

太平洋戦争史

第一卷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商务印书馆

太平洋战争史

第一卷 九·一八事变

編 者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

譯 者

金 鋒 冷 明

孔知行 王炳达 馬君雷

商 务 印 書 館

1959 年 • 北京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太平洋战争史” I “满洲事变”

1953年9月30日
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

太 平 洋 战 争 史
第一卷 九·一八事变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金鋒等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华印书局印刷 红旗装订厂装订

统一书号11017·89

1959年1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frac{1}{32}$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5千字
印张 7— $\frac{13}{16}$	印数 1—7,000

定价(9) 1.10元

出版說明

《太平洋战争史》是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的几位会员集体编写的。日本历史学研究会是日本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编写本书的几位会员，都是日本当代知名的进步历史学家。

本书与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撰写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根本不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曲解战争的起因和性质，向读者隐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历史过程，从而为垄断资本集团推卸战争罪责。本书的作者为了肃清这班御用学者的著述在读者中所起的十分有害的影响，收集了丰富的史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地区战争的性质和发生的根源。他们指出：侵略战争的罪魁是一小撮日本垄断资本集团，而日本军阀及其一整套的国家机器则是它们的意志的执行人。本书作者也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被侵略的国家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日本国内的劳动人民也身受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数十年来的劳动成果被大财阀和军国主义集团用于发动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中。

本书的题旨虽然是在叙述这一场战争的主要祸首——日本帝国主义在准备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局势，但作者并没有忽略叙述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人民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史实。作者站在国际主义立场，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叙述了这一段历史，作者对中国人民的斗争，是抱着深厚的同情的，他们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抗日斗争，是击溃日本法西斯的决定力量。

作者在分析日本准备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国际局势中，严正地

揭露了美国的不体面的外交政策。書中举出大量事实証明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对被侵略国家并没有給予真誠的援助,反而把軍火源源供应給日本侵略者,利用日本侵略为美国壟断資本服务。

本書不仅帮助广大的日本人民認清了过去这段时期的史实和真相,而且对日本人民的当前斗争起了鼓舞的作用。它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这一段史实,昭示了深受战争灾难的日本人民,必須起来坚决制止日本統治阶级企圖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的一切罪恶行徑,必須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反动政府企圖把日本拖入美国策划的侵略集团。日本人民已經愈来愈清楚地認識到,美国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目前,日本人民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殖民統治的斗争,我們深信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本書共五卷。叙述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包括了从 1931 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起到 1951 年在旧金山签订和約为止整整二十年的历史。

第一卷叙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前的国内历次事件和 1931 年至 1933 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侵略。

第二卷叙述 1936 年至 1940 年間的中日战争。

第三卷、第四卷叙述太平洋战争爆發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准备和战争的经过。

第五卷分析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日本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局势和 1951 年签订旧金山和約。

譯本是根据原書 1953 年版翻譯的。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1959 年 9 月

目次

代序.....	1
---------	---

——日本軍国主义的性格——

一 从被压迫国家变为帝国主义	2
二 帝国主义的确立	8
三 总危机.....	13
四 崩溃	18

第一篇 九·一八事变

第一章 世界面貌的改观	23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和列强	23
-------------------	----

中国革命的意义(23) 反帝运动(24) “五卅”惨案(25) 北伐的成功(27)
四·一二政变(28) 武汉政府轉向反动(30) 国共分裂(32)

第二节 世界經濟危机和国际政局的改观	33
--------------------------	----

“稳定”的崩溃(33) 經濟危机的爆發(35) 德国的破产及其影响(36)
战争危机的發生(38) 希特勒(38) 納粹德国的成立(44) 苏联的
社会主义建設(46) 苏联外交(48) 罗斯福的“新政”(50)

第二章 經濟危机下的日本.....	54
-------------------	----

第一节 金融危机和出兵山东	54
---------------------	----

中国革命的影响(54) 昭和金融危机(56) 台灣銀行救济法案和
若槻內閣的垮台(58) 田中內閣对財界的救济(60) 出兵山东和
东方會議(61) 美国支持蔣介石政策(63) 济南事件(65)
張作霖被炸死事件(66) “滿洲某重大事件”和田中內閣的垮台(68)
无产阶级政党的分裂(70) 福本主义(71) 反对干涉中国同盟(72)
1927年綱領和三·一五事件(73) “全集本”时期和无产阶级文学、戏剧(75)

第二节 井上財政和幣原外交	79
---------------------	----

濱口內閣的性格(79) 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和通貨紧縮政策(80)
产业合理化(83) 倫敦裁軍會議(87) 幣原外交(90) 罢工浪潮(92)
佃农斗争(95)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	98
第一节 “滿蒙”問題的紧迫	98
被压榨下的朝鮮(98) 万宝山事件(101) “生命綫”——“滿蒙”(103)	
中国的內战和中共势力的發展(106) 三月事件(109)	
第二次若槻內閣和軍部(112)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	114
柳条沟的爆炸声(114) 各国的反应(116) 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和犬养內閣的成立(119) 一·二八事件(123) “滿洲国”的建立(126)	
第三节 五·一五事件	128
日本的右翼(128) 十月事件(130) 血盟团事件(132) 五·一五事件(133)	
斋藤內閣的农村对策(135) 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138) 內田的焦土外交(139) 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力量(141) 1932年綱領(143)	
第四节 退出国际联盟和签订塘沽协定	145
李頓报告(145) 退出国际联盟(147) 各国的态度(149) 塘沽协定(150)	
第四章 “非常时期”	153
第一节 軍需通貨膨脹和农业危机	153
高桥财政(153) 軍事生产(154) 傾銷(156) 旧財閥和新兴財閥(157)	
国家壟断資本主义(160) 农业危机的严重化(162)	
第二节 法西斯主义的發展	163
五相會議(163) 帝国人造絲公司事件(167) 軟弱无力的岡田內閣(170)	
天皇机关說問題(173) 岡田內閣的加强(175)	
第三节 “非常时期”的体制和压制言論	177
工农运动的低潮(177) 佐野学和鍋山貞亲的变节(180) 从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納普)到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克普)(181) 反战作品(183)	
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失敗(187) 瀧川事件(189) 教育界的右傾(190)	
教师的抵抗(191) “非常时期”的社会風气(194)	
第四节 經營“滿洲”和侵略华北	196
統治“滿洲国”的方式(196) “滿洲”人民的生活(199)	
中日的接近与何梅协定(201) 中国的幣制改革(204)	
分割华北的工作(205)	
編后記	207
附录(一) 年表	210
附录(二) 資料	224

代 序

——日本軍国主义的性格——

近代日本的历史是不断战争的历史。战争和侵略是天皇制和资本主义日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手段。不仅一次战争与另一次战争的间隔非常之短，而且，这段间隔时间只是被用来处理前一次战争的善后和进行下一次战争的准备而已。正如经常用麻醉剂的人必须逐渐增加药量那样，天皇制和资本主义的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一次比一次扩大，最后，终于和全世界人民为敌，其结果，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取得教训，在遭到彻底失败以后仅仅八年的今天，又在大肆复活军国主义了。

日本人民为什么祖孙三代都这样地被迫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呢？难道这是由于日本人民的民族特性吗？不，日本人民决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日本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一样，从来就是爱好和平要求和平的，而且今天仍然是要求和平的。近代日本的一次战争都没有得到人民内心的支持。人民一直是厌恶和反对侵略战争的，但是，这种要求一直被统治者压抑下去，因而在政治上得不到实现。

那么，日本走战争的道路是否命中注定的呢？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日本国土狭窄、资源缺乏、人口过多。因此，日本人为了民族的生存，就必须发动战争来取得领土和资源。”这种说法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日本尽管由于甲午战争夺取了台湾，把朝鲜变成了事实上的殖民地，然而并未因此而不再发动战争；相反，却为发动更大规模战争准备了条件。而且，随着日本

領土和勢力範圍的擴張，就越發叫嚷“人口过剩”。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口过剩”的論調，几乎像常識一樣地遍及于全國。當時首相原敬和元老山县有朋曾就人口过剩問題作過如下的交談：

“山县認為我國尚有容納人口的余地，并談到了獎勵小農經濟的必要；這與我（原敬自稱）先前所說的相同，對此我是欣然同意的，向外國人宣傳‘我國因人口过剩而不得不向海外發展’，固然便於取得他們的諒解，但實際上在我國人口增加的比率上還存在疑問。我國可以容納人口的余地還很多，不必擔憂人口过剩，這可以從不久以前工業稍微發展了一下就馬上感到人力不足一事得到證明。”（“原敬日記”大正九年——1920年10月21日。）

山县和原敬都是近代日本的第一流政治家。他們比誰都清楚日本的真相，所以，在向日本和世界人民宣傳“人口过剩”的同時，他們本身却確認了人口过剩論只不過是便於對外侵略的宣傳。原敬和山县以後的人口过剩論，也是同樣騙人的宣傳。

那麼，為什麼近代日本的历史成了戰爭和侵略的历史呢？那是因為天皇政府和半封建的地主制度以及和這兩者緊密結合的特權大資本家統治着日本的緣故，統治者為了他們的利益，把日本從一次戰爭拖向另一次戰爭。

一 從被壓迫國家變為帝國主義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

日本向近代國家和資本主義的過渡，是經過明治維新由天皇政府自上而下進行的。

從十九世紀初葉起，農民、商人自發的反封建鬥爭即暴動和社會改革等激烈化了。同時，社會各階層對於歐美列強的嚴重壓迫，

以及对于这种压迫未能采取有效对策的幕府感到愤慨。改良主义的武士、地主、商人们，利用以上情况推翻了德川幕府，接着又廢除了諸侯、武士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1868—1871)以天皇为專制君主の統一国家。

1873年，天皇政府实行了所謂“土地稅改革”这一农业改革，承認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将按产量繳納的实物地租改为按地价繳納貨幣土地稅。然而，这并不是把土地發給农民，使他們从封建束縛中解放出来，虽然在形式上实物地租变成了土地稅，但實質上，却是由国家来榨取同等数量的封建地稅。同时，还把不屬於私有的原野、山林，甚至各村的公地也作为国有。这一改革还承認了使用农奴、压榨佃农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的处境絲毫沒有改变。佃农和从前一样，占全部收获量的 50% 以上的实物作为地租被地主夺去，他們根本沒有从农奴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中小自耕农也由于被殘酷地榨取着土地稅，不得不陸續将土地卖掉，至 1890 年前后，約有 68% 的农民成为完全的或部分的佃农。封建地主制度統治了农业和农村。地主成为天皇在农村統治的支柱。

資本主义企业，被作为天皇政府最重要的武力机关、軍隊和警察施行近代装备的手段而首先受到天皇政府的扶植。当时三井、住友、三菱及其他少数新旧巨商与官僚勾結，成为“政商”，从政府手中取得了極大的特权和庇护。他們从一开始就与国家資本主义并駕齐驅，取得了对商业、运输、金融、矿山等企业的支配地位。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后半起，这些“政商”就站在近代大工业的前列，在这方面也是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壟断地位。

扶植“政商”的資本主义的資金，主要是土地稅。同时，日本資本主义發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从呻吟在地主制度下的农民中，能够雇佣到不得不忍受極端低廉的工資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的大批劳动力，并对他們进行殘酷的剝削。

所以，無論从資本或劳动力來說，日本資本主义都是直接間接与半封建的地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天皇制是以这两者为支柱，同时又把它們結合起来。对于农民和工人不論是多末微小的反抗，天皇政府都要立刻进行无情的鎮压，来庇护地主和資本家。

人民的力量沒有从种种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使日本未能在民主的、革命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天皇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欧美屈从，而在另一方面，却又企圖借侵略朝鮮和中国来补偿它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民族自尊心上的損失。

实际上，近代日本从一开始就必须排除欧美資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約而进行的严重压迫，这一点恰好被天皇政府作为集中全力来扩充軍隊和警察以及鼓吹軍国主义思想的最好的借口而加以利用了。

他們在理論上也并不是不知道国内实行民主是完成独立的先决問題。可是，他們害怕国内的民主甚于外国的压迫。为了鎮压要求民主革命的人民，建立了軍事力量和警察力量，同时又企圖用这支武装力量侵略弱邻来欺騙要求对外独立的人民和达到自我滿足。所以，軍国主义也就成了天皇政府的固有的本性(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征韓論，1874年侵入台灣，1875年侵犯朝鮮江华島，翌年强迫朝鮮簽訂不平等条約、以后逐年加强对朝鮮內政的干涉，进行侵略)。

而且，这种侵略是在得到欧美列强的任何一国以上的支持和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可以从每次侵略事件的具体經過得到証明。譬如，侵略台灣是在美国的積極帮助下才开始策划和进行的。江华島事件以后对朝鮮的侵略，也是受到英国的鼓励以后才开始的。尽管这样，英美却一直拒絕了日本关于修改条約的要求。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半起，英俄在远东的矛盾更加尖銳化，当英国决定采取将日本作为它在远东对付俄国的走卒加以扶植的方

針以後，日本在修改條約上才逐漸成功。

日本的紡織、鐵路建設等資本主義大企業剛剛成長不久，到1890年很快地就發生了生產過剩的危機。這就充分暴露了由於天皇政府的殘酷榨取、地主的剝削和為了扶植特權“政商”而造成的經濟上顯著的不均衡，以及由此而必然產生的國內市場的狹隘。同時，又因連年米麥的歉收，更暴露了半封建的農業缺少足以供應向前發展的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糧食的穩定的生產力。為了擺脫這種困境，天皇政府和大資產階級加緊策劃了對外侵略。

日本統治階級的各階層都把朝鮮當做了糧食供應地而加以注視了。同時，企圖享有西洋各國同樣的特權侵入到富饒的中國市場上的野心也增強了。更由於日本對朝鮮的侵略逐漸加劇，就使得日本與朝鮮以及當時朝鮮的宗主國中國之間的對立，從1882年起日益尖銳化了。其結果，造成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當時，日本的統治者所以敢於發動戰爭，就是因為日本得到了英國的大力支持。這表現在英國答應了日本關於修訂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它同時還防止了帝俄過分干涉日本。英日修訂條約簽字後的第九天，日本就對中國艦隊進行了偷襲，這並不是偶然的。

日本由於甲午戰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它掠奪了巨額賠款和廣大土地，把清朝的勢力從朝鮮永遠地逐出了。它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由於這項條約，日本從中國奪取了比歐美各國所享受的更為有利的特權。以這次戰爭為轉機，日本從被歐美列強壓迫的民族，變成為與歐美列強同樣地壓迫其他國家的民族。天皇政府把要求擺脫歐美各國的壓迫以實現完全獨立的國民鬥爭，引導到壓迫鄰近各民族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甲午戰爭以及後來的帝國主義的道路。

戰勝的結果，日本資本主義得到飛躍的發展，奠定了輕工業的基礎。但是，這只是意味著三井、住友、三菱、安田、大倉、古河、澁

澤等少数特权大資本家扩大和加强了他們对金融、商业、运输、矿业、工业等各方面的直接或間接的支配，以及他們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已；它并没有使国民生活富裕起来。而且，由于資本主义的發展，以前被認為只是“貧民問題”的城市劳动者問題，在甲午战争以后就以“就业問題”的面貌出現，而劳資間的阶级矛盾已明显地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罢工的不断發生、以片山潛为首的工会运动、1901年的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宣言等，表明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經有了成長。

資本主义的發展，也給农业以深刻影响。可是，它并没有破坏半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反而加强了寄生地主制度，經營地主也变成寄生地主。大地主买卖股票和公債，漸漸成为工商业的經營者。另一方面，大資本家也大量購買山林和耕地，兼作寄生地主。这样，就加深了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关系。远离土地完全过寄生生活的地主增加了，并且，寄生地主与佃农之間的矛盾，作为仅次于劳資矛盾的日本的基本阶级矛盾而开始表面化。

1900年，对于城市和农村中新的阶级矛盾的發展，天皇政府和地主資產阶级的議會态度完全一致，在1900年制定了治安警察法，剝夺一切人权和自由，特別作出了有关鎮压工人运动和减租斗争的規定。

对外关系方面也和国内一样，旧的矛盾有了緩和，新的矛盾产生了。日本把清朝势力赶出朝鮮以后，在那里又遇到更强劲敌人帝俄。当时甲午战争就成为列强开始瓜分中国的信号，三国（指俄、德、法。——譯者）对日干涉就是这一竞争的最初的具体表現。对此日本虽然不得已屈服了，但是，它企圖在最近的将来寻找复仇的机会。

日本只要处在天皇制和侵略主义之下，在經濟竞争上是不可能战胜欧洲列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擴張須要具备以下三个条

伴：一、在远东只有日本一国拥有强大的军备；二、灵活运用远离欧美列强，而邻国又都软弱这一政治和地理上的有利条件；三、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及其他因素，日本可以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持。如果不具备以上这三个条件或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那末，日本的帝国主义的扩张，无论在这以前和这以后都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日本的统治者也知道。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镇压义和团民族斗争组织联军时，日本强行参加进去，并借此炫耀了它是远东唯一能够最迅速出动大批军队的国家。当时，日本还乘火打劫地钻列强的空子从台湾派兵到对岸的厦门，企图占领福建，但是遭到英国的干涉，只得罢手，日本的这次失败就是由于它缺少上述第三个条件。

上述三个条件中，最基本的东西是自己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天皇政府和资产阶级，还在日本和清廷讲和以前就为准备下一次战争进行了积极的布置。从中国取得的三亿六千万日元赔款的90%以上都用于军费方面。1903年陆海军的预算是一亿五千万日元，比1896年的七千三百万日元增加了一倍以上。

但是，因为国家财富被这样大批地投到非生产的军事开支上，所以原已萎缩不堪的国内市场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比，就更加狭窄。产业资金缺乏，又不能把朝鲜作为市场加以扶植，只有采取掠夺政策。这样，就使得朝鲜民族的抵抗进一步加强，使它倒向帝俄方面。因此，日本就不得不准备战争和更加依靠军备；其结果，削弱了经济基础。由于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扩大了一些领土，取得了一些赔款，可是，繁荣现象立即衰退。1897年发生危机，三年以后又是萧条，再过三年，又一次出现萧条，在这期间，就没有出现过全面的繁荣。这种情况使资产阶级急于寻求国外市场，并和天皇政府同样地发展了侵略野心。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和资本家的侵略主义相互配合着向前发展了。

可是，使日本成为侵略性国家的經濟上的脆弱性，使桂太郎首相也不得不承認“独当远东大局是很困难的”。因此，就需要和“欧洲的一国締結某种条約”，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現就是 1902 年的英日同盟。日本虽然成了远东的帝国主义，但是还必须从屬於某一帝国主义。

一面从屬一面侵略，也表現在經濟上。尽管日本国内苦于資本的短絀，但为了軍事目的，还得壟断中国的大冶鉄矿，以及在朝鮮鋪設鉄路，勉强来輸出資本。这样一来，国内的資本更加缺乏，其唯一出路就是政府和資本家想尽办法輸入外国資本。因得到英美的財政援助，日本才敢發動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軍費大約十七亿二千万日元，其中八亿日元是来自外債。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就是在資產阶级的帝国主义野心和天皇制的軍国主义成为一体、以及得到英美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的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显露了近代帝国主义的面目，同时，站在工人阶级立場的反战斗爭，第一次在日本历史上出現了。片山潛、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就是这一斗爭的領導者。当时，日俄两国人民为了和平进行的合作，具有特別深远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者的積極的反战斗爭，鼓舞了內村鑒三与謝野晶子等許多要求和平、憎恨和厭惡战争的人們。

二 帝国主义的确立

日本僥幸地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日本在沈阳战役以后，如果没有英美的財政和軍需品的大力援助，是絕對无法繼續打下去的。但是英美，特别是美国，并不希望日本获得徹底胜利，在美国的压力下，日俄講和成功，日本达到了侵略朝鮮及东北南部的目的，并夺取了庫頁島的南半部。

日本資本主义以这次战争为跳板，进一步发展了。企业的投資总额在战前 1903 年底为八亿九千万日元左右，至 1910 年底竟达到十四亿八千万日元。日本向东北傾銷商品，从那里排挤了英美商品。重工业的建設也开始了，但是这并没有消除日本資本主义的本質上的脆弱性。1907 年發生了严重的危机，以后經濟蕭条一直存在着。在这期間，虽然有些企业得到發展，各种工矿业的生产也有了上升，但都被用来建立財閥壟断資本。同时，这种产业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大量英美資本的輸入。1906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年，外資总额增加了六亿四千万日元，若将这个数目和同一时期企业資金增長額約十亿左右日元相比，就可以看出外資的意义有多末巨大。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同时加深了它在财政上对英美的从屬关系。

天皇政府和大資本家企圖靠掠夺台灣、朝鮮和中国东北来弥补这个弱点，它不仅断然拒絕美国关于共同經營南滿鉄路的要求，坚持了独自經營，而且还执行了从东北南部排斥所有外国势力的方針。日本从朝鮮赶走帝俄势力以后，到 1910 年終於击败了朝鮮民族的坚强抵抗，吞并了这个国家。在台灣，无情地迫害土著居民和汉族的地主、資本家(手工业工場主)，掠夺他們的土地，建立制糖厂，并对居民进行奴隶式的剝削。

日本的这种政策，使日本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圍繞着中国东北的市場同美国之間的矛盾發展了。美国当时还没有力量横越太平洋对日作战，只好和日本締結桂、塔虎特秘密协定(承認日本独占朝鮮，1905 年)和高平、路得协定(內容与前者大致相同，1908 年)，表示讓步，但它却企圖用“美元外交”在华北及东北扩展势力。由这里开始的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爭夺战，三十多年后終於發展为太平洋战争。

在这时期，中国 1911 年推翻清朝的革命宣告成功，翌年二月

中华民国成立。但是，由于軍閥的野心，中国未能实现坚强的統一，繼續处于混乱状态。日本乘此机会，在 1911 年發动了“滿蒙独立”运动。在南方“援助”革命派，企圖在他們胜利后，索取重大酬报；在北方，反对亲美派的袁世凱。

由于这样同美帝国主义的对立，并为了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和鎮压朝鮮民族激烈的反日斗争，日本統治阶级实行了漫无限制的軍备扩张。軍部强硬要求，陆軍增設四个师团，海軍建設八八艦队。由于这种要求和当时的經濟实力过于悬殊，連一部分大資本家也表示反对，但是他們并未抛弃以軍事力量弥补經濟弱点的基本政策。因此，經濟上的困难愈严重，就愈益急于要侵略中国。

在这种政策下，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極端困苦的。在日俄战争中，被欺騙的群众不滿情緒爆發了，1905 年 9 月东京發生了焚毁全市警察机关的暴动。群众已不怕从正面触犯統治势力（虽然是暴动式的）。特別是在危机以后，矿山、兵工厂發生了大規模的罢工，并且还和軍隊相对峙。其他工厂也陸續發生罢工事件。农民的减租斗争也在各地不断地展开。社会主义者活跃起来了。

为了鎮压这些运动，政府于 1910 年捏造了“大逆事件”，甚至連“社会”等字样也不許使用。由于这种殘酷的鎮压，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时期被窒息了，但工人阶级的經濟斗争并没有中断。这时，眼明手快的大資本家澁澤荣一帮助鈴本文治組織劳資协调的“友爱会”。不管該会的宗旨以及它的领导者如何，先进的工人都要求組織起来，因此参加了友爱会，并使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全国性組織向前發展了一步。

工人阶级的奋起鼓舞了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他們代表在財閥压迫下的一般产业資本的要求，攻击天皇政府特別是軍部的專制，反对扩軍政策。他們主張政府不只是对天皇，而且也應該对議

会負責；要求廢除軍部大臣武官制和統帥权的独立，并和工人阶级一起要求实行普选。

在他們领导下，进行了 1911—1913 年的护宪运动。群众包圍議會，要求憑借天皇大权肆行專制的桂太郎軍閥官僚內閣下台，結果桂內閣終于垮台。这一斗争的結果是，于 1913 年修改了官制，規定軍部大臣可以从預备役的大、中将中遴选。1914 年海軍的貪污（西門子事件）被揭發，当时，数万群众在議會旁边的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推翻海軍軍閥巨头山本权兵衛內閣，虽然同大批警察發生了流血冲突，但群众并未示弱。

天皇政府和大資產阶级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对內或对外，都一年比一年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他們总是千方百計地寻找借口，以便發動侵略中国的战争。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了，这对日本的統治阶级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机”。日本政府立即借口履行英日同盟的义务，而强行参加了战争，尽管英国本身并不欢迎。

日本軍隊迅速粉碎了在中国山东省境內的德軍，并占領了德租界和周圍屬於中国的領土，把大軍長期駐扎在那里不肯撤走。到 1915 年 1 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其內容分五点：第一点，把中国山东省变为日本事实上的領土；第二点，把內蒙古东部及东北南部变为日本事实上的領土；第三点，由日本独占汉冶萍的鉄矿、煤矿資源；第四点，中国沿海地区及島屿不得割讓与其他国家；第五点，由中国政府招聘日本軍事、財政顧問；中国警察由中日两国合办或者招聘日本顧問；中国軍隊所需的大部分武器由日本供应，或者将中国的軍事工业置于日本控制下。此外尚有七条，无非是要求把全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这些条件甚至使卖国的袁世凱政权也无法全部接受。他透露了日本的要求。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憤慨象怒潮一般高漲起来。

过去，中国人在那以前一直把日本当作模范的东方的先进国家和自己的朋友；从此以后，中国人开始認清日本帝国主义才是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懾于中国人民的这种反抗，日本政府在形式上将第五点撤回了。但是反映在那上面的意圖一刻也沒有打消过，为此，它支持袁世凱称帝的阴谋，此外还进行了削弱和分裂中国的各种活动。

在大战中，日本兼收了战胜国和中立国的利益。日本除了和山东省境内少数德軍作战，以及占領了几乎未設防的在南洋的德屬各島屿以外，仅仅是在大战末期，为了护送联軍的商船，派出过一个小艦队到地中海（这还是在和英法約定日本所占領的德屬各島战后归日本所有以后，才派出的）。因此，日本几乎沒有担负战争的开支，却从些微的交战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由于欧美各国商品来源断絕，中国市場当然不用說，就是整个东方和南洋的市場也都为日本商品所独占。另外，日本还向协約国出售了武器和軍需物質。

这样，日本資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大繁荣和惊人的發展。1914年底到1920年底，全国企业的投資总额从二十亿七千万日元增至八十二亿四千万日元，工厂从三万一千七百十四家增至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家，工厂工人由八十五万人左右增至一百五十五万人。在这期間，所有工矿业的产量都超过了五倍，其中机器制造业增至八倍，金屬工业增至六倍半。造船和鋼鉄工业的發展特別显著。日本的重工业已經建立起来。在对外貿易方面过去一直是入超，从1915年起轉为出超并繼續到1918年，出超总额达到十四亿九千三百万日元。

在农业方面，蚕茧的产值从1914年的一亿七千万日元激增至1919年的約七亿七千万日元。經濟作物的种植和畜产普遍地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長，从此有了富农經濟的萌芽。

通过这次繁荣，財閥壟斷資本确立了，日本走上了最新的帝国主义阶段。

三 总危机

但是，这种空前的景气和各种产业的飞跃發展，既沒有改变日本农业的半封建性質，也沒有改变半封建性的农业与資本主义产业的联系。因此，在未發生本質的变化的情况下，城市的各种产业异常迅速地發展起来，就使半封建性的农业与資本主义产业間的矛盾加剧了。这种矛盾在 1918 年 8 月即空前的大繁荣中間爆發成为波及到全国範圍的日本历史上最大一次飢餓暴动——“米騷动”。

“米騷动”的主要原因是：一、資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工业人口及城市人口激增，因而大米的消費量也相应地激增了。但是，由于寄生地主制度的束縛，大米的生产几乎沒有增加，又因为农民的大米消費量增長，以致产生了大米供不应求的現象；二、政府为保护地主利益，甚至未廢除外国大米的进口稅，并使三井、鈴木等特权政商壟斷大米的进口，使他們得以提高米价，攫取暴利；三、当时政府为了干涉十月革命进行儲备軍粮，这就加剧了大米的缺乏，助長了米商的投机活动；四、由于米价暴漲和通貨膨脹，实际工資显著減少；五、自 1905 年焚毁东京警察机关以后，群众斗争即不断發展起来；加之又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人民的斗争情緒更为高漲了。

这些因素匯集在一起，就爆發了这次大騷动。它意味着日本資本主义的矛盾已經达到无法調和和难以克服的地步，同时也表明日本資本主义摆脱不开因俄国革命的胜利而爆發的世界資本主义总危机。“米騷动”是日本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这一点，可从

“米騷动”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都陸續爆發开来，使得統治者一筹莫展这一事实得到証明。

“米騷动”象狂風一般席卷了全国，有六十个市鎮，由于出动了軍隊好不容易才鎮压下去。但在有煤矿的市鎮里，除了矿工以外，市区居民的斗争只坚持了几天。这是因为这次大暴动是自發的，沒有組織，在这一点上，它和从前的“搗毀”性質相同。但是，“米騷动”使日本人民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了，由于“米騷动”和十月革命影响的加深，工人、农民的階級斗争飞跃地發展起来。在軍事工厂、造船、鋼鐵、机械和紡織等大工业及矿山的工人带头下，罢工的規模和次数，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各产业中开始有工会組織。1919年友爱会改为“日本工会总同盟友爱会”，两年后，取消了“友爱会”三字样，改为“日本劳动总同盟”，与社会主义者結合起来，开始走上階級組織的道路。

1920年在东京举行了日本首次的“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参加的工人达一万人。根据官厅統計，減租斗争在1918年是二百五十六件，可是至1921年，竟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件（約七倍）。次年1922年开始組織日本农民协会。另外，为爭取受歧視的“部落民”的解放，在1922年3月还成立了全国水平社，这一运动極其迅速地在全国範圍內展开了。妇女运动也从小資产階級的妇女小組發展成为群众运动，馬克思主义的学生运动也誕生了。一切受压迫被剝削的人民都起来了。1922年7月，被認為非法的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秘密地成立了，它作为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的革命先鋒队，以廢除天皇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开始活动了。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人民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自覺斗争。

与“米騷动”同时，天皇政府和壟断資产階級为扼杀十月革命，派出了七万三千名西伯利亞远征軍。这固然是整个帝国主义国家

对苏俄进行共同干涉的一部分，而日本特別賣力。因为第一，充滿着矛盾的日本帝国主义特別害怕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存在，会使革命的影响傳播到和苏俄毗邻的朝鮮和中国东北的人民中間；第二，日本老早就渴望攫取西伯利亞和庫頁島北部的資源，因在經濟竞争上敌不过美国，因此企圖用武力占領这些地方，并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第三，日本还企圖利用这次远征霸占东北北部和外蒙。

可是，众所周知，日本这一企圖徹底失敗了。当其他国家已經承認失敗和撤兵以后，日本还不肯撤出，在西伯利亞一直賴到 1922 年 10 月，另一支占領庫頁島北部的軍隊直到 1925 年 5 月才撤出。这次出兵，不仅遭到最慘重的失敗，沒有达到任何目的，而且还向世界暴露了自己的侵略本質。

这次战争完全是天皇政府和大財閥發動的一場战争，它受到了人民的强烈反对。象“东洋經濟新报”等报刊始終反对干涉，要求立即承認工农俄国。大阪“朝日新聞”虽然不够明确，但也一直反对秘密外交和出兵。同时，日本的先进工人，例如佐藤三千夫还到了西伯利亞与苏俄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献身于保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1922 年，片山潛在西伯利亞鼓动日本士兵爭取早日归国。国内的工人也在 1922 年的“五一”劳动节提出了从西伯利亞撤兵和承認工农俄国的要求。以后不久，工会和各进步团体响应了英国工人的号召，組織了“反对干涉苏俄同志会”。日本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比日俄战争时代进一步提高了。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于 1919 年 3 月 1 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朝鮮全境，發生了“独立万岁”的民族起义，与日本軍隊、警察搏斗了三个月，在丧失主力以后，武装斗争还持續了好几个月。此后，朝鮮民族一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極端殘酷的統治坚持了斗争。朝鮮的殖民地經濟和日本本国經濟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首

先，日本本国的財政每年必須为統治朝鮮支出巨額軍事警察費。其次，三·一起义后日本为了欺騙朝鮮的人民和解决本国的粮食問題，制訂了朝鮮增产大米的十五年計劃；可是一旦有了些微增产，就与日本本国的地主利益發生矛盾。并且在朝鮮增产的大米也被掠夺了去运到日本国内，因此，朝鮮人越是种大米，就越吃不到大米，只讓吃从中国东北进口的杂粮。这种掠夺降低了朝鮮作为日本商品市場的意义。台灣的情况也是一样。

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也逐年高涨起来。1918 年日本为了把負担轉嫁給中国，把侵略苏俄的基地建立在中国境内，迫使段祺瑞政权接受“中日协定”，把中国军队变为日本的走卒，因此，中国学生和商人抵制日貨和反日的斗争进一步發展了。日本以二亿四千万日元貸款收买段祺瑞政权。又在上海、青島等地以紡織业为主建立起日本資本的工厂，虐待中国工人，进行不折不扣的奴隶剝削。这一系列行动迫使中国的广大群众走上反日斗争的道路。1919 年，凡尔赛和約将原屬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全部給与日本，这更加激怒了中国人民，爆發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从这时起中国的民族斗争的领导权轉移到无产阶级手中，这一斗争不可战胜地成長起来了。

战后，日本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和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进一步尖銳化了，开始了“日美战争必然爆發”的宣傳。虽然美国曾在 1917 年同日本簽訂了“藍辛·石井协定”承認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做过某些讓步，但是到大战結束以后美国也轉而采取攻势。1921 年的华盛顿會議就是这种攻势的第一步。在这次會議上，日本主力艦的吨位被限制为美国的 60%，这就动搖了日本在远东的軍事霸权，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天皇政府所賴以存在的最重要的条件。这时，又締結了有关中国問題的九国公約，它限制了日本在大战中从中国掠夺的权益，并且取銷了美国过去所

作的讓步。美国以門戶开放为借口，将中国改为列强共管，为美帝国主义敞开了擴張势力的大門。这时，部分由于美国的压力，英日同盟也宣告廢除。日本失去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开始陷于孤立。

在上述“米騷动”以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銳化、对苏干涉的失敗、朝鮮和中国反对日帝斗争的發展、日美矛盾的尖銳化，这一切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加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再加上1920年开始的經濟危机，使得这一危机更加严重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大發展起来的生产力，战后随着市場的縮小，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从1919年起，日本的貿易又轉为入超，市場已經急剧地在縮小，而生产仍然急剧地上升。不久在1920年3月，發生了由股票暴跌开始的危机。物价紛紛暴跌，棉紡織、毛織以及鋼鐵、砂糖、繅絲等业实行减产，銀行、公司陸續倒閉。由于生絲的暴跌(相当于高价时的四分之一)和米价的暴跌，农民受到致命的打击。

此后，日本的經濟从根本上动搖了。1921年受到裁軍的影响，1922年又有二十九家銀行破产，1923年由于关东大地震，經濟陷于大混乱，1924年进行了一些恢复工作，經濟虽有了某些好轉，但还有銀行破产，1925年大貿易商行高田商会破产，台灣銀行和朝鮮銀行等也因有巨額貸款难以收回而發生动搖。政府对此采取了直接給予救济貸款和津貼、減免賦稅、發放补助金及自己兴办事业等一系列措施，極力防止經濟崩潰。其結果，造成了公債的大量發行和通貨膨脹。另外在1917年9月，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实行了禁止黄金出口，但是这种禁令，美国在1919年6月就解除了，英国也在1925年4月解除了，可是日本却一直不能解除，因为担心解除这一禁令，必然造成通貨收縮，企业破产将会更加严重，同时还将給大米的販卖者地主阶级带来損失。这样，延緩經濟崩潰——

沒有实行所謂“財界整理”——的作法，使得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化，經濟穩定是毫无希望了。

四 崩潰 ——重新淪為被壓迫的國家——

經濟破產的最大犧牲者是工人階級。從 1920 年的危機以來，失業者激增，“失業問題”成為日本政治上的大問題。在此以前，城市的失業者可以重新回到農村，可是這時，農村本身還無法生活。工人和農民的唯一出路，就是團結起來，和資本家、地主及政府作鬥爭。不向殘酷的鎮壓屈服，工會和農民協會有了發展，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猛烈展開了。他們要求實行普選、修改治安警察法、從西伯利亞撤兵和承認蘇俄等等。同時從 1921 年起，也產生了成立合法的社会民主主義政党的要求。

工农群众的这种要求，使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有可能出來，為實現普選而進行激烈的鬥爭。在此情況下，壟斷資產階級認為只要普選能作為把群眾關在議會里的工具，和在天皇政權機構中擴展自己勢力的手段，可以同意普選。但是他們決不能讓普選變成工农提高政治覺悟和進行鬥爭的武器。這時甚至發生了這樣的事件，被宣傳為“普選之神”的尾崎行雄為了向“工人運動中灌輸勤王思想”，打算從宮內省(天皇)領取經費。（“原敬日記”1919 年即大正 8 年 2 月 20 日。）

作為各階級複雜鬥爭的結果之一，於 1924 年標榜反對官僚內閣、保衛憲政的憲政會、政友會和革新俱樂部等三派（“護憲三派”）獲得了聯合執政；1925 年初，在第五十屆議會上除制定了男子普選法以外，還以鎮壓共產主義為借口，制定了陰謀鎮壓一切真正民主鬥爭的治安維持法。

有人根据护宪三派內閣出現以后，有了普选以及所謂政党內閣的慣例这一事实，就認為日本的国家政权已經变成資產階級專政，其实不然。那只是意味着壟斷資本、地主和天皇政府官僚的勾結更加密切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势力进一步擴張罢了，天皇制的特点并未消失。官僚的堡壘樞密院，和以軍部大臣武官制与統帥权的独立为护身符的軍部权力，絲毫也未受到普选的影响。內閣从来没有因議會的不信任而垮台，但是只要得罪了樞密院或軍部，立即就会垮台，不管內閣得到議會多大的支持。再看看所謂的政党內閣絕對不可能从党内提出軍部大臣，而外务大臣也必須从外交官僚中遴选这些慣例，就可以知道它并不是真正的政党內閣。而且，这些政党是由官僚、地主和資產階級联合組成的，它的領導权一般是落在官僚势力的手里。

再看看“政党內閣”做了些什么。“护宪三派”联合执政的加藤高明內閣和加藤死后繼任的若槻礼次郎內閣，都是标榜“国际協調”，事实上在 1925 年承認了苏联，对于中国問題也打算和美英保持協調。但是这无非是伪装罢了。不應該忘記，加藤是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首謀者、当时的外相。这些內閣也曾在 1925 年派遣过軍艦到中国去鎮压过“五卅运动”，也曾把日本軍隊混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的軍隊中，去和英美派的直系軍隊作战，1926 年 3 月还派遣过艦隊到大沽口炮轟抗日軍隊。不过，进行这种侵略时，尽量想和英美協調罢了。

在國內，治安維持法首先适用于鎮压学生运动。日本农民协会、工会評議會及其他各工农团体煞費苦心好不容易才團結起来組成的單一的无產階級性質的政党“农民劳动党”，在組成的当天就被政府殘暴地勒令解散了。而它对于財閥和地主的保护却是无微不至。

但是不久，統治者們就連在国际上避免和英美对立，在國內多

少要伪装一点民主的那种慎重的态度也保持不住了。因为前面所說的經濟崩潰已經无可避免，到 1927 年的一开头，就爆發了金融大恐慌；另一方面，从 1926 年起，中国革命象暴風雨一般發展起来，这从根本上威胁了日本帝国主义。必須趁着中国尚未被新生力量統一起来的时候，在中国扶植起稳固的政治势力，以便确保市場，并分裂和削弱中国。既要这样干，还与英美講什么协调？还向人民伪装什么立宪？

統治者們除了考虑当前怎样解决由于日益尖銳化的国内矛盾而产生的一系列問題以外，什么也顧不得了。他們自己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賴以成功的三个条件。例如，不但沒有利用英美的矛盾，反而加紧推行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致反对的公开侵略中国和压迫国内人民的政策。这就是若槻內閣垮台田中內閣上台，出兵济南，謀杀張作霖，三·一五事件，修改治安維持法，终于在 1931 年發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又發生了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以至于發展为太平洋战争。这一段历史将在本論中詳述。当統治者們不再是一面从屬一面侵略，而專事侵略的时候，他們就遭到了空前的失敗。

这种战敗的重担，全部落在人民大众的身上。日本民族又变成被压迫的民族了。而且这次压迫不是从前那样比較溫和的压迫，而是世界第一号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受的不是領事裁判的压迫，而是軍事裁判的压迫；不是限定的居留地以內的压迫，而是遍布全国的軍事基地的压迫；不是征收 5% 的从价稅，而是对整个产业、金融和財政的完全控制。而發动侵略战争使民族陷于悲惨境地的禍首們，甚至利用战敗还攫取了利益，他們一直充当美国占領制度的工具。而深深懂得必須一面侵略一面从屬这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特性的所謂美英派外交官們，被安插在占領制度下的日本政权里，一面作为奴才屈从于美国，同时又梦想着早日加紧

复活軍国主义，充当美国的急先鋒去进攻亞洲各国。只要腐朽的天皇制、地主制和財閥壟断資本仍然存在，他們固有的軍国主义本質就不会消灭。

但是世界已經变了，特别是东方完全变了。中国和朝鮮已經成为朝气蓬勃的充滿創造力的人民的国家。日本人民也变了。日本人民的革命的、和平的傳統無論在質的方面或量的方面都已获得了远非以往任何时期所能想象的飞跃發展。历史的希望就在这里。和平战胜战争，人民战胜卖国反动派，日本民族一定会爭取到完全独立、持久和平和人民民主。这是和六十年前修改条約的道路截然不同的革命的独立。这是历史的發展規律。

第一篇 九·一八事变

第一章 世界面貌的改观

第一节 中国革命和列强

中国革命的意义

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至 1923 年期间，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革命的風暴席卷了全世界，大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体系。起先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日本(1918 年“米骚动”)等国，接着又在附属国或殖民地的埃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蒙古、朝鲜(1919 年 3 月万岁事件)发生了革命，同时在中国也发生了五四运动。在大战中，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成长起来，工人运动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五四运动便是在这样情况下发生的。这是第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目的的群众运动。

由于这次运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辟了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作为典型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世界革命的有力一环。

1923 年至 1928 年，资本主义处在所谓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英国和美国相互间对于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对中国的掠夺上，力求妥协。但是，这种稳定是靠大肆掠夺中国和其他殖民地才勉强保持下来的，因此，这些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加深，这

种稳定也就逐渐被破坏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翌年发生了香港海员罢工，1923年发生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帝国主义最害怕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增长了。以往，对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威力缺乏足够了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也从这些运动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反帝运动

这样，在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实行了扶助工农和与苏联友好的政策。群众的革命运动开展了，在苏联的援助下成立了黄埔军官学校（6月），加强了革命军。对此，英国很快就利用广东的买办和土豪劣绅的武装组织商团进行了干涉。但是立刻就被广东政府镇压了（1924年10月）。这时，在北方，直系军阀曹錕收买议员当了大总统，这些军阀是以农村封建制度为支柱的专制统治者，人民群众立即展开了反对曹錕的运动，孙中山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而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也发动了反直战争，结果曹錕失败了。在北京，张作霖和冯玉祥抬出段祺瑞成立了执政府。当时，人民群众极力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和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也认为有必要召开国民会议，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于1924年11月，孙中山到了北京。然而，当时段祺瑞却召开了仅仅包括当权派的善后会议，并与帝国主义勾结，发表了尊重不平等条约的声明。与善后会议相对抗，孙中山于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进会。但这时，孙中山已经病危，竟于3月12日逝世。他在遗嘱中指出：“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打败直系军阀后，群众组织急剧地发展起来，1925年5月，工会的全国性组织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并立刻决议加入世界工联。农民组织也在几个月内从三万人增至二十万人，同年9月，召开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大会。

这时正是帝国主义各国暂时摆脱了国内革命的危机，企图重新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来转化国内矛盾的时候。在此以前，英国就把长江流域作为其势力范围，又在各地经营纺织厂，还想把中国当作其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负的巨额债款的源泉，它最积极最直接地干涉了中国革命和民族产业的发展。因此，中国反帝运动的锋芒当时主要是指向英国。战后一跃而变为债权国的美国，国内的产业突飞猛进地发达起来，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也逐年增长。但是它并没有特殊的势力范围，因此就企图利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一类口号打入中国市场。日本在战后为了摆脱国内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局面，也希望向中国扩张，但是由于从“五四”运动以来开始的中国反日斗争的发展，以及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使日本感到：在与英美协调的情况下，采取逐渐渗透的办法侵入中国更为有利。所谓“幣原外交”（1924—1926年）就是这种政策。另外，日本还利用英美在中国的威信扫地和抵制英国货运动的发展（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以后），扩大了对中国的输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彼此间有利害冲突，但是在反对中国革命上却是一致的，因此，一旦有事，它们总是联合起来进行干涉。

1925年的“五卅”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五卅”惨案

在上海、香港等地，早就有很多日本人和英国人经营的纺织厂，这些工厂给工人的待遇是极端恶劣的，在工人的要求中常有“

提高工資”、“承認工會”和“不准捆縛和毆打职工”等条款。1925年2月,上海的日商紡織厂爆發了罢工,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外商的工厂,有七万工人起来响应。同年4月,青島的日商紡織厂相繼爆發了大罢工。4月8日,福州学生組織了反对殖民地教育的請願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学生遭到了屠杀。在这种形势下;5月15日,又發生了日本紡織厂資本家槍杀工人事件,这一事件立即引起群众的激烈抗議。为支援这次运动而散發傳單的学生被拘捕了。于是,在5月30日,学生們进入公共租界,进行了“抗議槍杀工人”“反对逮捕学生”等等的演講。奉命执行鎮压的英国巡捕到处逮捕演講的学生。在南京路巡捕房附近,集合了約有一万群众要求“釋放学生”,正与巡捕相持不下的时候,不料捕头命令开槍,杀伤了很多赤手空拳的工人和学生。这就是“五卅”惨案。

由于这次事件在全中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6月1日,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商人举行了大規模的罢工、罢課、罢市的三罢运动,連英租界的中国籍巡捕也实行了罢崗,同月7日,成立了上海反帝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同时在北京、青島、天津和其他許多地方也發生了激烈的反帝运动。6月18日,香港海員工会決議和上海、汉口采取一致行动,投入罢工,与帝国主义坚决斗争。6月23日,帝国主义者开炮轟击广州、香港七万人的示威游行队伍,被杀伤了二百多人,并宣布与广东政府絕交。于是,香港的中国工人有十余万人返回广州,發动抵制英国貨和日本貨的运动。这次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一直繼續到次年10月。这样由于“五卅”惨案,促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各阶级的革命联合,在全中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奠定了1925至1927年的革命的基础。特别是广东政府,通过这次事件加强了它的革命根据地。

“五卅”惨案在国际上也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斗争也是正在

与本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日本工人阶级自己的问题。当时，刚成立的日本工会评议会首先抓住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向社会宣传“援助中国工人”，“抗议日本政府”来唤起舆论，一方面不顾残暴的镇压，派遣三田村四郎、山本县藏二人为代表前往上海。由于这次派遣代表，加强了中日两国工人阶级的合作，又同好几国的工人代表举行会议，作出了有关太平洋地区工会互相团结的决议。日本工人，从这次革命运动中通过实践学习了丰富的经验，并在以后的工人运动中加以运用。

帝国主义各国对“五卅”惨案前后发展起来的反帝运动，不仅使用了屠杀手段，而且还积极进行分裂革命力量的勾当。列强对于在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面前感到威胁的上海中国中小资产阶级，一面提议召开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等表示和解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又以停止对租界内中国人经营的工厂的供电和供水等手段进行威胁。买办资本家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等人从中也有所活动。因此，总商会终于在6月26日决定结束罢市，走向破坏运动的道路。群众对此异常愤慨，罢工的浪潮扩展到中国人的企业，此后，资产阶级愈益倒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华盛顿会议以后，由于法国的策划使陷于停顿的关税会议好不容易在这年10月复会了。帝国主义各国虽然原则上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但是要从1929年才开始，同时，还附有中国政府废除厘金制度的交换条件。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的利害不一致，会议被拖延了。它们所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又爆发了混战，最后借口中国没有负责进行交涉的政府而把会议解散了。

北伐的成功

广东统一以后，在革命群众之间，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和解放全中国，就成为现实的课题了。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

‘国劳动大会作出“反帝反軍閥、拥护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決議，国民政府进行了北伐的准备。当时，以蔣介石为首的右派正在和資產階級一起企圖背叛革命，夺取左派的領導权。3月20日，他捏造“共产党企圖暴动”的借口，驅逐了黄埔軍官学校和第一軍內的共产党员，5月又制訂了限制共产党员活动的“党务整理案”。但是，当时，他还没有具备公开反共的力量。1926年7月，国民革命軍开始了北伐。蔣介石充当了北伐軍总司令，集軍令和政令的大权于一身，实现了他的完全的軍事独裁。7月12日，共产党發表了“第五次时局宣言”，号召加强各階級的革命联合陣綫和打倒軍閥、打倒帝国主义。这时，在北方，在日本支持下的張作霖扩大了势力范围，英国則帮助吳佩孚在長江流域重整旗鼓，巩固反革命势力。北伐軍首先进攻湖南，毛澤东等人組織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自衛軍同国民革命軍匯合在一起，迅速北上，在湖北击潰了吳佩孚的主力，并于9月7日和10月10日先后占領了汉口和武昌。北伐軍在江西方面，与孙傳芳軍隊作战，11月占領了南昌、九江。这样，就在那年年底革命軍光复了長江流域。在上海，为了配合这次北伐，在共产党领导下，于10月24日举行了武装起义，但由于孙傳芳軍隊的攻击和准备不足而宣告失敗了。在北方，从苏联回国的馮玉祥于9月17日就任国民軍联軍总司令，宣布全軍加入国民党，并率师于这一年年底平定了陝西省。1927年1月革命政府迁都武汉。

四·一二政变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使群众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全国的工人运动風起云涌，仅在武汉就有三十万工人組織起来了。以湖南、广东为中心，各地农民組織了农民协会，沒收地主的土地，在佃农之間进行分配，加强农民武装，甚至还自动地开展了禁止賭博和鴉片的运动。这种情况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为吃惊。它們

清楚地看到仅用鎮压政策已不能摧毀革命了。

1927年1月3日,在武汉召开了隆重的庆祝革命胜利大会。那时英国水兵竟敢襲击群众,造成了伤亡。群众万分憤慨立刻驅逐了租界內的英国警察,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的決議,接收了英租界。接着在6日,在九江的英国兵又槍杀了中国工人,因此群众就接收了九江的租界。在群众运动的压力面前,英国只能在形式上提出抗議而实际上却不得不退縮。这是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面临这种局势,列强愈益積極地致力于分裂国民党內部的工作。蔣介石首先派戴季陶去日本,又通过黄郛、張群、王正廷等与浙江財閥相勾結,并以六千万元的代价,答应了与列强有勾搭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反共灭共”的等等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准备。当时,在上海为配合革命軍的北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市民进行了三次起义。第一次起义(1926年10月24日)失敗后,1927年2月17日,当北伐軍占領杭州时,又举行了一次起义。这次有36万人参加大罢工,但是,由于准备工作的不充分和北伐軍的停止进攻上海,起义又告失敗。这两次失敗並沒有吓倒上海工人,他們进行了第三次起义的准备。这次广泛地进行了政治工作。工人們組織了糾察队,武装了自己。3月21日,絕大多数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接着,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举行了武装起义,經過激烈的巷战之后,把軍閥的軍隊赶进租界,第三次起义取得了胜利。22日,在工人占領了全上海几小时以后,北伐軍司令白崇禧的軍隊开进上海。这时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但形势十分緊張,不是北伐軍和工人市民的統一战綫取得胜利,就是資产阶级和租界势力联合起来破坏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蔣介石看到了这一点,認為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时机已經成熟。他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及虞洽卿等买办阶级进行政治交易,另一方面,又伪装革命派,利用当时在共产党內部处于领导地位的陈独秀

派的右傾机会主义，对革命力量进行压迫。他首先禁止了作为人民自治政权的上海市民會議，并抓住陈独秀派只顧和民族資產階級謀求統一的弱点，将它摧毁。

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北伐軍占領南京的那天（3月24日）即借口侨民受到損失而炮轟南京城，杀伤了兵士居民二千余人，打击了反帝运动的势力，促成了民族資產階級右派的脫离革命。在南京事件以后又經過半个多月，發生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4月11日，白崇禧将部队秘密集結在上海，使用流氓和帮会分子伪装工人，与工人糾察队發生冲突，然后借口鎮压工人內訌，解除了糾察队的武装。尽管这样，工人們仍然沒有認清这些直到昨天还是朋友的人們的眞面目。12日，全上海工人召开市民大会，举行了向司令部請願的大游行。群众走到宝山路时，突然机关槍彈如雨点般飞来，轉瞬間，尸体堆积如山。同时，上海总工会也被流氓占領，各工会都被搗毀，工人运动領袖遭到逮捕，一切革命組織都被殘暴地破坏了。这次政变还在南京、无錫、宁波、杭州等地同时进行，4月15日，在广州也进行了大規模的屠杀。

蔣介石所代表的背叛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与买办豪紳站在一起，向帝国主义表示屈服，丧失了它的民族立場。这样成了新軍閥的蔣介石集团成立了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相对抗。

武汉政府轉向反动

因为反革命政权——南京政府已經成立，所以，武汉国民政府便在1927年4月17日，把蔣介石开除出国民党，并向全国發出了討伐蔣介石的檄文。对此，蔣介石勾結統治上海一帶市場的浙江財閥（浙江省出身的大金融、买办資本家集团），在他們的援助下，擴張了势力，控制了長江下游一帶，并进而加强了对武汉的經濟封鎖。同时列强也積極援助蔣介石，对武汉施加压力，很多挂着英国

旗、星条旗或太阳旗的炮艦在長江上巡邏，进行恐吓。处在这种情况下下的武汉，由于生活必需品缺乏和物价暴漲，在經濟上逐漸感到困难，資本家和大商人开始动摇起来。其中有些人和南京勾結，有意識地关闭工厂或者在生产上实行怠工，停止貿易，这就越發加重了混乱局面。支持武汉的是工人和农民。刘少奇领导的工会为了应付反革命阴谋，加强了武装糾察队。在农村，以湖南省为中心，由毛澤东领导的农民运动有了飞跃的發展。这一省有三百余万农民組織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自衛队。农民們在农村中逮捕了軍閥的支柱大地主和土豪劣紳并开始沒收和分配他們的土地。这种农民革命的發展震动了武汉政府地方軍隊中的高級軍官。他們是当地地主和豪紳的兒子，他們之所以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和这一新兴的强大政治势力結合起来，以便打倒北方的旧軍閥，扩大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地盘；至于佃农們会成为乡村的和地方的主人翁这样的事，对于他們簡直是不堪設想的。同时一旦站立起来的农民也决不会寬恕他們的家屬。第三十五軍何鍵家乡的农民們捉住了他的双亲，和其他土豪劣紳一起，給戴上高帽子牽着游街。面对这种工农势力的急剧高漲，武汉国民党領袖汪精衛和孙科等，懾于資本家和軍閥的压力，責难“工农运动破坏国民革命”，要求糾正这种“偏向”。5月以后，各地連續發生了地方軍隊的叛乱，在湖南省會長沙，有实力的地方軍隊勾結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發动了“救党政变”。他們搗毀了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建筑物，槍杀了一百余名共產黨員，要求武汉政府进行“清党”，与共产党断絕关系。看到这种动向，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即利用其“中間立場”出面为南京与武汉进行調解，他呼吁汪、孙辞退苏联顧問鮑罗廷，与共产党断絕关系，并同南京政府合流。到了6月初，汪、孙解除了鮑罗廷的顧問职务，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压迫，武汉政府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已經十分明显了。毛澤东、刘少奇等早就主張建立并加强工人、学

生的义勇軍以代替不可靠的地方軍隊，在此危机临头的时候，他們又主張进一步加强工农运动，并武装工农来对付反革命的阴谋。当时，为了对付長沙政变，十万农民自衛队已經完成了对長沙的包围，在城市中的工人們也正在迅速地准备武装起来，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主張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共产党总書記陈独秀压制了毛澤东等人的主張，命令解除对長沙的包围和解除一切工人武装，企圖用妥协和讓步来維持与国民党的联合陣綫。值此千鈞一髮之际，軍閥势力利用陈独秀的动摇，更大肆加强恐怖手段。6、7月間，在国民党公开承認之下，武汉政府統治下的整个区域内对于左派进行了殘酷的鎮压，几千名工人、农民和学生“犹如秋天的稻禾一样都在利刃之下倒下来了”。

国共分裂

事态發展到这一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終於决定退出武汉政府，接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發表了退出武汉政府的声明，声明中說：“中国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孙中山“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而“武汉的国民党領導者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叛徒”。郭沫若、邓演达等联苏、联共派也接着退出政府，国共合作从此結束了。不論在南京或是武汉，全中国到处都弥漫着狂暴的白色恐怖，城市或乡村都为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同情者的鮮血染紅了。当时，魯迅曾对此惨状作了如下的控訴：“……而且对于別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顧惜。……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对过死刑。但是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凌迟，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后脑上么？結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

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鲁迅：“而已集”见“鲁迅全集”第三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42—343页)

8月,对抗这种白色恐怖的南昌工人和朱德等人领导的二万余革命官兵举行了起义,组织了国民革命委员会,但由于受到反革命军队的攻击而失败了。接着在12月,广东的工人和贫民约五、六万人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给工人以面包”“给农民以土地”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口号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对反共势力和大资产阶级实行了“血的清算”。但是,城市起义的这一最后反击也因为外国军舰的炮轰和各派军队的集中攻击而失败了。这期间,在“赤色”威胁面前一致行动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其他各派逐渐与南京政府合流,建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并继续施行了白色恐怖。据记载,“在1928年1月至8月期间,至少有四万工人农民被杀”。在这样的白色恐怖的风暴中,中国的革命力量逐渐转入了低潮。

田中义一内阁的出兵山东事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第二节 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政局的改观

“稳定”的崩溃

中国革命的发展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这种发展使日本统治者必然要采取积极侵略中国的政策,也使日本与英美两国势力的竞争和矛盾尖锐化,从而,形成新战争的原因。诚然,在1925年的罗迦诺条约和1928年的非战公约订立的当时,乍一看来,使人感到国际政局已趋稳定,一切战争威胁已经消除。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说明了这种国际关系的稳定是建筑在牺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基础上,而这种稳定也已经开始崩溃。到

了 1929 年，資本主义总危机卷入了除苏联以外的整个世界以后，一切稳定都破坏了。无止境的經濟蕭条和失业者的增長，人民生活的下降和政治的反动化，擴張軍备和国际間矛盾的尖銳化，这些成为各国通有的現象，国际間的協調破裂了，各国选择了各自的道路，世界大战的危机不斷增長。东方的情况以及日本在东方的国际地位，也和这种世界局势互相联系在一起向前發展着。在此，讓我們来回顧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

1928 年 8 月，列强在巴黎締結了非战公約，它的第一条就是那有名的規定：“各締約国以代表其本国人民名义庄严宣言：各国深覺用战争以解决国际爭端，以为相互間国际政策之工具，应予以廢止。”不到一年，加盟国达到六十余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年，到处都贊美着国际協調，認為現在“持久和平”已經不仅仅是人們的理想了。各国的通貨得到了稳定，信用也恢复了。貿易很兴隆，工业生产也正在增長。特别是处在資本主义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更取得惊人的發展，人們在贊美着“无止境的繁荣”和“永久繁荣”。例如：美国总统柯立芝于 1928 年底在議會里談到次年度的經濟情况时，得意地宣称：“有責任綜观合众国状况的这次議會，有着前所未有的美好的前景。……对我国目前情况感到滿意，对于将来也非常乐观”。有名的通用汽車公司經理也曾說：“我对 1929 年的看法是建立在确信我国的經濟状况和产业状况将是徹底健全的这一基础上的”。

在 1923、1924 年至 1928 年的所謂“資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时期”，資本主义各国依靠美国的經濟援助和国内的产业合理化以及鎮压各国内部的革命运动，才暂时得到了稳定，并摆脱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經濟破坏和战后的革命危机。

但是，这种資本主义世界政治經濟的“稳定”为 1929 年 10 月开始的經濟总危机所代替了。这就說明：“稳定”实际上仅仅是“相

对的”，同时这也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的起点。

原来，“稳定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可以说在它的繁荣之中就包藏了必然陷入危机的各种因素。欧洲各国大多数是依靠美国的资本输出得到复兴的。战后，日本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资本主义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讽刺的关系：欧洲各国的产业复兴使它们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各国的产业合理化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使人民群众日趋贫困，从而缩小了国内市场，出现了产品的滞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为了发展其资本主义，必须在剥削本国工人的同时，加强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其结果，必然会引起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等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不能不遭到这些民族的强烈抵抗。从 1928 年起，在世界经济上，明显地开始出现生产过剩的征兆。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开始出现了农业危机。到了 1929 年底，中欧、东欧各国也苦于工业危机。这样，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日益加深，危机的爆发已势所难免，它不在别处，终于在美国爆发了。

经济危机的爆发

1929 年 10 月 24 日，在纽约的华尔街，股票行市开始暴跌，这一现象立刻蔓延到伦敦、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等地的股票交易所。危机立刻在工业和农业部门出现了。按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规律，加拿大、日本，其次是中国和殖民地各国都相继被卷入了这次危机，并很快地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危机的速度和深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这次危机的确是以空前未有的气势袭击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工业产量和贸易减少了一半。企业相继破产，工资不断降低，不断发生解雇工人。失业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到 1932 年年底，据说欧洲的失业者达二千万人，全世界达到三千五百万到五千万人。物价暴跌，尤

其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特别显著。为了防止价格下跌,在巴西,一年内,有一千万包咖啡被烧毁和投入海中,或代替爐渣来鋪路。在倫敦,整船的橘子被扔在海里。一方面,农产品因滞銷而發生过剩,被糟蹋掉,而另一方面,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农民却处在悲惨的貧困状态。特别是殖民地农民的貧穷更达于極点,当时有过这样情况:“在上海的郊外以及在陝西省延河两岸,設有販卖人口的‘人市’,那里不滿十岁的女孩只值美金二元至三元。十岁以上的少女的价格也不过五元美金”(华南晨报)。在美国的阿肯色州,农民“如今把少得可怜的收获物的最后一点也都消費完了,他們把騾子牵至森林里,任其餓死。孩子們因为沒有衣服而不能上学。最后的希望就是紅十字会的救济。”(芝加哥論壇报)

德国的破产及其影响

德国的經濟危机最为严重。1929年6月成立的楊格計劃虽比以前的道威斯計劃稍見緩和,可是,对德国來說仍然是沉重的負擔。德国在經濟上依附于列强,支付賠償本身也是依靠外国資本。由于危机的發生以及德国政局的不稳定所引起的法国和其他各国对德投資的回收,使德国經濟陷于动蕩。1931年5月13日,控制整个奥地利金融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大銀行奥地利信用公司倒閉,金融危机的風暴襲击了德、奥两国,德国国内的产业衰退,財政赤字大增,失业者急剧增加。于是,面临德国經濟崩潰的危机,6月6日,德国总理勃魯宁向英国傾訴了支付賠償的困难,但沒有得到結果。德国經濟的破产对于在德国和其他中欧国家拥有很多投資的美国來說,将是重大的損失,面对这样情况,6月20日美国总統胡佛对德国發表了一项允許德国緩期一年支付賠償声明。因此将要特別受到損失的法国虽一度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在8月11日由英、法、日、意签署了一项允許德国緩期支付的協議。但是,德国

第二大銀行唐納德銀行已于 7 月 13 日歇業，德國的金融危機日趨嚴重，至 1932 年 1 月，德國竟發表了無力支付賠償的宣言。這樣，自 6 月召开的洛桑賠償會議經過討論了危機下的國際債務問題以後，將德國賠款數額減少到楊格計劃規定數額的 10%，至此德國的賠償問題實際上已告一段落。英法之所以同意這項協議，是打算以此來抵銷他們自己的對美戰債。美國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後來，英法的對美債務也在曖昧之中不了了之了。至此，英法從德國索取賠款，用以償還對美戰債的這條國際經濟上的循環鎖鏈也隨之消滅了。

德國的金融危機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恢復比較緩慢的英國帶來了危機。英國從美法借來短期資金，然後當作長期資金貸給德奧，自己處於從中取利的地位。特別是法國由於顧慮德奧的金融危機及其對英國的影響，從倫敦提回了資金。這樣，在 1931 年夏天，外國資本的收回和黃金外流便達到龐大的數額，英鎊受到了嚴重打擊，到 9 月 21 日，英國政府及英格蘭銀行終於停止了金本位。英鎊的崩潰對各國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印度、挪威、丹麥以及日本都相繼停止了金本位，至 1933 年 4 月，連美國也效法了上述國家的措施，於是，世界的幣制崩潰了。幣制的崩潰招致了外匯跌落和商品傾銷，這就促使各國採取對策提高關稅，進而引起了各國競爭的愈益尖銳化。各國為了保護其附屬國和殖民地，必須提高關稅來對抗其他國家。所謂“集團經濟”的道路就是從這時開始的。1933 年 6 月 12 日，66 個國家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由於各國在戰債問題和外匯協定問題上的矛盾而宣告失敗。這種情況說明了危機的性質是何等深刻！同時，也加速了走向集團經濟的傾向。1932 年，英國曾在渥太華會議上決定加強英聯邦內各地之間的合作和防止外國商品的進口，企圖加強大英帝國內部的聯繫。法國則以其擁有大量黃金和仍然保持金本位制為武器，力圖向中

欧、东欧各国建立它的金融統治。另外，美国也極力想办法把南北美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和德国也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集团。这样，整个世界行将分为几个集团。同时，一个集团的确立势必須以排除其他集团势力的侵入为前提，而每个集团本身又都有向外扩张的冲动，因此，帝国主义列强間的利害矛盾势必更趋尖锐化了。

战争危机的發生

进入 1933 年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有了部分的恢复。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走向繁荣，却轉入了慢性的蕭条。列强各国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了。同时，担負危机重担的各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革命的反抗也增强了。当时，未受到危机風暴的社会主义苏联正順利地执行着第一个五年計劃，它的發展力量对于资本主义列强是一种无形的威胁。列强在要求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同时，又不得不与各种革命势力及苏联相对抗。于是，各国乃紛紛进行扩张軍备，發展軍事工业，提高了軍事預算的比重。这样，列强都有了在国内建立鎮压革命势力和进行战争的政治体制的企圖，日、德、意的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企圖的露骨表現。在危机的風暴中，日本侵占了中國东北；在德国，納粹掌握了政权，并公开进行重整軍备；意大利征服了埃塞俄比亞。这些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

希特勒

德国在这次世界經濟危机中所遭受的灾难是非常惨重的。失业者在 1931 年达五百万人，至 1932 年据說超过了八百万人。就业者的劳动条件也逐渐恶化，工資减低了一半。这种情况当然要使群众趋向革命，在大选中共产党的得票数，1928 年是二百二十

六万票，1930年是四百六十万票，至1932年11月便增加到近六百万票。面对着这种革命的危机，德国金融资本家为维持其所统治的社会机构而选择的出路，就是使当时正在伸展势力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执政，以便建立反动的暴力政治——法西斯主义。1932年9月，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曾说：希特勒运动的使命，就在于挽救资本家的统治。1933年1月初，前总理巴本和希特勒在莱茵银行家的住宅举行了会谈，有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代表戴逊参加，会谈得到成功，1月30日以希特勒为首的国社党和右翼国粹派的联合内阁成立了。对内高唱“全体主义”、对外标榜好战纲领的希特勒政权的建立，表明德国社会已经失去一切的民主自由，并且使人明显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

当然，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已经培植了法西斯统治的因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导向停战的1918年的德国革命，虽然受到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全力支持，但是在并不希望彻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当时，以被宣传为最民主的威玛宪法为象征的新德意志共和国，一方面虽然建立了议会制度，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可是另一方面，为了阻止社会主义革命，也维持了各种反动势力和半封建的“容克”（地主）土地所有制。德国的军部虽然缩小了，但是它的首脑机构却为政府保存下来。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担心德国“赤化”的列强各国在这点上，显然表示了宽大，而这种情况恰好为德国反动势力所利用。凡尔赛和约规定了德国的战争责任，并决定了剥夺殖民地和缩小领土等项措施。在1921年又决定向德国索取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的赔款。于是，德国人民反对条约的呼声澎湃而起。这种赔款，对于在战败以后面临着社会和经济的雕敝的德国确实是苛刻的条件，德国确已处于民族危机的边缘了。

1923 年法国以德国不履行賠款为理由，占領了魯尔区。这次影响更为深刻，生产停滯，同时因为在战争期中濫發紙幣和支付賠款所引起的通貨膨脹現象愈益严重，到同年 11 月，馬克紙幣的价值已暴跌为一万亿分之一。

劳动人民和中产階級陷于悲慘状态。由于紙幣的价值不断下跌，据說：工人的妻子到工厂門口等候拿到工資的丈夫，赶紧拥向面包房。当时有很多有趣的傳說，例如，为了打电报，須用車子載鈔票；孩子們用煤球代替鈔票去看电影，等等。中产階級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化为烏有。左右两派在这种社会不安情况下，双方分別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活动。这一危机的深刻化，对于不希望德国革命化而相反地期待它成为防苏堡壘的英美等国是极为忧虑的，为此挽救頻于崩潰的德国就成为欧美諸国的迫切問題了。但是，为了挽救德国就需要資本。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並沒有深入地参加到欧洲的国际关系里来，也沒有加入国际联盟。但是到这时，却不得不参加到对德救济的工作中来了。以美国副总统道威斯为首組織了賠償委员会，1924 年 5 月，制定了所謂道威斯計劃，規定了合理的德国賠款支付方法。为了恢复德国的財政，發行了巨額外債，其中半数以上是由美国資本承購。

道威斯計劃的成立暫時稳定了德国的政治和經濟。但是，这种看法是从德国的大資本家和政府的立場出發的，实际上，德国人民本身的牺牲却愈来愈大了。并且，以 1923 年的通貨膨脹为中心的德国經濟危机对于大資本家來說，反而創造了有利条件。失业者的增加，工人的貧穷便于降低劳动条件；中小企业的沒落更为大資本开辟了壟断化的道路。以这种壟断資本的力量为后盾，政府一方面压制共产主义势力，同时在 1925 年，又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倒霉的敗将，而在国民中尚有声望的兴登堡拥为总统，繼續了它的統治。

这样,稳定时期的德国资本主义一方面依附于外国资本,在外交上取得国际协调,同时又企图伺机恢复其自己的帝国主义;随着德国经济的逐渐恢复,就露出了向中欧、巴尔干、近东扩张以及与列强进行竞争的动向,还进而秘密策划扩充国防军。而在魏玛共和国统治下,象纳粹一类的国粹主义团体和右翼团体也没有受到多大限制。

纳粹是德国国家社会党的简称,它本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诞生的许多规模很小的国粹主义团体之一。该党之所以逐渐壮大,并终于获得了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1919年1月入党的阴谋家和煽动家希特勒的手腕。在希特勒加入该党时,纳粹党是微小无力的,从他的“我的奋斗”中以下的話可以得到说明,他说:“现在我还记得,最初我曾经亲自分发过80张党的请柬,然后等待预定晚上来的群众。过了规定时间一小时,主席终于不得不致会议的开幕词。但是只有七个人,就是那经常来的七个人”。1920年2月24日,在国粹主义势力的中心地慕尼黑召开的该党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希特勒发表了所谓“二十五条纲领”,明确了该党的目标。其大意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建设大德意志,求取殖民地,反对议会政治和排斥犹太人等,同时还主张没收战时所发的横财,壟断企业国有化,大片私有土地的重新分配等等。这些要求的内容,固然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它一方面标榜着急进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针对着处在民族灾难中的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宣传了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对外强硬论,对人民进行欺骗性的诱惑。这种诱惑首先吸引了复员士兵、失业者,青年和妇女。纳粹从国防军、资本家和高級官僚手里接受活动资金,大力进行宣传活-动并扩大了党的声势。同年12月,以其从国防军方面获得的六万馬克的资金,收买了“民族观察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1921年8月,在鮑埃倫軍团参谋爱倫斯脫·萊姆大尉的领导下組成了希特

勒的 S. A 冲锋队。纳粹党即以这种秘密武装组织为核心，在性格上逐渐成为暴力主义的政党。

“群众不能判断敌方的错误终于何处，我方的正确始于何处。群众在看到我們猛烈攻击敌人的时候，就认为这是我方正确的证据。”“让群众把几个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的敌人看作是同一类的，这会使缺乏自信的人怀疑到他們自身的立场。”这些就是希特勒宣傳的信条。

希特勒在 1923 年 11 月与反动的鲍埃伦政府及部分国防軍相勾結，在慕尼黑举行暴动，但因失敗而被捕入獄。他在獄中写成了有名的“我的奋斗”一書，这部記述了希特勒的思想和政見的书对于了解納粹的内外政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义。1924 年 12 月，希特勒出獄时，德国已进入稳定时期，因之，納粹的活动也暂时轉入低潮。这时，納粹改变了活动方針，把重点放在党的群众化，組織青年和議會斗争上，并吸收了許多小的右翼团体，逐渐扩大了党的势力，至 1928 年，在議會内获得了十二个議席，党员超过 10 万人。随着 1929 年世界經濟危机的到来，德国群众特别是中产阶级、青年和保守的农民都既反对共产主义，而又对資本主义持有反感，同时又对懦弱无力的社会民主党感到絕望。这种情况使得納粹势力大为擴張，在 1930 年 9 月的大选中，納粹党竟取得一百零七个議席，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納粹势力在仅仅二年半時間內得以扩大到如此地步，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最明显的就是中产阶级因受到危机的打击而产生了絕望和憤怒情緒，他們在納粹的不合理的宣傳中，找到了他們这种情緒的發泄的方向。在格雷澤的小說“最后的市民”中，敘述了納粹分子在集会上發表的如下的演說：“1918 年以来，你們信任了現在的世界和現在的欧洲。你們在那侮辱性的条約上签了字。只因你們相信現在的世界是正直的，所以名誉才遭到沾污。可是这次，連仅存的一件襯衣都将被剝去了。

你們是何等愚蠢！鑽進了一切國家政府中的猶太人正在設法勒你們的脖子。但是你們却被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等非德意志的字眼所蒙騙而昏睡着。來！這次可要把這些字眼一脚踢開！把現在的世界一脚踢開！我們沒有相信過現在世界的正直。世上的人們嘲笑我們已有十年了。可是，現在要反復向你們呼吁！當面向你們大聲疾呼。德國必須強盛起來，必須重新拿起武器，只有這樣，才能受到尊敬。這一點，只要看看權力和恐怖在統治着世界所有的民族這種情況，就會明白了。”納粹的發展在東部和北部的農村地區特別顯著。例如，在東普魯士的得票數，1928年是0.8%，至1930年則增加到21.5%（全部有效投票數的百分比）。在大城市和工業地區也是如此，在漢堡，在這期間，它的得票數從2.6%增長到了19.2%。

但是，在同一時期共產黨的發展也是非常顯著的。對社會民主黨的失望和對納粹抬頭的威脅，鞏固了工人階級對共產黨的支持，在德國中部、上紹林吉亞和柏林等工業地區，共產黨凌駕其他一切政黨之上而成為第一大黨。在以後的歷次大選中，納粹黨和共產黨的得票數總是不斷增長，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等一向成為魏瑪共和國的支柱的中間派政黨逐漸變成了少數黨派。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金融資本家夏哈特的活動，德國金融資本家逐漸表明了支持納粹的動向，國防軍容克地主等各種反動勢力也越來越支持納粹。自從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對納粹給以財政援助的人物中知名的有以萊因——威斯特伐利亞重工業資本為背景的萊比錫銀行總經理夏哈特，大鋼鐵資本家戴遜和魯爾大煤礦資本家基爾道爾夫等人，他們都是為阻止工人階級的革命化而對納粹的活躍寄與很大期待的資產階級分子。基爾道爾夫在1929年曾說：“當愛國精神已被破壞無余的今天，能夠這樣地糾合和吸引國粹主義的同志的人，有資格抱有巨大的信心。榮幸地列席國社黨大會的我，儘管

对貴党綱領上的某些条款持有反对意見，但不能不承認你所领导的运动能使我們祖国德意志得到复兴，也不能不祝賀你們运动的成功”。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当时情况。这样，納粹党員人数急剧地增長起来，1929 年是十七万六千人，1930 年是三十八万九千人，1931 年是八十万六千人，至 1932 年便增加到一百万人了。

納粹德国的成立

經濟危机下的德国，由中央党的勃魯宁維持着政权。这个得不到議會多数支持的政权，未經議會同意，就用总統的紧急命令，一意孤行地推行了專制的、反工人阶级的政治。这意味着魏瑪共和国的民主的一面已經丧失，而社会民主党却还支持 勃魯宁 內閣。这个內閣所表現的專制傾向，在 1932 年 6 月巴本成立內閣以后，进一步加强了。7 月，巴本內閣搞了一樁所謂“普魯士的侮辱”事件，把社会民主党逐出普魯士的州政府，夺取了普魯士的警察权。德国人常說：“統治普魯士者就可以統治德意志”。巴本的行动显然是向整个魏瑪共和国挑战。正如当时評論界者所指出，社会民主党沒有进行抵抗，是給法西斯开辟了道路。然而，当时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反法西斯力量也在进行团結，在 1932 年 10 月的大选中，納粹一下子就失去了二百万票，而共产党却获得了将近六百万票。工人运动的攻势也激烈起来了。但是面临这种反法西斯力量的發展，各种反动势力也进行了联合，在 1933 年 1 月 29 日柏林举行一万人的反納粹示威游行的次日即 30 日，兴登堡总統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使一貫高唱打倒魏瑪民主的納粹掌握了政权。当时如果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結成了反法西斯統一战綫，那么，希特勒內閣将可能成立不了。但是，社会民主党对于和共产党合作表示冷淡，一直在拒絕共产党所提倡的結成統一战綫。当希特勒內閣成立时，它又強調內閣成立的合法性，不肯采取反对希特勒的

实力行动。另一方面，据说共产党也有缺点，它未能将大企业的工人充分地组织起来，而对于人民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情绪也未能给予正确的指导。总之，当时反对希特勒内阁的各种力量未能联合起来，是后来给德国人民带来不幸的根源。

取得了政权的纳粹立即解散了国会，为控制 3 月 5 日的大选，又开始采取了疯狂的恐怖手段。2 月 27 日的夜里，纳粹党徒纵火烧毁了国会大厦，却诬赖是“共产党的阴谋”而大肆宣传，次日，公布了所谓“保护人民免受共产祸害的法令”，而逮捕了共产党议员，同时，禁止了共产党言论、集会的自由，至 3 月 1 日便下令解散了共产党。在 3 月 5 日的选举中，纳粹党只获得了总投票数的 43%，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得了一千二百万票。于是，希特勒乃向议会提出“授权法”，要求授予独裁权，并迫使议会通过。这时，社会民主党反对了这一“授权法”，但为时已晚，至 6 月，社会民主党也被解散了，接着，国权党、中央党和其他政党也全都被解散了。这样，纳粹建立了它的一党独裁，1934 年夏在兴登堡总统死后，希特勒便就任了兼有总理权限的总统，至此，纳粹的法西斯统治宣告完成。但是，纳粹政权并未能解决经济危机所带给德国社会的危机，为了维持政权，它必须镇压许多反纳粹势力。这时，反纳粹人士相继被捕下狱，人民对政治的批评和言论自由完全被剥夺了。当时，希特勒向人民所作的诺言是什么呢？他所发表的危机对策只是依靠重建军队、扩张军需工业和土木事业，来吸收失业者而已。这些措施本身就意味着准备战争。“大炮比黄油重要”就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林所说的话。

由于这样扩充军备，德国的武力加强了，希特勒为了把人民的不满引向国外，在整顿国内体系的同时，明目张胆地开始了对外侵略。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

世界經濟危机把整个世界拖入了战争危机之中，但也有一个例外的地方，那就是苏联。在經濟危机的三年內，苏联的工农业生产，与列强相反，得到了飞跃的發展。不过，苏联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受到危机所带来的各样影响。苏联对于由世界經濟危机所引起的列强的战争危机，也要积极地采取对策。

列宁为了恢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后的內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苏联經濟，采取了“新經濟政策”。列宁不久就逝世了。1924年，斯大林繼承了他的事业。1927年，生产总值恢复到战前水平，具备了建設社会主义經濟的各种前提条件。当然，当时的苏联因受帝俄时代的經濟落后的影响，与列强各国相比較，还没有达到令人滿意的状态。在工业生产中，消費品所占的比重很大，許多生产資料要靠从外国进口，技术水平也低于列强。这种状态必須尽快克服，于是，从1928年10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計劃，其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

由于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人民劳动积极性的高涨，第一个五年計劃在1932年10月，提前九个月完成了。工业的跃进是惊人的，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国。第聶伯水力發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和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工厂等項建設是很有名的。机器、汽車、拖拉机工厂和飞机等制造工业在苏联虽然还是第一次出現，但这些部門却以飞快的速度發展起来了。鉄路的建設和苏联的亞洲部分的開發等在国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农业方面，机械化和集体农庄化的进展，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因素。随着这种社会主义經濟的發展，劳动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国民收入在1930年是三百五十亿盧布，至1933年已增長到五百亿盧布，职工人数从1930年的一千四百五

十三万人增加到 1933 年的二千一百八十八万三千人，工资增加了 50% 以上，工作時間縮短为七小时。妇女們也積極地参加了生产。阴暗潮湿的洞穴式的貧民窟变成了漂亮明朗的工人住宅区，現在，工人住宅区比城市的中心区还要漂亮。以往的农村，教会占着最优越的地方，它的前面是村警察所長、僧侶和富农的漂亮住宅、后面是农民群众的快要倒塌的小屋；这样古老的农村現在已开始消灭，而代之以有着俱乐部、收音机、电影院、学校、圖書館和托兒所并使用拖拉机、康拜因、打谷机、汽車的新农村。当然，这种国内变革并不是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执行計劃必須排除許多困难，人民的牺牲也不在少数。例如，对于农业集体化，不仅富农，具有保守思想的农民也頑强地反对，集体化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是，人民的耐心和努力終於結了果实，締造了社会主义国家，1937 年的苏联宪法就是这种成就的总结；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衛国战争証明了已經建成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强大。

对于苏联这种国力的增長，即使在資本主义国家的領導者中間也有人率直地表明过惊讶。1931 年，日本資產階級的代表性的理論家之一、当时的商工大臣中島久万吉曾說：“我目前确实患着恐俄病，也許有人会把我說的話当作恐俄病患者的一片囁語而一笑置之。但最近，特別是考虑到俄国工农业的五年計劃完成以后的情况，对于我国的产业前途就时而陷于一种病态的悲觀之中。本来，我起初——去年(1930 年)年初——相信俄国工农业的五年計劃会因以下三个因素而終将失敗。这三个因素是：俄国人民生活的穷困和物資缺乏、財政困难以及青年的覺醒。但是，回顧去年一年(1929—1930 年)的实际成績之后，終於相信俄国这一計劃必定成功。当我想到这一計劃成功以后，不仅对日本，同时对世界各国的产业將給予怎样的影响……”(中島久万吉：“俄国工农业五年計劃”)。这种惊嘆不久便轉为憎恨和恐惧了。

苏联外交

但是，必須注意，苏联这种發展是处在資本主义列强的包圍中、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立即組織起来的国际联盟，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障集体安全的和平机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各国对革命后的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产生的，所以从苏联方面看来，它是为了攻击和孤立苏联而成立的机构。苏联在1922年和同样作为战敗国而处在孤立地位的德国締結了拉帕洛条約，規定互相放弃賠償要求和互相提供必需品，这时，它才第一次作为一个国家取得了外国的承認。不久，其他欧洲国家也認為有必要与苏联重新建立貿易关系，因此，在1924年从英国和意大利开始，面临經濟困难的欧洲列强都不得不相繼承認了苏联。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只有当时情况还不严重的美国約在十年以后才承認苏联。

但是，这种情况也决沒有从根本改变苏联的孤立地位。早在1924年10月，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者致英国共产党的所謂“唆使叛乱文件”被公布了，由于这件事的影响，使承認苏联的工党内閣在五日后的大选中垮了台。这一“事件”是表明英国反苏政策的著名事例。以后在1926年英国發生有名的煤矿大罢工的时期，英国的保守党内閣更加反动，竟与苏联断絕了邦交。从国际上看，1925年的洛加諾条約确实是防禦德国的安全保障体系，而比利时和法国的国境綫的安全也确是受到它的保障，但是在东方的苏德国境的安全問題，却根本沒有被考虑，因此，从苏联的角度看来，这一条約当然还是屬於反苏体系的。

本来，苏联政府在原則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因为实际上处在这种資本主义世界的包圍之中，所以它的外交政策必須始終一貫以維持和平为基本原則。为了保証自己的安全，苏

联政府先后与其邻国土耳其(1925年)、德国、阿富汗、立陶宛(均在1926年)、伊朗(1927年)等締結了互不侵犯条約或中立条約。1926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裁减軍备筹备委员会,这时,苏联首先申請参加并派遣李維諾夫出席會議,提出了“完全廢除軍备”的提案,对于凡尔賽体系和洛加諾体系的不徹底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此后,又積極参加了1928年的非战公約,至1929年,由于世界經濟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所引起的侵略战争的危險已經迫近的时候,苏联特別致力于表明其和平政策,并由斯大林宣布了“苏联不侵略別国的一寸土地,但也不容許別国侵略苏联的一寸土地”的方針。苏联同別国締結的互不侵犯条約網进一步扩展到芬兰、波兰、拉脫維亞、爱沙尼亞、法国(1932年)和意大利(1933年)。1933年5月,在裁軍會議的安全保障委员会上通过了苏联的提案——“关于侵略定义的条約”。1934年苏联加入了日本和德国已退出的国际联盟,同时在法国的支持下还提出了由东欧七国,即拉脫維亞、爱沙尼亞、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苏联締結一項所謂“东欧洛加諾协定草案”,这一提案因受到希特勒的德国和在其影响下的波兰的反对,未能实现。至1925年,德国破坏凡尔賽条約的軍事条款而着手重整軍备,因此,苏联与法国締結了互助条約。从以上概述的情况,可見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上的集体安全保障問題,并不只是意味着建立抽象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是要把这种关系建立在反法西斯人民陣綫这一人民团結的基础上,这就是它的特点。

但是,要想在世界經濟危机和战争危險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單純依靠和平外交政策是不够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防止战争危險以謀求苏联社会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具有具体的实力。因此,五年計劃必須同时兼顧国防力量的充实,并且不得不以重工业为中心。其結果,使消費品的生产和国民生活的提高

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也是在所难免。苏联国防力量的充实，以飞机为例，1927年是八十五个中队，拥有七百架飞机，1931年增加为一百九十四个中队，拥有一千六百架飞机，至1933年便迅速增加为二千五百架；再以坦克为例，1928年末是二百二十台，1931年6月为五百台，至1933年1月便增加到一千五百台，在这样短期間內即增加了几倍。对苏联国防力量的这样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軍人和軍事專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例如英国里但尔哈脫的警告），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又利用这种評價来宣傳“苏联的威胁”，把它当作了煽动反苏情緒和擴張本国軍备的借口。

罗斯福的“新政”

1929年10月开始的美国經濟危机随着時間的推移愈来愈严重了。胡佛总统在每次演講里总是說：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现实情况却远远超过了他的乐观，是極其严重的。各种产业部門的股票价格都在急剧地暴跌，至1932年，工业生产总值几乎降低到1929年的一半。破产和歇业的厂商不下几万家，因破产而自杀的业主也不在少数。失业者的人数，1930年是三百万，1931年增加到七百万，至1933年初竟达到一千二百万。农村的雕敝也非常严重，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三分之一。在街道上可以看到失业者叫卖着少数苹果，飢餓的人群在飯館門前爭夺殘羹剩飯。某一新聞記者曾就矿山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报道：“几千名矿工拥挤在山腰上。三家或四家同住在一間小屋里，依靠蒲公英和野草的根莖来維系生命”。

然而另一方面，在危机中經常發生的机器和过剩产品被破坏和被抛弃的現象是十分惊人的。据說，有一百万吨的船舶被破坏，数十万公升的牛奶被抛弃，六百四十万头生猪被宰杀了。胡佛总统設立复兴金融公司，試圖解救銀行界的金融困难，兴办土木事业企

圖吸收失业者，但是这种弥补的对策毫无效果，在这种日益深刻化的不景气中，胡佛被認為无法挽救困难局面，因而成了人民激烈非难的对象。（在城市失去住所而在郊外和空地架起茅棚的人們，把他們的茅棚称为胡佛別墅。）这样，美国人民对于当前的社会制度本身不能不加以重新考虑了。高唱依靠科学和效能来克服經濟危机的技术万能的主張曾經風靡一时，但也无非是画餅充飢而已。这时，还曾出現了主張分配富豪财产的休伊·劳倫那样政治煽动家。工人的罢工事件此伏彼起，失业者举行了示威游行。至 1932 年 7 月，生产下降到最低水平。

1932 年 11 月，在总統选举中，标榜“新政”的富兰克林·第·罗斯福当选总統，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任总統的威尔逊以后，經過十二年后重新执政的民主党的总統。次年 3 月 4 日罗斯福进入白宮，他在就职演說中強調了用坚强有力的領導来进行改革的必要，并主張迅速地采取行动。他說：“我們唯一可怕的事情就是害怕这两个字的本身”。又說：“目前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討論而是实行”。这些話都被立即实践了。第二天，5 日，他首先宣布了禁止金銀出口和全国銀行停业这样的金融紧急对策。接着在同一天召开临时議會，此后在三个月的会期中，先后通过了失事救济法、农业調整法(A. A. A)、田納西河谷事业局法(T. V. A)、銀行法、全国产业复兴法(N. R. A)等十五項屬於新政的重要立法。各項立法的內容，严格說来，相互間是有矛盾的，但这些措施是要以国家权力干涉一切产业部門和劳資关系，用統制經濟来对付經濟危机，用社会救济性的各项措施来防止革命的發生，总的精神在于挽救美国資本主义。同时，为了实行这些措施，在总統左右設立智囊团，以下設立了所謂超內閣的机构国家产业复兴委員會，并由議會赋与总統以广泛的立法权。这些情况，从坚持三权分立的美国民主主义的傳統立場看来，也好象是一次“革命”，总統高度地集中了权

力。但罗斯福本身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并且因考虑到在下届选举中必须取得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在 1935 年 7 月通过了承认工会的集体交涉权和罢工权的华格纳劳工关系法；而在 1936 年 1 月的咨文中，他甚至喊出了“打倒经济贵族”。当时，反动的美国最高法院也曾经判决“新政”的某些法律为违宪。因此，在这些方面，可以说罗斯福的立场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是有区别的。

美国资本主义确实显示了它的强度和弹性，看来似乎依靠“新政”暂时恢复了元气，1936 年的工业生产比 1933 年上升了 30%。然而“新政”，毕竟是危机下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复兴对策，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对策并无本质的区别，其解决危机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但如此，“新政”的结果却是带来了大资本的集中和资本利润的上升，罗斯福所怀抱的以增加购买力来扩大生产的企图并未得到成功。就业工人数仍不及失业人数多，物价上涨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未见好转，劳资纠纷还是陆续不绝，工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因之，到 1937 年下半年美国再一次要发生经济危机时，罗斯福政权也采取了用经济的军事化的政策来摆脱危机，这样，美国对于世界战争的危机再也不能是毫无关系的了。

尽管如此，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策的“新政”能够把主要目标首先放在国内市场的开发上，这一点总算在美国国内维持了民主主义的形式，同时在对外方面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非侵略性的面貌。罗斯福对南美的政策被称为“善邻政策”。这种政策虽然是排挤英国在中南美各国的势力和形成美洲集团的泛美政策，但是从撤销美国在古巴、海地、巴拿马等国的驻兵权，同意各国独立，缔结互惠条约等措施来看，这一政策比过去还是有所缓和。其次，美国以往同苏联没有建立邦交，由罗斯福政府在 1933 年开始承认苏联，1935 年缔结了美苏通商协定。这种做法的目的，在经济上是要通过对苏贸易来扭转对外贸易的萎缩局面，在政治上

是要在远东牵制日本。国务卿起用赫尔代替了胡佛时期的史汀生,还是在就任总统前的 1933 年 1 月罗斯福就已声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保卫国际条约的神圣”,暗示他将承继史汀生对日本的侵略所采取的不承认主义的原则。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罗斯福也并没有象英国那样一贯地表示对日妥协。

总之,美国正在逐步地被卷入到世界战争的危机中。罗斯福就任初期,因为以恢复国内经济为首要任务而采取的对欧洲不干涉主义,由于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所以受到了舆论的支持,1935 年制定的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需品,这条规定曾适用于埃塞俄比亚战争。在 1937 年西班牙内战时,中立法案虽然被适用于内战,但当时美国采取了“现购自运”主义,企图在本国不遭受危险的条件下,保护贸易的利益,这就产生了利害关系受战争影响的可能性。对于同年中日战争的爆发,美国以不利于中国为理由,没有援用中立法。这样,新政下的美国,虽然是要站到反对最露骨的侵略的方面,但的确是沿着干预战争的方向前进了。

第二章 經濟危机下的日本

第一节 金融危机和出兵山东

中国革命的影响

日本資本主义和中国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鉄、煤等主要資源的埋藏量本来就很貧乏的日本，中国是其原料的主要供应地。同时对国内市場狹小的日本工业來說，邻邦中国又是它的主要市場，在日本整个对外出口中，有 35% 是运往中国各港口的。并且，作为資本輸出地，中国也有其重大意义，以在华紡織业和“南滿鐵路”为主的对华投資，对于日本的存在，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至 1927 年为止，日本仅对中国东北的投資，就达到二十五亿日圓。因此，中国革命的發展使日本資本主义的“稳定”遭到严重困难，使日本資本家直接受到致命的威胁。他們把中国革命势力和工农运动視為最危險的敌人，为了扼杀这种革命力量，不惜付出任何牺牲。

1925 年 2 月，上海的日本内外棉紡織厂的罢工終於發展为暴动，至 6 月間这一运动波及到全上海的紡織厂，上海的中国商人也举行罢市，全市进入了戒严状态。由于日本派遣海軍陆战队登陆鎮压，并殘暴地向罢工的工人开枪，致使反抗的火焰不久就扩大到香港、汉口、青島和天津等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这种情况加上帝国主义各国在关税會議上所表現的复杂的对立关系，使得日本資本主义的稳定受到極大威胁。尽管在金融資本的首脑部，曾經作为使日本資本主义趋于稳定的第一个步驟，而醞釀要取消禁止黄金出口，但是由于上述事件所明确地反映出来的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使当时的濱口大藏相不得不在

1926年3月声明停止黄金出口，并宣称解除黄金出口的禁令为时尚早。

1926年的下半年，国民革命军把驱逐中国南部的帝国主义势力，作为它的斗争的主要目标。这样就使在华南拥有权益的英国资本主义受到了重大打击。这种情况，从国际关系上看，似乎会给予日本以一时的有利影响，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使日本经营华南的重要机关台湾银行从交易关系方面发生了决定性的破裂，形成了下面所述的金融危机爆发的有力因素。

台湾银行利用欧美列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时退出中国市场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力推行对华经济政策，挽救中国财政的贫穷，适应事业资金的需要，在对华扩展经济势力上作出很大贡献”（“台湾银行四十六年史”）。1919年台湾银行在全中国的贷款总额达二千五百七十六万日圆。以后由于中国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台湾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发生了困难，使其对华投资濒于危险的境地，陷入了不得不放弃回收贷款的状态。1923年末，在中国中部的重要机构九江分行关了门，1925年6月，汕头分行也陷于半歇业状态，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其结果，台湾银行的经营情况非常恶化，终于在1925年将资金减少了四分之一，而且以后台湾银行的经营越来越不顺利，到了最困难的1927年，该行对华的贷款总额已经减少到只有1919年的17%了。

这样，进入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浪潮开始北进，三四月间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一带，中国革命呈现了新的面貌。恰好在此前后，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使得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加尖锐了。

昭和金融危机

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固然是偶然爆發的一件大慘事，但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中苦悶着的日本資本主义來說，实在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打击，从而又出現了“震灾危机”的局面。由于东京的恢复工作，使入超进一步增加，耗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期間的积蓄。

为了处理震灾危机的善后事宜，政府企圖以發行超过10亿日圓的震灾善后公債和公布震灾期票貼現損失补偿法来挽救信用不佳的銀行和一部分“政商”，并救济遭受打击的金融資本。所謂震灾期票是包括以震灾地为付款地的期票、当时在震灾地設有营业所的企业所开出的期票和由其承付的期票。这些，在震灾当天以前銀行已經貼現，但因震灾关系而无法結算，为了进行救济，日本銀行在这类期票上打上特別印記。根据上述法令，日本銀行对这些期票应給予貼現，其因此而受到的損失，由政府給予一亿日圓以內的补偿。这种对震灾期票的再貼現，曾規定以1925年9月底为限期，但这一整理工作沒有能够按照預定的期限进行，延長了两次，以最后規定整理期間到1927年9月底截止。到这一整理工作結束时，一亿日圓显然不够，这就使得金融界充滿了不安情緒。为了补偿日本銀行的損失，若槻礼次郎內閣又撥給該行一亿日圓的公債。同时，为了便于那些利用震灾期票而得到日本銀行通融資金的銀行整理它的期票，起草了旨在进一步給予为期十年的貸款（与前項合計为一亿零七百万日圓）的震灾期票善后处理法案和震灾期票損失补偿公債法案。在野党企圖把这件事作为政治問題而加以攻击。因之，在議會进行討論期中，对震灾期票的不信任逐漸發展为对于持有震灾期票的銀行的不信任，至1927年3月15日，东京渡边銀行和赤路儲蓄銀行竟因受到大藏相片岡直溫在前一天

議會里的失言的影响而宣告停业了。这样，先于世界危机二年有余，在 1927 年，日本就爆發了金融危机。

接着在 19 日，中井銀行宣告停业，由于它的影响，东京市内的各銀行發生了挤兌風潮，同一天，中野銀行也發生挤兌，因此，日本銀行和有实力的銀行决定采取共同措施，为防止挤兌，实行銀行間的短期貸款，并緩和銀行之間的貸款条件；据报导日本銀行的非常貸款已突破一亿日圓。尽管如此，东京的村井、中澤、八十四銀行和橫濱的左右田銀行还是不得不于 22 日宣告停业，金融危机的發展已經无法防止了。片岡藏相和日本銀行總裁市來乙彦發表了关于稳定財界和突破危机的共同声明，但仍然沒有任何效果，危机并进而波及到各地：埼玉的久喜銀行、浦和商业銀行、京都的桑船銀行、神奈川的川崎銀行、岐阜的淺沼銀行、德島的德島銀行等先后在 22 日、23 日，或者遭到挤兌或者竟自停业了。但是，震灾期票的处理法案由于政府和研究会之間的妥协才勉强在貴族院里获得通过，因此，一度显示了危机的緊張气氛暂时趋向緩和，市民的动摇情緒趋于稳定。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即将到来的大动蕩的一个序幕而已。

这是因为：片岡大藏相于 3 月 11 日在貴族院的發言中所暴露的鈴木商店和台灣銀行的問題构成了危机爆發的新的原因。4 月 2 日，鈴木商店把自己的期票整理工作完全委托給台灣銀行，常务董事金子直吉辞了职。鈴木商店因一直經售台灣的砂糖、樟腦等商品而与台灣銀行有着特殊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該店趁着好景气逐漸将企业范围扩大到海运、煉鋼、人造絲、制粉等行业、所屬企业單位达到六十余家之多。但是到了战后，其大部分企业都陷于不景气，以致發生了認為震灾期票專門是为了救济鈴木商店而制定的謠傳。在这期間，台灣銀行，由于台灣、中国南部、南洋方面的营业不振竟对一家鈴木商店通融了巨額的资金。由于这种原

故，两者的关系搞得非常密切，台灣銀行唯恐鈴木商店的破产招致自己的危机，所以接二连三地將大批資金貸給鈴木商店，真可謂“貸者敢貸，借者敢借”，到这时为止，台灣銀行撥給該商店的难以收回的貸款竟达三亿五千万日元之巨。这些情况再加上上述在华經營的失敗，使台灣銀行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

台灣銀行救濟法案和若槻內閣的垮台

4月14日，若槻內閣为救濟台灣銀行，准备了以二亿日圓为限額的“关于救濟台灣銀行的紧急敕令案”，并提交到樞密院。樞密院在17日否決了这一提案，因此，若槻內閣便实行总辞职。这期间，政友会在15日的临时大会上，修改了党章，推举陸軍大将前陆相田中义一为新总裁。

若槻內閣的总辞职給台灣銀行的救濟工作带来了暗淡的阴云，18日台灣銀行总行終於發生了挤兌，国内和海外的分行也同时停业了。这是因为該行的負債總額已达八亿九千万日圓，而其中紧急需要的二千八百万日圓的筹措工作又陷于絕望。而且，这件事又立刻影响到大阪的近江銀行，金融界的这种动摇使人預感到更加深刻的經濟危机即将到来，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气氛里，田中义一接受了組織繼任內閣的命令。

原来樞密院所以否決了这一“紧急敕令案”是根据“还有時間召集临时議會”和这种办法“違反宪法第七十八条”这样一种理由，但实际上并不是單純由于这种宪法程序上的問題。樞密院虽然也預料到如果无视国内危机，就必须付出極大的牺牲，但它还是認為当前迫切的問題是改变对华政策。这一点，可以从实际上控制樞密院的人物即反对这一敕令案的急先鋒、“紧急敕令案”审查委员会委員長伊东巳代治的發言中得到充分的証明。伊东在指摘了政府的措施不当以后，用暗示要推翻內閣的口吻，对政府进行了如下

的攻击,他說:“并且,現內閣不仅在本法案上措施不当,而且在对华問題上也是措施不当,由于事事处理失当,以致造成国家的威信扫地,这是我国人民所不能置若罔聞的。对华外交失敗的結果,使現在留居中国的几千同胞陷于窘境,其生命財產受到威胁。与其拿出二亿日圓的巨款来救济一家特殊銀行,不如把这笔款項用于救济在华的日侨。据信,对这样極不徹底的法案表示贊成的只是以若槻首相为首的內閣閣員而已,而七千万国民則必然一致反对这种法案。虽然若槻首相在議會以及本院(樞密院)屡次表明并不規避責任,但是我們从未見到他把自己的責任加以明确。現在是明确責任的时候了。我希望若槻首相今天能够很好地考虑這個問題。”

这种攻击,不是譴責若槻內閣在危机面前沒有提出經濟上的根本政策,而是譴責在对外方面,特别是在对华外交上表現的軟弱无能和損害了国家的威望。不难推測,当时在樞密院的幕后,还有与三井財閥互相勾結的政友会在进行倒閣运动。政友会的領袖鈴木喜三郎从担任司法省大臣时期起就和樞密院副議長平沼騏一郎結下了把兄弟般的关系,因此,他可能向控制樞密院的平沼和伊东进行了頻繁的幕后活动。同时,还有政友会干事長森恪也和軍部勾結进行制訂積極的对华政策,森恪和以后充任“南滿鐵路”總裁的山本条太郎当时正在中国作視察旅行,突然赶回来,并打电报召回山本。綜合这各种情况可以肯定:軍部、樞密院和政友会(三井)三者联成一气,为了“刷新对华外交”而进行了推翻若槻內閣的活动。危机一旦爆發,就繼續發展起来,在田中受命組閣的 19 日,滋賀的蒲生銀行、广島的蘆品銀行、大阪的泉湯銀行宣告歇业;新內閣成立的 20 日,广島的广島产业銀行、門司的門司銀行歇业了,东京的共荣儲蓄銀行破产了。至 21 日,东京的第十五銀行、泰昌銀行、武田貼現銀行和明石的明石商工銀行也宣告歇业,全国的銀

行、信托等金融机关决定在 22 日、23 日两天一齐歇业，混乱状态达到了顶点，在第一流银行的窗口也挤满了提款的人。

田中内閣对财界的救济

田中内閣将救济财界和改善对华外交作为它的使命，田中本身兼任了外务相，并得到在财界颇有声望的高桥是清出任大藏大臣。高桥的危机对策暂时收到了效果。他在 4 月 22 日公布并施行了一项名为“关于延期支付私法上的金钱债务和延期保留期票权利事项”规定将支付行为缓期三周的紧急敕令（付款延期令）。当天，日本银行即放出了非常贷款二十一亿九千万日圆，使纸币发行额达到了二十三亿一千八百万日圆的纪录。25 日，全国银行全部开业，财界逐渐恢复了平稳（此后，5 月 10 日，日本银行总裁市来乙彦辞职，井上准之助继任）。5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十三次临时议会，通过了五亿日圆的日本银行特别通融及损失补偿法和二亿日圆的台湾银行金融法，并追认了付款延期令。政府根据这项法令给予台湾银行的补偿超过了上届内阁所预定的二亿日圆的救济款额，为了救济大资本，政府支出了从国民身上搜刮来的巨额税款。高桥完成了牺牲人民来救济财阀的任务以后，即将大藏相的职位让给三土忠造而退休了（6 月 2 日）。

从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起一直到事后处理的整个期间，小银行和地方银行迅速地为大银行所吞并。用日本银行贷出的特别通融资金来兑出的存款都从小银行集中到第一流银行，以至造成了所谓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第一的五大银行的壟断。银行破产使企业单位受到了重大打击。从台湾银行和铃木商店的关系上可以看到银行与产业之间的密切结合的情况，正因为如此，企业单位所受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例如川崎造船厂，也是依靠了海军的救济才免于破产。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中小企业在此期间相

繼遭到破產，失業者急劇增加，社會的不安日趨嚴重。而在另一方面，以五大銀行為中心的各財閥則將其支配的魔爪伸向各個產業部門，在它們的控制之下，對中小企業進行了整頓和集中。

很显然，在金融危機中，壟斷資本如不借助國家權力是不可能存立的，同時，這種救濟財閥的巨額資金幾乎全是人民群众的零星存款和取自群众的賦稅，这样就引起了尖銳的階級對立，使資本主義的危機進一步加深了。田中內閣企圖在出兵山東的“冒險”中擺脫這次危機。這樣，1926年對華出口的減少和1927年3—4月的金融危機都被侵略成性的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利用來擴大勢力了。

出兵山東和東方會議

在危機開始後的1927年3月20日，中國國民革命軍終於占領了上海，接着，各國的陸戰隊也在上海登陸。至27日，日本第一艦隊也開始向上海集結，被稱為“協調外交”“軟弱外交”的幣原外交也“改變”了“不干涉主義”。繼之，在危機暫時收斂的5月28日，田中內閣看到國民革命軍北上，將到達華北和東北的形勢以後，就積極着手來加以阻擋。它借口“為了預防再度發生不幸事件，不得已而用陸軍來保護在華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出兵聲明），派兵侵入山東省，想借此來阻擋北上的國民革命軍（第一次出兵山東）。

田中內閣積極侵略中國的政策，在6月下旬召開的“東方會議”以及8月13日在大連召開的“第二次東方會議”上具體化了。

參加“東方會議”的有駐中國的外交官以及陸軍省、關東軍和參謀本部的首腦，通過會議，決定了“對華綱領”。駐沈陽總領事吉田茂也是參加者之一。在會議的公報中說，對於“滿蒙”特別是對於東三省，“我國不僅需要作特殊的考慮，而且為了維持該地的和平及其經濟發展，使該地成為中外人士安居之地，與該地接壤的帝

国实負有特殊責任”，“万一波及滿蒙，造成治安的紊亂，致使我国在該地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受到侵害时，帝国認為不管这种动乱来自何方，必須及时地采取适当措施以防衛这一地区，使其繼續成为中外人士發展的地区”，这就是說，为了維護日本的特殊地位，确保其認為“生命綫”的“滿蒙”，日本有决心要来維持該地的“治安”，并采取“坚决自衛的措施”。九·一八事变后，东方會議事实上的主持者、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曾暴露了当时的意圖。他說，“現在談出来也无妨了”，为了对抗中国的赤化，“使滿蒙脫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參預該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該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露骨地說，可能招致麻煩，所以給它包上了一層‘东方會議’的糖衣”（山浦貫一編“森恪”）。这段話表明了：他們阴谋建立一个脫离中国的伪組織和不管阻力来自何方，都要坚决“以国力反击”的狂妄企圖。

田中首相根据这次东方會議的決議写成了奏折，这就是被中国方面揭露出来的所謂“田中奏折”。它的开头一段是这样：“为了征服中国，我們須先征服滿蒙。为了征服世界，我們須先征服中国。如果我們征服了中国，其他一切亞洲国家和南洋各国将会惧怕我們而投降。那时，世界上将会理解东亚是我們的，并且不敢侵犯我們的权利。掌握了中国的資源以后，我們就将轉向征服印度、小亞細亞、中央亞細亞以至于欧洲。大和民族要想称雄于亞洲大陆，第一步是掌握滿洲及蒙古的統治权”。接着，奏折闡述了經營“滿蒙”的具体方針。这个奏折，作为証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文件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广泛地宣傳了。因为文件中的細節里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所以不能完全置信，但是，如果与前面森恪的談話联系起来看，就会了解，这一文件作为說明“东方會議”決議的基本方向的資料时常被人引用，也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此后在东亚發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采取的行动都好似完全根据田中

奏折而来的，所以，要想解消对这一文件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重光葵：“昭和的动乱”）。

美国支持蒋介石政策

田中內閣的出兵山东是帝国主义列强积极侵略中国的先驅。当时，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反革命势力的加强和革命运动的低潮，为这次侵略提供了絕好的机会。主要在华中和华南地区拥有特权的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尽管在爭夺中国市場上面有着深刻的矛盾，但在镇压革命和保护并扩大其在华权益上却是步調一致的。这些国家以上述的南京事件为借口，迫使新政府“惩处所有与事件有关的軍隊指揮人員”和“保証不采取任何形式，不侵犯和危害外国人的生命財產”。一方面，在暂时統一的政府內部，国民党各派的对立也日趋尖銳。他們各自拉攏地方軍隊，把朋友和亲戚安插在統治地区的机关和軍隊中担任要职，从而变成新軍閥，互相爭夺全中国的、或是更大地区的統治权。以蔣介石为中心的南京派，当时还没有控制和統一这些势力的实力。四·一二政变以后，蔣介石对外表明，打倒帝国主义不采用暴力手段，而且也不是排外性質的，同时又發表了“等待适当时期，提議廢除不平等条約”的妥协性的新对外方針，企圖借此得到列强对其镇压革命力量进行援助。为了压制可能和强大的外国势力进行勾結的反对派和軍閥势力从而統一全国，有必要在利用各列强的矛盾的同时，与提供最有利的交換条件的外国势力勾結起来，并接受其援助。当时被視為对象的是美国和日本。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撇开英国迅速地向中国市場擴張，并加强了和上海一带的資產階級的联繫，还針對英国和日本所实行的露骨的瓜分中国的政策，提出了門戶开放政策，从而它所受到中国人民的憎恨比較輕微。因此，蔣介石就認為，如果和美国勾結，在經過国民革命而迅速覺悟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被

罵为“卖国贼”的危險性会比较少。从四·一二政变前后开始，蒋介石就通过浙江财閥加强了和美国的联系，并任命亲美派伍朝樞为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長。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日本在战略上处于最靠近中国的地位，能对中国施展最为强大的力量，因此也不能置之不理。这时，蒋介石就派遣其思想上的导师戴季陶到日本进行对日妥协的工作。美国方面对蒋介石的这种两面手法表示不滿。1927年9月，蒋介石以国民党内部不和为理由而突然下野，就是受到美国箝制的結果，也是失去外国积极支持的蒋介石集团的懦弱无力的表現。下野以后，蒋介石亲自訪問日本，会见了朝野有名的人物。蔣在日期間，他本人以及圍繞着他的日本統治階級的活动情况，現在还不十分清楚，但从当时的形势及其以后的动向来看，很显然，蒋介石的訪日目的是請求日本援助和談判这笔政治交易的条件。日本右翼巨头头山滿在与蒋介石会談后說：“蔣氏无论如何还是和日本一致的人”，似乎暗示蒋介石已全面承認日本向大陆擴張的政策。但是从他以后的談話：“我在日本期間虽然希望訪美，但由于日本友人們的劝告未能成行”，以及回国后很快就向美国一边倒的行动来判断，日本的統治階級在控制蒋介石这一点上似乎是失敗了。据說，当时美国似乎是通过駐日使节与蒋介石簽訂了一个协定，内容是“美国支持蒋介石重新掌握政权，讓他会見日本天皇，承認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和西原借款。并以此作为日本不反对他获取政权的交換条件”（刘大年：“美国侵华史”）。这話的真伪无法判断，但是很显然，标榜强硬外交、着手援助張作霖的田中內閣，当时已經失去籠絡蒋介石的灵活性了。

1927年11月重新登上首脑地位的蒋介石發表了关于改变对外方針的声明，借口苏联有“指揮顛复中国政府的陰謀”，取消了对各地苏联領事的承認，搜查苏联領事館，逮捕苏联籍共产党员，表明了附和美國反苏政策的態度。翌年3月，又向美国表示“希望在

中美两国外交上开一新紀元”。在尚未解决的南京事件上，他首先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要求，根据美国的指名，發布了对“暴行負責人”林伯渠的通緝令，同意对外国人的損失負全部賠償責任，并表示了“郑重的謝罪”。蔣介石在政府內部，除任命他的妻兄宋子文为財政部長外，并任用宋的一派人物即亲美派担任要职，他个人則集政治、軍事的大权于一身，加强了独裁体制。这样一来，美国也于 1928 年 11 月正式承認国民党政府，取消了关稅特权，并重新締結中美关稅协定等，通过这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政策，在中国資產階級中間，扩大了对它的支持，巩固了它的立脚点。后来，有許多美国軍人、大財閥的代表被聘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軍事、財政、交通等部門的顧問，通过这些顧問，美国获得了最大的特权。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从原来的“門戶开放”逐漸轉变为支持中国統一，也就是把日、英两国支持下的一切新旧軍閥統一在中央——南京派控制的“国府”之下，以便借此阻止日、英的对华擴張。

济南事件

日本为了对抗美国，进一步对华北进行了露骨的軍事侵略。南京政府对日本的第一次出兵山东，提出抗議說：“已經坚决命令国民軍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財產，因此已与各国增进友好关系，只有日本蛮橫地竟敢独自蹂躪国际公法”，并要求日本撤兵。但是，日本政府毫不理睬，在 1928 年初，又派遣久留米师团的五千名軍隊，占領青島和胶济鐵路沿綫，另外还派駐在华北的駐軍两个中队，于 3 月間占領济南，向正在与張作霖作战的国民党軍隊表示了强硬态度。这种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憤慨，反日、抗日运动在华北一带展开了。一方面，国民党軍隊一面再三抗議日本軍隊侵犯領土主权，一面繼續北上，于 5 月 1 日进入济南与日本軍隊形成对峙状态。日本軍隊高筑壁壘，阻碍国民党軍进攻張作霖的軍事行动。于

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一方面命令部下避免与日本军队接触和冲突，另一方面在司令部接见日本领事，要求不干涉内战和拆除防御工作，日本领事接受了这种要求。

但是，对于不顾国内反对，动用了大部分军费出兵中国的日本军方来说，不得不借口“保护侨民”继续向中国军队寻衅。撤去壁垒以后，日本军队乃任意扩大警戒区，于5月3日枪杀了一名通过境界线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并趁国民党军队的动摇，发动了总攻击，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然后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十二小时以内立即答复下列要求：（1）中国军队撤离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外；（2）禁止中国军队统治地区内的一切反日宣传和抗日运动；（3）严惩与骚扰、暴行有关的高级军官；（4）解除与日本军交战部队的武装。另外，日本军队还枪杀了中国方面派去交涉的代表，接着又对代表“国府”访问日本军队的外交部长黄郛，不给饭食，加以近乎监禁的侮辱，并增派了一个师团（第三次出兵），来威胁国民党军队。因此，中国人民的反日、抗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猛烈地展开了。但是，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竟训令其部下说：“保护日本侨民是为了国家，所以个人对任何情况，都要忍受”，“为了救护一个日本人宁可杀死十个中国人”，通过镇压抗日运动，一味向日本讨好，全部承认日本的要求，暂时收拾了这种局面。蒋介石在实行亲美反苏政策的同时，对日本又采取了妥协政策。

張作霖被炸死事件

由于济南事件，使中国反帝运动的焦点开始转向日本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引证田中奏折向国际联盟控诉了日本的侵略意图。当时，張作霖和蒋介石之间的“决定南北胜败的战役”已迫于眉睫，張作霖军队已经露出失败的征象。5月18日，田中内阁发表声明说，一旦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维持治安，将采

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同时，命令旅順的关东軍司令部进驻沈阳。另一方面还訓令駐北京的芳澤謙吉公使劝告張作霖为巩固“滿洲”撤回关外。張作霖不願退出北京。济南事件爆發时，他还声明实行南北合一，共御外侮，企圖同国民政府妥协，来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撤回关外就意味着完全淪为日本軍的傀儡，在民族运动的高潮面前，張作霖还是不甘心这样做的。在張作霖和日本之間曾进行了几次交涉。日本最后恐吓他說：如果不听劝告，同国民党軍隊繼續冲突，失败后想退回“滿洲”时，日本軍隊可能在山海关予以拦击。在这种情况下，張作霖终于下决心把北京交給閻錫山，返回沈阳，于6月3日凌晨一时，搭上了从北京开出的專車。关于当时的情景据“朝日新聞”北京电称，“当張氏回顧中南海时，竟异乎往常地在他的眼里閃耀着泪花。”

在东京，从5月20日起，連日召开了有外务、陆海軍、大藏等有关方面参加的东方會議。这次會議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答复美国用警告式的口吻所提出的日本是否要对中国东北采取某种積極行动的照会，以及对于劍拔弩張候命出动的关东軍如何發出指令的問題。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事实上的外务相)对于从出兵山东到济南事件期間，时常發生动摇的田中首相不断进行鼓励，甚至还揚言說：“田中如果不听话，就讓他辞去总裁职务”，森恪以及和他相勾結的軍部当时陰謀策划的是什么，具体情况虽不得而知，但是企圖使用軍事力量来使“滿洲”独立这一点，則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当时內閣受到了美国的压力。“王正廷首先求助于美国，使美国向日本發出了某种警告。美国的这种警告深深聳动了田中首相及其周圍的要人們。而这种聳动就是阻止和挫折了推行森恪所怀抱的大陆政策的直接因素”。(山浦貫一編：“森恪”)

5月25日夜，田中首相断然決定“停止一切行动”。于是，进驻沈阳的关东軍也不得不迅速地恢复平时状态了。

6月4日凌晨五時半，在离沈阳車站約1公里的地方，張作霖乘坐的專車在前进中被突然發出轟然巨响的地雷炸毀了，張作霖的大元帅服被鮮血染紅，他本人被炸死了。陸軍省虽然声明說：“毫无疑問，这是南方便衣隊員搞的”，但是，元老西園寺公望接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怀疑說：“真奇怪！这可不好向人說，总觉得象是日本陸軍干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田中不得已向日皇奏称：“关于張作霖被炸事件，我国的陸軍中的某些分子似乎有嫌疑，因此，現在正着陸軍大臣进行調查”（原田熊雄：“西園寺公与政局”）。但是，政府和軍部却拖延調查，企圖把这个事件不了了之。当时，中国的抵制日貨运动威胁着对华貿易中心的大阪經濟界（例如，对华的棉布輸出1928年5月約有十九万反，至同年8月便銳減至一万七千反^①），因此引起了对田中內閣的非难，前任外务相幣原和民政党总裁濱口趁此机会在大阪發表了反对田中外交的演說。

“滿洲某重大事件”和田中內閣的垮台

在第五十六次議會开会前，政府下令禁止报道張作霖被炸事件，并向民政党提議不把这一問題提到議会上来。已經开始倒閣的濱口拒絕了这一提議，議會一開幕，就指使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剛質詢这事件的真相，迫使政府加以处理。对此，田中只是重复答称：“正在調查”，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議会的疑惑。然而內閣在勉强地把議會应付过去以后，紧接着就突然实行了总辞职。国民也大体觉察到这是“滿洲某重大事件”——張作霖被炸事件——严重化的結果，不过这个事件为何成为政界的重大問題以及政府在滑过議會以后为何又被迫宣告垮台，这一切，当时都是无从了解的。直到战后在东京的远东軍事法庭审理的过程中，才判明白这一事件是

^① “反”是日本量布帛的單位，每“反”約合9.84公尺×0.34公尺。——譯者

出于关东軍參謀河本大作大校等的陰謀。另外，“原田日記”（“西園寺公与政局”第一卷）这样透露田中內閣垮台的秘密：政府和軍部中央調查的結果，都一致判明犯人是陸軍軍人。但是，田中却仅仅奏称，犯人不知是誰，只拟对在事件爆發当时負有警备責任者給予行政处分。实际上，只是将关东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編为預备役，勒令河本參謀退役，这件事就算結束了。因此，天皇曾向田中說：“这不是和你最初說的話不一致嗎？”天皇后来向侍从長鈴木貫太郎說：“田中首相說的話一點兒也听不懂。我也不願再往下問了。”田中从鈴木处听到這話，感到“惶恐”，才决定总辞职了。

派遣在外的軍人不顧軍部中央首腦和政府的意圖，挑起了从根本上動搖外交政策的重大事件，而無論軍部或政府都不能對他們加以处分；不仅如此，甚至在陸軍方面还有人贊揚這一事件的首謀者，說他們本意还是出于对國家的忠誠，而終於把這件事不了了之，这就等于同意了以后軍人可以独断專行地执行其冒險政策。民政黨从解除國民疑惑有利于國家這一點出發，對內閣进行了彈劾，但是他們仅仅提到关东軍沒有完滿执行警备任务，沒有保全在“滿蒙”的權益等等，而未能触及事件的核心。他們是故意把攻击的鋒芒避开了統帥权的外衣的。天皇的話造成政变的直接原因，这是天皇在政治上表示意見的一个特殊例子。据長时期担任駐宮內省記者的高宮太平的記載，事后天皇对此頗伤脑筋，从那时起，天皇对于追究政治責任采取了慎重态度（“天皇陛下”）。的确，从这次事件起，在政治史上又产生了新的特点，例如不允許國民知曉的宮廷势力有力地出現在政府和政党的背后。虽然如此，然而这一事件既非出于河本大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田中的垮台也不是由于天皇的一句話。实际上，把張作霖的存在当作絆脚石的这种对“滿洲”政策，是東方會議的必然的結論，而对于田中的所謂積極政策感覺不滿，要求改变政局，也是日本統治階層全体的意向。

无产階級政党的分裂

造成田中內閣垮台的原因里，还包括工人、农民斗争的尖锐化和反战运动的高涨。站在这些斗争的最前列的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担任工会干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改良主义立场和革命群众的战斗立场之间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分裂和对立，这表现在 1925 年 3 月，劳动总同盟的第一次分裂和同年 5 月日本工会评议会的创立。由左派工会联合组成的工会评议会的活动，构成了 1925—1927 年工人运动展开斗争的中坚力量。渡边政之辅领导的工会评议会不仅运用工厂委员会、工厂代表会议运动等富有创造性的战术，组织工人和指导罢工，同时还参加太平洋工会会议和赤色工会国际。借以加强了国际联系，并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但是，这种活动的据点大体上只限于中小工厂，而大工厂还是掌握在改良主义工会的手里。工人运动的这种形势还表现为无产階級政党的分裂。1925 年，在普选法获得通过的同时，在工会团体参加下召开了一次组织无产階級政党的筹备会，当时左翼提出的组织全国单一的无产階級政党的倡议遭到右翼的总同盟干部的反对，总同盟退出筹备会后，这才举行了农民劳动党的成立大会，但又立即受到禁止结社的处分。接着，于 1926 年 3 月，在右翼的领导下，把评议会排除在外，成立了劳动农民党。后来群众要求为建立阶级的统一战线而实行“门户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在同年年末，右翼干部及其控制下的工会又脱离劳动农民党，另行组成了社会民众党。同时，中间派也组成了日本劳动农民党。这样，便形成了大山郁夫的劳农党（评议会、日本农民协会）、三輪寿壮的日劳党（日本工会同盟、日本工会总联合、全日本农民协会，接着在 1928 年发展为麻生久的日本大众党）、安部磯雄的社民党（总同盟、日本海员工会、海员协会、官业劳动总同盟）三派对立抗争的局面，在这期

間，雖然有過幾次成立統一戰線的呼聲，但始終沒有實現。

福本主義

日本共產黨在 1924 年春遭到政府的鎮壓，屈服於鎮壓的赤松克麿、山川均等人作出了取消黨決議，但反對這種失敗主義方針的幹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從 1925 年 1 月起又着手重新建黨。由渡邊政之輔、德田球一等人排除堺利彥、山川、赤松等人，成立了重新建黨的籌備機構，在 1927 年 12 月，舉行了黨的重建大會。當時，工人運動的高漲，正在迫切要求共產黨的領導。在 1926 年的大規模勞資糾紛，例如共同印刷公司和濱松樂器公司的勞資糾紛中，就可以看到這種趨勢；同時也因為，“五卅”慘案而爆發的中國革命中工人、農民的鬥爭，給予了日本工人階級以巨大影響。當時共產黨的指導理論是代替山川主義的福本主義。福本和夫的理論可以說是一反山川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左”傾機會主義，此二者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唯心的革命理論。福本批判了以往的社会運動是經濟鬥爭和以此為基礎的“工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主義”，而主張把這種鬥爭發展為“整個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主義”，為此，他強調在“聯合”以前必須先“分立”，必須進行理論鬥爭，企圖借此來建立革命的“主體”。其結果使黨成為知識分子黨員的集團，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同時也產生了把先鋒隊與群眾組織的不同作用混為一談的缺陷。這個福本主義，由於 1927 年因對內與危機的慘禍作鬥爭、對外反對侵華戰爭的工農運動有了發展，才得到了克服。

根據共產黨的合法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的倡議，以“勞農黨”為中心，展開了“解散議會的請願運動”。這一運動排除了官憲的嚴酷鎮壓而發展為全國性的鬥爭，提出了反對惡法、確立耕作權、進行失業者運動、不許干涉中國等口號，又和評議會號召的工廠委

員會、工廠代表會議的運動結合在一起，鼓動了許多工人和農民，甚至把社民黨和日勞黨的群眾也吸引過來，不但擴大了組織，而且還使廣大群眾認識到“獲得政治自由”的必要。

反對干涉中國同盟

勇敢地反對若槻、田中內閣侵略中國的也是這些勞動人民。應中國國民黨駐日總支部的要求召開的日中懸談會曾經開過兩次會（2月26日、4月13日），討論了組織“反對干涉中國運動團體”的問題。“無產者新聞”在2月26日，針對若槻內閣派遣軍艦和陸戰隊一事，發表了題為“要求立即撤兵！組織反對干涉中國同盟！”的社論，呼籲中日兩國人民團結合作。接着在4月2日和9日，繼續發出了“開展反對干涉中國的全民運動”以及“中國革命和日本無產階級……迅速組成反對干涉中國同盟”的呼籲。中國國民黨駐日總支部在4月5日發表了“向全體日本無產階級呼籲”的文告，為此，在14日，又召開了日中懸談會，並於26日成立了反對干涉中國同盟籌備會。同一天，勞農黨和日勞黨之間又結成了聯合戰線，而在5月1日東京的“國際勞動節”的遊行隊伍中，竟出現了“反對干涉中國”的標語。5月6日，勞農、日勞兩黨聯合舉辦了“反對干涉中國”的講演會，但因引起了官憲的恐慌而被解散。因遭到這種鎮壓而退縮了的日勞黨雖然拒絕了繼續與勞農黨進行共同鬥爭，但是在5月28日日本政府斷然出兵山東以後，於同月31日即在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戶、青森、岩手、長野、靜岡、奈良、三重、岡山、福岡等縣市的地方同盟的協助下和“反對出兵中國”“撤退在華駐軍”的口號下，結成了“全國反對干涉中國同盟”。而日勞黨和社民黨卻沒有參加這一同盟。社民黨為了拉攏被帝國主義者所收買的蔣介石，派宮崎龍介和松岡駒吉前往南京，甚至還表示態度願意和參謀本部合作。日勞黨在表面上雖然也標榜“反對干涉中

国”，然而却不去組織实际的斗争，也不想同中国无产阶级携手。由于工人阶级中的觉悟分子都热烈支持“反对干涉中国同盟”，在群众的压力下，属于日劳党系统的关西联合会、京滨劳动技友会、总联合会等也率先参加了这一同盟。对于关西联合会的这种活动，日劳党给予了“开除处分”，但关西联合会并没有屈服，还是继续进行了斗争。反对干涉中国同盟举行了两次“反对出兵周”，又发起了“派遣赴华视察团运动”。视察团代表在8月26日从东京车站出发，28日抵达福岡，一路上，不顾政府的压迫，在奈良、大阪、岡山、八幡、福岡召开了演讲会。在到达福岡以前，全部代表被先后拘捕和解回原地，没有达到去中国的目的。但这种活动已使“反对干涉中国”运动深入到日本西部的工农群众中间了。

1927年綱領和三·一五事件

1927年的“綱領”是在这样情况下产生的。1927年7月15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日本的綱領”。渡边政之輔和福本和夫代表日本共产党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一“綱領”同时彻底批判了两种偏向——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决定重新組織以工厂支部为基础的党的革命的实践运动，科学地并且具体地确定了战略目标和战术口号。在这一綱領中，对日本的客观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明确了以下各点：日本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时期；但它的发展是受到限制的，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已经开始威胁着资本主义；由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掌握的反动的国家机关的领导权已由地主阶级手里逐渐向资产阶级转移；从而，即将来临的革命是以极快的速度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成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革命的客观条件已十分成熟，但是革命的主观条件尚未成熟，为此，首先应该扩大和加强共产党、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使其在群众中获得政治领导权。根据这一綱領，产生了

新的党中央委员会，创刊了党的机关报“赤旗”，并从1927年年末起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1928年2月实行的第一次普选性质的大选，使处在地下的共产党有了在工厂支部的基础上公开出现在群众中间提出政纲的机会。共产党员作为劳农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并向群众提出了“打倒天皇制”、“建立工人、农民的政府”的口号。于是田中内阁的内务相铃木喜三郎对于以劳农党为首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和露骨的干涉，但选举结果，劳农党的得票数达十九万三千零二十八票，山本宣治和水谷长三郎二人当选，社会民众党的得票数是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六票，四人当选，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有二人当选，共计有八人当选（此外，旧有政党的政友会当选二百十九人，民政党二百十七人，革新党四人，实业同志会四人，中立派一人）。

共产党的出现和在选举中显示出来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力量引起了政府的恐惧，政府为了执行其蓄意已久的用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作好准备，乃于3月15日拂晓，在全国各地同时逮捕了一千六百名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这就是所谓“三·一五事件”。接着在4月10日，又解散了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劳农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和全日本无产阶级青年同盟三个团体。在“三·一五事件”中被起诉的人数达四百人。但是，在幸免检举的渡边政之辅、市川正一等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重建共产党的工作，并很快地在4月中就恢复了全国的联络。上述三个团体被解散后，劳农党随即组织了“争取政治自由工农联盟”（1928年12月），同月，革命性的工会——日本全国工会协议会也成立了。为反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兵山东，组成了全国反战同盟，提出“拥护中国革命”、“从中国撤出手来”的口号向人民和出动的部队进行了呼吁。此外，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还举行联席会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共同宣言。

为了镇压工人、农民的斗争，在 1928 年 6 月，政府竟然在议会开会期间以紧急敕令修改了治安维持法(最高刑为死刑)；至 7 月，又以二百万日圆的预算建立了特别高等警察制度。当时，官宪的镇压进一步采取了恐怖手段，10 月间，渡边政之辅在台湾基隆港被警察杀害了。次年 3 月，水谷长三郎慑于白色恐怖而脱离了革命阵营；劳农党议员山本宣治在第五十六次议会开会期间被七生义团团员暗杀了(3 月 5 日)，他在被杀以前曾说，“虽然我一个人在此坚守阵地，但我并不觉得寂寞，因为在我的背后有几百万工人群众”。此后，在 4 月 16 日，政府又对共产党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检举。

“全集本”时期和无产阶级文学、戏剧

在上述阶级斗争的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和普及到思想界里来了。从 1927 年起开始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二卷(改造社版)。为了具体论证“1927 年纲领”，在 1928 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讲座”，其中包括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服部之总的“明治维新史”及其他优秀著作，这一讲座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的具体运用打下了基础；另外，产业劳动调查所出版的“无产者政治手册”为实际开展社会运动提供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从这时起，在综合性杂志上也出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以“夺还被特权阶级所独占的知识和美”为目的而发刊的岩波文库也是这种潮流的一个反映。

当时“全集本”的流行最明显地反映了文化的大众化。这一倾向始于 1926 年前后，而以改造社的山本实彦所创始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为开端，该书售价普及本每册一日圆，精装本每册一元五角，因而大受欢迎，以后又出版了“大众文学全集”、“世界文

学全集”等数十种，不久甚至出版了“相声全集”、“評詞全集”等通俗讀物。这种大众化也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利用出版資本为反动統治服务。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就是拥有大量發行数字的大众娱乐杂志“国王”的大日本雄辯会講談社の野間清治的出版方針。他一面通过向大众提供通俗常識和低級趣味的艺术，来巩固作为封建权力之基础的家族道德，另一方面宣傳国家主义的教学，来实行“出版报国”。

在文学方面两种流派的对抗也非常明显。在 1921 年創刊的“播种人”里誕生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后加强了与工人运动的結合，巩固了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的基础，至 1924 年，由同人組織創刊了“文艺战綫”(文战)；創立了“日本无产者文艺联盟”，出現了叶山嘉树(“卖淫妇”的作者)、黑島傳治(“銅錢”、“豚郡”的作者)、林房雄、里村欣二、久板栄二郎等作家。次年，在文学之外又将戏剧、美术、音乐包括进来，同时，排除了反馬克思主义分子，發展成为“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当时因受到机械地搬用福本主义的影响，在文学上也展开了理論斗争，并主張艺术在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應該是“被組織起来的群众的进軍号角”。这种急进倾向使得“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在 1927 年發生分裂，由大部分“文战”的同人創立了“工农艺术联盟”，于是，在文学中确立“政治领导权”和知識分子的作用等有关“政治和文学”的問題成了爭論的焦点。这样，“文艺战綫”改为“工农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而繼續刊行，而“无产者艺术联盟”則創刊了“无产者艺术”。至 11 月，“工农艺联”又因为刊载山川均的稿件問題而再次分裂，分裂出来的部分成立“前衛艺术家同盟”，創刊了机关刊物“前衛”(1928 年 1 月)，从而形成了三派鼎立的形势。

为改变这种战綫分裂的状态，“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前衛艺术家同盟”在 1927 年的“关于日本的綱領”的指导下，于 1928 年

3月合并为“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合”，在日本政府进行第二次出兵山东的5月，以“对于战争的战争”为题刊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创作集”。接着，“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合”在“三、一五”事件后，为了整顿阵容，并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统一战线组织，组成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在5月间创刊了机关刊物“战旗”。这样，“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便与“工农艺术家同盟”（文战派）相对抗（这个文战派是和脱离共产党的山川均、猪俣津南雄、荒畑寒村等工农派理论家们保持紧密联系的），它无论在理论上或在作品上都使无产阶级文学开放出了美丽的花朵。当时属于“文战派”的作家叶山嘉树发表了长篇小说“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年），平林太子、黑岛传治等人也发表了作品；而属于“战旗派”的小林多喜二发表了“1928年3月15日”（1928年）、“蟹工船”（1929年）、德永直发表了“没有太阳的街”（1929年）等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这就表明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实际的正统性，接着又出现了洼川稻子的“从糖果工厂回来”和中野重治的“初春的風”、“鉄的故事”等作品。

尽管无产阶级文学有了上述的发展，但是构成文坛的主流仍然是资产阶级文学。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使东京完全失去了江戸时代情调的最后残余，代之而来的“复兴”则是对西洋文化的肤浅的模仿。“现代的”一词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在“现代主义”盛行的潮流里，出现了被称为新感觉派的作家。这就是川端康成、片岡鉄兵、横光利一等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由菊池寛的“文艺春秋”培养起来的。这一派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性”，采取艺术至上主义的立场，重视机械文明的物质性和基于享乐主义的感觉性，并吸取了战后欧洲文学的新的技巧（心理主义等）。然而不能忽视，在这种现代主义盛行期间，流露出来了在深刻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安和绝望的情绪。1927

年7月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就是作为在他遺書中所写的“莫明其妙的不安”的象征，在当时人們的心灵中引起了深刻的震动。

然而，和明治以来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發展相对抗的这种新感觉派的全部作家，並沒有朝着以解决这种现实不安为課題的方向及复活人性的方向前进。恰恰相反，以横光利一的描写五卅惨案的“上海”为頂点，新感觉派走上了解体和分化的道路。

在1928年时期，片岡鉄兵、高田保等人，以及后起的藤澤桓夫和武田麟太郎、高見順等人，从新感觉派文学中走出来而轉向“左傾”；詩壇上的壺井繁治等人以及細田源吉、細田民树（“眞理之春”、“生活綫A B C”的作者）等人开始以社会問題为題材进行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其次，野上弥生子的“眞知子”开始連載，中条（宮本）百合子的“伸子”的刊行也都是1928年的事。这种情况表示了一个鮮明的时代潮流，在这个时期，小林多喜二和德永直的作品也能够立即在“改造”和“中央公論”上發表。

新感觉派的分化当然並沒有就此結束，其中出現了龙胆寺雄等現代主义作家，也产生了例如佐佐木味津三那种轉向大众文学的作家，并且紧接着又进入了“色情、怪誕、荒唐无稽”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广津和郎和山本有三也开始写作“同情者”的文学作品，明治大正以来成为文壇主流的專門描写个人思想轉变的“心境小說”亦即“自傳式小說”这时似乎已經絕迹。当然，作为个别的“自傳式小說”作家（作为过渡到下一个时期的桥梁人物），还有嘉村礪多等人。

1927至1928年間，在戏剧界也發生了重大事件。1927年11月小山內熏以国宾身分被邀出席了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大会；1928年，市川羽左衛門赴欧洲，市川左团次一剧团也去苏联，这些以往从未想到的事情相繼發生了。1928年将近年終的时候小山內熏突然逝世了。这件事特別是給予了新剧运动以莫大的震动。

在此以前,当关东大地震后不久,新剧运动是以筑地小剧院为中心开展起来的,这个小剧院作为建立现实主义演剧的“实验室”,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剧的发展。正在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曾有人批判过筑地的小山内熏等人的学究倾向。在群众性的戏剧方面,有千田是也和村山知义等人为中心所建立的“前卫座”,它作为实验剧团参加过1926年1月共同印刷公司工人大罢工中所组织的“流动剧场”的演出,以后就改称为“无产者剧院”,并且有了发展。至1928年,这些剧院合并起来组织了“东京左翼剧院”。就在这个时候,小山内熏突然逝世,使“东京左翼剧院”在“八十四次”公演也是最后一次公演后发生了分裂,分裂为“剧团筑地小剧院”和“新筑地剧团”。留在“剧团筑地小剧院”的人们以北村喜八、青山杉作为中心,排演了“从早晨到半夜”、“磔茂左卫门”、“鸦片战争”、“怒吼吧,中国!”、“西线无战事”。为了接近无产者的演剧而集合在新筑地剧团的是以土方与志为中心的久保荣、薄田研二、丸山定夫、山本安英等人。两个剧团之间展开了热烈的竞演。(“左翼剧院”的合并是在和文学方面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筑地两剧团都受到了该联盟的影响。)

大阪(战旗剧团)、神户(工人一夜剧团)、松本(青服剧场)、东京(前进剧团)等从无产阶级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各地剧团以“东京左翼剧场”为主体,组织了“日本无产者剧院同盟”,之后,“新筑地剧团”也加入了这一同盟。对于这种无产者剧团的公演,后来不久,无论在东京或其他各地,警察当局的干涉都不断地加强了。

第二节 井上财政和幣原外交

濱口內閣的性格

田中內閣垮台以后,繼任的濱口雄幸的民政党内閣于1929年

7月2日成立。新內閣上台發表了以整理財政、減少發行公債、解除對於黃金出口的禁令、國際協調等為內容的施政綱領。田中內閣的肆無忌憚的冒險的內外政策，不僅給人民帶來了不安，就是統治階級也深深感到為了日後“前進兩步”今天必須“後退一步”，以便好好地站穩腳步。濱口內閣以所謂“幣原外交”和“井上財政”的新面目出現，改變了直接的武力行動，而採用了比較“慎重的”和“巧妙的”對外侵略政策。政友會和民政黨从一开始就和壟斷資本緊密地勾結在一起，並且是日本兩大財閥三井和三菱的直接而且公開的政治代理人。但是，政友會還和那些在日本國家政權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地主勢力、宮廷勢力以及軍部勢力有着更密切的關係；例如在金融危機時期，為了使用武力來推行對華政策，宮廷勢力就聯合軍部施加了強大壓力，使若槻憲政會內閣垮台，而代之以由田中陸軍大將擔任總裁的政友會內閣，從這裡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友會的性格。但是，民政黨（若槻內閣倒台後，憲政會與床次竹二郎的政友本黨合併，組成以濱口為總裁的立憲民政黨）與宮廷、軍部的關係並不十分密切，它是作為壟斷資本利益的代表者而登場的，其主要目的也是利用國家權力加強其資本主義的剝削。這並不是說民政黨比政友會更為“和平”，而是民政黨企圖在更慎重的準備的前提下進行對外侵略而已，在反對日本國內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這一點上，兩黨之間並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

歸根結底，田中政友會內閣倒台，濱口民政黨內閣成立，是上述對中國直接武裝干涉失敗的結果，同時，也是由於金融危機使壟斷資本在國內的勢力更加增長，民政黨就作為壟斷資本家的代理人而獲選了。

解除黃金出口禁令和通貨緊縮政策

解除關於黃金出口的禁令，是民政黨從憲政會時期起許多年

来一贯主張的主要政綱。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中国的直接軍事行动沒有成功，对于日本資本主义來說，必須进一步加强在国外市場从事經濟活动的力量，为此，首先需要尽可能降低日本商品的价格，加强在国外市場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加速資本积累，扩大向殖民地的投資，以便在和欧美資本主义国家爭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本禁止黄金出口，使得日本的商品价格，不仅不能低于世界市場的国际水平，反而由于过去历任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而更加提高。其結果，日本商品价格比外国高出很多，在貿易上，形成出口困难，进口却显著增加，每年都有巨額入超，妨碍了資本的积累。因此，廢除对于黄金出口的禁令、实行通貨紧縮政策、降低日本商品价格的呼声在壟断資本之間高漲起来，与壟断資本密切結合的宪政会特別主張这样做，只是在第一次大战后的不稳定的經濟情况下，驟然实行这种政策，势将促成物价急剧下跌和企业倒閉等經濟界的混乱局面，并进而危及壟断資本的基础，因此，統治階級才不得不一再延緩了这些政策的实行。

在金融危机中，已經通过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巩固了自己的壟断力量的大資本家們，終于要借濱口內閣之手来实行其多年未得解决的解除对黄金出口的禁令这一措施了。

大藏相井上准之助首先宣布“紧縮財政”，对 1929 年度預算坚决实行節約，由于对 1930 年度預算实行了一亿六千万日圓的紧縮，并全部取消了原来拟定發行的八千五百万日圓的公債，因而編成了日本財政史上从来沒有的“无亏空的預算”，着手实行通貨紧縮政策。1930 年 1 月又宣布解除对黄金出口的禁令。

濱口內閣所以要解除对黄金出口的禁令，除了上述基本情况以外，特別指望借此来与美国資本取得密切联系和外国資本的援

助。这种做法也就意味着明治維新以来日本資本主义依附于英美，借以引入外国資本，同时还利用这些資本向殖民地进行侵略的一种“借刀杀人”的傳統方法，也是利用外資抵补自己資本积累的不足，以便增强对殖民地經濟支配力量的一种巧妙策略。后述的对英美实行“协调”的幣原外交，所以被采用，也无非是为了这一目的的一种步骤。解除对黄金出口的禁令，是从1929年11月起，首先由英美借到了总额一亿日圓的信用貸款以后开始实行的。

关于解除对黄金出口的禁令，报纸上以“国力增長的时候到来了”为题，大吹大擂地进行了宣传。1930年1月15日那天，为了兑换从清早就跑到日本銀行的人們，看見了闊別十三年之久的五元金幣和十元金幣，脑子里幻想着繁荣即将到来。当时，留声机把以下这样的“解除黄金禁令小調”傳播到大街小巷，就是：“你許願戒盐，我許願戒茶，不是这样嗎？为了祈求解除对黄金的禁令，是嘛，当然……，”滿街貼着紧縮通貨的标語，实际上，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解除黄金禁令和通貨紧縮政策所給予人民生活的影响很快地就显露出来了。1930年7月，为了陈述农村困苦情况而来到东京的埼玉县北足立郡的一个农民代表，关于他們自己的生活曾这样說：“实际上今天我們农民正徬徨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含着眼泪过着苦难的生活。經過辛勤劳动而收获的白菜，五十顆才能抵上一包敷島牌香烟，卖一百把蕪菁才能买一包蝙蝠牌香烟（敷島、蝙蝠都是最賤的紙烟）。三貫^①蚕茧或三袋大麦只值十圓錢。这样，再扣除肥料錢，究竟能剩什么呢？”（日本經濟年報第一輯）。当时被迫面临生死关头的并不限于农民。政府为紧縮財政开支而实行整

① 日本重量單位，每“貫”合3.75公斤。——譯者

編行政机构的結果，很多官吏、特別是下級官吏由于失业而流浪街頭。由于不景气，企业的倒閉相繼發生，使失业者越来越多，想回原籍而沒有火車費只好步行的人群，造成了“东海道全綫意外的拥挤情况”。失业問題造成了就业的困难，曾經是“选女婿”的对象的大学生毕业的“学士先生”也不得不降格去当保險公司的外勤職員和小学校的临时教員。每天报纸上的社会新聞版都充滿了搶劫、杀人、自杀、全家自杀一类的消息和暗淡不安的气氛。

由于解除黄金禁令而流出的硬币，最初估計为一亿至一亿四、五千万日圓，但实际上，截止到1930年6月已达到二亿三千万日圓，以后，仍在逐漸增加。因此，解除黄金禁令的准备阶段就已經开始下跌的物价，这时更显著地加快了下跌速度，1930年6月的物价比1929年6月大約跌落了22%。这种物价的不断跌落招致了經濟的蕭条，而进一步加深这种蕭条的，却是資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到来。

产业合理化

世界經濟危机給日本带来的影响，首先表現在生絲出口的銳減上，日本生絲业的繁荣，过去是完全依賴于美国的購買力。而且同样由于危机的影响而造成的白銀价格的惨跌，使对中国的出口也完全陷于停頓，这就使得壟断資本家对于解除黄金禁令所抱的物价稳定、出口增加的期待已經完全落空了。再加上国内購買力的下降，不景气就越来越严重了。

这种不景气表現在严重的工业危机。从1929年3月到1930年9月之間的商品价格跌落情况，就其中八种重要商品来看，跌得最少的是洋紙，跌落13%，八种商品平均跌落37%；跌得最多的是水泥，跌落56%，生絲跌52%，棉紗跌43%。由此造成的各种商品生产量的降低，以1929年10月份为标准，生产最低时的减产

率，生絲是 60%，棉紗是 28%，煤是 30%。

在危机的發展过程中，壟斷資本家很早就企圖把危机带来的損失完全轉嫁到工人身上，以便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譬如，鐘淵紡織公司在 1930 年虽然把工資降低了 30%，而对于股东却仍然保持着 28% 的高額紅利。其所以能够这样，无非是由于壟斷資本家利用减低工資、加强劳动强度的办法把危机带来的損失轉嫁給工人，并以有組織的限制生产来維持其壟斷价格，同时，国家也通过所謂“产业合理化”的政策对壟斷資本进行了帮助。

在解除黄金禁令的一开始，壟斷資本最担心的是，随着黄金的流出物价可能急剧下跌，一时会引起国内的經濟蕭条和同外国的竞争趋于激烈，以致造成国内外市場的同时縮小，因而生产和銷售之間的矛盾将要进一步尖銳化。因此，必須同时进行“降低生产費”和“限制生产”。濱口內閣在 1929 年 11 月成立产业合理化審議會，在 1930 年 6 月又設立临时产业合理局，其目的就是要用国家权力来为壟斷資本强制执行降低生产費和限制生产的政策。

然而，这种工业危机再和农业危机結合起来就更加尖銳化了。危机所带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因直接受到美国市場不景气的打击，首先就表現在蚕茧的价格上。1930 年 5 月曾經保持着一千一百日圓的生絲价格，仅仅在一个月的時間即下跌了 36.8%，即跌为七百九十五日圓。这种跌价恰恰是在春茧即将大量上市的时候，所以蚕茧价格是更大地压低了，其下跌率比生絲大得多，1930 年 9 月的价格比前一年同期下跌了 65%。这就意味着生絲下跌的大部分損失都轉嫁到蚕农身上，給占全部农民 40% 的蚕农带来了严重的貧困。在長野县的蚕农地区农户因为没有現金收入，在参加亲友丧礼时只好拿写着“五分”“一角”的紙片来暫时代替奠仪，以后有了收入再付給現金，同时这种情况竟然成了一般的習

憤。

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10月政府發表了当年对米谷收成的估計，預告將有大丰收，于是，米价立刻暴跌，造成了所謂“丰年飢饉”。1930年1月米价是二十七日圓，到1931年1月猛跌到十六日圓，使农户的生产簡直陷于絕境。1931年情况正相反，东北地方和北海道又發生了从来沒有的歉收，这些地方出現了非常悲慘的状况，农民受到飢餓的威胁，赶在降雪以前到野山上挖掘蕨菜根，把馬鈴薯和米糠掺和起来作为日常的食物，借以苟全性命。不論丰收或歉收，都要为“飢饉”的厄运而愁苦，这就是当年日本农民生活的写照。

在工业方面，由于壟断資本的限制生产，壟断价格仍旧維持着較高的水平，壟断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差价逐漸增高，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的貧困。同时，大約占农民收入20%的“非农业收入”，也因工业的蕭条而銳減了。紡織女工、織布工人、繅絲工人的工資，由于縮短工作時間、降低工資、解雇等原因而大为减少，使农民所不可缺少的“非农业收入”的来源受到威胁。其次，农村的封建式大家庭还得担負起那些由于吃不飽而从城市回来的龐大的失业人群的生活。这样，工业恐慌的重压和农业危机的深刻化加在一起，显著地增加了农民的貧困。

危机带来的損失都被轉嫁到工人和农民的身上，而与此相反，大資本家为了摆脱危机，却广泛地推行了限制生产以及其他卡特尔(壟断資本相互間的协定)运动。在这次危机中，近五十个产业部門建立了卡特尔，特別是重工业部門建立得最多，实行了限制生产、分配生产任务、价格协定、統銷协定、分配生产数量等。

这种統制生产与銷售的卡特尔运动，由于濱口內閣的“产业合理化政策”的推动而更加有力地向前發展了。政府有关产业統制的立法的主要內容，是对大工业的重要产业統制法、对中小工业

的工业組合法、和对輸出企业的輸出組合法，而其核心則是重要产业統制法。这些法令的目的是用国家权力帮助壟断資本加强其卡特尔的統制。因此，卡特尔几乎控制了日本产业的所有部門。

这样，在各产业部門进行卡特尔化的同时，控制这些卡特尔，从而控制日本所有产业部門的則是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資本。例如，在煤业中就产生了煤矿业联合会这样一个卡特尔組織，施行煤矿业的自主的統制，在其全部产量中，三井占 31%，三菱 19%，住友占 5%，与其他中等財閥加在一起，共达 83%。虽然各个产业部門多少有些不同，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这些財閥資本虽然是被卡特尔糾合在一起，而財閥相互間以及大財閥和中小財閥之間的对立和竞争，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是更加剧烈了。

其次必須注意的是，这种卡特尔是在大銀行指使下进行的，銀行控制产业，財閥銀行的主人控制所有产业部門的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例如，在 1931 年大同电力、日本电力、东京电灯等大公司間的电力供給协定，就是在三井財閥的領導者池田成彬的指使下签订的；同时，三井銀行又向东京电灯公司进行干涉，把它也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如上所述，濱口內閣通过解除黄金禁令来为他“大展宏图”創造条件的計劃，徒使工人、农民的生活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而另一方面，壟断資本特別是大財閥，正如施行“产业合理化”政策那样，任意行使国家权力，在危机之中还拼命想要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以这次危机为轉折点，国家权力逐漸从屬於大財閥的利益支配之下了。

倫敦裁軍會議

幣原喜重郎担任外相，是从 1924 年到 1931 年大約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他所提出的以所謂四原則作为对华政策骨干的“国际协调外交”，就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所謂四原則就是：（1）不干涉中国内战；（2）通过经济合作来谋求共存共荣；（3）谅解与同情中国的现状；（4）合理地拥护合法权益。

但是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使这块金字招牌难以坚持下去了。繼田中外交之后的濱口內閣的幣原外交，逐漸地不得不暴露其侵略的本質了。至少是它已失去了阻止軍国主义策划发动战争的力量。幣原外交的最后产物，同时又使他險些跌跤的拌脚石，就是倫敦裁軍會議。

裁軍會議，一方面反映了战争牺牲者的人民群众对于和平的要求，而在强国政府方面，也有通过削减軍費来节约财政开支的必要，另外，这里面还包含着强国之間都想假借裁軍来互相牵制，并使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的斗争。

在 1921—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五大海軍国之間签订了关于战艦的协定，后来又在建造輔助艦艇方面开始了剧烈的竞争。于是，于 1927 年在日内瓦又召开了第二次海軍裁軍會議，但是由于英美两国意見分歧，这次會議沒有达成任何協議，至 1930 年 1 月，在新就任的美国总统胡佛和新成立的英国工党内閣首相麦克唐納之間达成了協議，于是就召开了倫敦會議。

日本的全权代表是民政党的元老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海軍大臣財部彪、駐英大使松平恒雄和駐比利时大使永井松三。海軍方面一貫主張大型巡洋艦应保有美国的 70%，輔助艦应为美国的 70%，潛水艇为七万八千吨。但是政府并未公开表明坚持 70% 的比例，而仅仅提出“攻击不足，防御有余”的“无威胁的裁减”并采取

了“国际协调”的方针。所谓“无威胁的裁减”的实际内容，并不是象字面上那样和平的，日本的目的是在远东保持对英美的军事优势，以及它向中国和南洋的扩张不致受到阻挠。日本面临国家财政的严重拮据，就中海军军费所占的比重几乎是英美的一倍，因此，它不得不避免在建舰竞争上与英美发生决定性的对立。所以，一面作为保卫国防的最低限度的数字提出了对美 70% 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幣原又暗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说“尽量争取 70%，但因为对方也有意见和面子问题，并不能完全按照日本的主张”。

这次会议，因为英美之间已取得谅解，主要的矛盾是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在交涉过程中曾几次濒于决裂，但结果，日美之间还是达成了协议，规定日本的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 60%，轻巡洋舰、驱逐舰为 70%，潜水艇相同，各为五万二千七百吨。全权代表团关于协议内容的请示到达国内以后，海军方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但结果，在内阁会议上还是全体一致同意了这个协议，并于 4 月 1 日向全权代表发出了批示。翌日，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即上奏日皇表示反对，并发表声明说难以保证国防的安全。据悉海军方面认为决定兵力属于统帅事项，因而指责政府未经海军军令部同意即发出批示是“干犯统帅权”，于是就发生了统帅权问题。在明治宪法上规定着“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一条），“天皇确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数目”（第十二条），但是，这些规定都是根据专制政府企图在军事方面逃避国会干涉的要求而设的。其中，关于前者，统帅权独立的原则已经获得广泛的承认。这就是说，在天皇之下掌管陆海军用兵的是统帅府——参谋本部、军令部，战时是大本营，国务大臣不得参与用兵。但是，关于后者，因为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问题，一方面与用兵有密切关系，同时，对于政治、外交、财政的各方面也有很大影响，因此，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兵额问题是否应该包括在“统帅权的独立”的范围以内，还有争论。伦敦条约中关

于兵力的决定，正是屬於明治宪法第十二条的問題。后来因为主張天皇机关說而遭受迫害的美濃部达吉博士，支持了政府的立場，認為在締結裁軍条約上軍令部沒有任何决定权。

正在这时，第五十八次国会开幕了。濱口內閣認為倫敦条約是关于决定海軍兵力的条約，其决定权屬於政府，所以在决定批示上面，虽然軍令部持有不同意見，并不构成对于統帥的干犯。然而关于第十二条的所謂編制大权，因为怕引起陆海軍的一致反对，政府也未敢断言这点應屬於国务大臣的輔弼事項，統帥部不得干預，故意地采取了曖昧的立場。于是，在野党政友会和貴族院就抓住这一点向內閣进行了严厉的追問。

正在此时，曾以專門委員身分出席倫敦會議的軍令部參謀草刈少校自杀了，遺書写道“为了就倫敦条約問題，向国民表示歉意，願以死相报”。这样一来，在陆海軍青年将校和民間右翼团体中間，“不要忘记被自由主义者利益被迫牺牲的草刈少校的死”的呼声高漲起来，对政府的“協調外交”、“軟弱外交”的攻击激烈起来了。

在这样的气氛中，倫敦海軍条約于4月22日签字了，7月4日条約提交樞密院諮詢。圍繞着統帥权問題和国防上有无缺陷問題，政府和樞密院展开論战，一直延續了将近三个月。在樞密院里也有一部分人主張否決，但是內閣的决心很大，終於在10月1日通过了。但軍部和右翼方面对于政府的攻击，并未因此就趋于緩和，11月14日早晨，将要西下的濱口首相在东京車站站台上，被一个青年用手槍打中了，負了重伤。凶手佐乡屋留雄是寄居在岩田爱之助的“爱国社”的一个右翼青年。

因討論倫敦条約而提出的統帥权問題，使民間右翼势力和軍部势力結合起来，国家至上主义运动开始公然出現到政界上来了。处于危机下的社会不安也是一个因素。对此，政府在議會中

答辯說：“不景气的原因是世界範圍的不景气”，并未表示任何自疚。右翼势力就利用此点喊出了“打倒政党”，打倒“財閥”的口号。尽管如此，政府这时所以对实行裁軍态度意外地坚决，是因为当年2月正在倫敦會議时期，民政党在大选中得到了絕對多数的选票，有了自信，而財閥也支持內閣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并且还直接受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的鼓励。同时也不能否認，当时自由主义气氛較强的輿論希望通过裁軍来維持和平，也是对于政府的一个有形或无形的支持。

幣原外交

倫敦條約被批准了，可是，当編制翌年——1931年度預算的时候，政府对于海軍当局所提出的为数三亿九千四百万日圓（其中第一年度为九千五百四十万日圓）的軍备补充計劃，却不得不加以承認。为了緩和因倫敦條約問題而引起的海軍內部的不滿，这样做是必要的。濱口內閣虽然在倫敦會議时成功地駁斥了海軍部內的强硬派的要求，可是它沒有敢于拒絕这一补充計劃，因为那样作将使海軍部內的妥协派也轉到反对派方面，以致政府在海軍部內完全失去其威望。这种危險局面具有动摇內閣本身的力量。日本的政党內閣，即使在其全盛时代也具有这种脆弱性。然而，必須注意，幣原的“協調外交”在本質上并不反对走向战争。濱口內閣上台，国家預算中直接軍事費的比例也並沒有特別减少。1929年度預算，因实行“緊縮政策”在总数上减少了6.89%，可是，陆海軍省的預算仅仅减少了4.39%；和“田中軍閥反动內閣”时期相比，軍事費的比例不仅沒有减少，反而有了某些增加。1930年度，陆海軍省的預算实額比以前有所减少，但在总預算中所占的比例是28.5%，是比上年度增加了。其次，軍需品进口額对全部貿易額的比例，在田中內閣任內，1927年是35%，1928年是39%，而到濱口內閣执政的

1929 年和 1930 年都达到了 41%，反而增加了。在国际上，軍費占整个国庫开支的比例，英国是 14%，美国是 21%，法国是 22%，意大利是 24%，而日本竟达到了 29%，占世界第一位，比英国多一倍。

根据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濱口、幣原外交尽管在表面上标榜“协调主义”、“和平政策”，但整軍备战却仍在以同样速度繼續进行。只是慑于与列强針鋒相对，因而不采取露骨的冒險主义政策，而以“紧縮政策”、“产业合理化”政策来加强壟断資本，依靠壟断資本来充实軍需工业、建立总动员体制等等，也就是把做好这类基础工作当成了重点。例如，田中內閣設立的直屬內閣的“資源局”，是“在經濟方面进行备战”的參謀本部，这个机关到了濱口內閣时就开始实际工作了。关于設立这一机构的目的，在該局發行的“資源的統制运用与資源局”(1930 年 5 月)里作了如下闡述：“这次大战在表現为大規模而且長期的兵力战的同时，也显示了作为武器战、軍需战的實質……使人深切体会到战后經營要受到平时国防准备多末大的影响，目前，倾向于偏重兵力的国防觀念受到修正，人們已充分認識到，国防已經不是軍隊的專業，而是整个国家的大事，战争已經不仅是兵力对兵力的斗争，而是国力对国力的較量”。

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总体战和总动员的主張，資源局的任務也就是为此目的而对資源进行統制和运用。同时，关于产业动员进行了詳細而具体的調查和計劃，为了准备一朝有事，甚至連山区僻地的公共汽車和馬車也列入了动员計劃之內。从 1929 年 12 月 1 日起，在日本全国实行了資源調查法及有关命令，而于 1929 年在东京、大阪、神戶地区，为了作好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还实行了工厂生产演習、調撥演習和运输演習。产业合理化政策是有着这样一种“軍事”目的，即企圖發展与軍需品生产直接有关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同时把这些工业改变成适应近代化战争需要的經濟

組織。例如：可能立即改为制造火藥、毒瓦斯的化学工业、人造肥料、染料工业(据说 99% 的大中型工厂在开战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即可变为軍需品制造工厂)等，尽管在危机之中还是有了發展。直接的軍事工业的水平也提高了，在 1931 年 9 月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开始前不久，三菱飞机制造厂，第一次制成了本国产的重型轟炸机，当时，还逐渐能够生产战車、装甲車、高射炮以及其他近代化兵器了。此外，在陸軍大演習时，还动員了在乡軍人、青年訓練所的訓練生等都来参加，而在京阪神地区、京濱地区、横須賀、吳港、佐世保等軍港地区举行防空演習和灯火管制演習，也是从濱口內閣时开始的。

罢工浪潮

濱口內閣在开始实行紧縮政策时，为了表示以身作則，立即發表了对官吏减薪一成的方案。但是，这件事遭到了以司法官吏为首的全体官吏的一致反对，因此，政府终于不得不撤回原案。天皇的忠誠官吏、其中特别是官僚气十足的司法官，竟以总辞职的决心起来反对并提出了請願，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紧张局势。紧縮政策、产业合理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把危机带来的損失轉嫁給工人、农民，挫敗了这些政策的根本力量，当然还是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根据产业劳动調查所的調查，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在 1930 年約計三百万人，在这种貧困的 1929 年、1930 年中，劳資糾紛的件数和参加斗争的人数都大大增加，农民的减租斗争也同样地激烈起来了(参看后表)。

面临淪落危机的中小工业主和小市民，为了緩和生活的压迫也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抗争，减低电灯費运动、减低煤气費运动、减低房租运动、消費合作社运动等維護生活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展开，无论在都市、农村、工厂或街头，到处都弥漫着不滿和

	勞 資 糾 紛				減 租 斗 爭			
年 別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件 数	1,021	1,420	2,289	2,456	1,866	2,434	2,478	2,689
参 加 数	102,000	172,144	191,805	154,528	75,136	56,830	39,799	60,365

反抗的气氛。

在 1929 年末發生的关东的东京市电和关西的大阪通用汽車公司的工人斗争，一直坚持到了 1930 年。东京市电的斗争，由于以全协革命的反对派为中心的工会会员群众的顽强活动，12 月 5 日各路汽車全部罢工，电车在新宿、三田等七个地段实行了罢工。但是，因为属于日本大众党的四名东交旧干部的叛变，罢工不得不暂时收兵。通用汽車公司的糾紛是由于反对解雇二百八十名职工而發生的，一千三百名工人在举行了大示威的同时，于 12 月 26 日开始了罢工，尽管是在正月里，工人们还是向公司当局进行了示威活动，斗争一直坚持到 2 月 1 日。尽管如此，但由于新劳农党大阪联合会的干部們为了顧全本身安全和巩固自己地位的作法，使斗争遭到了失敗。然而，通过这一事件，暴露了新劳农党的本質，造成了后述發起解散新劳农党运动的一个直接原因。接着，反对失业、反对解雇的斗争在各地高涨起来，东京、大阪的三千名邮政从业員要求改善待遇、反对解雇；东京毛織厂工人也举行罢工，反对封鎖工厂。此外，一向以家庭的温情主义而自豪的、开办以来从未發生过任何糾紛的鐘淵紡織公司，所屬各厂的三万五千名工人也在 4 月間，为了反对减低工資 40% 而展开了斗争。为采取对策而成立的无产者党共同委员会，決議于 4 月 21 日举行反对鐘紡日，号召借此机会实行紡織工人大罢工。正当鐘紡职工的罢工在全国範圍內展开了的时候，东京市电从业員繼續前一年的春季斗

爭，又于4月20日全部路綫一齐实行了罢工。这个消息給予全国交通工人很大影响，东京公共汽車、东京郊外電車、神戶市电、大阪市电、横濱市电也都起而响应，提出要求，投入斗争，整个日本卷入了工人的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之中。这些都是在工人运动史上划时代的大斗争。

对此，资本家和官宪采取了解雇和镇压。工人们坚持了斗争，但是，随着斗争的長期化，一些干部們开始妥协和叛变了。在东京市电工人开始罢工的第三天，曾在前一年年末叛变过的四名东交旧干部，又迫使其影响下的七百五十名芝浦工厂的工人停止了罢工，企圖借此进行分裂。这样一来，属于右派的旧自治会现实同盟的一千七百名职工也于翌日(23日)停止罢工。然而一万五千名群众仍旧坚持罢工了两天；但是，到了25日午后终于不得不結束了罢工。因此，各地工人的斗争也相繼失敗，鐘紡工人的斗争也由于公司的镇压和收买而失敗了。

但是，不久又掀起了第三次罢工風潮，革命的反派势力較强的东京市电，在罢工停止后仍旧坚持斗争，要求使被解雇者复职和补發罢工期間的工資，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一部分群众停止工作，采取了安全日、要求日、不服从日等一切手段进行了斗争，最后，于5月25日不顧官宪的重重包圍，为了徹底实现要求，一齐拥到市电气局。对此，官宪竟發射了催泪彈，使多人負伤并解散了示威队伍。但是，这种镇压并没有使他們屈服，他們仍旧坚持了斗争，結果，终于迫使这次糾紛的負責人东京市長堀切、电气局長覓辞职了。

在6月的东洋毛織龟戶工厂的斗争中，二千六百名女工在全国工会的领导下坚持战斗了两个月，公司方面竟利用大日本正义团的暴徒們毆打罢工工人，因而發生了混乱，而女工們和官宪之間也發生了冲突，这是一场被称为“巷战”的激烈的搏斗。

佃农斗争

危机在农村最为严重。报纸上也大谈“农村的贫困”这一问题。因为地主企图将危机带来的负担强加在佃农身上，所以，正如前表所示，佃农的斗争就高涨起来了。以往，佃户与地主的纠纷每年约有二千多件，在1930年以后便呈现直线上升，过去是要求减免佃租和反对涨租占大部分，这时，延长租佃契约、确认租佃耕权和永佃权等属于耕种权的斗争却占了优势，这都表明了斗争的急剧尖锐化。地主采取了禁入禁地、没收青苗等高压手段，这种作法并且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保护(1931年2月28日最高法院对于“进入禁地的耕作者，因无视扣押标示而引起的刑事被告案件”所作的新判例，就是第一个例子)。对此，佃农们就以共同收割、共同耕种来相对抗，并屡次演成流血斗争。在山梨县奥野田的纠纷中，地主带领流氓三十余人强行没收土地，于是，十八个佃农就拿着铁锹、镰刀起来斗争并夺回了土地。因为警察把全部佃农拘押起来了，所以，全县农联就向全县发出动员号召，七百余农民赶去救援。这样一来，警察又在全县范围内逮捕了二百多人，但斗争仍然坚持下去，农会终于取得了胜利。还有，在“新潟大蒲原纠纷”中，贫农用“实力”进行了保卫土地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佃农的孩子们也拿着红旗参加了战斗，向地主投掷石块。他们就是“劳农少年团”团员。他们在作文中这样写道：“地主混蛋们！我们的人多得很，我们唱大混蛋地主之歌，地主的婊子也唱起来了，我们就大声喝道，干嘛你们也唱这样歌？”(久保寺三郎：“农村的崩溃”)。又以“农会”为题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成立农会迫使地主家伙们大大减低地租，让我们吃饱饭。今年景况又这样不好，假如再收租子的话，我们就要饿扁了。蔬菜不值钱，庄稼因为干旱也完蛋了，今后我们怎么活下去啊！真让人耽心。所以必须更多地成立农会”(久保寺

三郎：“农村的崩溃”）。

統治階級對於這種革命運動進行了鎮壓，在這一點上，被稱為“自由主義的”濱口內閣，與“反動的田中內閣”並無區別，在日本國內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名義而被檢舉和被起訴的人數，1929 年為四千九百二十四人（被起訴者三百三十九人）；1930 年為六千一百二十四人（被起訴者四百六十一人）；1931 年為一萬零四百二十二（被起訴者三百零七人）；1932 年為一萬三千九百三十八人（被起訴者六百四十六人）；1933 年為一萬四千零六十四人（被起訴者一千二百八十五人）。

如上所述，工農運動顯示了空前的高漲。但是，負責領導工農運動的革命的政勢力，由於相繼受到“三·一五”和“四·一六”的鎮壓而大為削弱，因而沒能充分地展開活動。由於這種原故，在 1929 年 8 月間成立的新勞農黨的領導機構沒有和共產黨建立組織上的聯繫，反而具有一種對立的傾向。因此，從黨內產生了河上肇、上村進等的“戰鬥的取消”運動，使黨陷於癱瘓狀態。同時，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以及在 1928 年末繼評議會之後重新建成的日本工會協議會（全協），都在“把一切鬥爭集中在政治性總罷工上”的口號下，採取了過左的方針，並使對此方針表示不滿的一派分化出去而成立了“刷新同盟”。這樣，左翼勢力的分裂狀態，正如上述那樣，很自然地使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叛變行為成為可能，阻礙了工農運動的發展。革命運動的重新轉向高潮還是從 1930 年的下半年開始的，當時共產黨重新擴大了與群眾的聯繫，重建了共產青年同盟，日本工會協議會也把分裂出去的“刷新同盟”吸收回來，展開了“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綫運動”，加強了力量，並掌握了東京交通工會（東交）的領導權。在這種形勢下，合法的無產階級政黨方面也吸取了 1930 年第二次普選慘敗的經驗，產生了合併的動機，至 1931 年 7 月，全國大眾黨、勞農黨和社會民主黨的一部分即

所謂中間派，联合起来組成了全国劳农大众党。然而，为时已經大晚，两个月以后就爆發了“九·一八”事变，这就迫使工农运动又不得不退入低潮了。当时，有組織的工人有 30 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7%，因处于左、中、右三派政治势力对立斗争的漩渦中，以致陷于混乱状态，在他們統一步調的工作将要就緒的时候又受到了这番打击，所以也就沒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有效地阻止局势向战争的方向發展，这也是很自然的。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

第一节 “滿蒙”問題的紧迫

被压榨下的朝鮮

由于發生了危机的結果，日本的国内市場日益縮小。因此，日本資本主义要想从危机中摆脱出来，除了保有和扩大国外市場以外，别无他途。但是，在这一方面也因为世界經濟危机的結果，所有国外市場都被严密地封鎖起来，国外貿易也日趋减少。1930年比1929年出口减少了32%，进口减少了30%，比同期的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貿易額的銳减情况还要严重。在这种趋势下，日本的統治者和資本家們再一次选择了进一步加强剝削殖民地和用武力夺取新殖民地的道路，以圖摆脱当前的困境。

在日本的最大殖民地朝鮮，人民在經濟危机下遭受着三重压迫。那就是由危机的直接影响而来的农业危机的打击、日本工业危机的損失向殖民地农业的轉嫁，以及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剝削。1930年由于日本和朝鮮的丰收，米价跌落了44%强，使农民遭受很大痛苦；这种痛苦由于第二年的歉收更加严重了。占朝鮮全体农户43%的佃农、占33%的自耕兼佃耕的貧农，平均要担负50%的实物佃租，有的地区甚至要担负60—70%。而且，每月还要受到月息10—20%的高利貸和商业資本的盘剝。此外，农民們所必需的消費物資，必須用昂貴的壟断价格購買日本的工业制品。相反，朝鮮农民的生产品却被强制地按低价收購，在1930年3月至1931年3月这一年当中，其平均价格下跌了28%，而进口商品(大多数是从日本来的)的价格不过下跌了12.8%。本来，朝鮮的大部分农民單靠农业就无法維持生計，所以有的到日本內地

去謀生，有的是自己的家屬受雇于城市的工厂或是土木工程，借此来勉强糊口。可是，由于危机还在持續，出外謀生已陷于不可能，同时家屬也被解雇回到农村，这就加剧了农民的貧困。

遭受苦难的不仅仅是农民，而是全体朝鮮人民。根据官方資料，朝鮮的失业人数达到日本的两倍，本来就够低的朝鮮工人的工資进一步被压低了。根据有工人五十人以上的工厂的統計，日本人成年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資是日圓一圓九角六分，而朝鮮人成年工人仅仅是九角四分。这样低的工資还要被进一步降低，而雇农的工資竟被减低到了每天六角五分。因为工厂法不适用于朝鮮，所以在朝鮮的工厂里，那种殖民地性質的長時間的劳动(女工、童工也是十一小时)越来越被延長了。工人們在日本工头的皮鞭下被驅使着，而且，所掙的工資就連最低的生活也不能維持，甚至連这样职业也被逐漸剝夺掉，使农村中显著地增加了过剩人口，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悲惨情况。試举一例，根据在庆尙北道所作的調查，五口之家一年收入平均只有一百日圓，每月全家生活費只有八元多一点(日本的平均工資每月是三十日圓)。这是对一个三十六戶的村庄所作的調查，据說其中还有三戶六口之家一年收入只有五十日圓。每天一个人仅仅是二分多一点(合現在的日幣八日圓而已)，这真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悲惨的生活状态。因为朝鮮人口的80%是农民，所以这也可以說是当时朝鮮人民的生活状况。

危机这样襲击了朝鮮，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日本資本主义的矛盾。首先，为了将危机的負担轉嫁給殖民地而实行的掠夺的加强，就把本已狹窄的朝鮮市場弄得更小。朝鮮农民的購買力已完全丧失，1931年从日本的进口額，比1930年减少了25%，比1929年减少了33%，結果使日本的工业危机更加深重。第二，朝鮮的农业危机所带来的米价下跌，更加加剧了日本的农业危机。第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維持低工資政策以及保證軍事上的自給自足，曾大力奖励朝鮮增产大米，因此，朝鮮大米向日本的輸出，就占了全部輸出的一半，对决定日本的米价有举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朝鮮米价的下跌就直接影响了日本的米谷市場。第三，殖民地朝鮮的政治危机加深了。随着危机的加剧，佃农自不必說，就連自耕农兼佃农、自耕农、“半地主”^①也都穷困了，很多“半地主”、自耕农、自耕兼佃农降为佃农、而佃农則向火种农(經營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民，因收成極低，第二年又迁移到別的地方，他們是不定居的流动农民)轉变，很多甚至成为流浪者，流入中国东北和中国內地。佃农在1929年是一百二十八万三千戶，至1930年末增加到一百三十三万四千戶，純“火种农”从三百四十三万戶增加到三百七十五万戶。另一方面，地主也有一些增加，大土地所有者的增加与日本人地主的發展是很显著的。根据1927年的統計，在拥有土地一百“町步”以上的八百七十八个地主中，就有五百四十三个日本人，其中包括拥有九万“町步”土地的东洋拓殖公司。

由于这种貧富差別日益扩大和农民的極度貧困化，使农民的斗争激烈地展开了，斗争的内容不仅仅是佃耕权、租粮等問題，而且还提出了不納稅的問題，这样就和傳統的民族独立斗争結合起来，帶有高度的政治性，以至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1931年1月被檢举的咸鏡南道的定平农会表明，“几乎全郡都受到了左傾思想的洗礼，并且有了在农村里罕見的巩固的基層組織”。同年5月，在咸鏡南道洪原郡，二千余名农民拒絕繳納山林組合費、农会費及其他一切杂稅，要求延期繳納戶稅，利用这一天的集日，群众堵塞了由洪原邑通往东西南北的四条大路，扛着鋤、鍬举行了一次革命的大示威游行。阶级斗争在工人当中也很激烈。1930年1

① 自耕一部分土地、出租一部分土地者。——譯者

月，二千名朝鮮紡織公司釜山工厂的女工，提出“反对民族的差別待遇、八小时工作、每日工資最低八角、提高計件工資 30%”等十二条要求，举行了罢工。还有 1929 年 11 月，在光州，朝鮮中学生与日本中学生發生冲突，这次学生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發展到全国，与上述釜山紡織工人的罢工結合起来了。接着又發生了仁川斋藤碾米厂、城津松下罐頭工厂、汉城大昌紡織公司、咸鏡南道新浦罐頭工厂、大丘全部碾米厂、元山德兴罐頭工厂、汉城食品公司、龙山工程公司、鎮南浦加藤碾米厂等工人的罢工，成了 1919 年万岁事件以来的重大事件。在三百名咸兴煤矿的工人斗争、平壤十二个橡胶工厂的二千名工人的同盟罢工以及四百余名元山工人为夺还被殘杀的朝鮮共产党员金佚山的尸体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工人和日本官宪展开了浴血斗争。

在台灣，情况也大致相同。从 1927 年起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都高涨起来，1930 年 11 月，台中州霧社的台灣本地人一千五百名掀起了暴动，总督府出动了陆军和航空队进行镇压。这次暴动的对象显然是日本人，中国人一个也沒有被杀。关于事件的根本原因，就連东京“朝日新聞”的社論也不能不这样說：对于台灣“既不給予自治权、又不給予参政权”，“把本地人居住地区称做行政区域以外地区，經濟、教育都任憑警察官办理，暴动就是这种警察專制所造成的恶果。”

在朝鮮、台灣的以工农运动为中心、并包括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运动的这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动摇了日本殖民地体系的基础。加强镇压，只能激起民族反抗的进一步加强。

万宝山事件

大批不堪貧困的流民从朝鮮流入中国东北，构成了在“滿洲”引起政治危机的因素。早在日本开始統治的初期，就有很多朝鮮

农民不堪日本殘酷的殖民剝削而背井离乡移居到中国东北，在吉林省間島地方，这种移居者几占当地人口的大半，这时由于更多的农民流入，因而在土地問題上和中国农民引起了糾紛。1930年5月，在間島地方，朝鮮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反抗中国軍閥与日本警察的双重压迫的暴动，但不久就被鎮压下去了。以后中国軍閥和警察的压迫更变本加厉，三百多名朝鮮农民被迫从間島移居到長春附近。他們打算在長春西北方五十华里的地方(位于万宝山和伊通河之間)把一千町步左右的荒地开垦成水田，和中国地主签订了租佃契約，并开始挖掘沟渠。然而，在中国民族感情高漲、把朝鮮农民看做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当然难以順利进行，至1931年5月末，中国官宪要求朝鮮农民立即从这里退出，同时中国富裕农民也因为担心挖掘沟渠会引起水灾而掀起了反对运动。7月1日，五百中国农民拥到現場，發射步槍和手槍，破坏了堤堰和沟渠。这就是盛傳一时的万宝山事件，日本方面利用这一問題作为解决“滿洲”問題的手段，大肆宣傳中国方面的非法，結果在朝鮮人之間引起了复仇暴动，7月2日夜在仁川爆發的暴动立即波及到整个朝鮮，在朝鮮的中国人遭到了复仇性的暴行，以致死伤了中国人、朝鮮人以及警察数百人。本来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鮮农民，可以說是日本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不幸的牺牲者，然而，这些人却正如“田中奏折”中所說的：“如果住在东三省的朝鮮人达到二百五十万以上，……使其进行軍事活动，就可以借口取締而进行援助他們的行动。同时，使东洋拓殖公司与南滿鐵路作为他們的后盾来支援他們的經濟与財政，以便借朝鮮人之力开拓内外蒙古”云云，不自覺地被利用来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尖兵的角色。万宝山事件和报复性暴动的对象，并不是这个事件的禍首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必須團結一致的中国人民，这就使得悲剧性更加扩大了。

“生命綫”——“滿蒙”

当危机更加深刻，殖民地朝鮮、台灣の矛盾日益尖銳化以后，“滿蒙”問題便驟然被賦与了重大意义。“滿蒙”被称为是日本的“生命綫”，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滿洲”对于日本資本主义的重要性，从下面的例子也可以得到証明。在貿易上，1930 年度，“滿洲”从日本輸入的商品占日本总出口額的 8%，其中糖是 14%，綿織品是 12%，紙張是 12%，机械、器具达 37%，成为日本的重要商品市場。同时，“滿洲”又是日本原料資源的供应地，从“滿洲”进口的物資占日本整个进口的 11%，日本进口的 76% 的豆类、64% 的煤、46% 的銑鉄、86% 的豆餅，都由“滿洲”供应的。在“滿洲”的整个对外貿易中，日本所占的地位大大凌駕在其他国家之上，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大部分煤、生鉄都被运往日本。“滿洲”不仅仅是日本的商品市場，而且是它的最大的資本輸出市場。在 1930 年 1 月，日本向“滿洲”投資的数額，属于借款方面的是二亿三千八百零六万二千日圓，属于法人企业方面的是十一亿三千五百三十五万二千日圓，属于个人企业方面的是九千四百九十九万一千日圓，合計为十四亿六千八百四十万零五千日圓。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对台灣的投资三亿零五百万日圓，对朝鮮的投资八亿零四百万日圓和对中国本部的投資十一亿九千万日圓。这个数目相当于外国对中国东北投資总额的 73%，除去苏联的 23%（中东鉄路），几乎占了全部。在日本的全部投資中，运输业占 56%，矿业和农林业占 8.4%，工业占 9.7%，因为大部分都是投在生产上，所以具有重要意义。

占有这样重要地位的“滿洲”的局势，从 1930 年起逐漸地發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就是：由于危机的影响，日本对于“滿洲”原料的吸收能力降低了；“滿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購買力减低，以致

日本的出口减少了；中国革命的發展及其給予“滿洲”的影响，使“滿洲”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加强了；由于以上的結果，日“滿”間的貿易額开始走向下坡路了。

这些事情，首先表現在“滿洲”的各种矛盾的發展上，“滿洲”的人口每年增加将近一百万人。其中，从中国本部移来的約占一半。这些来自中国关內的移民，在“滿洲”并不是自由的自耕农民，广大的荒地早已掌握在軍閥、官僚、大商人的手里，移居者只能成为他們的佃农。佃农的負担，除了 50—60% 的佃租以外，还要向軍閥繳納各种捐稅、向地主繳納沟渠捐，另外，每年还必须循例为地主服十天以上的劳役。土地經營的規模也是不平衡的，在“南滿”的很多县，有 50% 的农户、“北滿”有 80% 的农户是本身沒有耕地的雇农，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和軍閥手里，二、三个地主占有全县土地的例子也不稀罕。除了这种封建剝削以外，再加上滿鉄壟断運費，三井物产公司、三菱商事公司等大商人杀价收买大豆，高价推銷消費物資，这就使得东北的农民受到了更重的剝削。这样，在中国东北，由于手工业破产和农村阶级分化而产生的大批貧民，找不到可以收容他們的工厂，不得不作为劳工、雇农和貧农过着那种非人的生活。在南滿鐵路及其他外国資本所实行的部分工业化中形成的現代阶级和上述貧民一起团結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圍，形成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頑强的力量。

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以逐年增加的中国农业人口为背景，中国民族資本在帝国主义壟断資本的縫隙里發展起来了。这个势力推动着代表原有封建地主势力的东北軍閥張学良，使他采取了加强統一东北政权、摆脫日本、靠攏国民政府的方針。“在帝俄和日本正忙于划定其各自在‘南滿’和‘北滿’的势力范围的时候，中国农民占有了土地，‘滿洲’就不可避免地中国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能得到重新主張自己拥有主权的良好机会。”（李頓报告

書)。張學良在其父張作霖被日本軍暗殺了以後，就把日本帝國主義視為敵人，掛起“青天白日旗”，表示向國民黨靠攏。當時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極為嚴重的时候，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為了擴大商品銷售市場，一面援助中國民族資本的這種反日活動，同時進行種種策謀，企圖動搖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壟斷性，如其可能，還想把東北市場攫為己有。這些情況首先表現在土地商租權問題上。在 1915 年中日條約里曾這樣規定：“日本國臣民在‘南滿’，為了建造各種工商業用建築物或經營農業，可以商租其所必需的土地”。但是在上述情況下，這種土地商租權在實際執行當中，却一再為張學良政權所否認。前面提到的萬寶山事件也就是“中國人的土地歸中國”這一運動的一個表現。這種情況使得把租借地從 1922 年—1923 年的八萬英畝擴展到 1931 年的五十萬英畝以上的日本大金融業者陷於極大不安。

在這種條件下，又發生了與南滿鐵路競爭的鐵路綫問題。1930 年 7 月，中國在荷蘭筑港公司的借款幫助下，在能與大連港相對抗的不凍港葫蘆島開始了筑港工程，邁出了修筑和南滿鐵路競爭鐵路綫計劃的第一步。以此為起點並計劃鋪設東大干綫和西大干綫。當然，這個計劃的背后有中國的民族資本的活動和英美資本的援助。就在這個時期，由於 1930 年度東北的大豆滯銷、中國鐵路運費降低、以及白銀猛跌而造成的南滿鐵路運費的相對提高等等，使代表日本對中國本部投資的 40%、對“滿洲”投資的 63%（1931 年）的滿鐵，收入減少了三千零八十萬日圓，比前一年減少了 1/3。中國本部和“滿洲”作為日本的产品銷售市場的地位也開始動搖了，特別是在中國本部，以 1926 年為頂點，從此以後作為日本的銷售市場的壟斷性格已逐年降低，五年當中降低了 5%。與此同時，向中國、“滿蒙”的出口，在日本總出口額中所占的比例反而上升了。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日本的原料進口上面。在中國和

“滿蒙”的总出口額中，对日出口額所占的比例，在到 1930 年为止的五年当中約減少了 1% 左右，尽管这样，在日本的总进口額中，从中国、“滿蒙”地区进口的比例还是繼續上升。这种情况，使日本深深感到滿蒙問題是一个有关“生命綫”的迫切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深切地感到了，必須把“滿洲”的民族資本和反日运动压制下去，排除外国資本，即便动用武力也要維護它的权益而把“滿洲”作为殖民地来加以独占。代表資本家利益的幣原外交，即使从資本的利益來說，也是不可避免地要加以修改了。

中国的內战和中共勢力的發展

日本的侵略“滿洲”計劃所以能够得逞，其条件之一就是中国本部的局势。蔣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大体上算是完成了中国的統一，但是人民群众却依然过着阴暗的日子。蔣介石在他的統一过程中，以列强的利害冲突为背景，与各个軍閥之間掀起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內战。从国民政府成立到 1930 年为止的四年中間，仅大規模的內战就發生过八次。所以，国民政府有关軍事的开支，平均約占每年总預算的 90%，公債發行額在 1927—1936 年的九年之間达到了二百零二亿元。即使在这以前的、被称为終年內战和橫征暴斂的典型——北洋軍閥时期，有关軍事的开支总共也只占每年总預算的 70%，公債發行額在十五年間也沒有超过六亿元。在这期間，以蔣介石为首的蔣、宋、孔、陈四大家族，壟斷了政府各部門的要职，一手包办發行公債、借外債和發行紙幣等工作，搜刮了全国的財富，掌握了全中国的銀行、产业、交通和商业的支配权。

另一方面，一般人民群众，除了正稅之外，还要被征收十倍到三十倍于正稅的附加稅，諸如嬰兒出生的“出生”稅，死人的“棺柩”稅，房屋的“烟囱”稅和田地的“糞窖”稅等等，以及其他由統治者随心所欲地制訂出来的“捐稅”。在这些捐稅之外，有錢有势者所献

給各派軍閥的“安全保障費”，归根結底还是出自劳动人民的身上。每獻給軍閥一笔款，就要把工人的工資降低一番，把佃农的地租提高或預收一番。而劳动人民所得到的，只是貫穿在一片荒涼的田野中的近代化軍用道路和在 1927—1930 年間被抓去当兵的約五十万亲人所遺留下來的白骨。

但是这种情况却給予了革命势力以新的發展的机会。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澤东和朱德所領導的井岡山紅軍根据地的斗争带动下而开始了。如前所述，南昌起义失敗以后，又有叶挺、賀龙余部四百余人和东江的人民武装，在 1927 年 10 月間在广东省的海丰和陆丰建立了苏区。朱德率領的部队后来也轉入湖南，与占据着东南部山岳地区和地主、軍閥的白色恐怖进行着頑强斗争的农民及矿工的游击队伍相会合，并在各地發动农民起义，把兵力扩大到六千人左右，一面迴避国民党軍主力的追击，一面进軍，于 1928 年春到达了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井岡山麓，和毛澤东的部队会合了。毛澤东于 1927 年 7 月率領脫离汪精衛政权的武汉警衛团，沿着湖南、江西两省的北部境界向南推进，联合农民游击队、鉄路工人和矿工展开游击战，在各地組織农民大暴动，建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即后来的苏維埃）。他們受到国民党軍隊的瘋狂的追击，紅軍士兵的身上生了虱子，鮮血淋漓地赤着脚轉战在峽谷和丘陵中，于同年秋天退却到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这以前，由五座險峻的山峰所环抱的井岡山，为出沒在这一带的王、袁两土匪所盘据，他們当时拥有由飢民組成的六百名队伍和六十支破槍。毛澤东部队說服了这支土匪队伍，把标有鋤头和鐮刀的紅旗插在这座山上。以后又来了一批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汉口逃出来的工人、学生和湖南南部秋收起义中失敗的四千名农民游击队。这支被命名为紅軍（工农紅軍）第四軍的、由四个团編成的一万二千名部队，就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衛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当时可

以称为武器的，只有朱德队伍的两千枝步槍和手槍、六門炮、二十挺機槍以及游击队在各地从敵軍处夺来的若干步槍，此外，就只有游击隊員們帶在腰間的鉄棍、長刀、短刀、鋤头、鋤头和矛槍而已。

剛剛停止了內战的华南地方軍閥，集中了八个到十八个团的大軍，从湖南、江西两省一起包圍了井冈山。紅軍奋战了八个月，不仅守住了这一根据地，而且还乘虛向四周出击，赶走了地主，在各地建立了农民政权。1929年1月，毛澤东、朱德率領的主力部队約四千人突破重圍，在江西省南部一带展开游击战，并且攻入广东和福建。在这种困难的战斗中練成了一支掌握着后来使日本侵略軍疲于奔命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駐我扰、敌疲我打”这种巧妙的游击战术，和“不取人民一針一綫”的严格的軍紀，以及被称为“不知恐惧的紅色野人”的極其勇敢的坚强队伍。他們針对着軍閥之間的分裂或統一的各个不同时期，实行集中或分散兵力，一天天地扩大了占領地区。在占領地区內动員貧农和工人驅逐地主，沒收一切土地分給貧农和中农，在他們的强力支持下，建立了不許地主和富农参加的工农兵苏維埃政权，扩大了紅軍和赤衛队。这样一来，連平原地区也在革命情緒高昂的人民群众的坚决保衛下，变成了巩固的根据地。到了蔣、閻、馮进行內战的1930年前半年，以江西和湖南为中心，在湖北、广西、广东、福建、安徽和河南各省已經出現了每区包括一县到数县的十五个边区(苏維埃区)，只是正規紅軍就达到了十三个軍共六至七万人。1930年春，湖南全省發生灾荒，飢餓的农民群众在各地掀起暴动，一直受到压抑的大城市的工人斗争也显著地活跃起来了。在这种形势下，由彭德怀率領的紅軍，趁着蔣、閻、馮打內战的空隙，在七月間占領了長沙，胜利的紅旗在这座湖南的第一个大城市上空迎風招展。革命的新高潮立即引起了英、美、法、日的共同干涉，在以美国炮艦巴罗士为先导的七艘外国炮艦的援助下，国民党軍夺回了長沙。由于列强的

干涉和当时中共领导者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的领导(号召工人在汉口等重要城市起义,并命令红军向这些城市进攻),红军虽然又一次受到了挫折,但是由于毛泽东和朱德以江西为中心而进行的活动,使红军进一步壮大起来,到1931年已达到十万人以上。这种情况使在长江流域拥有巨大利益的英美两国和国民党政府大为震惊。蒋介石一经结束他与閻、馮之间的内战,立即发布紧急治罪法,一面对于“红色分子”及嫌疑者施行空前残酷的白色恐怖,同时又集结了八个师十万人的兵力,围攻江西中央苏区。这次“围剿”很快被打败了,在1931年5月,又动员了二十万人,接着在7月间,蒋介石亲自率领了三十万主力军,试图一举占据江西中央苏区。此后,到1933年10月为止,又进行了两次“围剿”。在此内战过程中,苏区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同时,真正民主的政权机关也产生了,作为人民武装的红军也愈益壮大起来,“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政策”逐步制定出来,一句话,中国革命已经走上了通往胜利的轨道。

蓄谋侵略大陆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对着中国革命的这种发展和对此无力加以阻止的南京政府的无能,早已感到无比的焦躁。不仅如此,从1928年1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的存在,以及它给予了中国革命以无限鼓舞的事实,越发使侵略者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就企图强占“满蒙”,把它作为拦阻中国革命接受苏联影响的楔子、并作为征服全中国的基地和反苏战争的前哨据点。

三月事件

由于上述“满蒙”情况,再加上日本国内的不景气和社会不安的加深,使日本的政客和军人们感到了极度的焦虑。他们开始认

为，如果不依靠战争和通货膨胀，就不能摆脱这个危机，就不可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而生存下去。他们开始认真地考虑了在国内实行法西斯改革问题和武装占领“满洲”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站在最前列的就是军部。

本来，日本的陆海军是天皇制的最重要的支柱，但是它的阶级基础，在明治时代曾经占压倒优势的封建士族的成分，已经逐渐减少，由于陆军在 1914—1916 年废除了幼年学校，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行了大扩展，干部中间渗入了大批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陆海军的军官中，农村出身的远远超过了城市出身的，他们的父兄大多数是属于小地主、富农、官吏、教员和工商业者等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日本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开始以后，特别是发生危机以后小资产阶级的贫困化和没落，使他们产生了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对前途的不安和对阶级斗争的恐惧心理。而陆海军军官也自然地感到了和中间阶级同样的苦闷与动摇。尤其是他们本身，因为遭到减薪，生活发生困难，因军事预算受到限制，使他们迟迟不能晋级，由于几次裁军曾被大量淘汰，这些情况使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和焦虑有增无已。特别是农业危机的发展使农村破产，农村出身的军士和士兵，通过自己的体验，更加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还有在伦敦会议上决定的裁减海军、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满蒙”问题的紧迫等等，这些国内外局势，表现出国防上的不安，强烈地刺激了他们。他们把自身的不满和国防上的不安联系起来，并产生了这种想法：通过对国内的改革即实行法西斯武装政变来打开政治经济的难关。

1930 年 9 月，陆军中央机关的中坚军官，以亲眼看到土耳其基马尔的武力独裁而归国的桥本欣五郎中校为中心，暗中成立了叫作“樱会”的秘密结社。樱会的纲领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标，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它的目的在于：解决“满蒙”问题，以及研究为此目的的国家改造方案。他们所说的国家改造方案包

括：扩大国营企业，由国家管理金融、貿易，解散議會活动，实行一国一党制和軍备第一主义，模仿法西斯和納粹，实现民族社会主义，并为此而建立强有力的軍部独裁政权。参謀本部第二部的内部文件“1930 年局势判断”的内容，以前是專以假想敌国为对象的，由于櫻会会员桥本中校（参謀本部第二部俄国班）、根本中校（参謀本部第二部中国班）等的活动，在参謀本部的文件“1930 年的局势判断”——这种文件以往專以假想敌国为对象——里加上一条“如欲积极解决‘滿蒙’問題，必須以国家改造为先决条件”，并且把它变成了参謀本部的正式意見。从大正年間以来即以国家主义者著称的大川周明，从 1929 年起，在参謀本部的支持下，到全国各地拼命鼓吹在“滿洲”成立一个“王道乐土”的新国家，作为进行对苏侵略的基地的主張。大川之流的民間国家主义者和軍部紧密合作，进行制定“国家改造”計劃，并策划成立軍部独裁內閣的政变。

1931 年 3 月間，大川和桥本等阴谋采取非常手段发动政变，成立以当时的陸軍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相的內閣，实行侵略“滿洲”。据櫻会成员田中清少校的“手記”，宇垣已同意这项計劃，并决心出来組織內閣。1 月 13 日，杉山陸軍次官、二宮参謀次長、小磯軍务局長、建川参謀本部第二部長、山脇科長（当日由鈴木貞一中校代替）和桥本中校等举行集会，以后又有永田軍事科長、岡村补任課長和重藤中国科長参加，拟訂了下列計劃：

首先举行社会民众党、全国大众党和新劳农党这三个无产阶级政党彈劾內閣的大演講会，掀起打倒內閣的气焰，向議會举行示威，并在事先作好偵察工作，当工会法被提出时，即动员一万名工人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公开的軍国主义者率領下，从四面八方向議會举行示威游行，进攻政友会和民政党的本部及首相官邸。此时，軍隊实行紧急集合，借口保护議會而占領議會，由某中将帶領

小磯少將或建川少將進入議會，宣稱：“國民現在已經不信任現內閣，而只信任以宇垣大將為首相的內閣，現在國家面臨重要關頭，應作妥善處理”，來迫使內閣實行總辭職，並成立以宇垣為首的軍部內閣。由社會民眾黨的幹部龜井貫一郎承擔動員工人的任務。

本來預定在3月22日起事，但在起事的前夕，宇垣已得到一項情報說即使不採取非常手段自己也可能當上首相，因而發生了動搖；同時又發現了動員一萬名工人是大川的一個騙局，於是下令不要發動，因而使這一陰謀未能實現。這就是所謂“三月事件”。政府得悉這一陰謀事件以後，大為震驚，但是因有軍事首腦參加在內，又不便加以處分，一切情況都隱秘起來不了了之了。

三月事件大大地改變了此後的日本政治方向。作為擺脫危機的最後王牌，最初策劃大規模地侵略“滿洲”的軍部核心分子們，此後便逐步地把計劃付諸實施，同時也開始在國內政治上逐漸掌握了實權。事件發生後，軍部只把直接有關人員中的櫻會的核心分子從中央調往外地，而對於這次事件，則根本未進行處分。當時離開中央的大多數急進派分子，都被派遣到駐“滿洲”的關東軍里，這樣，他們就在現場着手擬訂直接在“滿洲”開始軍事行動的計劃了。

第二次若槻內閣和軍部

在前一年12月間遇刺的浜口首相，後來健康未能好轉，到了4月13日，浜口內閣即實行辭職，繼任的是以若槻禮次郎為首相的民政黨內閣，在14日宣告成立。若槻內閣，把前任內閣的主要閣員幣原外相、井上藏相等都挽留下來；宇垣陸相則由於因三月事件而引起的陸軍內部的派系鬥爭等原因而告退，由南次郎接任了陸相。比起和宮廷及政界聯繫較為密切的宇垣前陸相來，南陸相是望塵莫及的，他完全是在部內死硬分子操縱下進行活動的一

个傀儡，所以在新內閣中，政府和陸軍的分歧十分显著，关于“滿蒙”問題，陸軍也不考虑政府的意圖，而采取了过激的意見和行动。

若槻內閣从前任內閣繼承过来的大問題，就是官吏的减薪和軍制改革。其中，官吏减薪方案，如前章所述，由于引起了極大的反对运动，因而改变了它的內容实質，在同年5月公布了。关于軍制改革的問題，最初是因为世界輿論繼裁減海軍之后又要求裁減陸軍，而在國內这种要求也日益高漲，因此当局企圖以陸軍軍备合理化的形式来迴避这种要求，而对軍备进行近代化的改編。然而从軍部决心用武力解决“滿蒙”問題以后，軍制改革的內容逐漸起了变化，其主要目的是把落后的陸軍編制和装备改进到足以应付近代战争的水平。从三月事件前后，这一軍制改革方案就提到議事日程上来，但是以扩充航空队、坦克以及加强駐朝鮮部队为內容的这一改革方案，需要增撥許多經費，因此很难取得正在憂慮不景气的政府的同意。但是在7月1日，陸軍未經政府同意，就擅自公布了軍制改革草案，因而进一步加剧了它和政府之間的分歧。8月4日，南陆相在师团长會議上的訓詞中更暗示了用武力解决“滿蒙”問題的必要。这一点引起了报纸以及各方面的極大重視。陆相的这个訓詞虽然成了很大的政治問題，但并不只是陆相，就是各地的团管区司令和配屬軍官等也是一遇机会就叫囂要用实力解决“滿蒙”問題，这样，到了1931年夏天，陸軍要出兵“滿蒙”的謠言就傳遍了全国。于是，政府和重臣們为了防止陸軍在沒有立即开战信心的現狀下采取过激行动，曾經进行了活动，然而陸軍对于“滿蒙”問題的态度却愈来愈强硬了。

同年8月間，在“滿洲”西北部的偏僻地区，發生了日本軍事偵探中村大尉及其同行者一名在乔裝偵查中被地方軍閥的軍隊杀死的事件。一直在寻找机会的陸軍，就把“中村大尉事件”当作最好的借口，除了在当地向張学良提出了强硬要求，同时还在國內展

开了大规模的宣傳。很明显，陸軍是把中村大尉事件作为导火綫，要在“滿洲”燃起战火。但是政府和政党对于軍部的强硬态度，却在袖手旁觀。和具有相当强大政治力的浜口前首相比，若槻首相显然不如，他对于陸軍毫无办法；南陸相在内閣會議上也一味坚持自己的意見，陸軍已不再把政府放在眼里而一意孤行起来了。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

柳条沟的爆炸声

从 1931 年夏天起，在日本国内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間就开始了秘密地交談着这样話头：“‘滿洲’最近将会發生事情”、“关东軍一定要搞一下”。到了 9 月，关东軍的兵力調动和演習愈益活跃起来，而中央和現地之間，人員和电报的往返也十分頻繁。南滿鐵路沿綫地带籠罩着恐怖的气氛，附近的居民都預感到将要發生战争而惶恐不安，日本右翼浪人和鑽营牟利之輩相繼涌向“滿洲”。9 月 14 日，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美次少将，为了向关东軍傳達陸軍大臣的密令，从东京出發前往滿洲。他的使命据傳說是制止已經半公开的陸軍“滿洲”的策謀。但是建川少将本人和參謀次長二宮治重中将、陸軍省軍务局長小磯国昭中将等都是被目为在“滿洲”制造事件的中心人物。果然，于 9 月 18 日到达沈阳的建川少将，根本也不打算向关东軍司令部傳達紧急命令，却徑自到市內的酒楼里吃喝玩乐了一夜，而在这天晚上，事件就發生了。

9 月 18 日夜里十点，在沈阳北郊柳条沟發生了一連串的低微的爆炸声。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种音响，注意到的人也只認為是連日进行的軍事演習而已。然而，这次槍声竟成了后来持續了十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然而在当时又有什么人預料及此呢？

的确，这次事件，比起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的薩腊耶沃事件，只不过是规模更小的偶然事件而已。正如后来李頓报告書所說的：“9月18日下午十时至十时半之間，在鉄路綫上或其附近，曾發生过爆炸一事，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即使这对鉄路稍有所损伤，也并未妨碍从長春开出的南下列車的正点到达。仅仅这件事并不能构成軍事行动的正当理由”。这次爆炸对于南滿鉄路綫并未給予任何实际的損害。什么人，为什么搞了这次爆炸，一切都不了然，即使明了，也决不是足以产生“滿洲”事变这样严重后果的事件。尽管如此，这次爆炸竟使在“滿洲”的日本軍隊，用比較經過充分准备的非常演習更快的速度一齐开始了行动。爆炸事件發生后一小时，駐沈阳的日本軍守备队就开始进攻現場附近的北大营兵营，当晚，駐扎“滿洲”的所有陸軍部队向沈阳、長春、四平街和公主岭等地的中国兵营进行了集中攻击。19日清晨，就已經在沈阳城头上悬起了日本国旗，就在当日內，日軍全部控制了南滿鉄路沿綫，至23日已占領了較远的吉林。至21日，駐朝鮮軍的一个旅团并未接到敕令，仅憑駐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大将擅自下的命令，就越过鴨綠江，来到了“滿洲”。事件發生后5日以内，辽宁、吉林两省的主要部分已被日本軍隊占領。事件爆發的当时，在“滿洲”的日本兵力是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共一万四千人，事件爆發后，加上从朝鮮越境而来的一个旅团也不过一万五千人，但是由于事先进行了徹底的攻击訓練和奇襲的完全成功，因而一举粉碎了几乎沒有抵抗的十万人的張学良軍隊。

事件發生的消息，尤其是日本軍隊迅速地占領了“南滿”的消息，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日本政府在19日匆匆召开內閣會議，暫時决定了不扩大事件的方針，对前綫及在外机关發出了內部指示說：“应尽量不使局面扩大，根据在我軍保持优势的战綫上停止行动的方針进行处理”。但是，在現地軍事行动迅速發展的事实前

面，若槻首相和幣原外相等的政府，茫然若失，虽然連日召开紧急內閣會議，但对于解决这一事件却未能采取任何積極措施。在 21 日的內閣會議上，南陆相提議向“滿洲”增兵，但是遭到了幣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然而，駐朝鮮日軍却不等政府的决定就擅自越过国境进入了“滿洲”。22 日，陆相在內閣會議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內閣不得已只得予以事后承認。直到 24 日，政府才發表一項声明，表明了初步的态度，并决定了就地解决这一事件的不扩大方針。但是政府的决定，对于軍部和現地軍人並沒有任何权威。关东軍更加活跃地扩大了行动范围，在 10 月 8 日轟炸了錦州，并进而把兵力向“北滿”推进，而于 11 月 19 日占領了齐齐哈尔。由政府內定的“不扩大”的界綫，逐日受到修改。軍事局势的發展，对国内外完全暴露了外交与軍事的不統一以及政府政治力量的薄弱。政府只有追随軍部，軍部中央又只有追随关东軍而已。

各国的反应

9 月 18 日的事件在次日傳遍了全世界。这一天，在日內瓦召开的第十二次国际联盟大会正要閉幕，下午召开了第六十五次理事会。日本和中国的代表先就这一事件向理事会作了第一次报告。接着在 21 日，中国代表把这一事件作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正式向国联提出控訴。22 日，国联向两国發出同样內容的通牒，劝告两国要努力不扩大事件和立即撤退双方軍隊。对此，日本政府在 23 日發表声明說：“它对‘滿洲’并无任何領土野心，并将尽快地把軍隊撤至鐵路附屬地区。”这一表示初步地得到了国际联盟的諒解。接着在 9 月 30 日，国联理事会，包括日本在內，一致通过了关于不扩大事件的決議。日本政府用自己的声明和自己签了字的決議向世界保証了不扩大事件和迅速撤兵。然而，事态却超越了日本的外交而向前發展了。10 月 8 日，日軍对錦州的轟炸，使国联的空

气紧张起来；在 10 月 15 日通过邀请美国代表参加国联的决议时，日本开始陷于孤立了。接着在 11 月 16 日，国联以十三比一通过了要求日本限期撤兵的决议。但是，国际联盟所以对日本采取了这种强硬态度主要是因为日本的背信弃义在小国之间引起了强烈的愤怒，如果在“满洲”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美和英国不参加，它就沒有实力可以作为后盾。因此，国联很重视美和的态度，首先作出了邀请美和以观察员的资格参加的决定。

事件发生后的 9 月 22 日，美和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驻美大使出渊提出了照会，但是由于美和方面把事件看作是现地军人的过激行动，并相信日本政府将会尽力收拾局面，这个照会本身是极其无力的。尤其是史汀生本人把事件看作是日本两派势力的冲突，他甚至说：“我们相信把事件交给日本外务省和幣原外相去自由处理是适当的”，基本上相信了日本政府不扩大事件的方针。然而，日本军事行动的进展，特别是 10 月 8 日对锦州的轰炸，使美的态度为之一变。以九国公约及凯洛格非战公约的保卫者自居的美和，对于日本利用军事行动破坏势力均衡的行径，表示了强硬态度。尤其是当它看到从对于危机以后的美和更加重要了“满洲”市场上被驱逐出来的危险已经非常明显以后，它的态度就越发强硬了。于是，在 1 月 7 日，美和以国务卿的声明宣布对于日本在“满洲”的行动采取“不承认主义”的原则。但是以史汀生主义著称的这个声明，由于危机爆发以后孤立主义在美和外交政策上占了优势的影响，这一“不承认主义”的原则也只是停留在一纸宣言上面，而并未变成积极干涉日本行动的具体措施。

英国的态度则更为消极。从 1927 年起就在远东政策上显然采取了和美和对立立场的英国，对于“满洲”问题，也未采取一致的步调。在中国本部拥有巨大利权的英国，并不和美和那样地坚持条约的规定。它对于利害关系的态度是更加现实的。英国认为可以

容忍“滿洲”作为銷納威胁自己利权的日本武力的地区。因此，只要日本把它的行动限制在“滿洲”地区內，英国就准备加以默認。对于史汀生的声明，英国政府在1月11日發表了一項声明說：日本政府既已声明坚决执行門戶开放政策，并欢迎各国参加和协助“滿洲”的各项事业，那么，“就沒有必要再向日本政府提出某种形式的照会”。因此，英国勿宁說是采取了庇护日本的态度，它和美国的对立也就越發加深了。

国际联盟只是反复地举行會議和發表声明而无能为力，英国和美国的步調又不一致，因此，日本占領“滿洲”的行动，在国际上沒有遇到强有力的阻碍。占領了齐齐哈尔并从而控制了“北滿”黑龙江省一帶的日軍，更得到了从日本国内和駐朝鮮部队的增援，于12月22日，由关东軍發表了“討伐辽西一带土匪”的声明，开始了辽西战役，并于1932年1月3日占領了中国在“滿洲”的最后据点錦州。仅仅用三个多月的軍事行动，日軍就完全控制了东三省。日本能够迅速地占領了东北全境，固然是由于它利用了英美两国在远东政策上互相对立的有利形势，但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更加重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国内的情况。如前所述，武汉政府崩潰后，进入了和国民党政府公开斗争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紅軍和苏区的壮大發展，建立了以江西为中心的广大中央苏区，这是拥有三百余县和数千万人口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国民党政府來說，苏区的發展，是比日本侵占“滿洲”更为严重的威胁。因此，蔣介石从1930年12月起开始了全面的武装“討伐”，从1931年5月至9月之間，出动了三十万以上的軍隊进行了大規模的包圍战，但結果却被徹底粉碎了。“九·一八”事变爆發后，尽管經過張学良的請求，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向日本發出一兵，反而对共产党展开了第五次大“圍剿”战役。中国方面的这种政治分裂和軍事軟弱，使得日本軍隊的行动輕松容易，如入无人之境，东北軍閥，据說是由

于国民党政府的收拾軍閥的政策而被遺弃在日軍的面前。

第二个条件是苏联的發展和列强对于这种發展的恐惧。帝国主义各国对于順利地实现着第一个五年計劃、把世界經濟危机抛在一边不断壮大發展的苏联的实力，已經开始感到了恐惧。特别是中国革命在苏联的影响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使得帝国主义各国，为了确保中国这块殖民地，对于如何杜絕苏联的影响和威胁的問題，开始加以最大的关注。日本占領“滿洲”，固然意味着縮減各国的市場；然而在其筑成帝国主义各国对付苏联的桥头堡这一点上，它們發現有更大的意义。日本的行动所以能够未受各国的干涉而取得成功，就是由于这許許多多的国际条件起了巨大作用。

重新禁止黃金出口和犬养內閣的成立

侵占滿洲，是日本的政治家和資本家为了夺取国外壟断市場，以便摆脱已經發展到崩潰邊緣的資本主义危机，为了用武装占領来打开經營“滿洲”的絕路，为了把危机和随着危机而来的合理化政策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的貧困和不滿轉向对外战争，为了这一切而必然选择的道路。虽然他們对于軍部在侵占的时间 and 手段上的独断專行不能不感到很大憂慮，然而在其根本方針上，对于侵占“滿洲”，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政府在事变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过某些異議，但最后还是追随了軍部，把确保“滿洲”当作了国策来加以执行。不仅如此，对外必須强占“滿洲”的日本資本主义，在国内也不得不准备改变政策，采取作为新的剝削方式的通貨膨脹政策。他們在这以前采取了解除黃金出口禁令和通貨收縮政策，作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对策，但是，同样为了資本家的利益，又需要重新禁止黃金輸出和实行通貨膨脹政策了。促使这种轉變的原因，就是由英国带头实行的各国停止金本位制和“九·一八”事变的爆發。

1931年7月，使德国遭到破产的金融危机愈来愈趋于深刻；为防止破产而作拼命挣扎的英国，在工党内阁总辞职以后成立了举国一致的內閣，新內閣于1931年9月21日向全世界宣布了停止金本位制。这是在柳条沟爆炸事件發生后的第三天。这一消息使世界的金融市場陷于混乱，許多国家相繼放弃了金本位，这件事也給予了日本以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說，已經有人預料到，日本迟早也要重新实行禁止黄金的輸出，大財閥的銀行預計到重行禁止黄金出口可能带来的莫大利益而瘋狂地进行搶購美元証券。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謂財閥的“搶購美元”。这种“搶購美元”是在財閥和政府互相勾結之下进行的。屬於財閥的各大銀行、公司，不顧国民的貧困，从中攫取了極大的暴利。1930年7月，倫敦条約批准問題發生以后，正金銀行的美元統制銷售額，如下表所示，共达七万六千万日圓之多，其中，仅在英国放弃金本位以后，屬於各財閥系統的銀行、公司就一共購買了价值一亿三千万日圓以上的美元，包括：住友銀行的四千万日圓、三井銀行的四千五百万日圓，三

菱銀行二千万日圓，三井物产公司的三千万日圓。

这种“搶購美元”在国民各階層之間引起了極大的憤怒。軍部、右翼团体就巧妙地利用国民的这种憤怒来擴張自己的勢力。

这种“搶購美元”所引起的黄金出口，在英国放弃金本位以后更加严重起来，以致日本国内的金融

正金銀行的美元統制銷售額及其內容

購 买 者	購入金額(百万日圓)
外 国 銀 行	313 (41%)
財閥系統銀行公司	226 (30%)
住 友 銀 行	64
三 井 銀 行	56
三 菱 銀 行	53
三 井 物 产	40
三 井 信 托	13
朝 鮮 銀 行	34 (4%)
其 他	187 (25%)
总 計	760(100%)

情况日趋紧张，这就使得在深刻的不景气中挣扎着的产业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种经济危机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危机，为了突破危机，壟断资本也感到需要禁止黄金出口而重新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由于中国的银价暴落而受到重大打击的日本的主要输出业纺织业，又因英国放弃金本位以后英国棉制品大量涌向远东市场，而受到了最严重的损失。因此，他们就拼命要求断然实行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来降低外汇率和大力进行商品倾销，以便打开一条出路。前面已经说过，浜口内阁当初的计划，在严重危机中已经推行不动它的头一个招牌“紧缩财政”，由于“对官吏的减薪”所引起的下级官吏的抵抗、伦敦条约问题所引起的军部增加军费的要求和应付不景气的开支等等，实际上，财政开支已在逐年膨胀，通货紧缩政策已经不能不由政府自己来加以废弃了。侵占“满洲”以后，军部所提出的庞大的军费要求，使得通过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来改行通货膨胀政策已经成了必然的趋势。

资本家的这种强烈要求，表现为同年11月10日在野党政友会的“要求重新禁止黄金输出”的声明。两任民政党内阁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合理化——通货紧缩政策，已经到达了极限；资产阶级在新的局面下，又在要求新的政策了。

此外，再加上九·一八事变的发展和幣原外交之间的矛盾、井上财政的碰壁、国民对于政府的不景气对策的不信任，使若槻内阁发生了动摇。九·一八事变以后内阁的施政，一再地表现了政治力量的薄弱。不满这种倾向的一部分政党人士，受到英国成立举国一致内阁的影响，提出了成立“适应非常事态的联合内阁”的主张。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代表新兴的康采恩日产的鲇川义介的姻兄——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和民政党的内务相安达谦藏等人。尤其是若槻内阁的重要阁员安达谦藏内务相，对于以若槻首相、井

上藏相、幣原外相等为代表的这个內閣的施政方向，心怀不滿，他与荒木中将等陸軍革新派以及在野党的干部床次竹二郎、久原房之助等人相呼应，極力主張成立联合內閣。安达派的企圖是要把快要寿終正寢的以若槻为首的民政党内閣加以結束，而和政友会携起手来掌握政局的主导权，如其可能，即担任下届內閣。然而，在政友会內部，森恪、鈴木喜三郎等人却坚持主張要由政友会独自担当下届內閣，并得到了犬养总裁的贊同，因而联合內閣运动未能成功。不管怎样，由于安达內务相的活动，使內閣發生了不統一的現象，从而給民政党内閣带来了从內部瓦解的結果，它终于在 12 月 11 日实行了总辞职。其結果，直接促成这次政变的民政党內的联合內閣主張者安达謙藏、中野正剛等人退出了民政党，而另行組織了头一个持有法西斯主义主張的政党——国民同盟。但是，政友会对此并未理睬，而于第三天的 13 日，組成了由政友会单独执政的犬养內閣。犬养內閣终于成了最后的一个政党内閣，这个內閣早在組閣时，就不能不起用軍部革新派的代表人物荒木貞夫中将为陆相，不能不起用積極主張向大陆擴張的森恪为書記官長等，来討好軍部和右翼势力，从而暴露了它的軟弱无力。

果然不出所料，新內閣在組閣的当天就宣布了禁止黄金輸出，迈出了改变政策的第一步，接着又下令停止兌現，轉向实行通貨膨脹政策。在合理化政策已經行不通，侵略“滿洲”有了新的开展等情况下，为了适应資产階級改变政策的要求应运而生的犬养內閣，虽然和以軍部为首的急进势力之間，还存在某种程度的不一致，但是它全面地修改了民政党的政策，并采取了支持和推进九·一八事变的方針。原来是少数党的政友会，在第六十届議會一开始就宣布解散議會，在竞选中提出克服不景气的口号，获得了多数选票，議席由一百七十一席一跃而增加到三百零三席；而民政党則由二百四十七席銳減为一百四十六席。这样，犬养內閣就在議會中

拥有了绝对多数而推行了通货膨胀政策，其中包括由于九·一八事变而引起的庞大的临时军费的开支在内。

一·二八事件

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了庞大的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使得海军也企图在“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九·一八事变当时，在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拥有觉悟程度较高的工人和学生的上海，反对日本侵占东北的情况最为激烈。上海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的9月22日，就召开了大规模的抗日大会，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从此以后，抗日示威运动和集会活动，日益高涨起来。这种趋向使日本的侨民、驻华外交机关以及海军陆战队等陷于神经过敏。1932年1月18日，发生了伤害日本僧侣事件，同月20日，日本侨民召开大会，以这一事件为借口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派遣陆军来上海保护侨民。在此以前，日本海军驻在长江沿岸各地的，是以炮舰为主力的第一派遣舰队，在21日，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决定增派巡洋舰大井号及第十五驱逐舰（驱逐舰四艘），这支舰队于23日开到上海，并使特别陆战队登陆。接着又于1月28日派出第二批陆战队，在上海的日本租界里一共集中了陆战队二千八百名。日方就以这支武力为背景，借口伤害僧侣事件，向上海市当局提出了撤退军队及其他要求。另外，日本方面当天还片面地发出通告，要把陆战队的警备区域扩大到日本租界以外，并从29日上午零时起进行布署，并且还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答复就执行了这一决定。由于这种原故，在当天夜里担任警备北四川路附近地段的中国军队和侵入到这里来的日本陆战队之间发生了冲突，双方的战斗开始

了。

战斗是以巷战开始的，到了拂晓，日本方面从航空母艦上出动飞机，开始轟炸市区。但是，日本海軍陆战队却立即陷入恶战苦斗的状态。当时防守上海附近的中国十九路軍，不同于从中国东北败退的地方軍閥的軍隊，这支軍隊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識，而且在战斗中还得到了上海的工人和市民的热烈支援；因此，日本在估計上犯了很大的錯誤。而且，当时上海还存在着各国的許多权益，在各国外交团出面調停下，双方簽訂了临时停战协定。然而停战并非是日本的本意。当时駐上海的日本海軍最高指揮官野村中将在报告中說：“对于停战談判暂时采取敷衍态度，以避免刺激英美的神經。等待陆軍开到以后，再發揮我軍的威力，把禍根徹底鏟除，相信这是最好的办法。……总之，等待陆軍开到后，給中国軍隊以沉重打击，乃是必要的。”（“原田日記”第二卷）果然不錯，在2月3日的日本內閣會議上，决定了出兵，到了7日，很快地就派出一个混成旅团的陆軍在上海吳淞附近登陆，从背后向十九路軍展开了攻击。接着在2月13日，主力部队的第九师团也开到上海，并开始了总攻击。但是，尽管陆軍开到了上海，却并未能給予中国軍隊以沉重打击。中国軍隊的抵抗意外地坚强，迫使日本軍隊停留在海岸沟渠地带，不得前进一步。于是，日本方面又編成了大規模的派遣軍，以白川义則大将为司令官，率領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团开到上海，并使用了飞机和艦炮等新式武器的全部力量繼續向中国軍隊进行攻击，这样，至3月1日才勉强攻占了上海的北郊一带。

犬养內閣和芳澤外务相对一·二八事件的态度，比九·一八事变爆發时感到狼狽的若槻內閣和幣原外务相更为积极。派遣到上海的陆軍有三个半师团、海軍軍艦十几艘，超过了在占領中国东北时的兵力一倍以上。然而战局的發展，却完全与侵占中国东北时相反，日軍一直处于恶战苦斗中，他們不仅受到中国軍隊的

頑強抵抗，而且还受到了全上海民众的頑強抵抗，取得其所預期的侵略成果的希望被徹底粉碎了。而且在上海存在着列強不允許日本的独占性軍事行动的許多客觀原因。各国的輿論譴責了日本的行动，英美两国也都強烈地反对日本向它們許多權益所在的長江流域进行軍事擴張。2月2日，英、美、法三国的駐華大使，提出了共同調停方案，之后又累次劝告停战，提議設置緩冲地帶等等，并反复地对日本的行动提出抗議。2月24日，如前所述，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發表了对日声明，3月3日在日內瓦召开了国际联盟會議，就中日糾紛問題进行了討論。国际形势的不利和战局的胶着，挫折了日本繼續战斗的意志。3月3日，战局基本上出現了可以不失体面地实行停战的状态，日本上海派遣軍就利用这个机会發表了停战声明，重新开始了以各国外交团为調停者的停战談判。以后，关于两軍停战的談判，一直不能順利进展，并曾多次地發生了中断情况，但是沒有完全决裂，至5月5日終于正式簽訂了中日停战协定，日本从上海撤兵，結束了淞沪战役。

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所以失敗，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抵抗，特别是站在最前綫的十九路軍的英勇善战。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政府仍然抱着不抵抗主义，不仅沒有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反而采取了利用日軍来消灭受共产党影响較深的十九路軍的方針，对前綫部队沒有給予任何支援。然而，与国民党政府恰恰相反，各个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們，热烈地支援了十九路軍，不仅贈送慰問品和給予鼓励，也有很多人当了义勇軍；在这种鼓励下，前綫部队也愈战愈勇，把具有远为优越的新式武器装备的日本軍隊，拦阻在海岸一帶，不得越雷池一步。軍事上的失敗使軍部喪失信心，这就使得它此后暫時放弃了侵略中国本部的念头而專心从事經營“滿洲”和华北。列強的强硬干涉，也是促成日本失敗的原因之一。当时，日本的統治階級還沒有甘冒战争的危險来同英、美对抗的信心。随着战争

的进展，国内的元老、重臣等宫廷势力和财阀的代表等，为了阻止使国际关系陷于危局的军事行动，一再对军部采取了箝制的态度。日本人民也决不赞成这种无法无天的侵略战争。觉悟了的工人阶级虽然处于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镇压下，还是勇敢地坚持了反战斗争，在一·二八事件中，他们还同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携起手来，结成共同战线，进行了斗争。一般群众也怀疑出兵的目的，就连曾经歌颂过九·一八事变的大报纸，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意上海事件。由于内外形势的不利和军事上的失败，使得野心勃勃的军部也不得不暂时停止进行侵略战争了。

“满洲国”的建立

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从而初步完成了对东北全境的军事占领的关东军，为了进一步建立其完全的统治，开始推行了在“满洲”建立一个“独立国”的计划。关于实现“满洲独立”的构想，早在事变爆发前已为军部和一部分右翼分子所倡导，而在现地的关东军参谋部和特务机关以及满铁的情报机关等组织，也一直为此进行了策划。事变爆发以后，这些机关和日本浪人、阴谋家等，便立即一齐开始活动，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校的操纵下，首先在沈阳成立了“自治政府”，之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进展，在辽宁、吉林各省相继成立了“自治政权”。这些“政权”的名义上的领袖，大多数是为了保持其地盘而和日本军部勾结的地方军阀和失意的前清的旧官僚等等，都是一些完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家伙。同时，在各地相继成立的这些“自治机关”，虽说都是完全受日本政府的支配，但关东军、特务机关、满铁等都各按照自己的打算，根据各自不同的计划来行事，而右翼浪人也利用这种局面，从中渔利，结果形成了没有统一对策的混乱状态。但随着事变的发展，支配权逐渐集中于关东军，由于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增强了信心的

軍部，根本不理會政府的態度如何，而獨斷專行地開始推行其實現“滿洲獨立”的計劃了。

早在 1931 年 10 月前後，國內外就已經知道關東軍在籌劃“滿洲獨立”。最初，日本政府對於處理“滿洲”問題並無成算，既然向世界聲明了“無領土野心”因此也不能不對國際關係有所顧慮，從而，對現地局勢的發展保持了警惕。但是，政府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制止乘勢前進的現地軍事機關的計劃，對於“建國”工作的推行，也只有袖手旁觀而已。犬養內閣成立後，政府本身對軍部的行動，顯然有了贊同的跡象，對關東軍的計劃，完全採取了默許的態度。

就在這個時候劫持前清朝皇帝溥儀的計劃搞成功了，加之李頓調查團的前來，促使了駐在當地的關東軍決心建立一個“獨立國”。當時軍部感到只是利用舊軍閥的殘余和早已被人遺忘了的清朝官員，還不足以構成建立“獨立國”的理由，於是，便注意到居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清朝皇帝溥儀，而不顧一切地把他弄到“滿洲”。另一方面，國際聯盟在 1932 年初，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日本所強調的“滿洲”的特殊情況，決定在作出結論之前，派遣調查團前往“滿洲”，並組織了一個李頓調查團。而為了在李頓調查團預定到來的 4 月以前，在“滿洲”造成一個既成事實，以便為日本駐兵提供理由，軍部也認為有必要使“滿洲”脫離中國。

這種由關東軍主持的成立“獨立國”的計劃進行得很快，而於 3 月 1 日，以“王道樂土”、“五族協和”一類的漂亮字樣為綱領，成立了“滿洲國”。溥儀以執政的名義登上了元首地位，前清朝官員鄭孝胥、地方軍閥頭子張景惠、張海鵬等，都被安置在主要地位。然而，所謂“獨立國”，只是有名無實的偽組織而已。

第三节 五·一五事件

日本的右翼

九·一八事变助长了日本的右翼运动。軍部中的革新派和国家主义者，趁着因事变的发展而高涨起来的軍国主义的浪潮，开始活跃起来，而国家主义运动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从明治初年以来就有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这些团体在明治和大正时代，仅是在政界的内部进行活动的幕后势力，并没有直接影响社会的力量。到了大正年間，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社会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以对抗社会运动为宗旨的防止赤化团、国粹会等反动組織。然而这些組織也无非是一些为了謀取利权和生活費的賭徒和暴徒帮会組織。近代的国家主义运动的萌芽，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资本主义發生了全面的危机以后才出现。在 1918 年的米騒动事件发生后，紧接着組織起来的老壮会，反映了这种时代的动向；它是由堺利彦、高島素之等左翼变节者，北一輝、大川周明等旧右翼中的进步分子以及大井宪太郎、中野正剛等政党的右派，再加上其他資本家和軍人等共同組成的新的右翼势力的一个組織，也是以后国家主义运动中各种派系的起点。然而，这个老壮会仅仅是一个缺乏实践性的社交性的团体，因此不久便解散了。但是以它为母体产生了北一輝的犹存社、大川周明的行地社、高島素之的經倫学盟、赤尾敏的建国会等。这些团体，也是以个人的結合为中心，在社会上沒有基础，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街头，除了对政界的上層人物进行一些幕后活动以外，还不可能成長为較大的社会力量。

这种国家主义运动，是在以危机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革命的高潮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因危机而走向沒落的小资产

階級的擁護以後才開始有所發展的。法西斯黨徒眼看到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奪取了政權和德國納粹黨的抬頭，並且對現有的一些“愛國”團體僅僅是些封建奴才性質的暴徒組織表示不滿，於是便利用三·一五、四·一六等政府對革命實行大規模鎮壓的機會，立即着手組織國家主義的群眾性組織。1929年，高島素之、津久井龍雄等組成了急進愛國黨，其綱領是：“一、在天皇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忠实地代表全日本廣大群眾，為擁護和發展這種思想而努力；二、認清作為國際無產者的日本的地位，在消除國內的階級對立的同时，在國際上力求大發展”；為了奪取工會，他們還組織了一個下層組織——急進愛國工人聯盟。次年春季，天野辰夫、大川周明等所組織的愛國勞動黨和它的前哨組織——愛國無產青年同盟也成立了。至1931年，為了把各自分散的國家主義各團體統一起來，行地社、急進愛國黨、建國會等組織合併起來組成了全日本愛國者共同鬥爭協議會（日協）；同時，黑龍會、日本國民黨、大日本青年黨以及大阪、京都等地的右翼工會等也統一起來，組成了大日本生產黨。全日本愛國者共同鬥爭協議會提出了“一、消滅議會政治，二、打倒資本主義，三、克服國內的階級對立和發揚國威”等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的口號，而實際上採取了一套法西斯的作法；大日本生產黨則以“君民一致、實現自給自足經濟”為政治綱領，表現出濃厚的日本主義的色彩。此二者不論哪一方，既然是具有這樣組織、提出這樣綱領的國家主義運動，實際上就不可能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最多不過拉攏幾個腐敗的工人貴族或御用工會的幹部，以及扮演破壞罷工運動的暴徒組織的角色而已。在1932年在犬養內閣下舉行的第二次普選中，國家主義者為了與廣大群眾建立聯繫并大事發展，曾提出了多數候選人參加競選，但結果遭到了慘敗，這就充分說明了上述情況。

這樣，向廣大勞動群眾中推行國家主義運動的企圖，只是倚在

口头宣傳上，而未能收到任何成果，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協議会和大日本生产党等組織，絲毫未能發展。这一运动的实际作用，勿宁說是通过犹存社、行地社系統的活动，对政界、財界和官僚、軍部的内部給予了影响，为官方法西斯主义培养了馬前卒而已。特别是北一輝通过西田稅等人的关系，在陆海軍的中坚層軍官中，为他的著作“日本改造法大綱”得到了狂热的信徒；而大川周明則通过他的社会关系与政界、財界、軍部等上層进行了联系。

十月事件

当时，在軍部中，这种具有新的意义的国家主义思想抬头了。关于櫻会的成立和三月事件，前面已經說过，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發生，越發使軍部的革新派走向了阴谋和冒险的道路。在三月事件中失敗了的櫻会的桥本中校、長少校和大川周明等人，立即开始策划卷土重来。作为三月事件的繼續而發生的事件，一个是同年9月以关东軍参謀将校为中心而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另一个是同年10月企圖对国内进行改造的所謂十月事件。他們在主張民族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提出对外强硬論也是势所必然，因而在国防上經常強調占領“滿洲”的必要，同时，为使国内一新耳目而策划对外使用武力，也是很自然的。根据远东国际軍事法庭的徹底揭露，九·一八事变是以关东軍参謀部为中心，由沈阳特务机关長土肥原賢二和桥本、長等人进行了周密的計劃安排，象首先于9月18日制造鐵道爆破事件，然后于次日占領沈阳、長春的一出按照脚本演出的戏剧。由于前章所述的客观条件具备，使这一事变能够完全按照他們的意圖进行了。

8月初，櫻会在东京召开了有关“滿洲問題”的集会，为适应必然發生事变的情况作好准备，进一步策划立即利用事变来發動政变。駐在北京的長勇，在事变一爆發立即偷偷地回到东京，隐藏在

筑地的花酒館金龙亭里，并以此为本部，开始进行准备，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根本博、影佐禎昭等校官級的許多會員以及以大川周明为中心的屬於行地社系統的民間人士参加了这一工作。他們制訂了政变的具体計劃：企圖以事变爆發后一个月的10月18日为期，暗杀若槻首相、幣原外相、牧野內大臣等，同时使东京陷于混乱，然后出动軍隊，發布戒严令，組織新內閣，实现民族社会主义政策，并預定以荒木貞夫为內閣首相，大川、桥本、建川、長等人为閣員。据说在准备政变期間，他們始終住在花酒館里，連日倚偎美妓，举行盛宴，儼然以維新志士自居，这引起了純真的尉官級青年軍官的憤慨，他們全部退出而另外組織了皇道派，开始了独自的活动。他們的活動資金几乎全部是与財界上層有联系的大川筹措的。政变計劃在即将实行以前泄漏了，通过參謀本部作战科長今村上校，为陆相以下軍部首脑所获悉，三月事件后暂时采取了现实路綫的軍首脑部乃下令逮捕桥本、長等人，防止了这次政变的發生。但是，对于和事件有关的人員却絲毫沒有进行处分，与三月事件一样不了了之，只是将中心人物左迁至外地而已。

由于这次十月事件的失敗櫻会是瓦解了，但正如若槻礼次郎在远东国际軍事法庭上作証时所說的，这次事件对于在若槻內閣总辞职前后所实行的政策的巨大轉变，起了極大的影响；在标榜着積極政策而上台的犬养內閣中，荒木新陆相即以这次事件的压力为背景，他的发言权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些都說明了十月事件的重要意义。

由于十月事件的失敗，在軍部內發生了皇道派和統制派的对立。成为三月、十月两次事件的核心分子的陆軍參謀本部等中央机关的校官級軍官，大部分放弃了实现可能性不大的通过政变来改造国家的計劃。因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局势已使軍部在政治上的發言权驟然增强，从而加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不發

动危险的政变，也可能逐渐达到扩充军备和实现“国防国家”的目的。因此，他们即开始与中央各机关中新近抬头的革新派官僚、代表新兴康采恩势力的鲇川义介、森矗昶以及宫廷里的革新分子近卫文麿、木户幸一等青年贵族加强了联系，并通过金鷄学院、国维会以及近卫的早餐会等集会进行研究具体的改造计划。和这一派相反，以尉官为主的青年军官，由于他们的纯真和单纯，激烈地反对与财阀官僚的联系，并由于他们那种更加缺乏理性的观念主义作祟，仍然没有放弃采取武力行动的计划。因此，他们与北一辉等人的关系愈益加深，从他们的精神主义倾向出发，拥戴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两大将为首领。这后一派根据它的理念被称为皇道派，而前一派则为了镇压皇道派，经常主张在陆军中保持统制，所以被称为统制派。但是，这两派的对立，使右翼阵营中策划武装政变的核心——军部革新派的行动一时陷于停滞状态，而民间右翼团体中的激进派却站到了行动的前列，相继发动了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

血盟团事件

1932年2月9日，在犬养内閣下举行的普选中各派竞选活动正达高潮的时候，在野党民政党的选举对策委员长前大藏相井上准之助在其临时講演会场东京本乡区的小学校里，被茨城县的一个农村青年小沼正刺杀了。不久，在3月5日，三井财阀的总管、财界巨头、三井合股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在三井银行总行前被同样人物菱沼五郎所枪杀。经警视厅对上述两名凶手的审讯，真相已经大白；在其背后存在着具有一系列暗杀计划的秘密团体“血盟团”，其首领井上日召及党徒十余人都被逮捕了。“血盟团”是以井上日召为首的十三人的恐怖组织，按照其一人杀一人的方针，除了井上、团以外，还企图暗杀池田成彬、西园寺公望、若槻礼次郎、乡

誠之助等政界、財界的有勢力人物，並企圖“打倒政黨、財閥及特權階級等舊勢力”。“血盟團”的首領井上日召出生於農村醫生的家庭，由專門學校中途退學後，曾到“滿洲”流浪，歸國後成為日蓮宗^①的熱烈的信徒，在茨城县農村建立正護國堂並隱居於此。這期間，他受到前宮內大臣田中光顯的照顧；由於目睹農村的貧困而抱有強烈的革新思想；同時也和大川周明以及附近的土浦航空隊的軍官接近；吸收了一些熱心的追隨者並給予他們以個人的感化。他的出身經歷表明，他的思想顯然具有農民的色彩，反映了走向沒落的農村小資產階級的不安情緒。他曾說：“統治階級只知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們不懂得仁愛，即使看到農民死在路上，也無動於衷”，“為使統治階級醒悟過來，必須給他們當頭一棒”，“我們最終必須堅決成為英勇的犧牲者”（公審時的供詞）。從他這種話里可以看出，他們的思想行動是單純的、唯心的、而且是農村中心主義的。“血盟團”十三名團員都是受過他個人感化的農村出身者，例如，小沼在暗殺井上之後陳述理由時說：“農村的貧困狀況令人目不忍睹，這都是因為前任大藏相的方針不好而造成的”。

“血盟團事件”是右翼分子所干的第一次有組織的恐怖行為。雖然這種行為與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比較起來，是一種規模小、缺乏理智和計劃性的單純的凶殺行為，但是，這種敢作敢為的精神卻給予了政界財界上層人物以巨大的震動，也使國民開始感到法西斯主義日益迫近而深為不安。

五·一五事件

在“血盟團事件”還記憶猶新的同年5月15日，由於在上海實現了停戰，人心剛剛要安定下來的時候，又爆發了一個震動社會的

① 日本佛教的一個宗派，為日蓮法師（1222—1282）所創始。——譯者

事件。当天白晝，一队海陆軍軍人分为四部分，分別襲击了首相官邸、牧野內大臣官邸、警視厅、政友会本部、日本銀行、三菱銀行总行等地。在首相官邸，犬养首相被人用手槍击毙了，当时，他曾制止这些軍人說：“你們有話尽可以說……”。在其他各处，或者开枪射击，或者向門前投擲手榴彈等等进行了示威，然后，到宪兵队去自首了。而在当天夜晚，又有几伙平民襲击了田端、鬼怒川、龟戶、鳩谷、目白、淀桥等变压所，但是未能进行任何破坏就全部被捕了。襲击首相官邸等处的是海軍中尉古賀清志、中村义雄及三上卓等人和十二名陆軍士官学校的学生；襲击变压所的是十六名爱乡塾的學員。除了这些直接参加行动的以外，还有支援这次行动或参加策划的大川周明、头山秀三、本間宪一郎等右翼的重要人物也被捕了，爱乡塾的主持者橘孝三郎逃往“滿洲”以后，也被逮捕了。

犬养首相死后，內閣立即实行了总辞职。政友会的对策是：首先任命繼任总裁，以备組織后繼內閣。当时，政友会內部除了鈴木喜三郎、鳩山一郎、森恪等的一派以外还有床次竹二郎派、久原房之助派等等，以及岡崎邦輔、望月圭介、前田米藏等所謂老政友会派势力，他們之間忙于派系斗争，所以不难推想以后将出现混乱局面。至十七日，鈴木喜三郎接任总裁，准备組織繼任內閣。

在事件后的紧张空气中，存在着一股强有力的反对政党內閣的暗流。海軍方面因为是事件的犯人中有海軍人員，所以不便積極表示态度；陆軍方面、特别是中坚層强烈地排斥政党內閣，要求成立举国一致的內閣。在政友会內部，和軍部关系較深的森恪等人企圖以国本社的首脑平沼樞密院副議長为首相，并由在議會中占絕對多数的政友会予以支持，借此組成一个强有力的內閣，和軍部合作，積極解决“滿洲”問題。然而，民政党方面則一面标榜拥护議會政治，一面又反对政友会內閣，希望成立以在野党民政党为基

础的举国一致的內閣，并以屬於民政党的官僚伊澤多喜男为中心，为实现斋藤实組織內閣而进行了策动。

为了收拾政局，有必要以某种形式来解决政党和軍部之間的对立。然而，政友会鈴木总裁与荒木陆相举行了会晤，并似乎将要达成妥协一事，反而更加刺激了軍部的中坚層，使他們排斥政党内閣的主張越發加剧了。在此以后，元老西园寺公望为了向天皇推荐繼任首相的候补者，从兴津来到东京。他首先征求高桥临时首相、牧野內大臣、樞密院倉富議長、清浦、若槻前首相、陆海軍大臣及上原、东乡两元帅等的意見，表示了从来未有过的慎重态度，然后，推荐了海軍大将前朝鮮总督斋藤实为繼任首相。西园寺虽然不希望軍部以及接近軍部的右翼势力掌握政权；但同时，又考虑到不仅为軍部所反对，而在国民之間也失去了信任的政党的現狀，因而推荐了这个稳健派的海軍軍人，企圖借此来緩和軍部和政府之間的磨擦，避免再發生五·一五之类的不幸事件，使局势能逐漸安定下来，以便渡过所謂“非常时期”。

斋藤內閣的农村对策

受命組閣的斋藤实，首先要求高桥大藏相留任并得到他的同意以后，又和政、民两党总裁会晤，要求予以支持，結果，政友会同意出閣員三名，民政党同意出閣員两名，組成了包括軍部、官僚、政党在內的举国一致的內閣。五·一五事件后經過十多天好不容易才組成了后任內閣，可見統治階級所受的震动是如何深刻。陆相一席，仍由五·一五事件的負責人荒木貞夫担任，这是为了在当时局势不稳的情况下控制青年軍官，以維持陆軍的統制。另外，屬於伊澤多喜男系的內务省官僚的代表后藤文夫就任了农相。但是內閣的主导者乃是斋藤首相、高桥藏相(政友)、山本达雄內相(民政)三長老，他們为了消弭“非常时期”而采取了妥协的、保守的政策。

由农民敢死队参加的五·一五事件一事反映出来的、严重的农业危机所引起的农村不安，其后依然繼續存在。在斋藤实內閣成立后仅仅一周的6月1日召开的第六十二次临时議会上，通过了以九·一八事变費为中心的追加預算，当时，农民也为了得到救济相繼涌到議会进行請願。这种請願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單純地要求救济农民的貧困；另一种則屬於想要借此来實現社会改革的法西斯运动，后者的核心組織就是自治农民協議会。該会是由長野朗等右翼分子組成的，是从农民本位主义的立場出發，主張共同自治、自給自足、共存共济的团体，这个組織在要求實現“农户負債延期三年償还；每一反^①土地補助肥料資金一元；補助移居‘滿蒙’費五千萬元”的口号下，在長野、新潟、茨城等十六县糾集了三万二千人的签名，然后进行了請願。从以上的口号即可看出，这一运动是与巩固耕种权、減免地租等佃戶的切身要求毫不相干的，它是为了實現中农及部分富农的要求的运动。而且根据長野朗所述，这个請願运动的目的是反击社会上对农民的輕視和爭取三千万农民的團結，並沒有把重点放在請願的标語內容上（長野朗：“农民請願运动的經過”，“改造”第十四卷第十期）。在此以后，又相繼發生了征得五千人签名的長野县北信不景气对策会等各县农民的請願运动，它們之間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从这些运动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战术，即：“征集农民出身的士兵的签名盖章，使兵农打成一片，由各联队区加以匯总，然后再通过联队区司令官，以空前未有的隆重的方法上奏天皇”，对此，日本民族社会党給予了坚决的支持。这件事是急进法西斯主义者企圖依靠軍部来貫徹自己意圖的一种表現，同时也說明了日本急进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特点。由于右翼运动的刺激，全国鎮村長会、农会長協議会也进行了

① 日本土地面积單位，每“反”約合九九一·七平方公尺。——譯者

請願運動。另外，全國農民協會也和全國勞農大眾黨結成統一戰綫，到農林省提出了延期五年償付農民欠債、地租和禁止收回土地等要求。

在農民的壓力下，各派農村出身的議員五十四名召開了有志議員會，對各黨進行活動，並使政、民兩黨通過了匡救時局決議案，要求迅速召開臨時議會，以便救濟農村、漁村及中小工商業者的貧困。但是，這種措施只能暴露議會本身的狼狽，而問題的解決卻被推到下屆議會去了。對此，已經預見到農村問題難以解決的政府，在議會閉幕以後，首先主張以“自立更生”來克服不景氣，並由首相親自到街頭進行宣傳。

救濟農村措施在第六十三次議會上經過了討論，由這以前就主張“自力更生”的政府提出的這個方案，是以土木事業為中心的緊急對策，是一些被評為“略勝於無”的措施。方案的內容是從1932年到1934年三年間，撥出土木事業費八億日圓（中央六億、地方二億），低利流通資金八億日圓（共計十六億），企圖以此來挽救社會的不安；其中，在用於救濟農村方面的資金，1932年度是一億三千萬日圓，1933年度是一億八千五百萬日圓。在實行救濟農村的同時，還使自力更生運動具體化了。這就是說，首先由內務、文部兩省開展一個精神動員的運動，再由農林省實行農村經濟的計劃化。

這些救濟農村措施的特點在於：只是對地方銀行、地主、中農等施行金融上的救濟和為他們興辦土木事業，根本沒有考慮遭受危機打擊最深的佃農的要求。儘管政府提出了這些措施，但仍借口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強調“自力更生”並極力壓縮財政支出。配合着這種不徹底的救濟措施，政府由於考慮到農民、特別是佃農和貧農因窮困可能掀起暴動的危險，而加強了對農民運動的壓制。在8月舉行的第六十三次議會以前，內務省警保局以在左右兩翼中均

有發動群众运动的傾向为借口，除了表明它徹底“取締”請願运动的方針外，还在地方警察官會議上，也下达了徹底压制农民集体行动的命令。这个时期，除了到东京的請願运动以外，在栃木、秋田、及其他各地，还掀起了以乡公所或县政府为目标的群众运动。那就是被称为“要米会”或“口粮斗争”之类的群众示威，这些示威运动都是和反地主斗争結合在一起的。政府極端恐惧这种运动的发展而加强了镇压，其中大部分都因为禁止报道而被埋沒了。。

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

如上所述，以农村的不安为背景的急进法西斯主义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到了 1932 年年底至 1933 年年初，这一运动却进入了停滞状态。其社会原因是：救济农村的工作虽然不充分但总算有些进展，以及由于这一时期米和茧都漲了价，因而使农村的不安暂时得到了緩和。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軍部首脑及中坚層的态度已趋于稳重。五·一五事件发生后，海軍方面立即發布了整飭軍紀和反对軍人干政的訓示；陸軍方面也訓戒了軍人彼此間的联系。这样一来，軍部和民間法西斯团体的关系显然趋于疏远；同时，依靠軍部发展起来的后者的势力也就很快地陷于停滞状态了。

軍部的气氛所以發生了这样变化，主要是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局势下，軍部在对內对外政策上有了合法地加强自己發言权的可能性；而斋藤內閣也極力避免同軍部之間發生磨擦，从而容許了軍部的势力扩张。政党也通过了承認“滿洲国”的決議等来力求与軍部取得协调，这种傾向在右翼社会党方面更为显著。同时，財閥也采取了所謂“自肃”的方針。1932 年 4 月，三井、三菱以“滿洲国”成立后的首次对外貸款形式，以七年后归还和年利五分为条件，供給了二千万日圓的貸款；在五·一五事件后不久，

又以失业救济費及社会事业費的名义，三井、三菱各捐献三百万日圓，住友捐献一百万日圓；并朝着所謂“轉變財閥方向”的道路前进了。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1933 年 7 月神兵队事件，在企圖利用民間法西斯团体發动群众来改造国家这一点上，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表現；但是，發动群众的計劃終于流产了。因五·一五事件和神兵队事件法西斯团体的干部被捕一事，使沒有强大的群众組織、專賴私人关系的法西斯运动，势力大为削弱；后来又暴露了神兵队的干部作为通風报信的代价由股票商取得了一笔資金，这就更加降低了它的名声。

在这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变动之中，由于龐大的軍事开支和公債政策，壟断資本漸漸有了發展；而取代政党势力的官僚势力也漸漸擴張起来，企圖以軍部为推运力对原来的統治体制进行合法改革的所謂“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傾向也逐漸表面化了。官僚势力利用軍部排击政党的机会，在“淨化政界”的口号下，乘机發展自己的势力；并且利用統制經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1932 年 12 月，由于“文官分限令”的修改而产生的对官吏身分的保障，成了官僚扩充势力的一个基础。这样一来，在过去的政党內閣时代以“根据官厅事务上的需要，必要时”云云为理由，可以任意实行的对官吏的罢免，就要經過文官分限委員會的同意，并且这个委員會是由高級官吏和資格較老的官吏組成的，这就显著地巩固了官吏的地位。內务省，以往每年都要有三百人以上的更动，修改以后，仅更动三十人左右。这个修改，保証了取代政党的官僚在政治上得到發展。

內田的焦土外交

具有上述性格的斋藤內閣，在对外政策上几乎无条件地接受

了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軍部的对外方針，其結果，使日本的对外关系更加紧张起来，在国际上走向了孤立的方向。不言而喻，軍部所推行的对外侵略方針，是大体上符合壟断資本的利益的，所以壟断資本对此并沒表示强烈的反对。他們只是顧慮和列强引起直接冲突的危險，那样，会使日本陷于危險的境地。然而，他們認為这种冲突的危險既然还不紧迫，便可以容許軍部的主張，以便避免加剧在國內与軍部之間的斗争。

1932年7月，外交官出身的“南滿鐵路”总裁內田康哉被任命为專任外务相，內田外务相在8日召开的第六十三次議会上，在答复森恪关于积极承認“滿洲国”的主張时说：“所謂‘滿蒙’事件，对我帝国來說，是基于所謂自衛权的发动而引起的。……为了这个問題，必須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也要貫徹这种主張，在这一点上，應該說，我們具有一步不讓的决心”，主張了所謂焦土外交。这个焦土外交的第一个具体表現，是在1932年9月承認了“滿洲国”，次年1933年3月更进一步退出了国际联盟。

在此以前，1932年3月1日，在关东軍的“內面指导”之下成立了“滿洲国”，清朝的后裔溥仪就任执政，6月，众議院全体一致通过了政、民两党的共同提案——全場立即承認“滿洲国”的決議。接着，作为承認“滿洲国”的前提，为了大致統一日本在“滿”机关，新設了駐“滿”大使，使其兼任关东軍司令官和关东州長官。8月，陸軍大将武藤信义被任命为关东軍司令官兼駐“滿”大使及关东州長官；小磯陸軍次官被任为关东軍參謀長及关东軍特务部長。关东軍特务部事实上是統制“滿洲”經濟的最高机关。

同年9月15日，签订了日“滿”議定書，正式承認了“滿洲国”。日“滿”議定書只有两条，一条是“滿洲国”確認日本及日本国民在“滿”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另一条規定，日“滿”共同防禦和日本軍駐扎“滿洲”。这不过是以“国际条約”的名义確認了关东軍对“滿洲”

的統治而已。在此以前的 1932 年 3 月 10 日，溥儀在給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的信件中曾約定：（一）同意关东軍所需要的一切軍事設施由“滿洲国”提供，其經費由“滿洲国”負擔；日本負責保衛新“国家”的国防和国内秩序；（二）由日本担任一切既有的鐵路及其他運輸設施的管理以及它認為必要的新鐵道的鋪設；（三）日本人可以充当“滿洲国”政府各部門的官吏，但关东軍司令官可以任意任用、罢免和更換（远东国际軍事法庭記錄）。由軍部主張建設“王道乐土”的“滿洲国”就在軍部本身的重压之下，变成了人間地獄。

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法西斯主义所以能够得到發展，是因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后退了一步。

社会民主主义陣营的右翼——社会民众党在 11 月召开的中央委員會上，通过了一項決議：“（一）为了确保日本国民大众的生存权，認為在条約上規定的我們在‘滿蒙’地方的利权遭到侵犯是不正当的；（二）排除以往錯誤的資產階級的对‘滿蒙’管理，而改行社会主义的管理”，表明了支持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领导这次向右轉的是書記長赤松克麿，他已經甚至脫离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綫，公开地挂起民族社会主义的招牌来了。他和反对法西斯、共产主义、資本主义，即所謂三反綱領下，仍旧坚持社会民主主义路綫的松岡駒吉、片山哲等的主流派發生了对立，在次年 4 月的中央委員會上，赤松派因建議被否決，終於退党了。中間派的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情况是这样：它在 9 月發表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要求政府立即撤兵和絕對不干涉中国內政。但是，尽管在決議和声明中罗列了一些动听的反战辞句，但是並沒有同时进行实际的斗争，因此受到党内这样批評，即：“在‘滿蒙’危机最严重的今日，由于空喊口号，完全暴露了斗争的无力。”

社会民主主义的处境困难了。因为在事变开始的同时，可以进行合法活动的一面急速缩小，而从内部又出现了日本国民社会党筹备会(下中弥三郎、佐佐井一晁、满川龟太郎、室伏高信、橘孝三郎、权藤成卿、长野朗)和日本民族社会党(赤松克麿、大矢省三、平野力三)等为了投机相繼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然而，下層群众又渴望开展坚决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这样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左、右和中間の間隔已經縮小，“建立坚强的、單一的无产者政党”的时机成熟了，终于在1932年7月，全国劳农大众党和社会民众党合并，組成了社会大众党(主席安部磯雄、書記長麻生久)。这个政党的主張是：“反对过左的盲动，摺弃法西斯反动的骯髒运动，高举解放无产阶级的旗帜”(成立宣言)，也就是要成为所謂排斥左右傾而采取中間立場的統一体。

日本共产党早于事变發生的前两个月就号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备战展开斗争”，事变發生后立即尽其全力組織反战斗争。1932年7月，党中央成立軍事部，9月創刊面向士兵的机关报“士兵之友”，在軍营和軍艦內进行了發展基層組織的活动。發展党员的工作已經就緒，机关报“赤旗”也改为鉛印，影响也扩大了。党的活动已經达到了如此群众化的程度，以致可以举行街头示威活动，并把过去一直保密的活动地点和时间，公开地注明在机关报上和傳單上了。促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阶级斗争的激化。

1931年是在爆發了九·一八事变的暗淡情况下，工人、农民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工人斗争事件有二千四百五十六起，参加人数达十五万四千五百二十八人；农民斗争事件有二千六百八十九起，参加人数达五万二千七百八十九人；在农民斗争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有关地租問題以外，諸如要求延長租佃契約和確認佃耕权等有关土地問題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事件增多了。

1932 年綱領

九·一八事变反映了世界資本主义的全面危机的深刻化和帝国主义列强对立的尖銳化，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綫。如何向这一战争作斗争，这是日本革命势力对世界人类和日本劳动人民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战争必然会使国内的阶级对立更加尖銳起来，带来革命的机会。1932 年 3 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东方部负责人庫西宁就“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革命的性質”作了报告，指出以往日本共产党内部所存在的“左”的錯誤，这就是低估了天皇制的作用以及打倒封建制和进行农业革命的斗争。同年 5 月，根据以上分析，以共产国际西欧局的名义发表了“日本的形势和关于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綱領”，就是所謂 1932 年綱領，其中，对于革命的战略战术作了明确的闡述。这个綱領的内容是这样：日本的統治体系的第一因素是天皇制，它是目前的剝削阶级專政的坚固的脊椎骨；第二个因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日本农村的这种落后的、半封建的制度，才是促使农业衰退和广大农民群众日益貧困的原因；第三个因素是与由官僚支配的整个天皇制体系紧密結合着的壟断資本。与这三个因素所組成的統治势力作斗争的現阶段的革命，是具有坚决轉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傾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天皇制，廢除寄生的土地所有制，实现每天七小时工作制这三大民主主义的任务。

这个 1932 年綱領的意义在于：提出了显然不同于逃避与天皇制作斗争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劳农派）及取消派（三·一五、四·一六两次事件的被捕者中承認共产党战略錯誤，并容許天皇制存在的門屋博、淺野晃等人）的方針。这个綱領还指出了：必須向九·一八事变以后，作为挽救壟断資本危机的法西斯主义的最反动的执行者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天皇制軍部、官僚作毫不留情的

斗争。从 1932 年 5 月起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虽然是在 1932 年斗争纲领发表以前(日本是在 7 月发表的)着手计划的,因为特别强调要纠正 1927 年纲领的方向,所以在事实上它为从理论论证新纲领准备了条件,它是在党员野吕荣太郎领导下,动员了包括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许多党外学者在内的优秀的理论家共同编写而成的;它给予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所谓“讲座派”的这些学者们和持有不同见解的猪俣津南雄、櫛田民藏、向板逸郎等劳农派的人们,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由前一年春季就已经在野吕和猪俣之间开始了。猪俣津认为:当前实际掌握政权的阶级只有一个资产阶级,封建的专制主义已经失去了物质基础;野吕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半封建的地主制度就是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个基础而保持它的独立性,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了同盟。这一论战由于上述讲座的出版而达到高潮,关于幕府末期和维新的问题、怎样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的问题,等等,广泛地展开了争论,形成了几乎所有当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都参加了的一场大论战。当然,这场争论战无可避免地要受到官方的镇压。有的论文不得不作了很多删削和用了许多隐语,有的甚至受到了禁止发行的处分,不得不加以修订。为了尽量避免上述压迫,撰稿人不能不用列宁所说的“伊索寓言式的语言”。

1932 年纲领,通过提出革命战略,要求日本共产党克服落后于形势的缺点。然而镇压的魔掌却接二连三地袭击了日本共产党的核心。从 1932 年 10 月至 1933 年 1 月之间,进行了大检举,先后逮捕了风间丈吉、紺野与次郎、岩田义道、宫川寅雄等领导干部,以及前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前商科大学教授大冢金之助、前九州大学教授风早八十二等有关人士一千五百人。这是由于同年 6 月

警視厅扩大了特高警察，加强了镇压活动，并派遣特务警察混入党内，因而破坏了地下組織。

这样，趁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动摇、混乱，共产党受到镇压和打击，使革命势力遭到削弱的机会，法西斯势力取得了绝对优势。

第四节 退出国际联盟和签订塘沽协定

李頓报告

由于1932年5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一·二八事件已告一段落，由此，国际联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李頓調查团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告书的草拟和提出上面来了，对于日本承认“滿洲国”問題，它也没有立即采取任何措施。李頓調查团于1932年2月到达东京，接着经过上海、南京、北平，在4月进入“滿洲”，6月回到北平着手起草报告书。报告书是在9月30日交给了中日两国政府，并于10月2日正式公布了。

报告书不承认9月18日夜里日本方面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正当防御，并且否认“滿洲国”是纯粹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但同时却又承认“滿洲”的特殊情况，而认为仅仅恢复9月18日以前的原状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报告书提出了如下的解决问题的一般性原则：（一）不抵触中日双方的利益；（二）考虑苏联的利益；（三）符合现有的多边条约；（四）承认日本在“滿洲”的利益；（五）中日两国通过締結新的条约以建立新的关系；（六）对将来的糾紛采取有效的措施；（七）“滿洲”实行自治；（八）对于“滿洲”維持内部秩序和免遭外来侵略給予安全保障；（九）促进中日两国間發展經濟关系；（十）关于改造中国問題实行国际合作（报告书第九章）。此外，报告书还提議：在东三省設立自治的特殊行政机构，并以該地区为非武装区，由宪兵队維持治安；聘任外国人为自治政府的顧問。

間、警政及財政監督官以及中央銀行總顧問(報告書第十章)。這里提出了有利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對“滿洲”實行國際共管的方案，同時在很多方面對日本表示了遷就。

11 月，國際聯盟為了討論李頓報告書，在日內瓦召開了理事會，日本代表松岡洋右、中國代表顧維鈞出席了會議。松岡主張日本的行動是自衛行動，“滿洲國”的獨立運動是自主地發展起來的，並以此來反對以李頓報告為解決問題的基础。顧維鈞對此提出了反駁。問題被提交大會上，大會是在 12 月召開的。在大會上，英、法、德、意等大國對日本採取了綏靖政策，然而瑞典、挪威、愛爾蘭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小國則表示反對，他們堅持主張貫徹盟章的原則，強調否認日本在“滿洲”採取的行動的必要。全體討論結束後，中國代表指出中、日糾紛已經成為文明世界和日本之間的鬥爭，對李頓報告書的原則表示贊同。日本代表發表演說對此表示反對，並主張“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綫”，接着又強調共產主義侵入中國的危險和不應該削弱日本來加速遠東的崩潰，最後還威脅說，如果採納小國方面的意見，日本就要退出國際聯盟。由於這種原故，大會未能作出任何具有實際意義的結論，而把討論中日問題的任务提交給十九國委員會了。日本對這個委員會的決議案也表示了反對；但英國却繼續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並試圖調處日本同國際聯盟之間的关系。1933 年 1 月初旬，英國大使會見了內田外務相，接着，聯盟秘書長德拉門(英國)與副秘書長杉村陽太郎草擬了一項試案，並將其內容透露給日本。這一試案對採用李頓報告書大大地加以局限，同時，還刪去了“否認滿洲國”的字樣，這對國際聯盟來說，已經是最大限度的讓步。對此，日本元老重臣方面也主張接受，但是政府却認為仍有討價的余地，因而採取了強硬的态度。

在這樣情況下，日本軍隊積極地向熱河進攻了。日軍在占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以後，即將矛頭轉向西方，1932 年 7 月，

借口日本軍官在热河省北票附近失踪，而开始进攻热河。7、8月間，日軍的进攻遭到中国抗日义勇軍的阻击，但是它宣布“热河为滿洲国的領土”，而增强了兵力。1933年1月，日軍利用山海关爆炸事件的机会，占領該地，并要求以山海关作为緩冲地带，于是热河的局势吃紧了。2月20日，日軍以“滿洲国”的名义向中国軍隊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軍隊撤出热河，紧接着，就再一次向热河开始了进攻。

退出国际联盟

山海关事件和日軍开始进攻热河，使国际联盟的討論陷于僵局。在日本国内，为了避免退出国际联盟，虽然元老方面也表示了暂时推迟进攻热河的意見，但是这种意見絕對不可能为企圖退出国联以便随心所欲地侵略中国的軍部所接受。同时，中国方面对于德拉門和杉村的妥协性的試案提出了抗議，而在英国大使和內田外务相的会談中，日本政府又始終坚持强硬态度，于是国际联盟方面就認為再已无妥协余地，因而空气为之一变。另一方面，在德国，由于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后，不断叫囂要打破現状，国际联盟对此也有必要根据盟章采取强硬的态度。經過这样一段过程，国际联盟才从它一向謀求使中日两国妥协的立場前进一步，为了解决糾紛，起草了一項以李頓报告書的主張为要点的劝告案，并决定在2月24日召开的联盟大会上進行討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荒木陆相和內田外相等所提出的退出联盟的主張获得了优势，以往反对退出国联的元老重臣也同意了这种主張。在2月24日的大会上，报告書以四十二比一通过了，于是，日本代表松岡便声言：“日本政府現在不能不認為就中日糾紛問題，与国际联盟进行合作的努力已經到达了極限”，然后退出了会场。

日本对大会所通过的报告書，發表了一項声明說：“日本政府

認為日本在‘滿洲’的軍事行動以及日‘滿’議定書的簽訂，對於國際聯盟、九國條約、巴黎條約及其他一切國際條約均未違反”，又說：“赤化了的中國對歐美各國是個嚴重問題，與此相比，其他各種問題都將失去意義。然而，和中國完全脫離了關係的‘滿洲’，是一個在遠東方面防止共產主義危險的堡壘，對於它的真正意義，各國當政者應該已經有了正確的了解”，這樣，日本政府企圖用反共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3月28日，日本向國聯提出了退出的通告，同時發布了關於退出國際聯盟的詔書。日本天皇命令在這個詔書中要強調這一點，即：“日本之所以退出國際聯盟，只是由於它在‘滿洲’問題上和國際聯盟不幸而意見不能取得一致的結果，並非出於本意，因此，日本此舉絲毫也不違背國際聯盟的增進人類幸福的基本方針”，其後，他還屢次談到這種協調的意圖。（原田日記）

儘管天皇的詔書里面對於退出國聯也有一些批評的片斷字句，但是詔書的目的卻在於禁止對於退出國聯可能提出的一切政治性批判，這是顯而易見的。

退出國際聯盟，正是日本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的決定性的步驟。然而在當時，虛張聲勢的“自主外交”的叫囂，籠罩了整個政界，“亞洲人的亞洲”和“回到東方來”等空洞口號統治了言論界。松岡全權歸國時，受到了人們甚至還包括小學生在內的狂熱的歡迎，他被捧成了英雄人物，與簽訂朴次茅斯條約的小村壽太郎歸國時那種冷冷清清的情景，恰恰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在出發的時候，國民曾寄給他數以萬計的鼓勵信，其中希望“圓滿結束這次會議再回來”的信只有一、兩封（清澤洌：“生活在動盪時期”）。就在軍部和政府利用煽動一手製造出的這種完全有利於它們的“輿論”的浪潮中，他們自己斷送了解決九·一八事變的機會。

各国的态度

当时远东的国际局势，并没有引起对日本进行任何积极的干涉。首先，国际联盟在通过了对中日两国的劝告案（这造成了日本退出的原因）以后，为了决定国联应该采取的措施，而设立了諮詢委员会，并邀请美、苏两国参加和给予协助。美国答应派观察员参加，而苏联则拒绝了这一邀请。諮詢委员会虽然讨论了禁止对日输出武器问题和不承认“满洲国”的具体作法，但并未能对日本施加有效的制裁。关于在大会开会期中正在进行的热河问题，虽然由中国代表顧維鈞向大会提出了控诉，但是国联并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样，联盟的威信就愈發扫地了。

和国联的情况相表里，英国由于在九·一八事变时对日本采取的綏靖政策宣告失败的结果，丧失了它在中国的威信，当时的外交活动还是很呆滞的。美国也未能和英国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没有能够采取任何行动。1933年3月，民主党的罗斯福取代共和党的胡佛就任了总统；赫尔繼史汀生做了国务卿。罗斯福的远东政策，从史汀生只是口头上提出强硬抗议而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的情况中汲取了教训，一方面对日本侵占“满洲”依然采取不承认的政策，另一方面却避免采用虚声恫吓而竭尽全力扩张海军。这正是学习了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在温和交談中准备好大棒”的训示（格雷斯福德：“美国远东政策史”）。但是，采取这样的——至少表面上——綏和政策的原因之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重工业的发展給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产业资本提供了新的市場。

这个时期苏联的远东政策是一貫地以避免反苏统一战线成为重点，因此，在对日政策上也表现得極其慎重。在此以前，1931年12月，李維諾夫外交人民委員曾向为就任犬养內閣的外相而在归国途中的芳澤謙吉提議苏日間簽訂互不侵犯条約；至

1932年10月，又通过广田大使再次作了同样提議，并表示准备同意“滿洲国”派总領事駐在莫斯科或由日本駐苏大使兼任“滿洲国”总領事，以及以合理价格出售中东鐵路。然而，死抱着反共的招牌不放的日本政府，以尙非正式开始交涉的时期为借口而予以拒絕了。尽管这样，苏联方面仍然保留着談判的机会。对于国际联盟諮詢委員會的邀請，李維諾夫以半数以上的委員国都对苏联抱有敌对态度为理由，拒絕参加會議，避免使日本完全变成敌人。1933年4、5月間，“滿洲国”断絕了“中东鐵路”滿洲里和綏芬河两站与苏联鐵路之間的联系，就在此时苏联仍旧力圖避免和日本發生爭端；5月，苏联提議要出售中东鐵路。6月，有关出售的交涉开始了，苏联方面最初作价二亿五千万盧布（当时一盧布合一·〇四日圓），后来到8月，讓至二亿盧布；而“滿洲国”方面却坚持主張給五千万日圓，双方僵持不下，至9月末，交涉陷入了停頓状态。此后，日苏之間的隔閡逐漸加深了。

和远东的这种局势遙遙相对，在德国建立了独裁制度的希特勒，于1933年10月，宣布退出軍縮會議及国际联盟，使国际联盟的力量愈發削弱了。在这种国际協調主义失敗的同时，1933年3月的日內瓦裁軍會議及同年6月的倫敦經濟會議也都以失敗而告終。特别是由于后者失敗的結果，促进了世界上形成集团經濟的趋势，加强了关税壁壘。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国际間的对立日益尖銳化了。

塘沽协定

日軍在3月初旬結束了对热河的侵占。国民政府表示要保衛热河不过是为了爭取時間，以便等待国联的空气对中国有所好轉；而热河省主席湯玉麟也并未进行抗战，而是携带着財產跑了。3月10日，日軍对長城綫开始了总攻击。在这样情况下，依然集中全力

进攻紅軍的蔣介石終於北上，召开了有張学良、宋子文、何应欽等人参加的會議。其結果，掌握华北統治权的張学良下野了，华北的政权、軍权移交給何应欽，張学良部下的东北軍被改編了。这样，国民党的势力，沒有經過流血就扩展到了長城綫。但是蔣介石、何应欽等絕不想冒与日軍作战的危險，从而削弱自己的力量。对于日軍的攻击，中国二十九軍在喜峰口展开了反攻，并攻入了热河，但蔣介石、何应欽却命令主力撤退至灤河綫上，因此，二十九軍竟陷于孤立无援而被击败了。接着，日軍越过灤河，迫近北平、天津两地；这时候，国民政府內部主張緩和抗日和設置华北緩冲地帶，借以收拾时局的論調抬头了。

5月末，由于了解日本情况的黄郛等人的活动，日軍和中国軍隊之間开始了停战交涉，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該协定，規定：中国軍隊撤出長城以南的灤河东部地区，并将該地区作为非武装地区；該地区的治安由中国警察維持；一俟中国軍隊撤退，日軍将自动撤到長城綫。如果只就塘沽协定本身来看，它只是一項軍事上的停战协定，但实际上，由于它的签订，結束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兩軍的敌对关系，使中国方面默認了“滿洲”的既成事实。而且，这一协定是放弃了国际联盟的集体保障主义，經過两国間直接进行交涉而签订的，还意味着对于国联的一个重大打击。

6月，作为緩冲性的政权机构，成立了以黄郛为委員長，統轄山东、山西、河北、察哈尔、綏远及北平、青島两市的行政院駐平政务委員會。日本方面，关东軍在8月間撤到了長城綫，但是原来以两个大队为主力的华北駐屯軍，增加到一个混成旅团，兵力大大增强了。

当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妥协政策的势力在中国各地起事了。在察哈尔，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人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开进了非武装地区；在福建，在淞沪战役中由于英勇抗日而著名的

十九路軍的領袖李濟深、蔡廷楷等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主張武裝抗日。但是，他們都在國民政府的武力鎮壓下失敗了。此后，國民政府在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合作下，推行了消滅紅軍和統一國內的政策。國民黨政府雖然表示不放棄對日抵抗，並且在口頭上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實際上無法掩飾它對日本的妥協態度。

第四章 “非常时期”

第一节 軍需通貨膨脹和农业危机

高桥財政

日本資本主义为了摆脱严重的危机，發动了九·一八事变，在这种情况下，依靠逐步轉向战争經濟，日本資本主义暂时得到了恢复，当然，它的内部还孕育着更大的矛盾和危机。

起用“財政界老将”高桥是清做大藏相的犬养內閣，上台后第一个經濟措施便是宣布再次禁止黄金出口，这就等于参加国际資本主义經濟战的“宣战布告”。这是因为：第一，这样作就使得外匯率下跌，因而增强了傾銷能力，并表明要向英、美两国挑起激烈的商战；第二，这样作，就是把筹集軍費和挽回时局的經費，全部依靠发行公債和通貨膨脹，通过这样的道路逐步加强对外侵略的經濟体制。

高桥大藏相首先取消了前內閣的紧縮財政、不發行公債方針和增稅計劃等。1932年度預算，比前一年增加了五亿日圓；公債的發行額在1932年已达十亿日圓，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用于直接軍事开支。为了靠發行赤字公債来筹集軍費，高桥大藏相把这一任务交給日本銀行来承担，并由它在市場上公开銷售。这样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那些由于产业界的不景气而集中在大銀行手里的龐大的剩余資金提供一个有利的投資对象；另一方面，可以使軍部筹措軍費的要求和苦于无处投資的金融資本要求都得到滿足，并且可以避免通貨膨脹。但是，这种策划者自夸为“一举三得”的“妙策”，并不能解决日本的財政困难，也未能制止通貨膨脹。

高桥大藏相还以救济农民的名义，編制了“时局匡救費”。当

时农业危机正在猛烈地發展，农民已逐渐趋向革命化，大大地动摇了地主所有制的基础。这种情况使統治阶级感到恐惧，他們特别感到无论如何必須“保护”其“忠誠的”軍隊的“补充源泉”的农村。“时局匡救費”就是为此而支出的，而不是为了救济农民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这种“时局匡救費”，此后在軍費的压迫下，在 1933 年度和 1934 年度預算中逐漸减少，到 1935 年终于被完全取消了。

这样，高桥財政通过尽量不遭受抵抗的办法筹措了由于軍部侵占“滿洲”而遞增无已的軍費資金（1931 年占岁出的 30.8%，至 1936 年增至 45%），切实保证了有关金融資本家的利益，并且还满足了从軍費中获取利潤的“制造死亡的商人”的要求。至于由財政通貨膨脹带来的一切負担，則統統轉嫁到工人、农民和中小企业家的身上了。这就是被称为“非常时期財政”的高桥財政的内容和它的秘密。

軍事生产

这种以軍費开支为中心而引起的通貨膨脹，使接受大批軍事訂貨的重工业部門有了迅速的發展。由于这种关系，历来依靠国外市場、以纖維工业为中心的日本資本主义，由此完全改变了它的組織結構。这个变化表现在产值上的情况是：1931 年在构成纖維工业的主体的紡織业的产值与軍需工业的中心——金屬机械工业的产值，不过是十九亿日圓比九亿日圓；至 1935 年則增至三十四亿比三十三亿，几乎相等。这意味着在通貨膨脹下，軍需工业有了显著的發展。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称这种膨脹为“軍需通貨膨脹”。

在这样“軍需通貨膨脹”的情况下，日本的經濟迅速地轉入了战争經濟。使一个国家的經濟走上战争經濟的軌道，就是对全部生产事业赋与以單純的战争的方向，也就是不顧一切地擴張与一

般人們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大炮、坦克等軍需物資的生产。这样，把人民用血汗生产的物資用在战争上，就等于将劳动的結晶投到大海里；軍事生产的增長，不但不能使国民富裕起来，反而要使国民日益貧困。由于軍需通貨膨脹而获得巨額利潤的，只有生产軍需品的資本家。

扩大的軍事生产的重点，首先是陆海軍的工厂。陆軍方面，对小倉工厂进行了大規模的改建，使其成为綜合性的大工厂；而且更要使其成为与附近的八幡制鉄所的鋼鉄、筑丰煤矿的煤以及中国大陆的原料市場相結合的軍事工业的集中地点。此外，大阪、名古屋的陆軍工厂、横須賀、吳港、舞鶴的海軍工厂也都进行了扩建，以这些工厂为中心，軍需生产有了很大的擴張。軍需产业的核心是冶金工业，特別是鋼鉄工业。日本的鋼鉄工业自創建以来，就一直在政府的保护下不断地得到發展，1934年1月，政府制定了“日本鋼鉄公司法”，以国营八幡制鉄所为中心，把屬於三井、三菱、安田、澁澤等各財閥的鋼鉄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巨大的托拉斯——日本鋼鉄公司。由于这个公司的成立，只是它一家的生鉄和鋼塊的产量就占日本总产量的大半。在实行这次合并时，对屬於財閥系統的各鋼鉄公司的作价都远远超过了实际价值，因此財閥不仅在合并中获得了巨額的利潤，而且並沒有因此失去他們的支配权。这样一来，鉄的产量，由1931年的九十一万吨增加至1935年的二百一十一万吨；鋼的生产量在同一时期內，由一百六十六万吨增加至三百八十六万吨。但是，随着产量的增長，矿石、廢鉄廢鋼的进口量也显著地有了增長，而廢鉄廢鋼的70%都要从日本当时的主要竞争国——美国进口。这一点，說明了日本鋼鉄工业具有極大的弱点。另外，对于作为重要軍用物資的石油，于1933年制定了“石油业法”，石油的儲藏和精煉設備均被置于国家的統制之下；以日本石油株式会社为中心进行的对石油的壟断，是在与国家权力相

結合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

機械製造工業和化學工業本來是落後的，但這個時期的發展情況是值得注意的。機械製造工業中，工作母機、電機、汽車、造船等工業部門以增產武器為目的，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是在軍部的管轄下和國家的絕大保障下進行的。中島飛機製造公司的擴充，是利用興業銀行所貸與的等於其資本數十倍的資金來進行的。化學工業是製造炸藥、毒瓦斯所必需的，它在軍部的特別管轄和扶植之下發展起來。在這方面，1935年的總產量增長到1931年的大約二倍以上。

傾 銷

由於再次禁止黃金輸出引起的外匯率的猛跌，有力地刺戟了日本的出口貿易。外匯行市在1932年以前不斷下跌；至1933年落到平價（日圓本來的價值）的40%左右而大致穩定下來。由於幣值這樣下跌了60%，儘管隨着通貨膨脹國內物價有了上漲，然而日本商品還是可以在世界市場上廉價出售。這樣，就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外貿易陷於停滯不前的時候，日本的貿易卻有了相當的發展。然而，日本商品所以能夠利用這樣外匯關係廉價出售，是因為進行了相應的不等價交換，也就是說，日本的資本家將工人生產的龐大價值拿到國外市場上進行“甩賣”了。由於“甩賣”而受到的損失，是靠強迫工人犧牲（減低工資和延長勞動時間）和在國內維持特高的壟斷價格來彌補的。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的對外貿易上的“甩賣”就是所謂“傾銷”。例如，1929年和1931年的生產成本相比，生絲降低了53.5%；棉製品降低了36.3%；化學製品降低了24.3%。這就是由於資本家在大危機中通過強制實行“產業合理化”，降低工人的工資和延長勞動時間的結果。在這樣殘酷剝削工人的基礎上，在1932年8月，日本紡織品的輸出額超過了一

向是主要竞争国的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其所以造成这种情况，除了上述的“倾销”以外，还由于在世界危机中，殖民地人民进一步贫困了，他们不可能购买质量好而价格高的英国货，只能购买质量次而价格低的日本货。

采取这样“甩卖”的办法来增加出口，是为了争取外汇以便从外国购进军需生产的主要原料。但是，出口的增長比例并没有赶上军需产业所需要的原料輸入数量的增長比例。不但如此，至1934年，赖以进行“甩卖”的基础——外汇率的下跌宣告停止，出口逐渐陷入停滞状态。这种情况，对于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达到繁荣的依靠出口的各产业部门，是一个重大的阻碍。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35和1936年，它一方面越发加剧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同时还构成了一向从事壟断对外贸易的产业部门的旧财閥(三井、三菱、住友)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而一心从事军事工业的一个轉折点。

旧財閥和新兴財閥

从这种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军事工业的發展和低外汇率倾销政策的对外贸易中，得到利潤的，只是三井、三菱等大財閥。首先，三井財閥由于先前的“搶購美元”而大发横財；1932年，池田成彬繼团琢磨当上三井的總經理以后，改变了以往主要从事商业、金融、輕工业經營的方針，逐渐扩大了对军事工业的投資，并进而加强了协助战争的体制。在鋼鐵工业方面，除了在日本鋼鐵公司里有7.4%的投資以外，主要掌握着承担海軍訂貨的日本制鋼所。在煤炭工业方面，它的支配力特別强大，通过三井矿山、北海道煤矿、太平洋煤矿等三个公司，掌握着全国采煤量的25%。此外，它还运用它所屬的东京芝浦制造厂、东洋精密机械、昭和重工业、丰田紡織机械等公司，从事軍艦和机械化武器的制造，再加上东京电

灯、日本制粉等公司，其資本总额达十余亿日圓。特别是由于“軍需通貨膨脹”而获取的利潤更为巨大，只是日本煉鋼厂，从 1931 年至 1936 年之間，利潤率就增長了大約两倍。

三菱和三井一样，也从“軍需通貨膨脹”中得到了巨額利潤。在煤炭生产方面，它通过三菱矿业及其他两个公司，掌握了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15% 左右。另外，为了正式轉入軍事生产，把三菱造船与三菱飞机制造两个單位加以合并和扩充，成立了三菱重工业公司。此外，还拥有三菱电机、日本光学工业、日本电池等与軍事生产有关系的公司。所有这些屬於三菱財閥的企业全部資本总额，竟达十二亿日圓之多。只是三菱重工业这一个公司，在 1931 年至 1936 年之間，利潤率就增加了将近两倍。

住友財閥特別致力于發展直接和軍需有关的企业單位，除通过住友矿业从事煤炭、銅等的生产以外，还通过住友金屬、住友电綫、住友机械等公司，从事軍备材料及軍备的生产。另外，还以其住友制鋁和住友化学两公司，分別从事航空器材的生产和火藥的制造。其中，住友金屬公司在 1931 年至 1936 年期間利潤率增長了近四倍。

如上所述，从鋼鐵、煤炭等軍事工业的基础部門以至于机械化武器工业等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財閥手里，从侵占“滿洲”以前算起到其后的五年之間（1931—1936 年），利潤率激增了二倍至四倍的情况表明了：在“軍需通貨膨脹”所帶來的軍事工业的发展中，財閥的利潤日益增長了。

但是，如上所述各大財閥虽然在軍事工业各部門中都有了显著的發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一向掌握的是紡織业和煤炭业，而在化学工业及其他軍备制造业方面却没有取得壟断地位，圍繞着这些工业部門并在这种“軍需通貨膨脹”中产生了新兴財閥。这是資本家彼此間进行了激烈斗争的結果；旧

財閥对于新的事业，总是顧慮有危險，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慎重”，同时旧財閥和軍部之間在侵略中国的策略上也有矛盾，在巧妙地利用这种机会和軍部进行勾結的情况下，相繼出現了一批新兴資本家。他們往往被称为新兴財閥，其中包括：掌握着日本矿业、日立制造厂、日产汽車、日产化学等的日产康采恩(久原房之助、鮎川义介)，以日本氮肥为母体，于 1936 年發展到北朝鮮，在赴战江和長津江上建成了規模宏大的水力發电站，形成了巨大化学工业体系的日氮康采恩(野口遵)，以昭和电工为母体的森康采恩，日鈉康采恩(中野友礼)以及理研康采恩(大河內正敏)等。

这样，新兴康采恩是專門以軍事工业为母体而形成的，它們乘着“軍需通貨膨脹”的浪潮，有了飞速的發展。但是，这些新兴財閥都沒有自己的銀行資本作背景，在急剧發展中所需要的資金不能不仰賴于政府、兴业銀行以及旧財閥的銀行。因此，当三井、三菱特別对化学部門加强壟断以后(例如：三井化学部門的独立、日本化成——三井系統——的大扩充)，这些新兴財閥的活动，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或者被迫到殖民地去另謀出路。尽管有了美好的开始，尽管能够和軍部比較直接地进行勾結，新兴財閥無論如何是无力动搖旧財閥的宝座的。因为在和軍部进行勾結方面，旧財閥也很高明，并且也更为实际。

不过，旧財閥并不是沒有憂慮的。因为生活的恶化使得人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反对財閥的情緒，再加上与軍部相勾結的新兴財閥利用了这种情緒，这就使得軍部和右翼攻击的矛头完全指向了三井、三菱、住友等旧財閥。財閥搶購美元，特別刺戟了群众的这种感情。1932 年 2 月井上准之助的被刺和同年 3 月团琢磨的被暗杀即其明証。三井財閥的池田成彬回忆当时的情景，談了下面一段話：“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發，和对于購買美元的非难，以及对三井銀行和我的非难，从 1931 年 10 月起越来越激烈了。 11

月2日，自称屬於赤松克麿的社民青年同盟的分子二十余名闖入銀行的營業部，企圖逞凶。……12月21日，社会民众黨員数十名拥至三井八郎右衛門和岩崎久弥两人的住宅，坚决要求将購買美元的利潤拿来救济發生了灾荒的奥羽地方的貧民，救济百万失业者，并穿着沾有泥土的鞋闖进了室内。但是，这不过是表面的騷扰，以社民青年同盟和社会民众党的名义进行的騷扰而已；在暗地里的活动要比这厉害得多。每天来电话，出来一接，只听大罵一声国賊！就挂上了。其次，还有相貌凶恶的暴力徒帮也常光临；信件也不知道来了多少。这从9月开始經10月，一直到12月一个整月里，簡直象急性肺炎那样地流行着；其后，便逐漸轉为慢性了。1932年2月，井上准之助被暗杀，3月，团琢磨也被暗杀了。此后，便进入了一种險恶的状态，終于發展为二·二六事件，其間沒有一日不受到威胁。”（財界回顧）

面对这样情况，旧財閥的指揮部赶紧給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捐款，改革人事制度，使財閥的家族成員从表面上退后，更換首脑部，还把以往保密的財閥股份的一部分，公开出来了。这就是所謂的“財閥的轉向”。但是，这种“轉向”，只不过是為了避免攻击的一种烟幕而已，企圖获取最大限度利潤的壟断資本家的基本方針一点也沒有改变。不过，这种“轉向”也确实受到了它們的競争者——新兴財閥飞速發展的影响。

国家壟断資本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財閥为了謀取利潤，随心所欲地利用了国家权力。同时，为財閥保証尽可能多的利潤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傾向也漸漸加强了。天皇制的国家权力为了这些財閥的利益，实行了各种各样的“統制經濟”。重要产业管理法、工业組合法、日本煉鉄法、外匯管理法等一系列法令都是在这个目的之下实行的；又

如通过日本銀行制度的改革、兴业銀行資金的積極投資、創辦日鐵、帝国燃料等企业，等等国家直接参加到軍事經濟的基础部門中，从而加强了壟断資本主义体制，并保證了它們的利潤。这样做，并不是国家取代了壟断資本的地位，而是更加巩固了壟断資本的地位。譬如，通过改革日銀制度及其他而實現的日銀統制力的加强，不仅保證了面临危机的財閥銀行的地位，而且日銀所發放的巨額資金，都集中到財閥銀行手里，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些銀行对于产业界的控制力量。

这样，以侵占“滿洲”为轉机，日本的全部經濟都被推向軍事化的方向了，国家权力干涉到国民生活的任何一个細節，以滿足財閥等壟断資本的利益。大財閥不仅随心所欲地运用国家的权力，来尽量剝削日本国民，加深了国民的貧困，而且在侵占“滿洲”以后，为了从該地人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潤，还勾結軍部，努力协助了战争政策的推行。

在軍需通貨膨脹的情况下，尽管产业有了某些好轉，但是工人的生活反而更加困苦了。誠然，产业的好轉使在大危机中产生的龐大的失业者群减少了几分。但是，工人的生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改善。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就业工人虽有所增加，但多半是以“临时工”的名义被雇用的，这些“临时工”并不一定是不熟練的工人被临时雇用，他們与普通熟練工并无区别，只是在名义上作为“临时工”被雇用而已。这是資本家用来进一步降低工人的工資和更苛刻地使用工人的方法；是他們利用当时的龐大失业队伍并逃避“健康保險法”，以确保廉价劳动力的一种手段。

也是由于資本家利用这样的“临时工”制压低了工資，尽管物价已經显著地高漲了，而这一时期的工資水平反而降低了。实际工資已降到比危机期間还要低，1931年至1936年間，大約降低了15%。同时，这个时期的劳动時間也被延長了。据日銀的調查，在

情况特别好的机器制造工业里，劳动时间由 1931 年的 9.16 小时延長到 1935 年的 10.06 小时。这就表明了，軍需工业的發展是依靠加强劳动强度而取得的。

农业危机的严重化

資本家的这样的繁荣，并不仅仅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剝削。农民遭到了比工人更多的掠夺。如前所述，在大危机中，农村已陷入非常貧困的境地；尽管在侵占“滿洲”后，由于發展軍事工业，景气有所恢复，但是农村的危机却更加严重了。特别是农业危机，是在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基础上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換而产生的，因此，工业愈見恢复，农业危机反而愈益严重。1930 年的丰收危机，1931 年、1932 年的大歉收，1933 年实际收成超过七千万石的丰收危机，1934 年由于風水灾、旱灾、霜冻灾而引起的空前未有的歉收等，农村連年遭到不幸，因而失去了生气。

不錯，农产品的价格，有的年份也有过相当的上漲，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由漲价而产生的利益全被地主阶级所独占，占全体农户 40% 的貧农連自家口粮都不够吃，須要买米来維持生活，因此他們反而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反之，由于丰收而米价下跌时，米价甚至不能弥补生产成本，这就更加严重地打击貧农，使农村里的貧富对立愈益尖銳了。当时，由于歉收而出卖兒女的事例屡見不鮮，仅东北五县每年就有五万人之多。在青森县的一个农村中，因歉收、缺乏食粮而疾病丛生，平均每戶有病人一人以上。由于歉收带来的飢餓，严重地影响了健康，以致被召集的士兵不堪勤务演習，关于这种情况，当时一家报纸曾作了如下报道：“在弘前步兵第三十二联队所召集的岩手县出身的士兵中，由于身体衰弱不堪勤务演習，因而在十二天内被遣返的竟达二十一名之多，使陆军当局大吃一惊，其原因被認為是由于农业歉收所带来的营养不良

另外一家报纸还报道过这样一件惊人的事实：“在农村和渔村里，由于贫困，‘缺食’的儿童日益增多，文部省派遣有关人员到各处进行了详细调查。据报告，‘缺食’儿童达到了惊人的数字。……据当局的估计，现在全国‘缺食’的儿童超过二十万人，呈现了空前未有的悲惨状况”。（“日本经济年报”）

农村如此贫穷的状态，在全国各地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火焰，斗争非常尖锐，大大地动摇了天皇制的基础——地主制度。因此，统治阶级在拨出前述“时局匡救费”的同时，还不得不实行米价对策、农村更生运动、减轻负担对策、整理负债对策等多方面的“保护”农村的措施。米价对策是指 1931 年对“米谷法”的修改，和 1933 年“米谷统制法”的施行，其目的在于维持米价，但实际上只是维持了地主所出售的米的价格，并未给大部分农民带来任何利益。农村更生运动是和所谓产业合理化运动相呼应而被提出来的，这个运动强迫农民更多地劳动，把生活压得更低，它的主要特点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也就是不动用国费的原则下来强制加以推行。至于减轻负担、整理负债等等，几乎全是有名无实，无非是欺骗农民、企图缓和革命而已。

第二节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五相会议

在承认“满洲国”、退出国际联盟的所谓内田焦土外交的进行过程中，斋藤内阁对内避免与军部摩擦，采取了妥协的方针，以便稳定局势。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基础的斋藤内阁，每逢议会开会都要受到在众议院里拥有三百零四个绝对多数议席的政友会的攻击，虽然利用“非常时期”、“举国一致”的口号力图混过这一关，但是政党之间的倾轧是无法避免的。当时在政友会方面还不便同政

府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以军部为中心反对政党内阁的暗流仍然存在，而国民也不大信任政党内阁。所以，政党从本身的利益出发进行倒阁，必将受到严厉的指责；即使是推翻了斋藤内阁，亦难以指望上台执政。在这样局势下，政府和政友会之间，进行了旨在“安定政局”和授受政权的政治工作。这是从退出国际联盟，政局告一段落以后才开始表面化的。但是政友会的步伐并不一致，关于是否和政府决裂的问题，主张强硬论的铃木派和主张稳重论的床次派、久原派发生对立，每每引起内部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当编制 1934 年度预算时，由于海军提出了庞大的补充计划费的要求，增加了财政上的困难，使政府面临难局，迫切地要求在议会中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从此，政府与政党间的联系更加表面化了。七月下旬，斋藤首相宣称：“在恢复财政、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各方面，都必须制订确定不移的对策”，并要求政、民两党总裁入阁。但是，政友会总裁对此态度十分干脆，拒绝入阁，结果总裁入阁的问题宣告流产了。接着，斋藤首相又访问了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三党总裁，进行了国策协商。可是，政友会所提出的国策方案，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它只是强调国防、承认增加军费等借以迎合军部，至于如何处理军备与财政的关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并没有提出任何对策，暴露了政策的贫困。

正当政界上层的活动陷于停滞不前的时候，相继举行了五·一五事件(陆军方面、海军方面及民间方面)的公审，引起了新的波澜。在法庭上，被告对政党和财阀进行了攻击，并申诉了农村的贫困，报刊、广播把这些情况大力地加以宣传，这就使得五·一五事件后陷于停滞的右翼团体的活动死灰复燃了。陆军在 8 月进行公审时，对被告的犯罪动机是加以肯定的，而在九月间，海军方面的山本检察官则在起诉中严斥军人干与政治，要求判处被告以死刑以下的重刑。对此，海军的青年军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起诉

的运动。在横须贺水交社召开了有志军官联合会，在从四十期(中校一级)到五十八期(少尉级)的少壮军官的参加下，讨论并指责了伦敦条约的不当，并通过了攻击政府干犯统帅权的决议。对此，若槻民政党总裁发表演说为伦敦条约进行了辩护，这立即引起了在东京的预备役将官发表了一篇反驳声明，而五·一五事件的海军方面特别辩护人朝田中尉还访问了若槻，向他提出了质问。就是这样地在国民中间煽起了沙文主义思想，大肆渲染并极力鼓吹即将到来的 1936 年(海军裁军条约有效期间的最后一年)将爆发世界危机。在这种声浪中，采取了一系列扩充海军军备的措施，修改了军令部条例，把军令部的职权提高和扩大到与参谋本部相同的程度。接着，大角海相又表明，要在下次会议上要求修改现行海军条约的比率。日本侵占“满洲”以后，不仅需要扩充陆军，而随着日美关系的恶化，编制庞大的海军造舰计划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样一来，就越发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在这些事件的前后，9 月，内田外相下台了。广田继任外相以后，立即表明特别要改善对美、苏、中三国的关系。这就是代替内田焦土外交的所谓广田协和外交的开始。广田外相就任后，荒木陆相向首相建议，要求包括军部在内，由政府内部来决定国策。这是针对政府与政党间成立的国策协定提出的，企图排除政党参与决定国策的做法。同时，高桥藏相等为了对 1934 年度预算的讨论作好准备工作，而使国防、外交、财政各方面取得协调，也对此表示赞成。于是，首相、大藏、外务、陆相、海相等五相会议就在 10 月 3 日至 21 日之间召开了五次。在五相会议上，主张国际协调及国防、外交、财政调和的高桥、广田与主张对外强硬论及革新国内的荒木形成了对立。结果，前者的方针获得通过，宣布了下列大纲：

一、扶植与日本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满洲国”，使其健全发

展。

二、在安全不受威胁的限度內照顧財政狀況，力求充实国防。

三、外交方面，根据国际协调的精神，特别是对邻国——中国、美国、苏联，采取增进亲善关系的各种对策。

四、鑒于目前的国际关系和国内状况，在改革政治的同时，鼓励国民精神的振作。

虽然在五相會議上，荒木陆相的强硬論未被通过，但是这却意味着官僚陣营的进一步得势，同时也可以看出軍部获得了对一般国政的强有力的發言权。

繼五相會議之后，为了討論內政，特别是急不容緩的农村問題，在軍部的倡議下，召开了首相、大藏、內务、农林等八相参加的內政會議。荒木陆相指出，农村的貧困妨害了农村出身者約占80%的国軍的士气，而強調了救济农村的必要性，并由后藤农相提出了以減輕农村負担为重点的具体方案。但是，忙于筹措龐大軍費并尽量防止通貨膨脹的高桥藏相等却反对增加农村救济費，仍然提倡自力更生，因而發生了对立。會議于12月决定了振作农民精神、徹底發展农村合作組織、減輕农户負担、統制重要肥料、蚕絲对策方案等五項对策，但是关于其所需預算，高桥并没有給予保証，所以实际上會議并未取得任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后藤农相所代表的新官僚，却乘此机会与軍部合作，發展了自己的势力。一般說来，法西斯主义在其形成时期，总是提出反資本主义的口号，鼓动危机中苦悶掙扎的中間階層，使其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支柱，而在日本却把主要目标放在苦于农业危机的农村，荒木陆相和后藤农相的这一主張意味着，通过农村对策来阻止地主及自耕农階層的沒落，并爭取这些階層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但在內政會議上这种主張未被接受，而通过了高桥大藏相的自力更

生的路綫，這說明了一向以低米價、低工資作為有利條件的壟斷資本，是不肯輕易地對農民的要求表示讓步。也可以說，沒有受到工人、農民強有力的抵抗就走上發展道路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甚至不肯付出籠絡人民的釣餌。1934年1月，荒木陸相辭職，林銑十郎繼任。這是由於五相會議和內政會議的結果引起陸軍內部對荒木陸相有了不滿的原故。

帝國人造絲公司事件

五相會議、內政會議不要政黨參與決定國策的作法，自然要引起遭到排擠的政黨之間進行合作的活動。他們提倡“回到政黨政治的道路上來”，高呼“反對法西斯”，但實際上，這只是被排擠於政治舞台以外的政黨企圖適應時局來恢復自己勢力的一種嘗試而已。他們抓住在1934年度預算中由於軍費的龐大造成了財政緊張，因而壓縮了農村救濟費這一點，攻擊軍部，企圖將由於內政會議的失敗而引起的農民反政府氣氛引向軍部。對此，軍部發表了所謂“關於軍民離間的聲明”，進行反駁說：“最近就預算及其他問題，有不少人肆行離間軍民關係。例如：把1936年的危機說成是為了軍部的利益而制造的宣傳；或者說以往在戰爭中陣亡的都是平民百姓，而高級指揮官中沒有陣亡的；或者說農村問題成了軍事預算的犧牲品，等等；對於這種挑撥軍民關係的活動，軍部絕不能置若罔聞”。看來，政黨似乎拋棄了奉承迎合軍部的態度，而提出了獨自的主張。實際上這些政黨的政策，和走向戰爭的政策並沒有不同之點，他們的野心很明顯地只不過是為了爭權奪利而已，因此，政黨的合作運動从一开始便孕育着分裂的因素。

在考察政友會和民政黨這樣大政黨的動向上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黨的有力的靠山壟斷資本的態度有了變化。如前所述，財閥們通過軍事生產，加深了它們與國家財政的結合，同時也加強

了同軍部、官僚之間的关系。而且，对于社会輿論的非难，它們也有了“自肃”这样一个口实，这就使得它們与政党的关系逐渐疏远了。据三井的池田成彬說，繼 1932 年选举之后的 1936 年选举起便停止了对政党的捐款(財界回顧)，这种傾向在当时就已經产生了。因此，失去了經濟背景的政党，力量不能不削弱了。但是，这种情况並沒有削弱財界对政治的發言权。財界放弃了單純利用政党的道路，它反而扩大了对政治的影响。以財界的头面人物乡誠之助为首，并有永野护、長崎英造、小林中等財經界人士参加的“番町会”，这个时期在幕后政治上起了很大作用，便是一个例子。

总之，以这种財界的动向为背景的政党合作运动存在着两条路綫，其一是政友会的鳩山一派与民政党的町田、賴母木等互相合作的旧有路綫；另一条是以新兴財閥为背景而抬头的政友会的久原与民政党的富田、俵合作的路綫；这两者的关系还是对立的，而后者代表着更为接近法西斯的路綫。这样，政党合作运动不仅沒能提出一个統一的强有力的主張，反而引起了政党内部的斗争，导致了政党的分裂。政党合作运动，由于 1933 年 12 月以“番町会”为背景的中島久万吉商工相从中斡旋，有了某些进展，但政友会的久原派及右翼，在六十五次議會中对于政党合作运动，进行了不断的攻击，于是，倒閣运动也活跃起来了。头一个遭到攻击的是中島商工相，貴族院的菊池武夫(后备役陸軍中將)抓住中島的旧著“足利尊氏贊美論”而进行了攻击，中島終于辞职；接着，鳩山文相也因为久原派的議員岡本一巳所揭發的紀律問題而辞职了。接着，帝国人造絲公司的事件也被揭發出来，被視為斋藤內閣的后台的“番町会”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这个帝国人造絲公司原是造成金融危机根源的鈴木商店的子公司。在危机發生后，台灣銀行作为鈴木的債权担保，持有二十二万帝国人造絲公司的股票，后来鈴木商店总

經理金子直吉等預料到股票的漲价，就想購進這批股票，而托“番町會”的成員們代為斡旋。這次購買股票是成功了，但在購買過程中，在購買價格問題上競買者之間發生了紛歧，未买到手的人認為其中有行賄和受賄的行為而進行攻擊，掀起了一個很大的貪污案。台灣銀行和帝國人造絲公司的首腦和“番町會”有關人員以及大藏次官黑田英雄等人，都陸續受到傳訊，並流傳着中島、鳩山、三土等前內閣和現內閣的閣員也與此案有關的說法。從這個事件後來被宣判無罪這一點來看，當時有人企圖利用這一事件進行倒閣活動，把這一事件甚至宣稱為司法界的法西斯主義。不難推想，在檢察官員的背后有奪取後任內閣的司法界元老平沼騏一郎位置的企圖。平沼派與齋藤內閣之間的鬥爭是由來已久的。在此以前即 1934 年 5 月，樞密院議長倉富勇三郎辭職時，預料將由副議長平沼騏一郎升任，但是與這種預料相反，齋藤首相受到西園寺的指示，任命了前宮內大臣一本喜德郎為樞密院議長，加強了宮廷重臣的勢力。隨後，在六月間又把和伊東已代治、平沼等共同形成樞密院的中心勢力的二上樞密院書記官長調任行政裁判所長官，從而瓦解了平沼的勢力。

但是，如前所述，企圖打倒齋藤內閣的策謀，雖然在議會中受到政友會多數派力量的壓制，暫告平息，但在議會中出現的相互漫罵和攻擊，使得漸有起色的政黨的威信重新掃地了。隨着對帝國人造絲公司事件的調查工作的進展，勢必追究到大藏相的責任問題，因此，齋藤內閣終於不得不在 7 月 3 日宣布辭職了。

齋藤內閣是在政黨衰退時期，代替政黨內閣而組成的第一個舉國一致的內閣。從這個內閣成立的情況來看，它是糾合龐雜的政治勢力——重臣、政黨、官僚、軍部等——組織起來的大雜院式的內閣。因此，這個內閣總是不斷由於內部對立而不斷地發生動搖，始終未能提出其獨自的政治方針，而且也沒有推行這種方針的

政治力量。結果，在各种势力牵制之下，未能前进一步，最后，一方面是迴避了五·一五事件后政局的突变、一方面則起了使政局逐漸轉向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消極作用。而且，它在形势面前所表現的这种被动态度，給予人們一个“过渡存在”的印象，它一面受到急进法西斯势力的非难和攻击，同时还被当作了發展法西斯势力的一个跳板。

軟弱无力的岡田內閣

齋藤內閣总辞职后，元老西园寺根据原定計劃，召开了重臣會議，討論繼任首相的人选問題。在會議上，和西园寺交换过意見的齋藤首相推举了预备役海軍大將岡田啓介为首相候补，然后經西园寺的推荐，岡田就受命組閣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岡田內閣在很大程度上是齋藤內閣的延續。其所以选中了岡田，是为了准备应付 1935 年在倫敦举行的修改海軍裁軍条約會議，其次，前內閣的垮台是由于違法乱紀問題，所以这次必須选出一个与此无关的人物。西园寺对岡田在处理 1930 年的倫敦条約問題时所显示的政治手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岡田以前任齋藤內閣的后藤农相和河田拓务次官为組閣參謀着手組閣工作。首先决定使前內閣的陆、海、外三相留任，随后决定任命后藤为內相，前內閣藤井大藏次官为大藏相，小原东京高等法院院長为法相，在这些重要职位上都安置了官僚以后，才向政民两党提示了大臣的职位和名單，邀請参加內閣給予协助。民政党接受了这个邀請，派町田忠治、松田源治参加內閣；而政友会則拒絕給予协助，不过，政友会中反鈴木派的床次竹二郎等三人却不顧政友会的开除处分强行参加了內閣。从組閣的經过来看，岡田內閣显然具有濃厚的官僚色彩。同时，这种官僚势力的擴張是在“澄清政界、肃正官紀”的名义下實現的。齋藤內閣虽称为举国一

致的內閣，但沒有政治勢力為其基礎，內閣的政策仍不免搖擺不定。這個進一步加深了官僚色彩的岡田內閣，由於官僚內部的不統一，因而這種缺陷更為突出，隨著政局的糾紛，很快地就暴露了它的脆弱性。

岡田內閣在組閣期間，接受了陸、海軍對他提出的強硬要求。海軍的要求是對於裁軍會議採取強硬態度和廢除華盛頓條約；陸軍的要求是改革在“滿”機構。

曾經在日本引起統帥權問題的倫敦海軍裁軍條約到1936年滿期，規定在期滿的前一年再召開一次倫敦會議，以便協商修訂問題。海軍從組閣的一開始，便主張廢除華盛頓條約，並主張爭取在總噸數上與美國平等，為了貫徹這一主張，還玩弄了種種手段，例如通過軍令部總長伏見宮直接向天皇陳述意見，以及召開海軍首腦部會議等等。岡田內閣反對將對方顯然不能接受的提議帶到會議上去，為此曾一度考慮更換海軍大臣，但究竟抵抗不過少壯軍官的壓力，而對海軍方面作了讓步。其結果，在同年十月召開的倫敦會議上，日本主張規定共同最大限額，而美國則主張按比例加以限制，於是雙方發生了衝突，雖經英國居中調解，但未能使雙方意見趨於一致，會議終於宣告休會。在裁軍會議的背后，美國和其他各國都在加緊推行造艦計劃，以期在裁軍會議上佔據有利地位。日本政府向美、英、法、意四國提出照會，要求共同廢除華盛頓條約，但是遭到了一致拒絕，至十二月底，日本政府發出通告單獨廢除華盛頓條約。

陸軍提出的改革在“滿”機構問題，歸根結底，是要把所有在“滿洲”的日本政治和行政機構完全掌握在陸軍手里。到當時為止，日本在“滿”機構，實際上是採取了由一人兼任關東軍司令官、駐“滿”大使、關東州長官的過渡形式，改革機構問題一直是個懸案。到了這一年的九月，內閣會議終於通過了陸軍的方案。這次

改革的内容是把有关日本在“滿洲”的一切事务由外务和拓务两省分別移交給內閣直屬的对“滿”事務局，并撤消关东州長官，在駐“滿”大使的管轄下另設关东州厅長官，由关东軍司令官兼任駐“滿”大使。同时，一切警察权、包括南滿鐵路附屬地的警察权在內，也統归軍部掌握。从經濟上来看，軍部获得了自从提出滿鐵改組問題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对南滿鐵路的监督权，这一点是有重大意义的。对“滿”事務局在1934年12月成立，总裁由林陆相兼任。这次在“滿”机构的改組，是在制度上肯定了由陸軍掌握对“滿洲国”的“指导”权和关东州、“南滿鐵路”附屬地等的行政权，也是容許軍部管理一般行政的开端。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曾遭到了拓务省官吏、特别是关东厅警察官的猛烈反对，这一点也表明了內閣政治力量的軟弱。

与此事大約同时的10月1日，陸軍省的新聞組發行了以“国防的意义及其强化”为題的所謂陸軍小冊子。在小冊子的一起首就說：“战争是創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国防’是国家壮大、發展的基本动力”，主張国防的优越性和建設“国防”国家的必要性，并进一步說明，为了应付緊張的国际形势必須扩充軍备，必須采用統制經濟和救济农村和漁村。这說明軍部已經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准备登上政治舞台，它主張在內政方面也要貫徹建立广义的国防和建設“国防”国家这一方針。但是，已于年初召开的第六十五次議会上，由于軍部發表了关于离間軍民的声明，政党方面曾就扩大軍事开支和救济农村、漁村之間的关系进行了追究，結果陆海軍委员会与軍部的声明相反，不得不承認軍費开支完全流入重工业部門的壟断資本手中，不仅农村无分，就連中小企业資本家也很难均沾到一点。

由于軍部的得势和貫徹了它的要求，1936年度的預算中軍費有了显著的增加，陆海軍省的經費达十亿零二千余万日圓，占岁出

總額的 46.6%。因考慮到軍費的激增和通貨膨脹的危險，從這一年起，農村救濟費被取消了，對於 1934 年的關西風水災和東北的霜凍災，也未能採取充分的對策。在這期間，藤井藏相代表金融資本家的利益，想盡量維持健全財政的方針，主張對戰時產業征收臨時利潤所得稅，結果遭到了閣員的激烈反對。藤井藏相就在編制這個困難的預算途中死去，由前任大藏相高橋接任。從這時期起，政民兩黨的合作又復活了，它們在 1934 年 11 月召開的第六十六次議會上，猛烈地攻擊了軍費偏重的跛足預算和對於救農救災對策的輕視。但是兩黨仍然不能一致對政府採取堅定的態度，政友會也沒有拚着解散議會也要鬥爭到底的勇氣。雖然如此，在議會閉會以後，岡田內閣的脆弱性更加暴露出來，齋藤內閣曾被評為“動作遲緩”，而岡田內閣則被評為“沒有動作”。這個內閣所以能夠維持下去，不過是由於軍部想通過它來貫徹自己的要求而已。

天皇機關說問題

1935 年，發生了天皇機關說問題，這一問題成了當時在逐漸尖銳化的政治上各種對立的焦點。所謂天皇機關說，就是美濃部達吉在明治末期，因反對當時社會所公認的天皇主權說而提出的憲法上的一種學說。明治憲法第四條規定是：“天皇為國家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並依據憲法之規定行使之”。在解釋這一條上面，天皇機關說否定了天皇為統治國家的主體（天皇主權），主張統治權屬於國家，天皇應作為國家最高機關而行使統治權。因此，天皇機關說否定了國家統治權單獨屬於天皇，雖然不夠徹底，但卻構成了政黨內閣制的理論基礎，同時還強調了天皇行使統治權並非毫無限制，而應受憲法的約束。在這一點上，天皇機關說是反對旨在鞏固軍部和官僚在國家機關中的專制地位的天皇主權說，而承認以代表國民為出發點的議會應有自己的地位和權能，這個學說

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以后的宪法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对天皇机关说的攻击，原来是意味着军部与官僚势力对于议会势力的攻击，但在实际上，由于这件事和当时的局势纠缠在一起，因而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内容。

这个问题，是由于陆军中将菊池武夫在第六十七次议会开会期间在贵族院里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而美浓部达吉又对此进行了反驳而引起的。在最初，就连林陆相也曾说过：“美浓部博士的学说，经过数载的传播，没有给予军部以不良影响的事实”，这个学说并未成为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被贵族院的国粹主义者和对岡田内阁抱有强烈反感的在野党政友会提出来以后，就形成了攻击政府的焦点，军部也公开地对天皇机关说展开了攻击。在使这个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上，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分发了十五万册攻击天皇机关说的小册子的全国在乡军人会所起的作用。象上述这样一个脆弱的政府，当以军部为中心的各种势力加强了攻击以后，一面附和着这种攻击，一面却又极力想把问题敷衍过去。天皇机关说问题的发展掀动了政局，其结果，引起了4月间的禁止发售美浓部博士的著作和对美浓部博士加以处分的问题，以及政府在8月和10月先后两次发表关于明确国体的声明的问题。问题所以这样越闹越大，一则因为政友会和军部中的急进派企图借此问题进行倒阁活动，二则因为当时的一木樞密院議長、金森法制局长官被认为是天皇机关说的信徒，所以平沼一派就想利用这一问题来打击一木以及重臣们。这些企图均未得到成功。不过，作为压迫言论自由和发展法西斯的手段，它们倒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天皇机关说问题，进一步又与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纠缠到一起，演变得更加复杂了。对于天皇机关说问题的扩大，在陆军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是和荒木同为皇道派巨头的真崎甚三郎教育总

監，眞崎甚三郎向全軍發出了关于明确国体的訓示，因此受到了政府和重臣方面的嫉視。7月，眞崎与林陆相之間發生对立，林迫使眞崎辞职，其結果，林在閑院宮參謀总長的支持下获得胜利，更換了教育总监。这样一来，皇道派即認為林勾結重臣、官僚、財閥而撤換了眞崎，認為这是沾污“皇軍”，侵犯統帥权，結果在8月發生了相澤中校刺杀統制派的智囊永田軍务局長的事件，林陆相因而辞职，由川島大将繼任。这种軍部內部的对立，后来發展成为二·二六事件。

与此同时，作为日本經濟窘困的一种反映，在編制預算时發生了尖銳的对立。九·一八事变后，每当編制預算时，站在金融資本家的立場上想維護“合理”財政的大藏省的官僚与要求扩大軍事开支的軍部之間，就要發生尖銳的对立，而总是前者受到后者的威逼，同时这种傾向是愈演愈烈了。1935年11月，討論下年度預算的內閣會議由于爭執不得进展，第三天會議竟徹夜举行。陸軍在当晚發出威胁性的声明說：“此次陸軍的預算是有关对完成目前我国全部国防責任和建立不可缺少的、永久性軍备的基础事項。对于陸軍真正从国家和国民利益出發的以往和現在的預算要求，如果有人說軍部如再无理坚持下去的話，恐怕要惹起国民不滿云云，这應該說是在国民面前肆意誣蔑軍部”。从这一方面也使政治上的矛盾更加深刻了。其次，在1935年12月召开的倫敦裁軍會議上，日本代表坚持既定的共同最大限額的原則而退出了會議，从而投入造艦竞赛，这也加深了內部的矛盾。

岡田內閣的加强

政局的糾紛表現在天皇机关說這一問題上，說明了当时的政局正处于攻守双方僵持不下的状态。对此，岡田內閣也未能提出任何積極的对策，只是設法加强內閣。1935年5月設置了內閣审

議會和內閣調查局一事，便是這種加強內閣的第一次嘗試。然而，這不僅是加強內閣的措施，同時也是隨著統制經濟的進展和開始走向“國防”國家以後的必然要求。審議會是對重要政策進行調查和審議的諮詢機關，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包括重臣、貴族院、政黨、財界的代表的一個純政略性的機關。岡田內閣在拉攏財閥的代表池田成彬（三井）和各務謙吉（三菱）參加內閣的工作上是成功了，但這時還未能得到政友會的支持，只是望月圭介等人退出政友會參加了審議會而已。對以後的政局發生了影響的還是它的事務局，也就是以後發展為企劃院的內閣調查局。

這個內閣調查局，是由各省的調查官組成的以官僚為中心的政策參謀本部性質的機構。長官是內閣書記官長吉田茂，擔任調查官的是鈴木貞一（陸軍）、山田龍雄（大藏）、和田博雄（農林）、奧村喜和男（遞信）。在這裡，中級官僚同校官一級的軍人在一起研究了國策，這對以後的統制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到了二·二六事件以後，在廣田內閣制定戰時體制政策上面，這些人異常地活躍了。

作為官僚內閣的岡田內閣，想單靠“澄清政界”這樣的消極口號來表明它的存在意義。它在這一方面所採取的實際行動，就是取締暴徒幫和整頓選舉。取締暴徒幫是從1935年開始的，這個措施的特点是，不是單純地依靠警察，而是作為內閣的方針來執行的。這樣做，一方面是要對趁着天皇機關說問題而開始猖獗起來的右翼團體加以統制，另一方面也企圖炫示官僚內閣的中立性。暴徒幫與政黨之間是有着不可告人的關係的，它們在選舉時多半充當政黨的工具有，政党内閣對於它們是不可能徹底加以肅清的。因此，官僚內閣採取的這種措施固然也受到了社會上的贊揚，但同時，這也意味着掌握國家權力的官僚統治，向下層群眾中間的滲透。其次，由後藤內相倡導的整頓選舉運動，是在各府縣設置選舉整頓委

員會，舉行懇談會、講習會等宣傳活動，以期整頓選舉。但是，這個委員會的會長是縣知事，中央的整頓選舉聯盟的首腦是前首相齋藤，委員由各府縣廳的官吏、審判官、檢查官、市鎮村長和校長等擔任，因而官僚色彩十分濃厚。官僚勢力大約是想通過整頓選舉來爭取群眾和軍部的支持，並使政黨在受到“澄清”以後再度發展，然後再利用政黨和軍部來鞏固自己的勢力。

政友會想在 1936 年 1 月召開的第六十八次議會中就明確國體問題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但政府卻在它還沒有提出以前就解散了議會。由於隨着整頓選舉而來的取締的加嚴和政、民兩黨感到組織政党内閣的不可能等原因，使得競選鬥爭並不尖銳，以致這次大選氣氛低沉，2 月 20 日舉行選舉的結果，各黨派所得的議席：“民政黨二百零五席、政友會一百七十五席、昭和會（以政友會脫黨者為中心組織的）二十席、社會大眾黨十八席、其他無產者各黨派六席、國民同盟十五席、國家主義團體三席、中立派二十六席，民政黨取得了勝利。其中，社會大眾黨的發展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儘管它受到整頓選舉的影響，但並沒有遭到政府露骨的壓迫——不僅沒有壓迫，據說首相秘書官迫水還向麻生久提供了選舉經費（岡田啓介：回憶錄）。這是由於政府鑒於國民不滿法西斯勢力的發展，因而對這個最大的合法的無產者政黨有所期待，雖然這個政黨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領導幹部在法西斯主義面前還表現着動搖和走向反動。

第三節 “非常時期”的體制和壓制言論

工农运动的低潮

正如在九·一八事變的過程中所預料到的那樣，日本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各種矛盾以及作為它的基礎的農村的危機，愈來愈尖

銳了。在工人階級鬥爭的同時，在農民運動方面，也展開了深刻的佃農的鬥爭。特別應該注意的是，中小企業中沒有組織的工人也起來參加了罷工鬥爭；而農村中的土地鬥爭的浪潮不僅有貧農參加，而且還把中農階層也卷進來了，他們高喊着“不得土地毋寧死”的口號，進行了鬥爭。與此同時，由於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為實踐“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國際綱領而展開的反戰鬥爭當然也就迅速地加強了。

工資水平表				勞動鬥爭件數及參加人數表		
年 次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零 售 物 價 指 數	實 際 工 資 指 數	年 次	件 數	人 數
1930	100.00	100.0	100.0	1932	870	53,338
1931	92.0	87.1	105.3	1933	598	46,787
1932	89.4	88.0	101.5	1934	623	49,478
1933	90.4	94.6	95.5	1935	584	37,650
1934	92.9	95.7	97.0	1936	546	30,857
1935	92.8	97.5	95.1	1937	628	123,730
1936	93.0	102.6	90.6			
1937	98.0	112.2	87.2			

（根據梶西光速、大島清、加藤俊彥、大內力等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統計年鑑）

然而，如前節所述，由於事變的進展發生了軍需通貨膨脹，資本家獲得了龐大利潤而把殘羹分給了工人，這樣，仿佛使工資稍微有所提高，使失業者有了就業的機會。不過，名義工資的提高，遠遠低於物價的上漲，反而勞動時間被延長，實際工資被降低；新就業的失業者多半是作臨時工，工資也非常低，並且工作條件也是不安定的。雖然如此，這種情況在沒有組織的工人的腦子裡，還是引起了景氣恢復的幻想。再加上政府加強了鎮壓和工會幹部中改良主義者的動搖，因此在1932年以後，工運的攻勢逐漸衰退了。這就是說，鬥爭次數和參加人員，除了1937年以外，逐漸趨向減

少，而工会的組織率也从 1933 年以后急剧下降了。与此相反，由 1934 年东北地方的大灾荒所反映的农业不景气，虽在軍需通貨膨脹中仍然繼續着，并产生了严重的事态，佃农的斗争和参加人数从 1932 年到 1935 年之間，逐年都有增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农全国會議，以發動索取政府存米的斗争，把缺米的貧农組織起来，并与日本消費合作联盟在城市中發動的“要米斗争”相結合，一时形成了很大的声势，通过这次斗争，暴露了政府大量囤米和資本主义的对外傾銷的真象。

然而，如前所述，工人运动的衰退进而阻碍了农民运动的發展，虽然佃农斗争的件数逐漸有所增加，而每一次斗争的参加人数却有减少的趋势，还逐漸地趋向于分散的、小規模的斗争。这种情况，給利用农民的反資本主义情緒而标榜反动的农本主义的右翼运动，以及把佃农与地主在土地問題上的糾紛說成是“土地飢饉”問題而主張用对外擴張来求得解决的国家主义运动，提供了掌握地主以至中农阶層、把农村变成法西斯势力的地盘的机会。

工农运动如此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进步政治力量的动摇和分裂。1934 年，社会大众党在題为“国防的意义及其强化”的陸軍小册子事件中暴露了法西斯主义者的真面目。麻生总書記宣称：“日本的国情促使軍隊和无产階級在打倒資本主义的社会改革中，必然实行合理的結合”，公开地支持了陸軍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該党領導人物并說：“工会应尽量避免罢工，为此必須含泪忍受削減工資，使三十人被解雇的止于二十人被解雇，”（西尾末广在議會上的演說），他还強調在“非常时期”的“勤劳奉公”和“产业报国”。在他所屬下的总同盟，从階級協調主义思想更后退一步，变成了御用工会，它和日本工会联合会、海軍劳动联盟、东电爱国同盟、邮遞員同盟等当时陸續产生的以日本主义为招牌的右翼国家主义的团体，共同支持了无产階級政党的右傾。領導农民运动的主要組織

全日本农民协会，亦在 1931 年脱离了左派而向右轉(左派結成全农全国會議)，并且在 1934 年的第七次大会以后，几乎陷入了停止活动的状态。

政府的鎮压越来越凶，白色恐怖的猖獗达到了極点；以“非常时期”为借口，誣蔑和工农运动有关的人士为不奉行国策者、无爱国精神者，以国賊对待，予以非法逮捕，进行惨无人道的拷問，岩田义道、小林多喜二等人就是在这样迫害下牺牲的。在这以前，破坏了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特务組織，后来又把魔爪伸向工农救援会、共产青年同盟等外圍团体和日本工会全国協議会、全农全国會議等的下級組織，以及日本无产者文化联盟等文化团体。但是，对于共产党來說，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佐野学和鍋山貞亲的变节。

佐野学和鍋山貞亲的变节

1933 年 6 月，拘押在獄中的佐野和鍋山二人，在上訴公审中發表了一个“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的声明書。这一声明的要点是：“日本共产党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看来似乎革命而实际上有害的廢除君主制的口号，这是根本的錯誤”，并主張脱离共产国际。这种变节的理論，否認了革命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它在說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同时，抹煞階級斗争，主張民族統一。这些主張必然导致放弃对天皇制的斗争，正如佐野所說的“促使我改变主意的动力，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战争形势”（《与共产国际诀別》，“改造” 1933 年 8 月），这意味着向法西斯主义投降。佐野是知識分子出身，鍋山是工人出身，同是負有众望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一，正因为如此，这个声明給了当时的人們以極大的聳动。接着，三田村四郎、高桥貞树、中尾和風間丈吉等也紛紛表明变节，这样，就开始了所謂变节时代。根据司法省行刑局的統計，从佐野、鍋山声明变节以后，到下个月的月底为止，和治安維持法有关的变

节及脫党分子，在未判决的一千三百七十名中有了四百十五名，在已判决的三百九十三名中有了—百三十三名之多。出现了这么多的变节分子，多半是以健康恶化，家庭观念和生活困苦等为理由，实际上是經不起慘酷的拷問和長期拘押生活的考驗，同时，也是在随着战争而来的鼓吹民族主义思想以及皇室的历史傳統等等“理論”的迷惑下开始变节的。司法当局根据变节与否作为量刑标准的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些变节分子不管是有意識的变节还是无意識的逃避斗争，所有这一切匯集起来，形成了一个麻痹良心的風潮。如河上肇博士一边流露着出卖良心的苦恼，肯定自己是阶级斗争的逃兵，一边却还是向当局表明脱离革命，这件事引起了人們很大的同情，但是，他的内心即使是誠懇的，反而因此使人感到变节似乎是无法避免和迫不得已的，而容忍这种行为，因此他仍然是起了消极作用。在这个时期，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不仅受到外来的打击，而且由于内部的涣散，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从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納普)到日本

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克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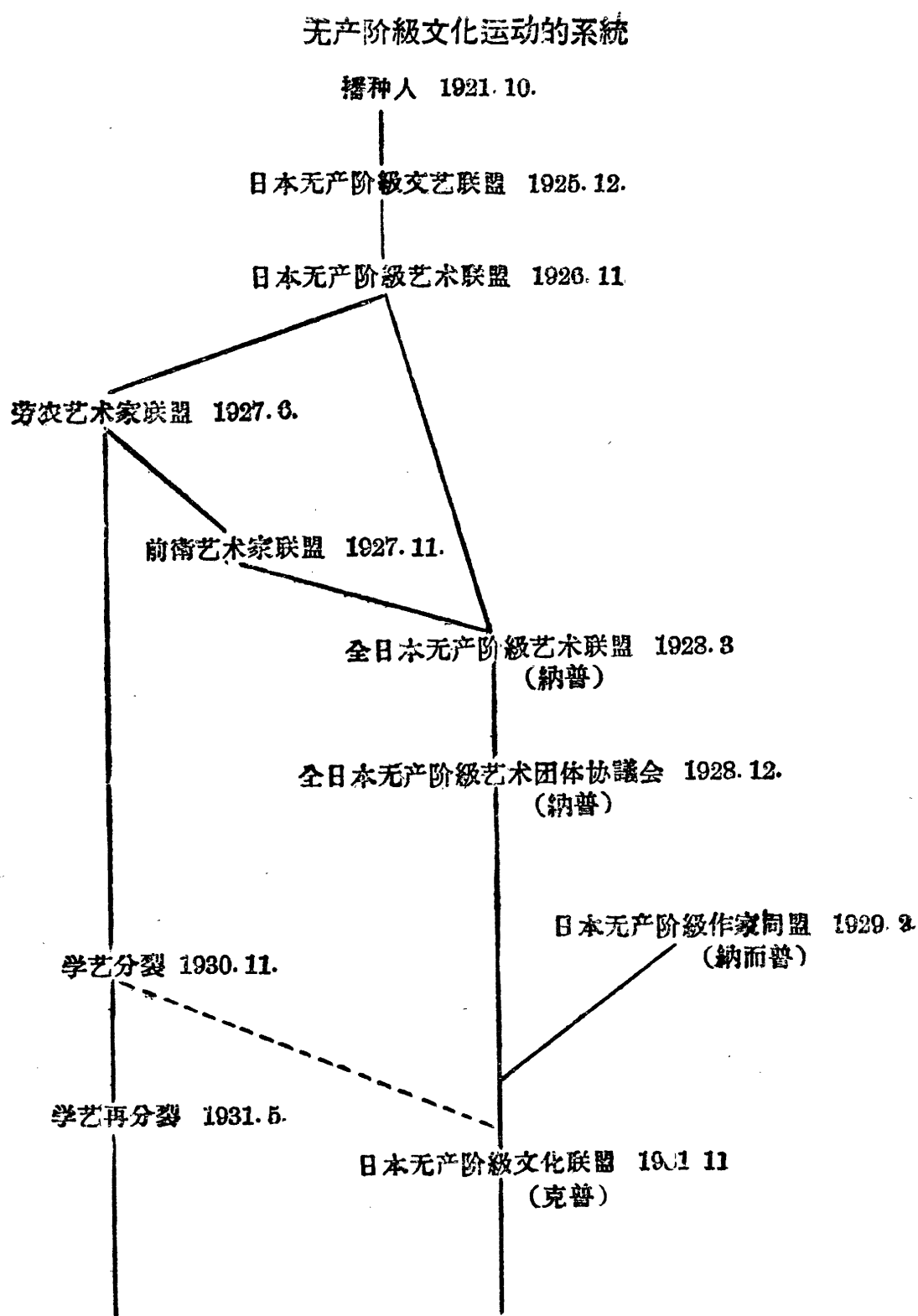
无产阶级文学界的变节情况，受到了报刊上大張旗鼓的宣揚，使人們感到知識分子失败了。在介紹这个問題以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在 1928 年的三·一五事件后，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立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經過情况。以“把无产阶级艺术帶給全体无产者”为任务的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把“无产阶级艺术”和“前衛”加以合并而創刊了“战旗”，在这个刊物上陸續發表了在理論方面和創作方面的指导性的意見。这个机构分为文学部、演剧部、美术部、音乐部、电影部、出版部等六个部門，至同年 12 月实行改組，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協議会”。所屬各部門从次年年初起，分別改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日本无产阶级剧

場同盟、日本无产階級美術家同盟、日本无产階級音樂家同盟、日本无产階級電影同盟等，并开始了活动，它們以“艺术运动布尔什維克化”为目标，倡导唯物辯証的創作方法的理論，而与当时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傾向的工农艺术家联盟举办的“文艺战綫”相对立。1930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工会国际第五次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階級文化及教育組織的作用与任务的綱領”，出席此次大会的全日本无产階級艺术团体協議会的领导人藏原惟人于1931年3月回国后，發表了“无产階級艺术运动的組織問題”（彙入“艺术論”一書），在法西斯風暴的襲击下，批判了以往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活动方針的非政治性和文化主义傾向，以及它同法西斯进行斗争的軟弱无力。这个理論被采納为此后无产階級文化运动的基本方針。早在1930年4月發表的“全日本无产階級艺术团体協議会的艺术家的新任务”一文中，藏原就要求加盟艺术家必須建立起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不同的、明确的“共产主义观点”；又在1931年9月發表的“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一文中，坚决主張不應該采取“与无产階級及其政党需要毫不相干的題材”。这样，无产階級文化运动就明确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环了。接着，从1931年7月到8月，在屬於全日本无产階級艺术团体協議会的各同盟外，又有无产階級科学研究同盟和日本无产階級世界語使用者同盟，作为科学团体参加进来，成立了“无产階級文化联盟中央協議会組織發起人会”，在11月，解散了全日本无产階級艺术团体協議会，重新成立“日本无产階級文化联盟”，創刊了机关刊物“无产階級文化”。这个联盟作为和无产階級文化运动統一的協議机关而开始了活动，并制定了以下的章程：“（1）同資产階級、法西斯主义者及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动文化作斗争；（2）系統地啓發和教育工农及其他劳动者，使其認識到自己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3）滿足工农及其他劳动者在文化生活上的需要；（4）建立以馬克思列宁主义

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化。”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地实现他们的运动方针，便遭到了 1932 年 3 月的大镇压，藏原、中野、洼川等属于中央组织的有四百多人被捕入狱。宫本显治、小林多喜二虽转入地下继续活动，但在接连不断的镇压中，组织遭到破坏，更由于治安维持法的修改，开展运动越发困难了。自成立以来大约经过了三年，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散，但被迫停止了活动。

反战作品

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在接连不断的镇压的风暴中，坚持了反法西斯、反战的文化斗争。他们发表了許多反战作品，有在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成立中起了媒介作用的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盟所编辑了一部反对军国主义的创作集“反对战争的战争”(1928 年)，在那以后的 1929 年，黑岛传治又写了一篇“反战文学论”(收在“无产阶级艺术教程”第一辑)，阐明了无产阶级反战学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又陆续产生了一些反战反军国主义的作品。在上述创作集“反对战争的战争”中，有一篇“一个士兵的震灾笔记”；想借此来暴露日本军队的实况的越中谷利一，另外还写了“一个士兵多仲的死”、“等在后面的人”等反军国主义的作品。写了“军队病”(1928 年 5 月“战旗”)的立野信之，另外还留下了“成了靶子的那个家伙”、“豪雨”、“红色的天”等作品。1933 年在筑地警察署被杀害的小林多喜二，在“蟹工船”(1929 年 4 月 5 日的“战旗”)一书中，一方面描写了殖民地渔业工人，同时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国领海进行强盗式侵略的野心。此外，黑岛传治在“列丽雅和馬露霞”(1929 年)、“雪的西伯利亚”、“雪橇”、“盘旋着的鸦群”(1927 年)、“冰河”(1928 年)、和“栗本的负伤”等作品中，通过作者本人作为一个被



征兵士派到西伯利亚作战的亲身体验,暴露了日本军队的实况,这些作品与描写济南事件的长篇小说“武装的市街”一样,都是反对战争和强烈憎恶军队生活的、感人至深的作品。

黑島的“反战文学論”和小林多喜二的“战争和文学”（1932年登載于“东京朝日”）显示了反战文学理論的出色成就。然而，当时的反战作品和許多的反战詩，同其指導理論之間有着相当的距離。其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无产階級文学在九·一八事变后陸續不断的大規模鎮压的面前，不得不从積極的反战言論轉向“同反动化的資产階級文学作斗争”。

文学以外的其他各个文化部門的反战活动，也是以日本无产階級艺术联盟战綫为中心而展开的。1928年分裂为屬於劳农艺术家联盟的前衛座（后改名为前衛劇場）和屬於日本无产階級艺术联盟的无产階級剧团，在全日本无产階級艺术联盟統一战綫成立的同时，重新合并，作为全日本无产階級艺术联盟演剧部，組成左翼劇場，在筑地首次公演了村山知义的“依旧是奴隶”和鹿地亘的“暴风雨”。以后左翼劇場在1928年9月为了紀念无产階級新文化运动三周年，在报知礼堂公演了“山”、“父”（久板荣二郎）等剧；为了紀念十月革命，准备在10月底公演“曙光号巡洋艦”（阿芙乐尔），但是遭到了禁止，于是改以流动劇場的形式到各地展开了活动。1929年，日本无产階級艺术联盟改組时，以左翼劇場为首的全国无产階級剧团，成立了以参加劇場演剧的單位为成員的全国性組織，即日本无产階級劇場同盟。而且在成立大会上，明确地提出了無論是公演、流动劇場还是朗讀等形式的群众性的演剧活动，都应以“拥护工农国家苏联”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准则。这样，在1929年左翼劇場作为“五一”公演，在上野公园演出了“怒濤”、“沒有脚的馬丁”，接着从6月到7月間，演出了村山知义的作品“战綫”（佐野碩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并奠定了运动的方針，于是，在10月間向当时的三个进步剧团：心座剧团、筑地小劇場和新筑地剧团倡議，成立新兴剧团協議会。由于实行互助的結果，当心座要上演“装甲列車”而遭到禁止时，左翼劇場全体动員起

来給以支持,再次上演了“前綫”。筑地和新筑地两个剧团,在左翼剧場的支援下,竞演雷馬克的“西綫无战事”,热烈地向观众进行了反战的呼吁。此后,日本无产阶级劇場同盟,采取流动剧場的形式,向全国範圍内展开了活动,演出了“暴徒帮”、“胜利的記錄”(知义)、“沒有太阳的街”(德永直)、“不在地主”(小林多喜二)等,但是,随着形势的恶化,反战的性質逐漸衰退下去,到了1934年左翼劇場解散以后,反战的演剧活动几乎絕迹了。在法西斯体制的极端困难的局面下,只有新协剧团上演了久保荣的“火山灰地”(1938年6月),这算是勉强地承繼了上述的革命傳統。

在电影方面,1929年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組織了流动放映队并进行了活动,可是並沒有进行过一次称得起划时代的反战电影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演剧的影响之下,电影界从1929年到1930年之間,攝制了一些帶有左翼色彩的电影。(内田吐梦导演的“活的人偶”、沟口健二导演的“都会交响乐”、鈴木重吉导演的“是什么使她这样”等等。当然,这些影片是“改良的”资产阶级性質的东西,不可能具有反战的性質。)此外,在当时的严格檢查下,被允許公演的苏联电影“亞洲風云”、“前綫”、“土西鐵路”等,給予了日本人民以难忘的印象。

其次,在美术方面的情况是这样:1929年2月,以“克服反动的美术”和“以美术为武器进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作为綱領而成立的日本无产阶级美术家同盟,在全国各地組織流动性的美术展覽,以举办无名画家展覽会的形式进行反正統派的斗争,举办无产阶级美术大型展覽会,在无产阶级报纸上和“战旗”杂志上开展漫画活动,編輯出版无产阶级漫画和小型插图集,举办統計图表和宣傳画展等,積極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把大量的反战、反軍国主义的漫画送到群众的面前。例如,柳賴正梦在无产阶级报纸上發表了大量的漫画,受到工农群众的欢迎;其中,有很多反战、反軍

国主义的优秀作品，反映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阶级斗争，这些作品一直流传至今。特别是以“入伍”（“劳动报”65期，1927年1月）、“伪装维持世界和平的裁军会议”（“劳动报”71期，1927年2月）、“工农支援谁？日本帝国主义在覬覦什么？”（“劳动报”77期，1927年4月）、“呸！这个军阀政治”（“劳动报”88期，1927年6月）、“怪物徘徊今天地暗”（“劳动报”116期，1927年10月）、“反对压迫！”（“劳动报”142期，1928年3月）等为中心的反战漫画，都是以雄健的笔法暴露了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并强调向它作斗争的优秀作品。此外，还有如下的反战宣传画：“工人在劳动”、“他是甲种合格”、“工人士兵的肖像”、“演习（附有说明语：‘一天一角二分，两年！’）”、“退伍即失业”、“……农民在劳动”、“青年训练所”、“老农妇在沉思”、“老太太在流泪”（附有‘儿子被抽走以后怎么办？’的字样）”、“军费大袋吞进农民的捐税（附有‘另外还得纳税’的字样）”、“农民士兵的肖像”、“……资产阶级用船满载士兵送往战场（附有‘开战了！’的字样）”、“士兵成了炮灰（附有‘被迫去打中国兄弟和打工人农民的俄国’的字样）”、“后果就是无数的坟墓、坟墓、坟墓……（附有‘所以工人必须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不过，也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字样）”、“互相携着手的工人和农民”、“塞住炮口”、“挺立着的工人与农民”等等。就这样地把各种场面按照一定的次序组织成一个系统来表达反战的意志，同时，也反映了群众反战运动的方向。

在这些漫画中，一般说来，各个部分里都出了一些优秀的反战反军国主义的作品，但是由于没有建立起明确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以不久便流于形式，走上说明画的倾向。

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失败

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尽管有了这样辉煌的成就，但也无法掩盖

它的弱点。这就是在理論指導上犯了急性病，勉强要求作家接受不成熟的政治任务。例如，創作的題材有局限于“党的当前的政治任务”的傾向；在組織工作上也有这样缺陷，即：“沒有使全体盟員經常把艺术的和技术的能力發揮在具体艺术活动上，而过多地消耗在許多集會和其他瑣碎事务中”(山田清三郎“战旗”)；此外，創作的具体方法不能与政治实践結合起来，也是一个弱点。因此，一旦敌人向文化运动展开了“圍剿”，再加上某些作家的小資产階級动摇性作怪，就紛紛地从机械的政治主义掉过头来，向着它的反面非政治主义逃跑，結果产生了所謂变节文学。很快就脫离了战綫的林房雄，在1933年發表了“青年”，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出曖昧的階級观点，这种观点后来有了發展，在1936年出版的“壯年”中竟然說：伊藤博文和他代表的絕對主义專制政府，实际上是在日本实现政治自由的力量，借此来迎合軍国主义。然而，多数变节文学的作者比起林房雄来，多少还有些良心。高見順在“应忘故旧”中，一面描写着自己陷于頹廢，另一面却毫无保留地吐露了对于自己的憎恶，想从沒落中寻求摆脱的道路。又如島木健作的“盲目”、“癡癡”(1934年)，描写了一个在許多人紛紛变节的时期，独自在獄中坚持不屈的坚强性格，在这些作品里，描写了主人公受着“失明”和“癡癡”这种生理上的折磨，陷入了絕望的境地，最后却象悟道者一样从“开悟”中找到了生活的道路，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被視為无产階級作家叙述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敗的代表作品之一的村山知义的“白夜”(1934年)，如实地描写了变了节的主人公的“人性”的空虛，引起了反应。中野重治在“村之家”(1935年)、“写不出小說的小說家”(1936年)中，毫无保留地吐露了变节以后心緒不宁的苦悶。如在“村之家”中，主人公勉次回答他父亲的劝告“如果要保身，就必须丢下笔杆”时說：“我知道，不过我还是想写下去”，这句话，誠然是出于这样一种善意，即：想用后退了的

最低限度的活动来尽可能地医治由于变节所給予良心的創伤，并且試圖通过这样做来进行力所能及的抵抗。但是，这种作法却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变节不仅不被看作可耻的背叛和墮落，反而輕易地俘虏了許多善良文化人的心。

瀧川事件

反法西斯的先鋒共产主义运动被鎮压下去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随之失敗。1933 年京都帝国大学的瀧川事件，等于給自由主义敲了喪鐘。鼓吹荒謬玄虛学說的右翼分子蓑田胸喜、三井甲之等原理日本社的同人，从很早以前就攻击“帝大赤化教授”。所謂“赤化教授”，是指东京大学的美濃部达吉、牧野英一、末弘严太郎和京都大学的瀧川幸辰等教授而言，而头一个牺牲者就是瀧川幸辰。瀧川幸辰在刑法論里說：犯罪是由于国家組織不良而發生的，……犯罪就是对国家的制裁。右翼分子攻击他，說这是赤化思想。在第六十四次議会上，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問題提出了。当时的文相鳩山一郎要求瀧川辞职。对此，京都大学法学院教授会認為文部省当局的这种措施，是蹂躪大学的自治和威胁学术自由，而起来反对，学生也高呼保衛大学而举行了反对运动。于是，政府通过文官高等分限令委員會，采取了非常手段，給予瀧川以停职处分。消息傳出后，法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等三十九名立即联名辞职，事实上使法学院陷于关門状态。后来，教授团内部發生分裂，佐佐木惣一、宮本英雄、末川博、恒藤恭等八教授离开了大学，由留下来的人們重建法学院，但是它已經不配称为学府，只不过是一个无自由的殘骸而已。瀧川事件作为侵犯大学的自治和思想自由的一个事件，广泛地喚起了社会上有識者的共鳴和同情。尽管如此，然而各大学的教授們只是在口头上責难政府的压迫，而沒有采取共同行动来进行反对。学生們在全国范围

內掀起了反对运动，可是沒有很好地和工人及市民保衛生活的斗争結合起来。甚至在馬克思主义者之中，还有人只是从教条主义出發，站在旁觀者的立場进行了批評，說什麼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已經沒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京都大学法学院教授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好为維護学术自由而牺牲了。过了二年以后，發生了天皇机关說的問題，第二次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美濃部博士。法西斯的暴力无休止地猖獗起来，以至于毫无理性地污蔑从事純粹学术研究的学者为“叛变者”、“学匪”，但是到了这时，知識界已經看不到象瀧川事件时的那种抗議，而只是在灰心和沉默中坐等失敗了。

教育界的右傾

在瀧川事件的同一年中發生的另一次聳人听闻的事件，就是小学教員的赤化事件。“非常时期”的压力，最凶狠地施加在教育界。三·一五事件以后，学生的科学研究会和学生联合会全部被解散，学生的自治运动受到了鎮压，同时在政府的肃清“左傾教授”的方針下，东京大学的大森义太郎、京都大学的河上肇、九州大学的佐佐弘雄、石濱知行、向坂逸郎等教授均被迫辞职。而在同年 10 月，文部省在專門学务局里添設学生科，在它的統轄下，在各大学、高等学校和專門学校設置学生主事，从事調查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傾向，積極地开始了訓导工作。次年，又添設了社会局，对学校以外的在职青少年施行了严格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和訓練，企圖实现“教化总动员”。1931 年 7 月，政府成立了学生思想問題調查委员会，次年 8 月，在东京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开始徹底統制思想，1933 年，設立了思想局。至 1935 年，成立了青年学校，每年对数十万青年男女積極地灌輸国家統一思想，施行軍事訓練。这是把原有的实业補習学校和青年訓練所合并而成的，无非是陸軍

对未来的士兵——青少年施行軍事預备教育的要求和文部省实行实业補習教育的方針互相結合起来而产生的东西。随后，又成立了教育刷新評議會，作为政府关于革新和發展教育施設以及整頓学校方針的諮詢机关。評議会在答复中首先叙述了革新教育的方針說：“我們的教學，淵源于国体，以日本精神为指导思想，其根本精神在于：以此为基础适应世界潮流的演变，跟随人类文化的进步，力求蓬勃發展，以为皇道的發揚光大服务。”基于这个答复，政府于次年9月召开了“諸学振兴委員會”，11月举行第一次教育学会，为貫徹“皇国教學思想”采取了措施。

教师的抵抗

当然，有良心的教師們，也曾对于这种教育的法西斯化进行了反抗。这一反抗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大正时期以来的以教育生活化为目的的教育思想。这是把現有的教材与实际生活結合起来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因为当时只有写作課，沒有国定教科書的限制，所以能够开展通过兒童的作文使教学和他們的实际生活相結合的生活写作运动，并由此促进了昭和时期的生活教育运动的發展。初期的写作运动，是由鈴木三重吉所著“紅色的鳥”（1919年）的写生的影响和狄尔泰一派的“人生哲学”打下了基础的。后来因为受到田上新吉的“生命的写作教育”（1920年）的影响，便从以鑒賞为主的写作轉向重視对生活的表現和指导。然而，其“生活”的内容，只不过是些抽象的东西，把这个运动引向表現社会的现实生活上去的，乃是昭和初期的乡土主义教育思想。它教导学生从历史上、地理上来了解乡土的各种环境，写作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关于村庄的写作”、“关于土地的写作”逐漸盛行起来了。可是，这种写作具有強調爱乡观念和洋溢着怀乡情緒的牧歌式的地方生活的傾向，以致墮入复活乡土神聖权威的国粹主义中去了。

可是，以杂志“写作生活”(1929年出版)为据点的东北青年教师們，却走了与此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他們在农业危机最严重的地方，創立了北方教育社(1929年)，創刊了机关报“北方教育”(1930年)。然而，在危机逐漸加深和生活困苦之中，青年教师們对于如何通过封建色彩濃厚的东北农村来进行教导儿童的写作問題，开始感到苦悶。教師們的眼光逐漸接触到社会中的严酷的現實生活，开始注意到必須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科学的調查工作。其結果便是提倡“調查的写作”、“科学的写作”。这样一来，热爱教育的有良心的教師們就感到苦悶和焦虑，覺得再也不能停留在單純指导表現技术上面了。面对着这种严酷的現實，他們認識到，讓兒童們怎样生活下去的問題同时也是自己如何生活下去的迫切問題，这种認識唤起了他們的自覺和自我批判。青年教师們，通过“北方教育”杂志，推动了以地方为基础的教育并推动了以实事求是地观察事物、把它写成文章互相进行批評的生活写作运动。在生活写作运动中产生的兒童文集，其中有代表性的，有“穿着劳动服的弟弟”(国分一太郎)、“小旗”(鈴木道太)、“藍天”(塞川道夫)、“向阳之家”(坂木良人)等。这个运动得到了秋田、山形、青森等地的青年教师的协助而發展起来。在1934年組成了拥有机关刊物“北日本教育”的“北日本国語教育联盟”，次年成立了“北海道写作教育联盟”，于是，連接着东北和北海道两地的生活教育运动發展起来了。不仅如此，通过“文集”的介紹使全国範圍內对生活教育有理解的青年教师們，对此給予了协助。他們好比在法西斯文化中閃閃發光的一顆“星星”。他們在鎮压的風暴不断襲来的时候，在校長和督学的不断監視之下，在同行教师的背叛和在乡軍人会等法西斯势力的走狗以及土豪劣紳的監視之下，絲毫也沒有放松对于兒童的自治和互助的活动，并頑强地坚持了“什么是可喜的，什么是可悲的”这一基本觀念和“一人之喜即全体之喜，一人之悲即全体之

悲”的生活实践的教育。

这个生活写作教育运动进一步同 1935 年創刊的兒童村庄小学校的机关刊物“生活学校”及 1937 年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活动互相結合起来了。这种結合也說明了这个运动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教育实践。

在这样情况下，比較急进的教师組織也得到了發展。早在 1930 年 8 月間，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科学的一环，建設科学的新兴教育”为目标，成立了新兴教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創刊了“新兴教育”杂志，进行研究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次年，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成立时加入了联盟，但是在这一年里，杂志的同人被捕，因而完全停止了合法活动。教員工会运动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在 1927 年由青山师范出身的小学教师組織了一个称为“义足同人”的文艺团体，次年改組为以批判研究教育思想为目的的“青年教育家联盟”，1929 年又改組为“小学教員工会”。次年，成立了教育工会，加入了国际教联，同年改組为屬於日本工会全国協議会的一般佣工工会教育劳动部，以“改善教員待遇”、“反对帝国主义教育”、“实现校長公选制”、“職員會議民主化”、“反对督学”等为口号，开展了运动。当然，这样的激进运动是要遭到严厉鎮压的。特别是因为他們是担任培养天皇制思想基础的义务教育工作的小学教員，所以鎮压就更为广泛和严厉。1933 年，在長野县內大批逮捕了“赤化小学教員”，这是以組織非法社团为借口而把所有反对教育統制的教师全部加以清洗的事件。当局在公告中故意夸張了赤化的威胁，这在思想問題鬧得正凶的当时，对吸引世人支持教育的反动化起了充分作用。尽管如此，在奴才思想和封建主义气氛濃厚的教育界，特别是在农村小学教員之間，在那以后，仍然以生活写作运动为中心，扎实地、也比較頑强地保持了反抗法西斯的精神，这是值得注意的。

“非常时期”的社会風气

来自下面的抵抗力量大为减弱了。从上面强迫人們接受不合邏輯的国家主义思想，使人們感到处在一种与自己的意志毫不相干的、无形的力量在任意地摆布着自己命运的境地。就在这样的政治被凶猛地向前推行的时候，对此不能完全接受的民心，自然而然地沉淪到追求色情、反常以及无聊的低級趣味这种自暴自弃的气氛中。这种情况在城市小市民阶層中間表現得特別突出，不久通过广播、唱片、杂志等也傳播到了农村。1931年出的哥倫比亞唱片“酒是泪？还是嘆息？”和次年出的“慕影”，通过古賀政男的具有独特的哀怨腔調和充滿着頹廢气氛的旋律，風行于全国的每个角落。坂田山的殉情自杀，被視為“到天国結合的恋爱”，引起了青年男女的无限感伤；到大島三原山跳火山口情死一时极为流行，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自杀了六十名，还有自杀未遂的十六名；男女老幼热中于玩弄毫无意义的玩具；女学生們瘋狂地对“男装美人”水之江瀧子的欢呼；所有这些都表現出一般民众向頹廢中寻求刺激，企圖从这里發現生活意义的一种虛幻的願望。政府在引导学生思想的問題上，采取了所謂三S政策。認真讀書的学生，有被視為赤化的危險，所以，到咖啡館、酒吧間、跳舞厅去寻求性（Sex）的安慰，用看电影（Screen）来消磨時間，或者热中于体育运动（Sport）就被認為是最安全的；而政府就是在暗中利用了这样的社会風气。1932年夏天在洛杉磯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大会，作为“發揚国威”的机会，被充分利用来进行了爱国思想的宣傳。

忠实地反映时代潮流的是文学。好坏姑且不論，在感到历史車輪沉重的这个时期中，島崎藤村的畢生的巨作“黎明之前”完成了（1929—1935）。作者在这部小說中，精心地描写了明治維新变革时期的浪潮，它是怎样把木曾地方一个寒村中的草莽之士青山半

藏卷进去的，結果他終于不得不悲憤而死。这部作品，确实达到了历史小說的高度成就，給予讀者以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这里，只描写了主人公作为尊王攘夷的志士的一面，而对于把他彻底粉碎了的明治維新的进展，有了共鳴，作者在內心里似乎有意把这段历史重新加以評價，这也可以說和他后来的作品“东方之門”表现出更加露骨的迎合时局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正在这个时候，在文学評論的領域中，主張“超越近代”的日本浪漫派，乘着无产階級文学的低潮，抬起头来了。这就是保田与重郎、淺野晃、芳賀檀等一幫人。他們和小林秀雄、林房雄、武田麟太郎等“文学界”的同人們，提出了“文艺复兴”的口号。这在表面上虽然意味着使文艺摆脱政治的統治而走向“复兴”，然而实际上却是加强反馬克思主义的趨勢，使文学家丧失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意志，为从艺术角色来看相当出色的文学成为政权的奴婢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在不顧这样的时代潮流而一味追求个人天地的旧作家中間，产生了作品，永井荷風在“梅雨的前后”(1931)、“瀨东綺譚”中，描写了陋巷生活的情景；谷崎潤一郎在“吉野葛”(1931年)、“盲目故事”(同年)、“割蘆”(1932)、“春琴抄”(1933年)中，把色情提高到幻想和抒情的境地；还有德田秋声的“假想人物”(1935年)是赤裸裸地描写了老丑和痴情的私生活小說。讀者从这种情欲和爱情的文学中，寻求了暫时的安息。在这以前的川端康成的“淺草紅团”(1930)、武田麟太郎的“銀座八丁”(1934)、石坂洋次郎的“年青人”(1937年出單行本)等作品，其所以拥有广大讀者，也是因为这种原故。

由于荒木陆相的演說而普及开来的“非常时期”的歇斯底里的叫喊、装模作样的“日本精神論”和玄虛誕妄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就是建筑在以上这种民众頹廢的基础之上的。

第四节 經營“滿洲”和侵略华北

統治“滿洲国”的方式

日本对“滿洲”的經營，是以准备进攻苏联的軍事設施为唯一重点来进行的。从“滿洲国”成立到 1936 年之間，可以看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奠定基础的阶段。

关于“日滿議定書”的內容，前面已經說過(第三章第三节)，对“滿洲国”的政治指导，“是在关东軍司令官兼帝国駐滿大使的不公开的統轄之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滿洲国”指导方針綱要，1933 年 8 月决定)来进行的。“日系”官吏，在“滿洲国”政府各部中，不仅占有重要职位，即在人数上，也占中央政府全部人員的 36%，在中央到省公署人員中平均占 29%，特別是国务院、財政部及監察院等主要部門中，“日系”官吏的比重，更超过半数以上。

在国防方面，根据“日滿議定書”的規定，“滿洲国”的国防全部委托日本軍隊承担，“滿洲国”的軍隊，仅限于“維持国内治安”，只是担负着輔助性的任务，可是，日本駐“滿”的軍費，“滿洲国”則要分攤。与国防有关而引人注意的事情，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維持治安的問題，为此，在 1934 年 12 月采取了保甲制度。这与日本江戸时代的五人連坐制度相同，使大家負有互相監視、共同負責的义务，借以維持治安。这一制度規定，十戶为牌，牌以上設甲、保，牌內如發生严重犯罪时，各戶主連坐，罰款二元。

“滿洲国”既不許可有政党組織，也不采取議會制度，而是采取了独裁制度。为了牢固地統治人民，从思想上准备对苏开战，設立了一国一党制的协和会。协和会是“滿洲国”成立时担当政治工作的自治指导部的一部分，是在 1932 年 7 月組成的，它与“政府”互为表里地展开了活动。关于协和会的活动，九·一八事变时任

关东軍參謀長的三宅光治中將會这样叙述过：“为此(指准备对苏开战)，协和会广泛地展开宣傳，……对會員、特别是青年施行軍訓，積極發展滿洲的工业，特别是軍事工业，……并为着战时的活动，組織了名为‘先鋒团’的特別战斗团。……在战争中，先鋒团的主要任务是，在苏軍后方展开積極的恐怖和陰謀活动，炸毀鐵路、桥梁、軍事倉庫等，以及杀害苏联軍人，等等。”(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公审口供)

“滿州”經濟建設是在关东軍特务部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其直接目的还是加强准备对苏开战。其主要內容是，整頓幣制財政，建設鐵路、公路、港灣和通訊机构，以及開發矿山等。在建成的單位中，兵工厂、水泥厂、鋼鐵厂等屬於軍事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占大多数，而紡織厂等和平工业却被弃置不顧，这是值得注意的。試以 1932 年到 1936 年五年間的对“滿”投資額为例，總額达到十一亿六千万日圓，但其中的 80% 主要是通过南滿鐵路投到与鐵路有关的企业方面。这表明了为了把“滿洲”建成进攻苏联和中国的軍事基地，并鎮压“滿洲”人民爭取民主和独立的斗争，首先需要扩充交通網和通訊網。同时，这还给企圖安然的获取最大限度利潤的日本財閥直接向“滿洲”擴張势力，提供了准备条件。

这个时期的經濟建設的进展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談。从九·一八事变爆發到 1933 年年底这一段时间，关东軍的反資本主义和“王道乐土”的思想是很濃厚的。在 1933 年 3 月發表的“滿洲国經濟建設綱要”，虽較“建国”时略微協調些，但仍然規定：“有关国防和国計民生的重要企业，以国营、或交由‘特殊公司’經營为原則”，对此日本国内的資本家並沒有積極地进行投資。为了經濟建設，筹集資金是一个紧急的任务，因此关东軍打算通过对南滿鐵路进行改組来达到其筹集資金的目的。南滿鐵路从来就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公司，在政府的保护下利潤也有保障，所以关东軍就想

利用南滿鐵路的信用來籌集資金。1933年10月，關東軍特務部沼田中佐提出一項改組滿鐵的方案，其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點：一，南滿鐵路改為特殊公司，脫離鐵道部並與傍系公司分開；二，南滿鐵路附屬地行政權歸還給“滿洲國”，並廢除治外法權；三，將滿鐵經濟調查會和關東軍特務部合併起來，成立經濟參謀本部；四，關東軍司令官對南滿鐵路具有統一的經營權。據此，以南滿鐵路為中心的“滿洲”經濟機構作為駐“滿”全權府為最高經濟統制機關，以經濟參謀本部為經濟指導機關，南滿鐵路作為控股公司受這些機關的統制和監督，在它下面存在着獨立的各個公司。這個方案的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徹底的国家統制機構。這個方案引起了南滿鐵路職員會和日本國內資本家的猛烈反對，南滿鐵路的股票暴跌到六十幾日圓，滿鐵發行的五千萬日圓的債券推銷成績也空前不佳。在政府內部，首相、大藏相、拓務相等站在各自的立場表示反對，結果，這一改革方案被撤回了。

在這種反對力量的推動下，從1934年以後，關東軍的反資本主義思想，逐漸被修正了。促成這種變化的原因之一，是1933年12月蘇美恢復了邦交，從而使日本陷於不利的地位。1934年6月發表了“關於一般產業的聲明”，表明：“對於國防上有重要意義的產業、公共事業及成為一般產業之基礎的產業等，採取特別措施……，對於其他一般企業，大体上廣泛地歡迎民間投資和經營。”次年1935年7月，為了促使日“滿”兩國經濟合作，設置了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而隨著經濟建設的進展，也發生了握有“滿洲國”政治實權的在滿機構的改革問題，到了1934年9月，大体上按照軍部的提案，進行了機構改革，這一點前面已經敘過。

在這樣對“滿洲”進行經濟統治的同時，對採取不承認“滿洲國”政策的英、美等國的平民，在通商上採取了差別待遇。“滿洲國”在“建國”之初，便聲明了尊重國際條約和門戶開放主義，但在

1934 年以后,对重要物資加以統制, 同年夏天, 又悍然不顧英、美两国的反对, 实行了对石油的壟断。这种做法, 明确地否認了在中国的門戶开放政策, 加剧了英、美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滿洲”人民的生活

日本的这种軍事上的需要和随之而来的經濟建設, 究竟給了“滿洲”人民以什么样的影响呢? 先从財政上进行考察。这里, 暫且不提九·一八事变以后, 由于以工人、貧农为主体的民族独立斗争、即所謂“匪賊”扰乱、治安不宁而不得不因襲張学良时代的稅制这一个时期, 讓我們先看一看自从公布了所謂“使人民群众的經濟生活富裕安定, 提高人民生活, 充实国力, 并对世界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 提高文化, 以實現偉大建国理想的模范国”作为“經濟建設的最終目标”的“滿洲国經濟建設綱要”一年后的 1934 年度的預算, 岁入較上年度增加了 39%。在岁入中, 地主和資本家所負擔的田賦和營業稅即利潤稅(直接稅)仅占 10%, 而农民和工人負擔的消費稅(間接稅)达到 89%。并且不只是國稅如此, 在地方稅方面, 佃农負擔的地亩捐, 比國稅的田賦还要苛重。其結果, 賦稅、公費对現金收入的比例, 地主仅为 19.8%, 而佃农和中农竟达到 30—37% 之多(如加上地租, 将达 50% 左右)。而且, 这里还不包括消費稅。据說, 消費稅占农民購買商品价格的 20—26%。

这样从农民群众中榨取来的稅款的用途是: 軍事費用一項就占去岁出的 30%, 警察費占 6%, 司法費占 4%, 軍人、司法官、警察官的薪金占 15%, 只是以上这些軍事、治安方面的費用, 就占岁出的 55%。另一方面, 荒歉儲备費, 不論怎样高估, 也不超过 3%。同年度的“滿洲国預算总綱”中, 还这样謳歌日本統治者对殖民地的“善政”: “因为日滿两国根据議定書实行共同防衛, 滿洲国不仅摆脱了以往过重的軍費負擔, 还巩固了国防的安全和維持了治

安”。可是，眞象却是上述那样。

如前所述，事变前的“滿洲”农民，在很高的地租、稅款、大商人和高利貸的重重盘剥下，过着穷苦悲惨的生活。自从日本統治“滿洲”以后，“滿洲”农民的生活，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恶化了。这种情况，从 1934 年成立了金融合作社一事也可以看出。成立的宗旨，据說是为了建立把农民从高利貸的剝削下挽救出来的“公正的平民金融机关”，但实际上，能認两股出 10 圓成为社員的人，仅限于富农和地主，并且貸款中 99.6% 属于抵押放款，結果，貸款几乎全部流入了有抵押能力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只是对富农起了救济补助作用。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鎮压和剝削“滿洲国”人民，不能不这样以地主、富农作为支柱。这样强加在农民头上的重重剝削，不久，便造成了动摇日本統治的經濟基础的严重后果。

世界經濟危机所引起的“滿洲”农业的危机，在战乱和随之而来的天灾(1934 年的大歉收)的影响下，長期化和日益加深了。于是占“滿洲”出口額 80% 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其主要部分的大豆、豆餅、豆油的价格發生了暴跌(如在 1934 年年初出現了十幾年来的低价)，随着，当地的工商业者，也陷入了严重的不景气中。这种农村的穷困給日本的經濟工作带来了極大障碍。要挽救这种情况，首先必須降低农产品的鐵路運費，然而，当时的南滿鐵路，即使不減低運費，尙且难以吸引日本国内的投資，当然也就做不到这一点。并且，尽管大豆价格暴跌，而欧洲的需要却有所減少，日本的农村也因为不景气而失掉了購買豆餅作为肥料的能力，結果，使“滿洲”貿易一向出超的情况轉为入超。而在另一方面，日本的进口較前增加了，主要是供应“滿洲”的基地建設和駐“滿”軍隊的消費，因而把“滿洲”变成日本商品的正常市場的希望就落空了，并破坏着建立日“滿”經濟集团的基础。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初对于占領“滿洲”所梦想的計劃：日本的投資、滿洲經濟發展、日本产业

界繁荣、日本投資扩大，这种循环关系，由于“滿洲”农业荒廢的結果而遭到了惨重的失敗。“滿洲”的魅力，已經开始消失了。

中日的接近与何梅协定

到了 1934 年，日本的对华外交有了急剧进展。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这样：英国面对着由于希特勒取得政权而引起的欧洲的險恶形势，在远东方面繼續执行对日妥协政策，对华也依然采取消极政策。美国虽在执行扩充海軍計劃，但在远东方面还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英、美之間也没有实现合作。美国从 1933 年初期，开始采取收購白銀政策，致使采取銀本位的中国，往国外流出了大量白銀，經濟瀕于破产。这件事造成了中国向英日接近的最大原因，严重阻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推行。苏联与“滿洲国”之間，进行了出售中东鉄路的談判，可是因为日“滿”方面采取强硬政策的結果，例如逮捕中东鉄路職員，在国境綫上頻繁制造冲突事件等等，同时苏联也揭露了日“滿”两国企圖夺取中东鉄路的計劃等等，使交涉一时陷于停頓状态。然而，由于美、苏在 1933 年 11 月恢复了邦交，削弱了日本的势力，在此影响下，日苏交涉有了进展，至 1935 年 1 月，苏“滿”双方終以鉄路收买費一亿四千万日圓和鉄路員工退職金三千万日圓为条件，达成了協議。

这个时期的日本外交，是从斋藤內閣后半期上台到岡田內閣仍繼續担任外务大臣的广田所主持的协调主义外交。这种外交政策与“滿洲国”初建时期的状况是相适应的。同时，日本也想恢复由于九·一八事变而中断的同中国的貿易，在对中国的关系問題上，企圖以承認“滿洲国”为前提条件来調整中日关系，以便促成中日“滿”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合作”。然而，与此同时，正如 1934 年 4 月天羽声明所說的那樣，由于国际联盟和列强对华援助，使国民政府得以进行統一国内和經濟建設，日本認為这是离間中日关

系，扰乱东亚和平，并将形成对中国的国际共管的局面，因而加以反对。据当时的外务次官重光葵所说，日本的方针是这样：“第一，日本必须根据退出国际联盟时的方针，坚决避免对‘满洲’以外的中国本土采取积极行动，以表示毫无野心，并对美国所重视的门户开放主义，加以特别注意；第二，不希望世界各国不负责任地煽动中国‘排日’，给予中国武器或财政上的援助，促使中日间的斗争趋于激烈；第三，中日两国，应该觉悟到面对着以扰乱为目的的共同敌人共产党。”（重光葵“昭和动乱”）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但从1934年的年中起，开始有了对日接近的活动。这个方针是在同年8月，由蒋介石、汪精卫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决定的，随后便付诸实行。在同年的夏天，恢复了同“满洲”的通商关系，双方的海关也开放了。11月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偿还对日债务，到1935年还进一步同“满洲国”开始通邮了。

1934年，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几乎没有进行武装侵略的唯一的一年，能够出现这种情况，不外乎是广田外相的对华政策在各个方面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的结果。第一，关于建立中日“满”的合作关系问题，除上述与“满洲”恢复通商关系以外，日本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修改关税也得到成功，日本的出口逐步增加了。第二，对抗日运动的取缔，主要在华北方面由北平政务委员会进行了。第三，关于防共问题，虽未结成共同战线，但国民党政府对中共军的进攻有了进展，以至于占领了苏区中央所在地瑞金。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广田外务相在1935年10月的会议上，又声明了不威胁、不侵略的原则，主张中日合作，中日两国的“亲善工作”由于同年5月双方互派大使而达到了顶点。

对于日本外务省对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亲善方针”，以军部为中心，仍有人加以反对。他们攻击说：国民政府的外交是“伪装亲

日”，而在1935年春天，日本軍隊重新开始了侵略。軍部采取这种方針，一方面是要借此給予国内“穩健派”一个打击；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受到了德国重整軍备和中东鐵路收买成功等有利的国际形势的鼓励。这一計劃，首先是由日本的現地駐軍否定了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所采取的协调的态度，而付诸实行的。

1935年在天津的日本租界中，發生了暗杀亲日派新聞記者的事件，日本华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通过參謀，向北京軍事分会何应欽委員長提出了以下的要求：認為这个事件是中国方面对日本軍隊的挑战行为；必須把第五十一軍撤出河北省；封鎖該省內的国民党机关并禁止一切党派活动；并要求禁止該省內的一切排日活动。6月10日，何应欽完全接受了这些要求。这就是梅津·何应欽协定。与此相前后，日本方面的特务机关長土肥原少将和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純之間，又签订了所謂土肥原、秦德純协定。协定中規定：从“滿洲国”国境附近，撤退宋哲元軍隊和清除察哈尔省內的排日机关，这可以說是梅津·何应欽协定在察哈尔的翻版。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新的侵略的开始，国民政府还是不想进行抵抗。他們从河北、察哈尔两省撤出了国民党軍，集中全部力量来进攻当时正在为了北上抗日而进行長征的紅軍。国民党政府鎮压一切抗日救国运动，公布敦睦邦交令，禁止組織抗日团体。就連林語堂也說：1935年的夏天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于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的呼声，不但在人民和士兵中，就是在国民党的一部分將領中，也逐漸出現了。这种动向最明显地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在冲破第五次“圍剿”后，在北上抗日——長征途中，于1935年8月1日發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書”（八一宣言）。

中国的幣制改革

国民政府的这种对日讓步，使英国担心国民政府是否会变为日本的傀儡政权，而由于白銀問題引起的中国經濟的削弱，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不安。这种情况反映在英国的对华政策上，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美合作还是对日合作的問題。从 1934 年到 1935 年初的英国外交，虽然是采取了后一条路綫，但同时，它还大力参加中国的經濟工作，企圖重新巩固其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这表现在，英国一方面在 1934 年 10 月到 11 月派遣英国产业联盟代表团，訪問了日本和“滿洲”，另一方面，用庚子賠款对中国进行了投資。随后在 1935 年初，它又接受国民政府的要求，向日、美、法三国提議共同对华提供財政援助。美国支持了这个提案，而日本則認為这将招致列强对中国的共管，疏远中日关系而加以反对。这个提案終於在日本反对之下被撤回了。因此，当时正在国民政府内部逐渐扩大自己势力的英国，便不再热心同日本取得合作，从此以后，英国就不顧日本的反对，推行了它的对华政策。英国远东政策的这种轉变，是在 1935 年下半年开始的。

这个轉变的开端，就是經濟代表李滋·罗斯的被派来华。1935 年 6 月，英国公布派遣李滋·罗斯到中国，并表示了根据他对中国經濟、財政情况的考察报告，将要調整对华經濟政策的意圖。同时，也曾邀請日、美、法参加，但未能实现。李滋·罗斯于 8 月从倫敦出發，繞过华盛頓經由加拿大，9 月抵达东京，同广田外相、高桥藏相等举行了会談，然后到了中国。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滋·罗斯是希望英、日共同对华貸款的。可是，这个希望遭到了日本政府、特別是現地駐軍的反对而沒有实现。接着在 11 月 1 日發生了汪精衛被刺事件，銀行發生了挤兌，国民政府即根据李滋·罗斯的提議，公布白銀国有令，进行幣制改革，实行管理貨幣

制，同时，使法幣和英鎊联系起来。当然，这种措施的背后，有英国在财政上的支援。日本一贯的强硬态度，加强了英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从此以后，英国的威信就要取决于这次幣制改革的成败，英国的利害进一步与中国經濟工作结合起来。接着，美国也表示支持幣制改革，使法幣也和美元联系起来。这样造成的法幣的稳定，一方面加强了国民党政府的依赖外力，但同时又大大地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对内统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建设。

分割华北的工作

李滋·罗斯代表团来华，引起了日本政府、特别是现地驻军的反对，这种反对表现为同年9月24日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发布的关于华北“自治”的声明。声明中除在华北肃清反“满”抗日分子，防止赤化之外，还主张实行华北五省联合“自治”，脱离国民政府。接着，在日本政府内部，也召开了首相、外务相、海相、陆相、藏相的五相会议，关于在华北实行积极的经济合作和防共问题，决定了包括使华北地区特殊化在内的“谅解事项”。

担任策动华北“自治”的是1935年由关东军派到华北的土肥原少将。他接受了关东军和华北驻军的意图，担当这项工作，首先把旧军阀的巨头吴佩孚拉了出来，想以吴为中心建立华北五省的政权，但结果是失败了。接着，又想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主席，成立华北自治政府，也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然而，在同年的年底，终于在以土肥原为首的关东军的压力之下，成立了两个新的华北政权。同年10月，由于日方特务机关的阴谋策动，在河北省香河县发生了以自治运动为名的农民暴动。这个暴动虽然立刻被镇压了下去，可是这个事件以后，在日本军队的压力下，以殷汝耕为首的、包括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地区的保安队长和各县县长，于11月间宣布成立自治政权，但实际上它只是日军的傀儡。

傀儡政权。他们利用非武装地区国民党政府不便干涉的条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随后在 12 月，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声明脱离国民政府，实行防共和模范自治。

大约在“冀东政府”成立的同一时期，北平方面也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日军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不过，为了符合国民党政府的希望，这个组织表面上是由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可是，这个政权的统治区域只限于河北、察哈尔两省，而不包括山东、綏远及山西各省，并且这个政权虽标榜尊重地方民意、中日亲善、防共等口号，但仍然是在国民党政府监督之下，与日军最初计划的华北自治政权相差很远。

至此，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再屈从于日方的压迫了。这是由于它一方面受到英国的援助，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运动的压力。同年 11 月 1 日，亲日派的巨头、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以后，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势力衰退了，抗日派抬头了。

这样，中日两国的紧张状态，日益加剧起来，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尖锐对立。在华北地区特殊化的条件下，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扩张。与“满洲国”接壤的“冀东政权”，成了巨额的冀东贸易的根据地。该“政权”的关税率只是国民党政府的四分之一，因此，天津海关的收入，据说减少了一半。在 1935 年的 12 月，作为南满铁路的子公司创办了拥有一千万日圆资本的兴中公司。次年 8 月，在其控制下，成立了中日合营的天城电业公司。与此同时，以纺织资本为中心的各种企业，也向中国进行了扩张。这种经济侵略，同币制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正面冲突。

編 后 記

这是我們日本人亲身經歷的世界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本書的叙述,在年代上,前后共有二三十年,在地域上,广泛地涉及到世界形势,而且内容也不限于軍事和外交問題,同时还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个方面。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們抱着如下的动机出發的。

我們可以說是生活在战争的世紀里。在本世紀中發生了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規模,無論是在战争的地区范围上,或者是在战争給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牺牲上,都是一次比一次显著地扩大了。但是,另一方面,亲身体驗到惨痛事实的全人类,發出了殷切要求和平的呼声,現在,絕大多数的群众,都在为保衛和平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在今天,当然不允許历史学家單純从兴趣出發来叙述战争的历史,即使是把战争的灾禍展示出来,告訴人們和平的可貴,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是极其不够的。我們必須更进一步,从历史上穷究战禍的根源。而且,太平洋战争的結果还直接地和我們日本人的今天的情况联結在一起,所以我們應該提供材料,来帮助日本人民了解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并进而展望未来,以便共同考虑摆在面前的“战争与和平”的問題。

因此,在这部太平洋战争史中,序言部分是从昭和危机起談到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展望部分是从太平洋战争的战敗写到它的結果——旧金山和約为止。我們的意圖是要在国际的和世界史的范围內来考察日本的軍事法西斯主义的成立、潰敗以至直到今天的經過情况。我們認為,为了从历史学的立場来回答怎样才能避免重复这种可怕的遭遇的問題,上述观点是絕對必要的。因

此，为了不仅仅从軍事史或外交史的观点出發，而是从政治、經濟、文化各个方面来写出一部綜合的、統一的历史，邀集了各方面的許多專家共同进行了研究。

現在，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著作、回忆录已出版了不少，这对于究明史实、丰富史料，有不少貢獻。然而，另一方面，这些著作，有的只是片面的考察，有的流于自我辯护性質的夸張和追忆，甚至还难免出現一些專为迎合最近的反动潮流而写的东西。这些，如果不正确地科学地加以整理，也难保不發生重新鼓吹战争的危險。历史学研究会針對这种傾向，本着精确而平易地叙述真实的历史使其成为和平、自由与独立的一塊基石这样一种願望，开始了这项工作。

根据这种意圖，从 1952 年 9 月以来，在各方面的人員，不仅仅是專門研究历史的会員，还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个部門的有关人士共同参加下，前后召开了二十余次研究会。因为作为一项學問來說，無論在理論方面或是資料方面，还是一塊未开垦的处女地，加上編者和主編時間不够充裕，以致在研究和編写上都碰到了意外的困难。到了最后阶段，还有若干部分是完全重新組織和改写的。

今天，編写工作已經完成，将要出版。因为我們的准备期間不滿一年，当然不能期望尽美尽善。然而，以現阶段而論，我們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相信它可以成为对于这方面做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出發点。

当本書即將出版之际，特将参加共同研究和編写者的姓名开列如下，并感謝他們的劳动。

相田重夫、秋山穰、朝田輝彦、荒井信一、井上清、伊豆利彦、生山良夫、池边恭、石田雄、犬丸义一、今井清一、宇佐美誠次郎、江口朴郎、衛藤沈吉、大江一道、大田捷、犬久保和子、岡部广治、川村善

二郎、草部典一、小島晋治、斋藤孝、島田福子、田代正夫、竹中清之助、高桥誠、土井正兴、远山茂树、中川信夫、中山立平、中村义、野澤丰、野原四郎、原田胜正、阪东宏、藤井松一、藤田省三、藤原彰、古島和男、松岡磐木、松島荣一、松本貞雄、山極晃、山極潔、山田胜男、山本弘文、吉田輝夫(按五十音順序)。

本書中的圖片(中譯本略去——編者)，除了共同通信社提供的兩張以外，其餘都是日本近代史研究会提供的。

第一分冊的執筆分工如下：

代序：井上清。

政治：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犬丸义一。

經濟：宇佐美誠次郎、生山良夫、高桥誠。

文化：松島荣一、島田福子、草部典一、大久保和子、大田捷。

中国：野原四郎、小島晋治。

国际关系：江口朴郎、大江一道、山極晃、斋藤孝。

附录(一) 年表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17 (大正6年)	1. 西原借款开始(至次年9月共七笔,一亿四千万日圆)。 11. 2 藍辛—石井协定签字。		11. 7 俄国爆發十月革命,苏維埃政权成立。
1918 (大正7年)	8. 2 声明出兵西伯利亞。 8. 3 由于米价暴漲,富山县發生“米騷动”,波及到全国各地。 9. 23 寺内内閣总辞职。 9. 29 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内閣成立。	5. 16 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字。	1. 8 威尔逊發表十四条綱領。 3. 3 布列斯特和約签字。 11. 3 [德国]十一月革命爆發。 11. 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
1919 (大正8年)	3. 1 朝鮮發生“万岁事件”。 5. 17 日本声明归还山东。 10. 29 大日本国粹党成立。 12. 12 設立協調会。	5. 4 五四运动开始,北京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声明归还山东。	1. 5 [德国]斯巴达克团起义。 1. 18 巴黎和会召开。 3. 2 共产国际成立。 3. 23 [意大利]莫索里尼組織法西斯党。 4. 28 决定成立国际联盟。 6. 28 凡尔賽和約签字。
1920 (大)	2. 10 为爭取普选而举行示威游行。 2. 26 众議院解散。 3. 15 战后危机开始。	3. 12 庙街事件發生。 5. 1 中国第一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	1. 20 协約国解除对苏封鎖。 3. 13 [德国]發生卡普騷动。

正 9 年	<p>5• 1 日本第一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p> <p>5• 10 举行第十四次大选，政友会获得压倒多数。</p> <p>7• 15 日本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p> <p>12• 10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举行成立大会，当天被勒令解散。</p>	<p>8•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p> <p>10• 15 (对中国)新四国财团成立。</p>	<p>3• 19 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p> <p>8• 10 (对土)塞维尔和约签字。</p> <p>9• 2 召开巴库东方民族会议。</p> <p>9• 3 [意大利]工人占领工厂。</p>
1921 (大 正 10 年)	<p>10• 3 友爱会改称日本劳动总同盟。</p> <p>10• 4 首相原敬被刺杀。</p> <p>11• 12 发生晓民共产党事件。</p> <p>11• 13 以高桥是清为首的政友会内阁成立。</p> <p>11• 15 皇太子裕仁就任摄政。</p> <p>12• 13 废除日英同盟。</p>	<p>5• 5 广东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p> <p>7• 1 中国共产党成立。</p> <p>7•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p>	<p>3• 16 苏英通商协定签字。</p> <p>3• 31 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p> <p>5• 5 决定德国赔款总额。</p> <p>11• 6 [意大利]法西斯党正式成立。</p> <p>11• 12 召开华盛顿会议。</p>
1922 (大 正 11 年)	<p>6• 6 加藤友三郎内阁成立。</p> <p>7• 15 日本共产党成立。</p> <p>10• 26 日军完全撤出西伯利亚。</p> <p>12• 1 日本归还山东协定签字。</p>	<p>2• 3 在华盛顿签订中日鲁案条约。</p> <p>3• 29 日军撤出山东协定签字。</p> <p>5• 14 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p>	<p>2• 6 华盛顿海军条约签字。</p> <p>2• 6 对华九国条约签字。</p> <p>4• 10 召开热那亚会议。</p> <p>4• 16 苏德拉帕洛条约签字。</p> <p>10• 28 莫索里尼进入罗马。</p> <p>12• 30 苏联成立。</p>
1923 (大	<p>3• 13 拒绝中国关于废弃二十一条的要求。</p> <p>4• 14 废弃蓝辛—石井协定。</p>	<p>1• 26 发表孙中山—越飞共同宣言。</p> <p>3• 10 中国通告日本废弃二十一条。</p>	<p>1• 11 法军占领鲁尔区。</p> <p>8• 13 [德国]斯特雷士曼大联合内阁成立。</p>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正 12 年	6• 5 第一次逮捕共产 、党。 9• 1 發生关东大地震。 接着，發生殘杀朝 鮮人、社会主义者 的事件。 9• 2 山本內閣成立。	10• 国民党發表改組宣 言，聘任鮑罗廷为 顧問。	10• 10 〔德国〕發生薩克森 事件。 〔德国〕馬克暴跌。 11• 8 〔德国〕希特勒組織 慕尼黑暴动。
1924 （大 正 13 年）	1• 7 清浦內閣成立。 1• 29 护宪三派同盟成 立。 5• 10 在大选中，护宪三 派获得大胜。 5• 国本社成立，由平 沼騏一郎任会長。 6• 11 以加藤高明为首的 护宪三派內閣成 立。 9• 22 幣原外务相声明不 干涉中国內政。	1• 20 中国国民党实行改 組，并确定联俄、联 共、扶助工农三大 政策。 5• 31 中苏恢复邦交，并 締結协定。 7• 9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 立。 11• 24 段祺瑞就任北京政 府执政。	1• 21 列宁逝世。 1• 22 〔英国〕第一次工党 內閣成立。 1• 27 意大利吞并阜姆。 2• 1 英国承認苏联。 2• 7 意大利承認苏联。 5• 24 美国制訂移民法。 8• 30 对德国实行道威斯 計劃。 10• 28 法国承認苏联。
1925 （大 正 14 年）	1• 20 苏日基本条約签字 （苏日恢复邦交）。 4• 13 田中义一就任政友 会总裁。 4• 22 公布治安維持法。 5• 1 裁减陆军四个师 团。 5• 5 公布普选法。 5• 24 工会总同盟分裂， 工会总評議會成 立。 8• 2 以加藤高明为首 的宪政会內閣成 立。	3• 12 孙中山逝世。 5• 1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 立。 5• 30 上海全市举行总罢 工，此后工人运动 蓬勃展开。 7• 1 在广州，成立反帝、 联共的国民党左派 政派。	4• 26 〔德国〕兴登堡当选 总统。 10• 5 召开洛迦諾會議。 10• 16 洛迦諾条約签字， 法、捷互助条約签 字。

	12• 1 农民劳动党成立，当天即被勒令解散。		
1926 （大昭 正和 15元 年）	1•26 發生学联事件。 1•30 以若槻为首的宪政会內閣成立。 2•11 赤尾敏等人組成建国会。 3• 5 劳动农民党成立。 10•24 劳动农民党分裂。 12• 4 日本共产党重建。 12• 5 社会民众党成立。 12• 9 日本劳农党成立。 12•25 大正天皇病歿，皇太子裕仁即位，改元昭和。	3•20 蔣介石在广州阴谋策划中山艦事件，借端压制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 7• 9 中国革命軍开始北伐，蔣介石任总司令。	4•24 苏德中立条約签字。 5• 4 〔英国〕發生煤矿工人大罢工。 5•12 〔波兰〕畢尔苏斯基独裁政权成立。 7•15 奥地利工人起义。 9• 8 德国加入国际联盟。 10• 〔苏联〕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政治局。 11•27 意大利同阿尔巴尼亞签订地拉那条約。
1927 （昭 和 2	3•14 發生金融恐慌。 3•17 樞密院否决救济台灣銀行紧急敕令案，若槻內閣总辞职。 4•20 以田中为首的政友会內閣成立。 4•22 公布延期支付令。 5•31 反对干涉中国同盟成立。 6• 1 立宪民政党成立，浜口雄幸任总裁。 6•27 召开东方會議。 7• 8 第一次出兵山东。 8• 制定 1927 年綱領。	1• 4 中国各地爆發反英运动，英国出兵。 2•21 武汉政府成立。 3•24 革命軍占領南京，發生南京事件。 4• 3 革命軍收回汉口租界。 4•11 英、美、日、法、意就南京事件对中国提出共同抗議。 4•12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18 蔣介石成立南京政府。 8• 1 中共举行南昌起义。	5• 4 在日内瓦召开国际經濟會議。 5•27 英国与苏联絕交。 6•20 在日内瓦召开裁軍會議。 8•23 〔美国〕薩克和万蔡基被处死刑。 11•14 〔苏联〕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 12•17 〔苏联〕拉狄克、皮达可夫、加米涅夫等被开除出党。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年)		8• 7 陈独秀被撤销中共 总書記职务。 9•16 南京、武汉政府合 流。 12•11 广州苏維埃政府成 立。 12•14 南京政府与苏联絕 交。	
1928 (昭和 3 年)	2•10 举行首次普选，政 友会获得二一九 席，民政党得二一 七席，无产阶级党 派得八席。 3•15 發生逮捕共产党的 三•一五事件。 3•25 全日本无产阶级艺 术联盟成立。 4•10 劳农党、工会总評 議会被勒令解散。 4•19 第二次出兵山东。 5• 8 第三次出兵山东。 6•24 以紧急敕令恶劣修 政治安維持法。 7• 3 設置特高警察。 8• 4 日本劝告張学良放 弃易帜。 10• 6 日共总書記渡边政 之輔被槍杀。 10• 朝鮮元山工人举行 罢工。 12•24 新劳农党被勒令解 散。	4• 9 南京政府开始第二 次北伐。 5• 3 中日两軍在济南交 战(济南事件)。 5•11 南京政府向国际联 盟控告日本。 6• 4 發生張作霖被炸死 事件(“滿洲某重大 事件”)。 6•11 国民党軍占領北 京,北伐結束。 7• 2 張学良就任东三省 保安司令。 8• 5 国际联盟正式承認 国民党政府。 10• 3 蔣介石就任国民党 政府主席。 12•20 英国正式承認国民 党政府。 12•29 張学良宣布东三省 易帜。	8• 7 共产国际召开第六 次大会。 8•27 非战公約签字。 10• 1 苏联宣布第一个五 年計劃。 12• 8 意大利国会承認法 西斯独裁。

1929 (昭和4年)	2・10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成立。	5・2 南京、汉口两事件解决。	3・4 [美国]胡佛就任总统。
	3・5 劳农党国会议员山本宣治被暗杀。	6・3 日本承认南京政府。	5・30 [英国]麦克唐纳内阁成立。
	4・16 发生逮捕共产党的四・一六事件。	7・21 中国收回中东铁路,中苏开战。	6・8 [英国]第二次工党内阁成立。
	6・3 日本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		7・9 [德国]希特勒掀起反对杨格计划运动。
	7・1 处分“满洲某重大事件”的责任者。		10・24 [美国]股票市场陷于停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开始。
	7・2 以浜口雄幸为首的民政党内阁成立。		12・3 英、苏恢复邦交。中苏伯力议定书签字(有关中东铁路问题)。
	10・8 犬养毅就任政友会总裁。		
	10・15 政府就减低官吏薪俸一成发表声明,但因遭到官吏的反对而作罢。		
	11・1 劳农党成立,大山郁夫担任委员长。		
1930 (昭和5年)	1・11 取消禁止黄金出口令。	3・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1・20 杨格计划通过。
	2・20 举行第十七次大选,民政党成为第一大党。	4・19 英国归还威海卫。	1・21 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开幕。
	2・24 逮捕共产党。	5・30 间岛地区朝鲜人暴动。	1・28 [西班牙]里维拉独裁政权垮台。
	4・2 军令部长就伦敦条约问题直接上奏。	6・11 中共采取李立三路线。	2・10 越南爆发独立运动。
	6・2 设立临时产业合理局。	7・27 长沙苏维埃政府成立,8月退出。	3・30 [德国]勃鲁宁内阁成立。
	7・1 陆军青年军官组成“樱会”。	9・9 阎锡山在北平成立北平“国民政府”。	4・ 印度反英运动激化。
	7・20 全国大众党成立,麻生久任中央执行委员长。	10・6 上述政府垮台。	6・30 法军从莱茵河非武装地带撤退完毕。
		10・9 张学良就任国民党政府海陆空军副司令。	9・14 [独]经过大选,纳粹党跃居第二大党。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年 ()	10• 1	樞密院通过倫敦条約諮詢案。	11•	蔣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一次“圍剿”，次年1月被徹底粉碎。		
	10•26	台灣發生霧社暴动事件。				
	10•30	安岡正篤創辦金鷄学院。				
	11•14	浜口首相被左乡屋留雄刺伤。				
1931 (昭 和	1•	南滿鐵路理事木村就鐵路問題同張学良开始談判。	2•25	中日两国就南京、汉口两事件进行換文。	3•19	德、奥签订关税同盟。
	1•	井上日召等人开始組織血盟团。	2•	蔣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圍剿”。	3•28	德国發布紧急令，停止宪法中保障人权的一部分条款。
	2• 3	在众議院的会上，發生幣原外务相失言問題。	5•28	汪精衛等成立广州政府。	4•14	西班牙廢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
	3•	三月事件未实现即被揭露。	6•27	在中国东北發生日軍中村大尉被杀事件。	5•11	奥地利信用公司倒閉。
	4•13	浜口內閣总辞职。	7• 2	在中国东北發生万宝山事件。	6• 5	〔德国〕發布紧急总統令。
	4•14	以若槻为首的民政党内閣成立。	7•12	上海各团体通过关于断绝对日經濟关系的決議。	6•20	美国总统胡佛發表允許德国緩期一年支付賠償的声明。
	4•	日本共产党發表“政治綱領草案”。	7•	蔣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圍剿”。	7•13	〔德国〕銀行停止营业，金融危机爆發。
	4•	橘孝三郎組成愛乡塾。	9•18	九•一八事变爆發。	8•25	英国成立国民內閣。
	5•27	公布官吏減薪方案。	9•20	日本駐朝鮮部队开赴中国东北。	9• 1	智利海軍發動叛乱。
	6•28	大日本生产党成立，內田良平任總裁。	9•21	南京政府要求国际联盟調停中日糾紛。	9•13	〔奥地利〕法西斯分子掀起暴动。
	6•	第十六师团移駐南朝鮮。	9•23	蔣介石“劝告”各界停止反日运动。	9•21	英国停止金本位制。

6	年)	<p>7. 4 在日本帝国主义鼓 动下, 朝鮮各地發 生襲击华侨事件。</p> <p>8. 4 南陆相有关“滿蒙” 問題的訓話造成政 治問題。</p> <p>10. 27 无产階級文化联盟 成立。</p> <p>10. 十月事件未实现即 被揭露。</p> <p>11. 2 社会青年同盟組織 譴責財閥搶購美元 的示威游行。</p> <p>11. 21 安达內务相發表声 明主張成立联合內 閣。</p> <p>12. 11 若槻內閣总辞职。</p> <p>12. 13 以犬养毅为首的政 友会內閣成立。安 达、中野等人退出 民政党。</p> <p>12. 14 停止兌現, 再度禁 止黄金出口。</p> <p>12. 23 閑院宮就任參謀总 長。</p>	<p>9. 28 沈阳地方治安維持 会發表“独立宣 言”, 接着, 东北各 地相繼發表同类宣 言。</p> <p>10. 1 南京、广州两政府 妥协。</p>	<p>12. 9 西班牙發布共和国 宪法。</p> <p>12. 10 英国通过威斯敏斯 特法。</p>
1932	(昭	<p>1. 8 在櫻田門附近發生 謀刺天皇事件。</p> <p>1. 安岡正篤等人組成 国維会。</p> <p>2. 2 伏見宮就任軍令部 長。</p> <p>2. 9 前大藏相井上准之 助被暗杀。</p> <p>2. 11 大川周明等人組成 神武会。</p>	<p>1. 3 日軍占領錦州。</p> <p>1. 14 李頓任国际联盟調 查委員會委員長, 負責調查九·一八 事变。</p> <p>1. 28 發生一·二八事件。</p> <p>2. 2 英、美、法三国大使 提出关于調停一· 二八事件的共同方 案。</p>	<p>1. 7 [美国]宣布史汀生 主义。</p> <p>1. 9 德国宣布无力支付 賠款。</p> <p>2. 5 在日内瓦召开裁軍 會議。</p> <p>4. 10 [德国]兴登堡再次 当选总统。</p> <p>5. 5 [法国]总统杜麦尔 被暗杀, 魯布兰繼</p>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和 			

	<p>10•23 唯物論研究会成立。</p> <p>10•30 發生逮捕共产党事件。</p> <p>10• 大日本国防婦人会成立。</p> <p>12•22 国民同盟成立，安达謙藏任總裁。</p>		
1933	<p>2• 2 長野县左翼教員被捕。</p> <p>2•20 小林多喜二在筑地警察署被虐杀。</p> <p>3•27 通告退出国际联盟，并發表詔書。</p> <p>4• 5 皇道会成立。</p> <p>5•10 在京都大学發生瀧川事件。</p> <p>5•16 明倫会成立。</p> <p>6• 7 佐野学、鍋山貞亲声明“轉向”(变节)。</p> <p>7•11 神兵队事件被揭露。</p> <p>9•12 海軍青年軍官通过反对对五•一五事件一案有关者的求刑的決議。</p> <p>9•14 内田外务相辞职，广田弘毅繼任。</p> <p>9•22 三井財閥声明改变方向。</p> <p>9•27 海軍軍令部条例修訂。</p> <p>10• 3 召开五相會議。</p> <p>10•15 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協議会成立。</p> <p>11• 7 召开內政會議。</p>	<p>2•25 关东州声明进犯热河。</p> <p>3• 1 伪“滿州国”發表經濟建設綱要。</p> <p>3•10 日本向長城綫展开总攻击，張学良下野。</p> <p>4• 1 伪“滿洲国”对不承認国家实行“关门”。</p> <p>4•12 英国通告廢弃日印通商条約。</p> <p>5• 6 苏联向伪“滿”提示出售中东铁路。</p> <p>5•26 馮玉祥組成抗日民众同盟軍。</p> <p>5•31 塘沽停战协定签字。</p> <p>6• 7 国际联盟通过关于不承認“滿洲国”的报告書。</p> <p>7•18 国际联盟决定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p> <p>8• 8 日軍撤至長城綫。</p> <p>8•13 蔣介石召开廬山會議，决定緩和抗日。</p> <p>9•25 在西姆拉举行日印会談。</p>	<p>1•30 [德国]希特勒內閣成立。</p> <p>2•24 国际联盟通过不承認“滿洲国”的決議。</p> <p>2•27 [德国]發生放火燒毀国会事件。</p> <p>2•28 [德国]總統發布关于镇压共产党的紧急命令。</p> <p>3• 4 [美国]罗斯福就任總統，开始实行“新政”。</p> <p>3• 4 英意举行羅馬会谈。</p> <p>3•21 英法举行巴黎会谈。</p> <p>3•24 德国国会承認希特勒的独裁权。</p> <p>美国發生金融危机。</p> <p>6•12 在倫敦举行世界經濟會議。</p> <p>6•22 納粹勒令社会民主党解散。</p> <p>6•27 [德国]国权党解散。在哥本哈根召开世界反战大会。</p>

(昭

和

8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年 ()	11•16 举行政民两党志願者懇談会。 12• 9 陆海軍两省就“离間軍民运动”發出警告。	10•21 关东軍特务部公布“滿洲国”产业統制計劃。 10• 蔣介石向苏区进行第五次“圍剿”。 11•20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	7•14 納粹一党独裁确立。 7•15 英法德意四国协定签字。 9•12 苏意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9•21 [奥地利]陶尔斐斯法西斯体制确立。 10•14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11•16 苏美建立邦交。 12•30 法国發生斯达維斯基事件。
1934 (昭 和)	1•17 时事新报报道“番町会”問題。 1•23 荒木陆相辞职，林銑十郎繼任。 1•25 鋼鐵业实行合并。 2• 8 中島商相因足利尊氏問題辞职。 3•12 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解散。 4•17 关于对华援助問題發表天羽声明。 5•19 黑田大藏次官因“帝国人造絲公司”事件被捕。 5•21 設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6• 1 設置文部省思想局。 6• 日本工会全国協議会指导部成員被捕。 7• 3 斋藤內閣总辞职。	2•19 蔣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 3• 1 伪“滿”实行帝制，改元康德。 3•24 美国承認菲律宾独立。 4• 6 蔣介石、汪精衛、黄郛举行南昌會議，决定采取亲日政策。 5•19 薩尔瓦多承認伪“滿洲国”。 6• 伪“滿”發表声明欢迎民間資本。 6• 1 华北与伪滿通車問題解决。 7•12 日印通商条約签字。 8•12 苏联和伪滿关于出售中东路問題的談判决裂。	1•26 德波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1•27 [法国]旭当內閣总辞职。 1•30 达拉第內閣成立。 2• 6 [法国]發生2月6日事件、反法西斯大罢工。 2• 9 [法国]杜美格右翼內閣成立。 2•16 苏英通商条約签字。 6•15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举行会談。 6•30 納粹清党。 7• 9 英法举行倫敦会談。 7•19 [美国]發生旧金山大罢工。 7•25 [奥地利]陶尔斐斯被暗杀。

9	<p>7. 8 岡田啓介內閣成立，政友会拒絕合作。</p> <p>9. 12 关东厅 職員就在“滿”机构改革問題通过总 辞职的決議。</p> <p>10. 1 陸軍省新聞班印發《国防的根本精神及其加强》。</p> <p>10. 20 陸軍士官学校事件被揭露。</p> <p>11. 27 藤井大藏相 辞职，高桥是清繼任。</p> <p>11. 18 工会全国評議會成立。</p> <p>12. 11 改革在“滿”机构，設对“滿”事務局。</p> <p>12. 29 通告廢弃華盛頓条約。</p>	<p>8. 30 国民党撤銷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p> <p>10. 中国紅軍开始長征。</p> <p>11. 国民党軍占領瑞金。</p>	<p>7. 27 [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决定采取联合行动。</p> <p>8. 2 德国总统兴登堡病歿，希特勒繼任。</p> <p>9. 18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p> <p>10. 5 [西班牙]發生反法西斯起义。</p> <p>10. 9 法国外交部長巴都、南斯拉夫国王被暗杀。</p> <p>11. 9 [法国]弗兰丹內閣成立。</p> <p>12. 1 [苏联]發生基洛夫被暗杀事件。</p> <p>12. 5 埃塞俄比亞發生华爾华爾事件。</p>
1935	<p>1. 28 町田忠治就任民政党總裁。</p> <p>2. 28 美濃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說引起政治問題。</p> <p>3. 23 众議院通过关于明确国体的決議。</p> <p>3. 26 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开始生效。</p> <p>4. 1 在全国各地設立青年学校。</p> <p>4. 6 眞崎教育总监就明确国体問題向全陸軍致訓。</p> <p>4. 9 美濃部达吉著《宪法撮要》等書被禁</p>	<p>1. 21 苏“滿”两国就出售中东路达成協議。</p> <p>1. 中共举行遵义會議，确立毛澤东的領導。</p> <p>2. 23 出售中东路协定正式签字。</p> <p>5. 2 天津發生亲日派报社社長被暗杀事件。</p> <p>5. 29 日本駐华北軍就中国方面“違反”停战协定問題發出警告。</p> <p>6. 5 宋哲元軍捕获日本特务机关人員（張</p>	<p>1. 7 法意羅馬协定签字。</p> <p>1. 13 薩尔归屬德国。</p> <p>2. 3 英法两国發表倫敦宣言。</p> <p>3. 16 德国宣布重整軍备。</p> <p>3. 25 英德举行柏林会谈。</p> <p>3. 28 英掌璽大臣艾登訪苏。</p> <p>4. 11 英法意举行斯特萊薩会谈。</p> <p>4. 15 国际联盟召开临时理事会。</p> <p>5. 2 苏法互助条約签</p>

	立激化。 12•23 望月遞信相、内田 鉄道相等組成昭和 会。 12•26 牧野内大臣 辞职， 斋藤实繼任。	动)。 12•18 冀察政务委員会成 立，宋哲元任委員 長。 12•26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 府成立。 12•30 德王宣布内蒙“独 立”。	
1936 (昭 和 11 年)	1•15 全日本劳动总同盟 成立。 1•21 广田外务相發表对 华三原則。 1•24 暗杀渡边教育总监 阴謀被揭發。 2•20 举行第十九次大 选，民政党成为第 一大党，社会大众 党获得十八个議 席。陆軍省决定将 第一、第十二两师 团派往“滿洲”，几 天以后便發生“二 •二六”事件。	1•22 南京政府声明不承 認日本对华三原 則。 2•14 苏联封閉駐沈阳总 領事館。	1•16 [西班牙]人民战綫 結成。 [法国]沙路内閣成 立。 2•14 [法国]解散法西斯 团体。 2•16 举行大选，屬于人 民战綫的党派获 胜。 2•19 [西班牙]人民战綫 政府成立。

附录(二) 資料

田中义一大將的“奏議”

(1927年7月25日)

內閣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率領群臣誠惶誠恐謹以我帝国对“滿蒙”积极的根本政策奏聞。

对“滿蒙”的积极政策

所謂“滿蒙”就是指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及内外蒙古而言。这里，不仅地广人稀令人歆羨，而农矿森林的丰富也是世界无比。因此，我国为了开发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永久繁荣，特設“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①，在假借中日共存共荣的美名下，对该地的铁路、海运、森林、鉄矿、农业、畜产等各方面投資达四亿四千万日圓，这个企业实在是我国企业中規模最龐大的一个。

回顧在华盛顿會議簽訂九国条約以来，我国向“滿蒙”的扩展事事受到限制，因此国内上下輿論为之譁然。九国条約本来是在美国的主持下簽訂的，附議各国对我国在“滿蒙”势力的增長并不反对，而認為国际貿易及投資利益借此可以得到保护。

东三省是亞洲的一个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我日本如欲保护自己的安全，并进而保护他国居民的安全，就必须使用鉄血，这样才能突破当前的困难局面。然而，如果采取鉄血主义来保全东三省，那么第三者的美国必将受到中国以夷制夷的煽动，起来制止我国。这样一来，我国就要被迫与美国进行角逐。

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須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异族的民族

① 即“南滿鉄路公司”。——譯者。

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日本帝国存立上的必要大事。

考虑我国現状和将来，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須采取積極夺取“滿蒙”利权的方針，并借利权發展貿易。这样，不仅能制止中国工业的發展，还能避免欧美势力的东漸，良策妙計莫过于此。

“滿蒙”利权果真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滿蒙”作基地，假借貿易来征服中国四百余州，就可以利用“滿蒙”的权利作为司令塔来攫取整个中国富源，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島，并进而征服中小亞細亞以及欧洲。我大和民族为了向亞洲大陸發展，第一个重大關鍵就在于掌握“滿蒙”利权。

为建立昭和新政并实现我帝国的恒久兴盛，采取積極夺取“滿蒙”利权的政策是惟一办法。

“滿蒙”并非中国領土

最不幸的是：日俄战争时，我国在宣战布告上明确承認“滿蒙”是中国領土，而在华盛顿會議上簽訂的九国条約也認為“滿蒙”是中国領土，因此在外交上不得不承認中国的主权。由于以上二个錯誤，給我国在“滿蒙”权益遺留下禍患。

我国今后要利用一切机会，使全世界知曉有关“滿蒙”主权的“真相”，并趁着机会以漸进方式向内外蒙古擴張以使大陆得到“新生”。

对于南北“滿洲”的利权，除应根据二十一条勇往直前外，应依下列附帶利权，扩充我国既得权利，以便永久享有其利益。

- 一、三十年商租期限滿期以后，自由地加以展期，并使对方確認經营商、工、农等业的土地商租权；
- 二、日本人在东部內蒙古可以自由居住往来和經營各种工商业，在出入“南北滿”时中国方面不得依中国法律进行征稅或檢查；
- 三、取得对奉天，吉林等地的十九处鉄矿、煤矿的开采权及森林采伐权；
- 四、在“滿洲”及东部蒙古的鉄路修筑权及鉄路借款的优先权；
- 五、政治、經濟、軍事顧問和教官的增聘及雇佣的优先权；
- 六、为管理朝鮮人民的我国警察駐在权；
- 七、将吉長鉄路的經營管理权延長九十九年；
- 八、特产物的專卖权及对欧美貿易貨品运输的优先权；
- 九、黑龙江(省)矿产的全部开采权；

- 十、吉会，長大鉄路的修筑权；
- 十一、收回中东鉄路时提供借款的特权；
- 十二、安东，营口的港权及运输联络权；
- 十三、东三省中央銀行的設立及合办权；
- 十四、畜牧权。

对内外蒙古的积极政策

现在，圖什业圖王府內有我退伍軍人十九名，已从王府取得土地購買权、羊毛收購权、矿山开采权等，这些都已成为我国的先取权。此外，已将多数退伍軍人秘密派往該地，为了避免引起奉天政府的嫌疑，使其經常穿着中国服装分散在該王府轄区内从事开垦、畜牧和收購羊毛等工作。

这样，一旦时机到来，内外蒙古即将归于我国所有。为此对于蒙古，拟自本年度起，从陸軍机密費中撥出一百万圓左右，急速派遣軍人四百名，化装为教师或中国人，潛入内外蒙古，拉攏一切旧王公，攫取該地的畜牧、矿山等，以便为国家树立百年大計。

对朝鮮移民的奖励和保护政策

“滿蒙”各地資源丰富，适于朝鮮人移居，因此朝鮮人移居者日益增多，目前居住在东三省的朝鮮人已达一百万人以上。

为能使移居“滿蒙”的朝鮮人达到二百五十万人以上，一旦有事，即令朝鮮人进行軍事活动，同时还可以取締为名对他們的行动加以援助。

另外，还可以“东拓”^①和“滿鉄”^②作为后盾，在經濟和金融方面对朝鮮人进行援助，借朝鮮人的力量来开发内外蒙古并掌握其商业权。

这就是說，朝鮮人侵入“滿蒙”显然对帝国的国防、經濟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今后要由政府大力加以援助俾其成功，以为帝国發展制造新机会。特别是根据石井一藍辛协定所取得的我国对滿蒙的特殊地位，在华盛顿會議上已經放弃，幸而朝鮮人移居者日益增多，其投資也日益增長，这样，石井一藍辛协定上規定的特权，就可以利用朝鮮移民的新問題而加以恢复；而对于这种情况，从法理上說，在国际間沒有任何人可以反对我国。

新大陆的開發和“滿蒙”的鉄路

交通既是国际交往的工具和战争胜利的保証，又是經濟上的堡壘。我国

①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簡称。——譯者

② “南滿洲鉄道株式会社”的簡称。——譯者

所修建的鐵路大部分在“南滿”，尚未進入物產豐富的北滿，這是特別遺憾的。

“南滿”地方居住着很多中國人，這對於我國的國防和經濟是不利的。我國如欲開發其富源和鞏固國防，必須大力建設“北滿”的鐵路。

已有的“滿鐵”路線，主要是經濟性的鐵路，而非循環線路，極不適於戰時動員和軍事運輸。

在中國自己建設的鐵路方面，以吉林省政府的財力而言，不久將來即可建設運輸能力強大的鐵路，如果再利用奉天(省)和黑龍江(省)的財力進行鐵路建設，中國方面鐵路的力量，不久將凌駕“滿鐵”之上，必然會產生激烈的競爭。然而，奉天省目前經濟紊亂，除非我國出力救濟，否則無力恢復。

我國利用這一時機，勇往直前以完成我國的修建鐵路的目的，同時，如果再極力進行煽動，使“奉票”進一步暴跌，那麼，奉天政府的財政必然重蹈赤俄財政的覆轍，這是拭目可待的，到那時，他們也就沒有能力開發“滿蒙”了。

唯有中東鐵路的勢力是很難打倒的，並且不幸的是這條鐵路線和滿鐵成“丁”字形，丁字形固然也有有利的方面，但對軍事的進展上卻是十分不利的。

幸而赤俄的勢力日衰，已無力向滿蒙擴張，毫無疑問，今後中國的鐵路建設必將聽從日本的指示。

赤俄雖然國力日衰，但對滿蒙擴張的野心並未停止。其一舉一動都是妨害我國的擴張和“滿鐵”的利益。我國必須極力防止赤俄的擴張。

我國首先應該以防止赤俄南下為口實，逐漸向“北滿”強行擴張以便攫取其資源，南面，要制止中國勢力北上；北面，要制止赤俄勢力南下。為了對赤俄的政治和經濟進行鬥爭，應該使中國站在表面，我國在背後加以監督，以防禦赤俄勢力的擴張。同時，還要採取機密手段和赤俄合作，以防止中國勢力的增長，和維護我國在“滿蒙”的既得權益。

前几年，我國后藤新平主張恢復日俄邦交及邀請越飛來訪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利用俄國牽制中國。

我國對於“滿蒙”，不能單單依靠“滿鐵”而得到滿足。

鑒於我國擴張的現況和將來，必須獨占南北滿鐵路。特別是擁有巨大富源的“北滿”及東蒙古方面，對我國說來，發展余地很大而且有利。因為在“南滿”，中國人日益增多，無論政治上或經濟上我國都處於日趨不利的狀態，所以必須迅速進入“北滿”的地盤，以謀國家的百年興隆之計。

我國在最近將來，一定要在“北滿”和赤俄發生衝突，那時，可以按照日俄戰爭的前例，如同當時獲得“滿鐵”和大連那樣，獲得中東鐵路和吉林。為了

取得“北滿”的富源，我国再一次在“南滿”的曠野上与俄国展开斗争，将是我国国运發展上势所难免的。

我国亟欲完成的“滿蒙”铁路如下：

通辽—热河铁路

这条铁道一旦建成，对于我国开发内蒙古将有很大贡献，在“滿蒙”的所有铁路中，它是在军事上和經濟上价值最大的一条。

要想同内外蒙古王公取得充分联系，非依靠这条铁路不可。也就是说，我帝国主义在内外蒙古的盛衰，完全取决于这条铁路。

洮南—索倫铁路

这条铁路一旦建成，我驻“南滿”的军队就可以通过这条铁路綫插进赤俄的背后，同时还能阻止赤俄軍向北滿增援。

我們可以强迫蒙古王公制定一項防止中国人侵入的法律。只要能够使已侵入的中国人得不到安居乐业，他們也就自然离开。除此以外，我国如能积极采取其他防止办法，就可能使中国人无从进入蒙古。

長春—洮南铁路

因为“滿蒙”的富源全部集中在“北滿”，如果这条铁路建成，那么北滿及蒙古的富源将全部归我所有，沿綫地区还可能容纳我移民二、三十万人。

将来吉林、敦化和我朝鮮会宁綫的联运通車实现后，蒙古及“北滿”的富源即可直接运到东京和大阪，一朝有事，从我东京出兵经过日本海可以直达北滿和蒙古，中国陸軍一定无力突破北滿地区。而在日本海上，赤俄的潜水艇将不可能威胁我朝鮮海峽。这样，在食粮和原料方面，将能得到自給自足，不論同任何国家作战都可以处于自由自在的地位。

吉林—会宁铁路

以往到欧洲去的人，都要經由大連或海參崴，将来这条铁路建成后，就可以由清津港经过会宁，轉西伯利亞铁道到达欧洲，这不仅是亞洲交通的大动脉，将来不論旅客或是貨物，都要通过我們控制的地区。

我方如果掌握了这条交通的大动脉，就可以无所忌憚地侵略滿蒙，实行明治大帝吞并滿蒙的第三期計劃，实现大和民族的征服世界。

明治大帝遺策的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鮮均已实现，然而第三期吞并滿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东方及整个亞洲畏服于我，仰我鼻息的大业，尚未实现，这都是臣等之罪过。

以吉会綫和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

罗津是唯一无二的終点良港，可以成为世界貿易的良港，它一方面可以压倒赤俄的海参崴，另一方面还可以吸收北滿的丰富物产，把“滿蒙”的繁荣引进我們国内。假如在最近的将来战争爆發，我国不得不从大連港口取得富源的話，敌艦就会把对馬海峡和千島海峡加以封鎖，最后将我国打敗。

要知道，世界大战期中，美国曾和英国暗中勾結，一举一动都想牵制我国对中国的行动。为了我国的独立，不得不与美国一战，以警誡中国和全世界。

美国有呂宋艦隊，和我对馬島和千島之間只是一衣帶水之隔，可以朝發夕至。如果再派潛水艇往来游弋于对馬和千島之間，就可以切斷“滿蒙”食粮和原料对我国的供应。

如果建成吉会綫，將“南滿”、“北滿”和朝鮮形成一个大循环綫，不仅便于我軍隊和粮食的运输，同时还可以确保控制“北滿”的富源。如果“北滿”的富源能够輸送到敦賀和新泻，敌人的潛水艇不能侵入朝鮮和日本海峡，我国的战时交通 經濟就能够保持独立自主，这就是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

只要能够确保战时的食粮和原料的充分供应，无论美国海軍如何强大；中国陸軍和赤俄軍隊如何众多，最后也必然对我无可奈何，同时还可以鎮压朝鮮人在战时的反抗。

有必要改变南滿鐵路公司的經營方針

“滿鐵”由于使命既重且大，所以和历届內閣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因之內閣的更迭往往禍及“滿鐵”，而“滿鐵”的一举一动也有时累及內閣。这是由于滿鐵組織虽然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組織，而其实权則掌握在內閣的手中。由于这种原故，在国际間并不認為滿鐵是一个营利公司，而看做是一个純粹的政治机关。九国公約所以要对我“滿鐵”的發展加以限制，其原因也就在此。

再就內部来看，“滿鐵”在推行“滿蒙”的事业上，实行着有关东軍司令官、大連長官、关东州長官和总領事参加的四头政治，在大連进行討論有关这方面的机密往往被东三省执政者所探知，从而極力阻碍“滿鐵”的發展。另外，在东京作最后解决时，也时常因为外务、鐵道、財政和陸軍等各方高級官員的意見分歧，而使計劃的实行受到阻碍。

为了避免这种种不利情况，拟对“滿鐵”进行根本改革，將“滿鐵”附屬事业中职能和利益較大的單位分为独立的公司，暗中以“滿鐵”势力为背景，積極向“滿蒙”發展。另一方面，对于在“滿蒙”的全部事业，吸收中国人和欧美

人投資，使“滿鐵”單純擔任鐵路運輸業務，由我國壟斷其資本的半數以上，把握實權用以大力推行帝國的政策。“滿鐵”掌握的重要附屬事業如下：

(1) 鋼鐵問題

煉鋼事業的盛衰對國家的強弱關係很大，“滿蒙”的鐵礦有十二億噸，此外，還恰好有二十五億噸的煤。用這二十五億噸的煤可以精煉十二億噸的鋼，可以保證七十年間鋼的自給自足，而不需要仰賴他國的供應。這樣，我國就具備了作為世界上第一強國的要素。

(2) 石油問題

石油是我國最缺乏的重要產品之一，也是國家存在上的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

“滿蒙”的鐵和重油一旦歸我所有，我國的海陸軍便可一舉而成為銅牆鐵壁，因此說“滿蒙”是日本的心臟，決非虛言，這是為我綿綿皇基不勝慶幸的。

(3) 硫氨肥料及其他問題

肥料是國家食糧政策上最重要的大問題，化學肥料都是用由煤里抽出來的硫安當原料製造的。而撫順煤最適合提取硫氨。

這樣不僅能促進我國農業的發展，而且借推銷豆餅的便利，還可能征服全中國和南洋。

(4) 鹼及純鹼企業

鹼和純鹼是軍事上和化學工業上的至寶，其原料只是鹽和煤，而鹽和煤都是“滿蒙”產量最多並且價格低廉的產品，因此建立工廠進行生產，就可以壟斷這一重要工業產品，並且還可以達到我國軍用化學工業原料的自給自足。

(5) 菱鎂礦和鋁礦企業

菱鎂礦和鋁礦的開采，根據“滿鐵”和東北大學本多博士的調查，已經判明為非常有希望的企业。這兩種礦物是飛機、軍用飯盒、醫療器具及其他工業的重要原料。因為這種珍貴的產品是國防工業上不可缺少的原料，所以應該把這項企業和滿鐵分開獨立經營，並將礦石運回國內加以精煉和秘藏，以避免英美資本家的虎視眈眈。另外，若在鴨綠江流域建立水電企業，用來精煉金屬，鑒於將來航空事業的發展，可以斷言，全世界在對於航空工業資源材料的需要上，必將仰我鼻息。

以上各種企業如能獨立經營，我國大致可獲得六百億萬日圓的巨利，同時南滿的工礦業，將給予我國國防及經濟以巨大的幫助。

如使上述重要的有形事业独立经营，予以单独行动，并免受有关监督官厅的干涉，最后必然是符合帝国利益的。并且作为营利的公司来积极发展，既可以避免国际间的嫌疑，又可以缓和东三省民众的抗日。为了形成新大陆的局面，采取这样公然秘密的手段，将会感到轻便自如。

今后对“南满”的扩张，应该完全以资本主义为前锋，来压倒中国。

首先要向北满移民，以便切断中俄的亲密联系，在攫取富源的同时，制止赤俄虎视眈眈地强制中国压迫我国的企图。倘一朝有事，可令我“北满”移民向“南满”长驱直入与“南满”驻军和移民相配合，来共同完成“满蒙”大业。万一须要坚守“满蒙”时，即令我“北满”移民攫取当地资源，来供应驻在“满蒙”的军队和国内以食粮和原料。

我国今后对“满”策略，只有直入北满的一个办法，只要在“南满”采取资本主义，则不仅可以利用外国资本帮助我国开发，而且还可以缓和各国对我向北满猛进的疑惑。

有必要设立拓殖省

我国对“满蒙”经营复杂多端，因此主管官厅之间往往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以致有利于国家的事业也得不到迅速进展。并且有许多我国浪人被奉天省政府所收买，专门从事侦察我国对满蒙措施，因此，一件事尚在审议中就被中国方面所探知，从而传入全世界的耳目，很快地就引起各国舆论对我的掣肘，这样，不止一次地在对“满蒙”措施上，尝到苦头。同时，反对党也经常把在“满蒙”方面探知的情况向中央提出，以作为反对执政党的材料。

特别是在今后，我国对“满蒙”应该改变方针，以便勇往迈进，所以，有必要把领导的中心集中到东京来。这样，第一、便于保密；第二、可以防止中国政府探听机密；第三、事前可以避免招致各国疑虑；第四、可以革除对“满蒙”四头政治的流弊；第五、内阁和满蒙的关系可以趋于紧密，以便集中全力对付中国。

拟设立拓殖省，使其专管侵略满洲事项，特别要以掌管台湾、朝鲜、库页岛为名，而实际上以对满蒙扩张为目的，这样，可以蒙混世界的耳目，并防止暴露国内的不统一。

如果设立拓殖省，把对“满蒙”事务的中心集中到东京，使在“满蒙”的我国官员只能按照命令行事，而不能随地参预经营计划的话，也就自然能够严守秘密，使对方国家无从察知我拓殖秘密，国际舆论也就得不到对我进行先发制人的材料了。

对于从“滿鉄”分离出去独立經營的各种企业，如劝业公司、土地公司、信托公司等营利公司的監督及經營的权限，也划归拓殖省統一掌握，以便实现帝国向滿蒙擴張的根本政策，并完成建設新大陸的計劃。

附 件

关于田中义一請求宮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代奏積極政策一件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总理大臣 田中义一(署名)

外务大臣 田中义一(副署)

鐵道大臣 (副署)

大藏大臣 (副署)

宮内大臣 一木喜德郎台鑒

請代奏对滿蒙積極政策事

欧洲大战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經濟均感到莫大不安，其原因在于我国未能發展在“滿蒙”之特权及既得权益，以致上瀆圣慮，无所逃罪。况且当臣拜受大命之际，奉到上諭：特別对于中国及“滿蒙”之行动，必須确保我国利权，以研究进展之机会。聖旨所示，臣等不胜感泣之至。当臣在野时，即主張对“滿蒙”采取積極政策，并希望从速实现，茲为开辟东方之新局面，形成我国之新大陆，發揚昭和新政，已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凡十一日，招集与“滿蒙”有关之文武百官举行东方會議，就对“滿蒙”之積極政策作出決議。

以上請代轉奏

敬啓

櫻会旨趣書

(1930年10月1日)

一、窃察帝国現狀，万象墮于消極，进取的銳气扫地无余，明治維新以来蒸蒸日上的国运簡直要归于衰敗，实在令人悲痛憂伤不已。長此以往，不但我大和民族不能保持現有的国际地位和荣誉，其結果将使今日的强盛成为历史上的曇花一現，終于墮落到希腊、荷兰的行列，从而遺恨千載，这种趋势已經很明显了。

我国所以成为此种状态，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們不能不指出作为国家核心的为政者有重大責任。請看看他們的所作所为。他們作为国民的表率，执掌国政，理应上对陛下負有重責，但实际上，竟然忘却大本，沒有勇气奉行国

是，对于人和民族兴隆的因素——精神一面，丝毫不加以考虑，只知追求政权和物质利益，上则蒙蔽圣明，下则欺骗国民，政界的腐败每况愈下，至此已达极点。

全体国民对此弊风虽然有所察觉，但被当下消极沉郁的社会风气所同化，已不能有所反应，不可能要求他们拿出勇气和决心来清扫政界的暗云，铲除邦国的祸根，不独如此，在全体国民正自掘坟墓的时候，只有左倾团体显示出一种奇怪现象，这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而且现在这种腐败透顶的政党者之流的毒刃正指向军部，这一点，从伦敦条约问题上面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然而被混浊的社会风气所麻痹了的军部，对此腐败政治竟然缺乏奋起的勇气和决心，仅仅通过由那些老朽过时的人物组成的枢密院来表达自己的必须坚持的主张，这是多么可悲的现象！

军部所以陷入这样状态，原因固然不一而足，其主要原因在于：泰平日久，士风渐衰，一般将校缺乏一定的主义方针和基于武士道精神的精诚团结。政党者之流不久以前向海军使用的毒刃，不久即将以裁减陆军问题强加到陆军身上，这是很明显的。因此，我们作为军部的中坚分子，必须充分加强团结，时刻本着这种精神坚持斗争，不但要有决心防止类似海军问题的错误发生，还要进一步发扬坚强的爱国热情，把腐败透顶的为政者的头脑彻底加以洗刷。

二、看看今天社会各阶层的情况，尽是一些上层为政者的悖德行为，政党的腐败，不了解群众的资本家和贵族不顾国家的将来，言论机关专门诱导国民思想趋于颓废，农村陷于荒废、失业和不景气，各种思想团体的发展，糜烂文化的空前泛滥，学生缺乏爱国心，官吏的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等等，为国家着想，实在令人寒心。然而负有纠正这些现象的重大责任的执政当局，并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连一点诚意也看不出来。因此，政府的威信愈益低落，无论在经济上、思想上或政治上，国民都是陷于不安状态，以致国民精神逐渐松懈，明治维新以来培养的元气消磨殆尽，国势日益削弱。再看外交方面，为政者已经忘掉国家百年大计，专汲汲于仰外国之鼻息，毫无对外发展的热忱，明治以来积极进取的气魄已经完全消失，在解决人口和食粮问题上束手无策，致使国民时时刻刻感受威胁。这种情况形成了横在帝国前进途上的一大暗礁，吾人大声疾呼改变这种情况，却被当政者付之一笑。这种现状，为国家前途着想，实在令人痛恨之至。

内政、外交所以陷入以上这样绝境，是由于政党者之流只知道私利私欲

以外，毫无为国为民的大計。国民和吾人都在企望着出現一种真正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真正以天皇为中心的活潑明朗的国政。吾人原屬軍人，按理說是不應該直接参与国政的，但一心报国的至誠不免随时随地要流露出来，这对于改革为政者的弊端和国力的增長可能有所裨益。吾人所以集会于此，在慨嘆国势衰微之余，惟恐違背武人的操守，实因不願有越軌行为之故也。

日本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声明

(1931年9月24日)

日本政府于9月24日关于九·一八事变發表声明如下：

- 一、帝国政府始終以敦睦日华两国的邦交，实现真正的共存共荣为对华方針，并为貫徹这一方針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幸，近几年来，在中国官民中間一再發生了刺激我国国民感情的言动，特別是在和我国有着最密切关系的“滿蒙”地区，近来不断發生不愉快的事件，以致在我国国民心目中造成了一种印象，認為中国方面对于我方友好公正的政策，并未报以同样精神，从而群情为之騷然。恰巧在这种情况下，于9月18日夜半，沈阳附近的一部分中国軍隊破坏了南滿鐵路，襲击了我国守备队，以致双方發生了冲突。
- 二、当时守衛南滿鐵路全綫的日軍总兵力不过一万零四百名，而周圍的中国軍隊竟达二十二万之多，情况异常紧急，同时，居住在該地区的一百万帝国臣民，也陷入了严重的恐慌不安之中，面对这种情况，我軍認為有必要先發制人以便鏟除危險的根源。为此，立即开始行动，排除抵抗，解除了中国軍隊的武装。至于地方治安，則在我軍督导下交由中国自治机关負責維持。
- 三、我軍在达到上述目的后，大部分已撤回并集結到鐵路附屬地內，目前在附屬地以外地区，只有沈阳城內及吉林駐有若干軍隊，另外还有其他几个地点駐有少数兵員，然而这只是为了警备并非軍事占領。至于謠傳帝国官宪占領了营口海关和盐务局；又說日本接管了四平街、郑家屯間及沈阳、新民屯間的中国鐵路等等，全是誤傳。至于謠傳我軍开往長春以北和延边地区云云，也是毫无根据。
- 四、帝国政府在9月19日召开了紧急會議，决定了竭力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針，并由陸軍大臣将这一方針下达了在“滿洲”的駐軍司令官。9月21

日會由長春派出一個部隊開到吉林，但這並非為了對該地方施行軍事占領，只是為了消除從側面對南滿鐵路的威脅。所以，一俟達到這一目的，我方出動的大部分隊伍即將返回長春。另外，事態發展到9月21日，南滿鐵路沿綫已陷於不安，針對這種情況，由朝鮮駐屯軍開出一個混成旅團計四千名，撥歸駐“滿洲”部隊司令官指揮；即便這樣，駐“滿洲”部隊的兵員總數仍未超出條約規定限額，這當然談不到在對外關係方面擴大了事態。

五、帝國政府對於“滿洲”沒有任何領土野心，這一點已無需多說。我方所要求的，歸根到底，就是帝國臣民能夠在這一地區安心從事各項和平事業，以其資本和勞力參加到開發該地區的事業中。維護本國和本國臣民應該享有的權利，是政府應盡的職責，消除對於南滿鐵路的危害，也無非是為了這一目的。當然，帝國政府在尊重日華善鄰友好方面仍將堅持既定方針，因此，為使這次不幸事件不至破壞邦交，並且為了進一步求得可以杜絕以後再發生禍患的建設性辦法，帝國有決心同中國政府進行真誠合作。如能因此而打開目前兩國間的困難局面，轉禍為福，帝國政府將感到莫大的欣慰。

日本政府關於九·一八事變的第二次聲明

（1931年10月26日）

帝國政府於10月26日關於九·一八事變發表聲明如下：

- 一、對於在10月20日提交國際聯盟理事會的有關帝國軍隊撤回滿鐵附屬地內問題以及日華開始直接交涉問題的決議案，日本理事提出了包括幾點修正意見的修正案，經10月20日進行表決的結果，上述決議案和修正案均未取得全體會議一致同意，因而未獲通過。
- 二、這次九·一八事變，完全是由於中國軍閥的挑釁行為而引起的，關於這一點，帝國政府已經一再作了闡明。目前尚有少數帝國軍隊駐在滿鐵附屬地以外的幾個地點，這是為了保護帝國臣民的生命財產，也是出於萬不得已。這樣當然不會成為迫使中國接受帝國關於解決爭執的條件的一種手段，而且帝國政府根本不想利用軍事壓力來和中國進行交涉。
- 三、帝國政府在很久以前就對於日華兩國關係全面地進行了研究，並曾利用各種機會一再表示決心，絕不允許對於構成兩國間密切、複雜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的各種因素中有关帝國國民生存的權益加以改變。不幸，近來中國的所謂收回利權運動逐漸趨於極端，並且在各種學校教科書中公然

鼓吹“排日”思想，并已發展到根深蒂固的程度。現在显然已經有了一种不顧条約和历史，甚至企圖破坏关系到帝国国民生存的权益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帝国政府單憑中国政府的保証，把軍隊全部撤回滿鐵附屬地內的話，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使帝国臣民的生命財產瀕于危險，多年以来的历史和中国目前的情况充分証明确实存在这种危險。

四、因此，帝国政府認為，为了确保在“滿”的帝国臣民的安全，唯一办法在于：首先采取措施消除两国国民的反感和疑慮，并願就为达到以上目的所必要的基本大綱与中国政府进行談判。关于此意，已由外务大臣在10月9日致駐东京中国公使照会中加以申明，另外还通知了国际联盟理事会。帝国政府坚信，只有根据以上观点才能收拾局面，所以在理事会进行討論过程中，始終一貫坚持了这种主張。帝国政府所考虑的談判的大綱是：（一）不采取互相侵略的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的領土完整；（三）、徹底取締妨害相互通商的自由和煽动仇視对方的有組織的运动；（四）、对于在“滿洲”各地的帝国臣民的一切和平事业加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条約上規定的帝国在“滿洲”的权益。帝国政府相信以上各項，完全符合国际联盟的目的和精神，應該成为維持远东和平的基础的一些应有的原則，因而必然会得到世界輿論的支持。帝国代表所以沒有把它提到国际联盟理事会上，是由于認為这个問題按其性質來說，是應該屬於日华两国直接交涉及的問題。

五、为日华两国前途着想，目前的迫切任务應該是，双方共同努力設法迅速收拾局面，以便走上共存共榮的大道。帝国政府目前仍願同中国政府，就簽訂上述旨在确立两国正常关系的基本大綱問題以及日軍撤回南滿鐵路附屬地問題，举行談判。

日本政府关于一·二八事件的声明

（1932年1月29日）

帝国政府于1月29日（昭和7年即1932年）就一、二八事件發表声明如下：

一、帝国政府曾在去年10月9日的照会中，向国民政府指出：在中国各地进行的“瘋狂”的“排日”运动，是在組織上和实际上与国民政府职权很难划分的国民党党部直接或間接领导下，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来进行的一种不使用武力的敌对行为，同时要求国民政府不但对于党部及其领导下的各

种“排日”团体的策动加以制止，还要取締其他的排日运动，以及采取必要和有效措施以保护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利益。其后又曾迭次向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重申上述要求并提醒对方严重注意。

二、然而，国民政府对于接受帝国的上述要求不仅没有诚意，甚至认为中国官民对于帝国及帝国臣民的“不法”行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并采取一种鼓励的态度，致使“排日”运动变本加厉，特别是近来，不仅在广州、青岛、福州等地发生了杀害帝国臣民事件及侮辱帝国官吏事件，甚至还发生了中国许多报纸登载对我皇室“不敬”的消息这样事件。

三、特别是在上海，抗日会本部和其他各种排日团体的活动最为“猖狂”，尤其最近发生了国民日报刊登“不敬”消息的事件和杀伤日莲宗僧侣的事件等以来，事态日趋恶化。为此，驻上海帝国总领事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了有关取締排日运动及其他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都是公正合理的，但中国方面却迟迟不作答复，另一方面竟然向上海地区集结军队，摆出一种威胁我方的姿态，使得我国侨民感到极大危险。

四、不过，至28日午后三时中国方面终于接受了我方的要求。尽管如此，因鉴于中国方面的一贯手法，在监督其履行诺言的同时并严加戒备，以防“不法”分子进行策动，另一方面，因为公共租界工部局也鉴于驻在公共租界附近的中国军队中有不稳行动，于是就在当日午后四时发布了戒严令。因此，各国驻军也都根据共同防务计划进入各自分担的警备区段。我陆战队也从27日午前零时起开往分担的防区——北四川路的两侧。正在这时，突然遭到中国正规军的开枪射击，不得已只好应战。现在，我方正继续要求中国当局从我国侨民居住地附近把它的军队撤走。

五、这次我国海军在上海方面采取的行动，和以往列强曾多次地在该地采取的武力行动相同，完全是以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其他我方权益为目的，并无其他用意。同时这次派兵，只是鉴于以往我方驻在上海的陆战队人数少于英、美、法等国的驻军，为了适应事态发展而进行的一种增援。我方当然是坚持同列国合作的方针，在当地的帝国官宪正与有关各国的领事、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各国驻军保持密切联系。毋须赘言，我方不仅对上海地区无任何政治野心，同时对于各国的权利和利益也毫无侵害的企图。

日“滿”議定書

(1932年9月15日)

因为日本国已經確認“滿洲国”是一个根据居民的自由意志而成立的独立的国家这一事实;

因为“滿洲国”已經發表宣言表示中华民国所簽訂的国际条約和协定凡是可能适用于“滿洲国”的,一概予以尊重;

日本国政府和“滿洲国”政府为了永远巩固日“滿”两国的善邻关系,互相尊重領土,确保东亚和平,簽訂如下协定:

一、“滿洲国”除将来日“滿”两国另行簽訂协定外,应確認尊重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滿洲国”境内,根据既存的日中两国間的条約、协定及其他条款和公私契約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利益。

二、日本国和“滿洲国”確認对于締約国一方的安全和独立的威胁,同时构成对于另一方的威胁这一事实,两国約定共同担任国家的防衛,为此目的所需要的日本国軍隊应駐在“滿洲国”內。

本議定書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本議定書用日文及汉文各作成两份。对于日文正文与汉文正文的解釋發生分歧时,以日文正文为准。

作为以上的証据,由下列人員各受本国政府的正式委任,在本議定書上签名盖章。

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即“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于“新京”。(全权姓名从略)。

关于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

(1933年3月27日)

关于帝国根据国际联盟規約第一条第三項退出国际联盟的下开通告文,已于昭和八年(1933年)3月27日由外务大臣电告国际联盟秘書長。(英文原文从略)

“帝国政府認為帝国关于力求确保东亚和平并进而对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的决心是与謀求各国間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联盟的使命精神相同,在过去十三年間,作为国联會員国及常任理事国,一貫为达成这一崇高目的而进行

了合作，这是引为欣快的。在此期間，帝国經常以不亞于任何国家的热誠参加了国联的事业，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同时，帝国政府鑒于目前国际社会的情势，确信为了維持世界各地的和平，應該針對各該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运用国联規約，只有根据这样公正的方針，才能完成国联的使命，提高国联的威信。

昭和6年9月，当“日华事件”提交国联以后，帝国政府始終根据上述信念，在国联的历次會議上以及其他机会建議国联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應該采取公正妥当的方法，以便加强东亚和平，同时为了發揚国联的威信，必須正确地掌握該方面的实际情况，針對这种情况来运用規約，并一再強調必須考虑到以下情况：中国并非完全統一的国家，其国内情形及国际关系極為复杂紛繁，其中包含着許多反常和例外現象，从而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因此，作为一般国际关系准則的国际法的各項原則和慣例，在适用于中国的时候，就要加以很大的改变，其結果，已經在事实上形成了特殊的和异乎寻常的国际慣例。

然而，从国联在过去十七个月間的審議經過可以明显地看到，不仅多数會員国沒有掌握东亚的实际情况，或者沒有面对这种现实而加以应有的考虑，同时在适用、特別是解釋国联規約及其他各种条約及国际法的各項原則方面，帝国与这些會員国之間，也常常發生重大的意見分歧。其結果，在本年2月24日召开的临时大会上通过的報告書，不仅无視了除确保东亚和平以外別无任何企圖的帝国的精神，同时在对事实的認定上以及据此而下的結論上，都犯了严重的錯誤。尤其是对9月18日事件当时及以后日本軍的行动，臆断为不是出于自衛权，也沒有看到該事件以前的緊張局势和事件以后事态恶化的責任完全在于中国方面，这就給东亚政局造成了新的糾紛原因。另一方面，也无視“滿洲国”成立的真相，否定帝国承認該“国”的立場，这是蓄意破坏稳定东亚局势的基础。特別是在報告書的劝告部分中提出的条件，对于确保东亚和平毫无补益，这在本年2月25日的帝国申述書中已經詳細提到了。

总之，多数會員国在处理日华事件上，只能被看成不是为了在实际上确保和平，而是把不能适用的方式看成比“现实地”确保和平更加重要了；把維護脱离实际的理論比鏟除将来紛爭的禍根更加宝貴。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这些會員国与帝国之間，在解釋規約及其他条約上面也存在着重大的意見分歧，根据以上情况，帝国政府已經確認，在維護和平的方式方法上，特別是在确立东亚和平的根本方針上，帝国政府与国联見解主張完全不同。因此，帝国

政府相信已經沒有与国联繼續合作的余地，这样，帝国只好根据国联規約第一条第三項規定退出国际联盟，特此通告。

〔以上根据外务省情报部編“‘滿洲’事变及上海事件有关文件集”（昭和9年即1934年）〕

关于退出国际联盟的詔書

（1933年3月27日）

朕惟曩者世界和平恢复，国际联盟宣告成立，我皇考即表示欢迎，命我帝国参加。朕繼承遺緒不敢稍懈，前后十有三年，始終坚持同国联之合作。

此次“滿洲”国成立，帝国認為尊重該国独立，促使其健全發展，乃消除东亚禍根，保持世界和平之基础。然而不幸，国联意見与此背馳。朕乃命我政府慎重进行申議，終于不得不决定退出国联。

虽然如此，朕迫切祈求国际和平能以确立，是以对于有关和平之一切企圖，今后仍願提供合作。今虽与国联分手，实践帝国之主張，固非偏重东亚而輕視友邦之誼；而应愈益立信于国际，显揚大义于宇內，此朕夙夜考虑者也。

方今，列国正处于稀有之变局，帝国亦遭遇非常之时艰，此正举国振奋之秋也。尔等臣民宜深体朕意，文武百官恪守职分，众庶人民勤务生业，履正执中，齐心向前，以应此时局，进而翼成皇祖考之聖猷，增进全体人类之福祉，欽此。

情报部長关于对中国的国际援助問題發表的

非正式談話（天羽声明）

（1934年4月17日）

甲、4月17日情报部長在定期記者招待会上，就日本在东亚的立場向记者們作了大意如下的非正式談話。

日本为了“九·一八事变”及“滿洲国”問題，在去年三月，迫不得已發出了退出国联的通告。这是因为在維護东亚和平的根本意义上，日本与国际联盟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不用說，日本一貫致力于保持和增进与各国之間的友好关系，但是，对于东亚問題，它的立場和使命，可能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对于維護东亚的和平及秩序，日本應該同东亚各国共同負責。日本有决心完成

維護東亞的和平及秩序的使命，為了完成這個使命，日本必須首先與友邦中國共同努力來維持和平及秩序。

因此，日本迫切希望中國保持獨立、完成統一以及恢復秩序。然而從歷史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要想保持獨立、實現統一以及恢復秩序，只有依靠中國本身的覺醒和努力。所以，如果中國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採取違反東亞和平的措施，或者採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等等，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對了。另一方面，各國也應該考慮到由於“滿洲事變”、“一·二八事件”所產生的特殊狀態，如果企圖對中國採取共同行動，即使在名目上是財政性或者技術性援助，但是不可避免地將具有政治意義。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其結果，將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或者造成國際共管或國際瓜分的開端，這樣不僅會給中國帶來莫大的不幸，而且還有可能給東亞的安全，以及給日本帶來嚴重後果。因此，日本在原則上不能不反對這種做法。但是如果其他各國個別地同中國進行經濟通商貿易，只要不妨礙東亞的和平及秩序，也就沒有必要加以干涉。不過，如果這種活動具有擾亂東亞和平及秩序的性質，那就不能不加以反對。例如，向中國供應武器、軍用飛機、派遣軍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其結果顯然是要離間中國與日本及其他各國之間的關係，違反維護東亞和平及秩序的利益的，所以對於這些，日本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以上所述是從日本一貫的方針所必然得出的結論。而最近有迹象表明某些國家假借共同援助的名義，積極向中國進行擴張。由於這種原故，相信現在來闡明一下日本的立場，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乙、4月20日情報部長在外国新聞記者定期招待會上答復問題時，關於上述談話，作了如下的說明。

我對於前些時候發表的談話在海外引起的反應，感到意外。那個談話不過是把今年1月外務大臣在議會里發表的演說的精神加以引伸罷了，而那次演說是受到了全世界的歡迎。

外務大臣在議會上說：

“帝國是維護東亞和平的唯一基石，負有完全責任，因此我們一天也不應該忘記這一點”。又說：

“如果美國方面也能充分認識到東亞的複雜而特殊的情況，能夠了解我國為什麼是東亞和平的安定勢力的話，確信日美間感情上的緊張狀態就會自然緩和下去。”又說：

“帝國政府對於維護東亞和平感到有重大責任，並且具有堅定的決心。”

等等。

日本无意侵害中国独立和利益。日本希望中国能够保持独立,实现统一和繁荣。如果中国得到统一和繁荣,由于地理上的关系和所处的位置,日本是可以分享到这种利益的。然而实现统一和繁荣,要靠中国自己的觉醒和努力,不能依赖别国的利己主义的开发。

日本无意侵害第三国的权利。日本欢迎第三国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和中国通商贸易。日本根本不想无视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以及现行有效的各项协定。但是日本反对各国采取任何形式的、足以危及东亚和平秩序的行动。日本对于维护东亚的和平秩序,是与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共同负责的。其他各国或国联对中国实行利己主义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丙、4月26日外务大臣对于英、美两国驻日大使的质询,答称4月20日主管官员的回答大体上说明了帝国政府的立场,提交了回答提纲的译文如下:

(一)日本从未侵害过中国的独立和利益,同时也没有这种意图。不仅如此,日本还衷心希望中国能够保持独立,实现统一和繁荣。然而中国的保持独立,实现统一和繁荣,原则上要靠中国自己的觉醒和努力。

(二)日本无意侵害第三国在中国的 any 利益。第三国从善意出发,通过通商贸易与中国来往,将给中国带来利益,这倒是日本所欢迎的。日本从来就支持关于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并且遵守有关中国的现行有效的各种条约及协定。

(三)然而,日本对于任何国家采取任何形式的违反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都不能置之不理。日本考虑到它在东亚所处的地理上的地位,对于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秩序最为关切。因此,在中国问题上,对于任何第三者不考虑上述情况,而利用中国来推行利己主义的政策,都不能置若罔闻。

[根据“外务省公布文件集”第十三辑]

塘沽停战协定

(1933年5月31日)

5月31日下午四时在塘沽,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25日在密云接受了何应钦通过其代表徐燕谋参谋提出的关于停战的正式提

議。根据这一决定，关东軍代表陸軍少将岡村和关东軍副參謀与华北地区中国陸軍代表陸軍中将熊斌于5月31日在塘沽簽訂了如下的停战协定。

1. 所有中国陸軍应即速撤到連接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鎮、宁河、蘆台的一綫以西及以南地区，以后不再越过該綫前进，亦不进行任何挑衅扰乱行为。
2. 日本軍为了確認第一項的履行情况，将随时利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进行視察，中国方面应对此給予保护和各种便利。
3. 日本軍確認中国軍已經履行第一項規定后，将不越过上述中国軍的撤退綫繼續进攻，而自动地撤到長城綫一带。
4. 長城以南，屬於第一項中所規定的一綫以北及以东地区的治安維持工作，由中国方面警察担任。
5. 本协定签字后生效。

〔根据昭和8年(1933年)6月1日“东京朝日新聞”〕

政府关于明确国体的声明

(1935年8月3日)

伏惟我国国体，已經在天孙降临时所賜神敕中有了昭示：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統治国家，宝祚兴隆与天地同样長久。因此，在关于頒布宪法的上諭中說：“統治国家之大权，系朕繼承于祖宗而傳之子孙者也”，宪法第一条明确規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这就是說，大日本帝国的統治大权屬於天皇，这一点十分明确。如果認為統治权不屬於天皇，而天皇不过是行使这一权力的一个机关，那便是完全違反万邦无比的我国国体本义的。

近来在解釋宪法的学說方面，关于国体的本义，竟然發生了各种各样的議論，这是不胜遺憾的。政府抱定决心要作进一步努力来明确国体，并發揚其精华，茲将此意公布周知，希望各方面广泛予以协助。

〔根据昭和10年(1935年)8月4日“东京朝日新聞”〕

政府关于明确国体的第二次声明

(1935年10月15日)

不久以前，政府曾就国体的本义作了闡明，借以指明方向，以期愈益發揚国体的精华。天皇为我国統治权之主体，这是我国国体之本义，也是帝国臣民

坚定不移之信念。伏察有关帝国宪法的上諭及条章的精神亦在于此。然而，有人随便援引外国的事例、学說来与我国国体相比拟，竟然認為統治权的主体不是天皇而是国家，天皇只是国家的一个机关，而主張所謂天皇机关說，这是与我国的神聖国体相悖謬，严重違反国体的本义，必須徹底加以鏟除。政教及其他百般事宜，必須以万邦无比的我国国体本义为基础，并發揚其真髓。政府根据上述信念，再次闡明意圖所在，以使国体觀念更加明确，并坚决竭尽一切努力来保証收到实效。

【根据昭和10年(1935年)10月16日“东京朝日新聞”】

統一書号: 11017·89
定 价: 1.10 元